

一、历史的流程

真实的东西本来是独一无二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显然存在两个。良心是这样，正义也如此。大阴谋、肉欲、掠夺、强奸……任何恶党都无法战胜的战争的野蛮改变着历史的车轮，人类要想摆脱伪善和堕落是永远不可能的。虽说拿破仑的词典里没有不可能的字样，但其实那不过是人类炫耀其伪善的梦呓而已。

知道地球彼端生活着什么人的古代人，只有来往于艰险、遥远的丝绸之路的有限的极少数商人。

当然，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大王的远征，从 1096 年开始进行的数次十字军东征，以及 1219 年成吉思汗西征，使东西文化得到了交流。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只是渺小的一部分，好像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但是，从进入 19 世纪开始，交通和通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现在我们脚下的这个地球已经变成了很小很小的土丘，在核战争的恐怖之中仍形成了地球村。

从这个视角观察、发掘历史也许是一场恶梦，那时，我们的祖先尚在沉睡，不知遭受过多少屈辱。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不久的 1498 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从里斯本起航，绕过好望角，来到桑给巴尔，后到达印度的卡利库特。他们是为了赚钱才乘船出海冒险的，当时没有一个人预见到他们的梦想会在地球上埋下可怕的祸根和不幸。不过，他们的冒险活动成了今天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分化为难以

弥合的两个优劣世界的契机。

1619年，美洲大陆大约发现100年之后，29名黑人被荷兰人贩子用船运到了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第二年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在美国历史上记录下又一个基点。

另外，新航路一开通，1505年，葡萄牙首任印度总督阿尔美塔便走马上任。4年后，阿尔美塔击溃了阿拉伯联合舰队，确立了对印度洋的制海权。1517年，葡萄牙人有史以来终于首次踏上了中国广东的土地。

随后英国于1600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1602年、1604年荷兰和法国各自设立了东印度公司。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虽说不过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伦敦的一家小公司，但其后摇身一变成为半官半民的殖民公司，作为殖民机构为英国掠夺海外领土出了大力。有时甚至毫不犹豫地干些海盗行径，满载着如山一般的掠夺品而归，这种强盗行为或残忍的行为竟成为授勋的对象。英国在广东获得贸易许可是在清朝时的169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濒临没落的大英帝国就是从这时起在不断的侵略中开始成长的。

这种情况大约有5个世纪，其间白人王国统治了地球，在他们的暴政下，有色人种受尽奴役，陪伴他们的是饥饿、眼泪、鲜血，甚至死亡。

或早或晚，欧洲人纷纷乘船东进，这时候，欧洲边缘的俄国人也跃马扬鞭或者步行开始东进。

1581年～1583年，叶尔马克走上征服西伯利亚之路；1649年，俄国人巴巴洛夫考察了黑龙江地区；1654年，俄国使臣巴伊考夫出现在清朝朝廷。1689年，康熙帝和彼得大帝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确定了两国国境线南起额尔古纳河，并沿雅布洛诺

夫、外兴安岭山脉向东北至鄂霍次克海。这是清朝的失策。1697年，俄罗斯人又入侵到坎恰卡。他们大部分都是哥萨克人，此外还有罪犯、不良分子、受过迫害的人以及发动叛乱的农奴等。

与美国开拓西部时代相仿，为了寻找适合农业的土地，俄国不断向东北方向扩张，为形成占据了从欧洲到太平洋的大面积土地的俄国领土作出了贡献。

然而，在989年乌拉基米尔大公改奉基督教之前，俄国是个很不起眼的近乎野蛮的地方，特别是1217年成吉思汗开始远征，1240年占领了南俄罗斯的基辅，这一来，蒙古人便建起了从太平洋到多瑙河的世界最大的大帝国，俄国人在东方人的暴政下挣扎着，在约250年的时间里受其统治。到了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拒绝朝贡和服从义务，才侥幸摆脱从属国的地位，奠定了现代俄国的基础。说起来可能自相矛盾，俄国人取代蒙古人轻而易举地继承了大小相仿的2227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这不能否认是暴政的代价所起的作用。

俄国在1240年以前很早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并将与罗马分廷抗礼的基督教正教奉为国教。

其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了大改革，以法语为宫廷语言，到近代为止，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识字。

当时斯拉夫民族和斯拉夫文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留下“财产是万恶之源”这句名言的列夫·托尔斯泰写出《复活》俄国文化之花开始绽放，这是很久之后的19世纪的事。

俄罗斯作为和我们邻接的异民族，对我们的经济、军事、政治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是很大的障碍，不过，由于地缘上的无法割断的缘份，应该选择一条共存的路。

然而，人们不知道俄国人为了获得不冻港推行了南下政策，而且不只一次觊觎朝鲜半岛、土耳其、阿富汗，这始终是个问题。

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欧洲很多人都移民到这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奴隶贸易的事。

在 1619 年运送黑人奴隶的船到达查尔斯顿之前，非洲的奴隶贸易足足经历了 100 年历史。17 年后，最早的美国造的奴隶贸易船从马萨诸塞州起航就不是件偶然的事了。

现代人是很难理解奴隶问题的。奴隶从概念上说与人不同，不是拥有完全权利的主体，而是有钱人的财产的一部分；如果不喜欢了，随时都可以像商品那样送上拍卖台进行买卖，这是一种同牛和猪没有什么分别的物体。因而，奴隶贩子被看成牲口贩子。

北美十三州在 1776 年发布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之前不过是欧洲殖民地而已。前后 300 年间，有时一年就有 100 多万人来到这块土地。接踵而至的贫民迈出了艰辛的步履。船靠岸后，付不出船资或者拿不出适当的农产品的人无论是谁都下不了船。结果，在有人买下他之前只能滞留在船上无法获得解放。船上的人口买卖开后，远在 60~90 海里开外的投标者也会聚拢过来。

具有强健劳力的男子和生育能力强的女子可以卖个好价钱，而且很快就能出手。

据推测，在形成奴隶贸易期间，大约有 5000 万年轻力壮的人被拉去成为奴隶。

到 1808 年废除奴隶贸易时为止，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也同南部的贸易商一起积极参与奴隶贸易。华盛顿总统也好，杰佛逊总统也好，都曾拥有过奴隶。

宗教这东西也不过是统治奴隶精神的工具而已，其唯一的说教就是让人们信奉“主啊！感谢奴隶。阿门”。白人们为了奴役黑人，利用了奴隶制度，宗教是他们的一种武器。

美国独立时约有 75 万黑人。1860 年，亚伯拉罕·林肯在总统选举中当选，1863 年 1 月 1 日发表《解放奴隶宣言》。南部以种植园主经济为根基的民主党反对解放黑奴。1861 年 4 月 12 日终于

爆发了南北战争。经过连续 4 年的流血战斗，1965 年 4 月 9 日南部投降，战争以北方胜利和奴隶制度废止而正式结束。这是北部工业力量和奴隶力量的胜利。

全黑人改善地位协会高举起了赤、黑、绿三色构成的旗帜，赤色表示流出的鲜血，黑色代表皮肤的颜色，绿色象征着希望。

建国 200 多年的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黑人和白人之间迄今为止仍存在使其隔阂的敌对意识，仿佛是嘲笑 20 世纪末的文明，他们不仅像水和油一样难以融合，而且爆发了可怕的种族暴动。据推算，黑人人数为白人的一成，约有一千四五百万。

回过头来看，所谓美国文明不过是建立在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和榨取黑奴的血汗基础上的产物。说它是白人的头与黑人的血混杂、梳理结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化再恰当不过了。

16 世纪初，欧洲移民作为北美殖民地的开拓者踏上北美东海岸之后，很快征服了美洲大陆中部地区，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手中夺取了大片领土。他们的领导人虽然是基督的信徒，但却教导下一代的人这是“主示的命运”因而现在的领导人也认为美国应该成为自由世界的警察。

1898 年 4 月 20 日，美国对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舰队发起了攻击，夺取了菲律宾。然后，当时的美国当权者们作了前后矛盾的解释：菲律宾对保护美国和进行东方贸易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对菲律宾人不是作为友邦而是作为臣民来统治的，唯有霍森参议员认为这违背了《独立宣言》神圣的原则和宪法。但是美国大众却觉得做帝国的滋味很威风，和世界殖民地国家的君主平起平坐，望着远处热带的岛上飘扬的星条旗，权力欲得到了深深的满足。

对中国，美国主张在拥有开放门户特权的国家保护下的条约规定的商埠进行的贸易，应对所有外国人和外国船舶平等开放，以

间接保证其在领土和行政上的权益。

所有美国的这些态度，与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于 1823 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中阐明的对美洲大陆各国的干涉就是对美国的干涉，美国也不干涉欧洲问题的孤立政策，即所谓门罗主义，是完全相反的政策。就是说，具有反叛性的孤立主义者的态度开始锈蚀，从而变换出通常所说的美国式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来。

今天的美国领导阶层的头脑中“白人的太平洋”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意思是，太平洋是白人的海洋，统治太平洋的民族将统治世界。

美国以本土为基点 将由夏威夷、威克岛、关岛、菲律宾连接的防卫线和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纵向连接的防卫线通过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连接成“L”字形防卫线。

美国四年间固然对这两条防线投入了 9 亿美元的军事费用，不过，这也意味着作为军事基地其价值远在其上。

苏联在菲律宾对面越南的金兰湾建起了第二个符拉迪沃斯托克，这可以看作是针锋相对的严厉对峙，前景令人极度忧虑。

美国在 L 形防卫线上建起了军事基地，覆盖了太平洋。

这虽然可以说是为防备苏联南下和包围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次性军事战略措施，不过，换个角度说，这不过更确证了他们没有把覆盖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太平洋当作公海，而看成是白人的内海而已。

作为太平洋一部分的东南亚各国，不仅在文化上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前院。过去，欧洲国家虽以这一地区为跳板侵略了中国大陆，不过，香港回到中国人的手里之后，可以预测会使东南亚的将来发生变化。

美国经历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直至 1914 年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40 年代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 年参加朝鲜战争，1965 年参加了越南战争。

根据格拉温德·杰洛撰写的《核战争》所述，1981 年末，美苏两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的破坏力，相当于在生活于地球上的男女老少每人头上投下 10 吨 TNT 炸药的破坏力。

二、鸦片战争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是清朝开国196年，也是我们韩国发生镇压包括三名法国传教士在内的天主教徒的“己亥事件”第二年。

该年，中英之间首次爆发了鸦片战争，两年后，中国战败。于是，1842年8月29日，两国在英国军舰科恩沃尔兹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包括开放香港、上海、广东等5个港口，开辟租界，确立治外法权及丧失关税自主权等内容，该条约给中国带来了丧权辱国的悲惨结果。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不幸，更是我们韩国可怕悲剧的开始。

见到泱泱大国受到英国的欺侮，覬覦其畔的列强不禁蠢蠢欲动，迈出了侵略的步伐。愤怒的中国国民于1850年举行了太平天国起义。英国和法国以民乱为借口入侵中国，于1858年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再度入侵，签订了《北京条约》。

见清政府软弱可欺，俄罗斯也于1858年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璦琿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到日本海的广大地域即沿海州划为清俄共同所有地。两年后的1860年，备受英国欺凌的清政府又在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中将沿海州划为俄罗斯领土。于是，俄罗斯开始着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1882年，这里成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1887年，印度支那沦为法国殖民地。1898年，胶州湾、威海卫和九龙半岛、旅顺以及大连分别被德国、英国和俄国以租借名义强行占领。

1900年清廷的无能与腐败使中国大地再度燃起以攘夷、焚烧教堂、杀传教士为内容的义和团起义的烽火。以后,1904年又爆发了日俄战争。

1769年,阿克莱发明了纺织机,1770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这时起到19世纪约100年期间被称为产业革命期。随着手工业时代向机械工业时代的转变,人类的劳动和机器的力量开始在工厂被用来生产商品,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造就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领取工资的工人与占有利润的资本家。

原本短缺的商品有了剩余,为打开销路寻找市场,同时为了确保原料资本家们不惜争得头破血流,于是为了避免贸易摩擦达到垄断的目的,出现了武力侵略,所谓的帝国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正当欧洲借产业革命之力入侵东方以垄断市场之际,清朝的西太后却把建设北洋舰队的国库资金挪作综用,用来建设与国防毫不相干的万寿山,可见清朝统治的腐朽、无能。

更有甚者,清朝政府对鸦片以长寿药、福寿膏之名蔓延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笑的是,他们居然相信这与维持其统治而采取的愚民政策步调一致。

企图依靠麻药而不是实力或善政来维持其统治,这种荒谬的着想实在令人惊愕。

自从英国获得广东贸易许可的1699年开始不到200年间,中国便沦落到这种地步,备受列强蔑视,我们不能不探究一下鸦片战争的意义。

朝鲜也经历了一连串的历史事变:1860年的东学运动,1871年的“辛未洋扰”,《江华条约》甲申政变,甲午农民起义,中日战争。我们多多少少都能从鸦片战争中找到导致这些国难发生的原因。

叶林格在《权力斗争》一书中指出：“法的目标是和平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斗争。法表现为斗争。法并不是单纯的思想，它还是生存的力量。”他还说过：“付出的代价决定民族的地位。”我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以法为先导进行的斗争，历史就是斗争遗留下的创痕。斗争是力量的较量。只有进行斗争的人才拥有索取代价的当然权利，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

但是在当时 中国也好 我们的祖先也好 深受佛教、儒教和道教等等精神文化的影响，心思都放在了维持社会制度方面上，只热衷于固守东方传统，其危机感仅仅局限于只要强制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便可保卫国土之上。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也是个基督教万能的教权时代。政治、教育和仲裁等所有方面都受到教会的支配，教会成了万流之源。从 14 世纪开始到 16 世纪，死气沉沉的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期，宗教的异端分子在德国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炬。因为他们认为以现有教会的力量已经不能促进社会发展了，这与夏行夏令、冬行冬令的道理是相同的。

这种社会氛围给欧洲带来了机械革命，使产业革命之花在欧洲绽放。

也就是说，当中国和朝鲜沉浸在封建制度的梦境尚未睡醒时，欧洲人已经抢先一步睁开了眼睛。可以说，他们是我们的先觉者。英国军舰发射出的炮弹爆炸声，既是帝国主义掠夺的信号，同时也为封建制度敲响了丧钟。

让我们再更仔细地回味一下鸦片战争的历史经过吧！

1840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出口茶叶，在出口大战中白花花的洋银流入中国，形势颇佳。不料，由于印度制鸦片的进口，贸易形势瞬间便形成逆转。

鸦片以印度西孟加拉邦出产为最佳，有公班土（即指英国东印

度公司的产品，公班即公司之意）、白皮土和红皮土之分。

鸦片输入量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为3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为4万箱。每箱重133又1/3磅即60公斤当时一箱鸦片的批发价为七八百美元。2万箱的价格为150万美元左右。而原来的价格连此价的1/1000都不到，英国人把鸦片的价格提高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从这点看，与其说英国人是通过贸易致富的，不如说完全是靠欺诈这种犯罪行为而大发横财的。而且退一步说，英国人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种近乎是不劳而获的暴利呢？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啦。

虽然当时朝廷主张禁烟并存在“弛禁论”和“禁输论”两种不同观点，但鸦片贸易的逆潮仍使银币大量外流，导致银价高昂。采取银本位货币制度的清朝经济状况恶化，使其不得不提高税赋，国民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忧心忡忡的道光皇帝发布敕命，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就是受皇帝委派，代表皇帝全权处理特定问题的大臣。

十一月二十三日离开北京时，他深知敌人的强大。“生死有命，成败在天。”是他心迹的流露。动身时他只带36名随从和3名厨师，钦差大臣的队伍如此寒酸真是前所未见，其清廉之风可见一斑。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广州天字码头。结束两个多月的旅行而走马上任的林则徐，没收了总量为19187箱和2119袋重2376254斤即1425吨的鸦片。从阳历4月11日~5月18日没收的鸦片被汇集到一处由12名监官、10名军官、100名兵卒不分昼夜，严密巡视警戒。

在接到就地处置的命令后，于旧历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将缴来的大量鸦片采取火烧及其他方法一举而销毁。

目睹这一幕的英国人，深知用贿赂及其他方法都无济于事，于

是装有 28 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波莱基号毫不犹豫地开了炮。在 11 月 3 日进行的穿鼻海战中，英国方面只是旗杆受损，而清军出动的 29 艘兵船大半受创，能够自行移动的只有 3 艘。

除英国印度总督奥格兰德调动陆军 4000 名外，英国本土还任命乔治·埃里奥德少将为远东军总司令官，派出了舰队。

虽然由于武器的优劣，战争早已结束，但英国仍派出舰队，其目的并不在于战争，而是利用舰队进行示威，以索取更多的利益。

其间，宫廷权臣说服皇帝罢免了爱国忠臣林则徐。

这与 1592 年丰臣秀吉派遣 15 万倭兵及 1597 年再次派遣 14 万倭兵发动壬辰倭乱之时奸臣向国王进谗言罢免圣雄李舜臣一事何其相似乃尔。

在此战攻打广州时，清兵 292 名战死，463 名负伤，清朝投降，并于新历 11 月确立了停战协定。英国以赔偿被没收的鸦片烟价 6000 万美元、商欠 300 万美元及远征费的名义从中国成功地掠走了巨额赔款。

不仅如此，1842 年还强行缔结了《南京条约》，香港、上海及广东等港口被割让，还开辟了租界。这意味着中国的领土中有英国的领地与之共存。说不好听点儿，这与认可一名女子享有与亲夫和奸夫同居的特权毫无区别。

如果说这是对家庭制度的破坏，那么，我们也可断言，《南京条约》是对主权国家的侵害。

这不单纯是当时身为清人的中国人的耻辱，而要说这是白人对黄色人种的轻蔑及首次攻击，也无丝毫不妥。

三、日本

日本是从朝鲜输入儒教和佛教的。主张大慈大悲的佛教曾被定为日本的国教，说大部分国民都是佛教徒也并不过分。

可是，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养成了一个恶习：不放过任何一个侵略周边国家的机会。除了国土狭窄这一根本原因外，还在于武士这一在漫长岁月尝尽权势甜头的阶级，到了今天形成名为军国主义的集团，他们养成了到处挑起事端的好战性格。

具有欺软怕硬国民性的机灵的日本人，缺乏公正心和信义，喜欢暗地里勾结，令人无法信赖。他们虽然饱尝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创痛，但只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则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发动侵略。

饱尝战争甜头的日本人常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话挂在嘴边。在日本军人的辞典里没有“投降”二字。这是他们的豪言壮语。尽管他们尝尽使他们眼中流血的败战痛苦，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完全放弃享受侵略所能带来的欢愉。

征 韩 论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征韩论”吧。

征韩论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主张，并非有充足的侵略理由。

明治元年（1868年）12月14日，木户孝允答岩仓具视问时说：“派使节前往朝鲜，望追究其无礼之举，如有不服，则动用武力兴师问罪，一显神州之声威……。”日本由此开始征韩步伐。然而，到那

时为止，朝鲜在对日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无礼之举，只是日本在“王政复古”之后，国书的格式及用人情况与幕府时代有所不同。文中“皇”、“敕”等字要修改，这被朝鲜拒绝，因而被指责为无礼。这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实际上这是种阴谋诡计，其目的是为了垄断与朝鲜的贸易。

时至今日，人们通常都认为西乡隆盛是“征韩论”的创始人或首脑，其实明治维新时的权臣们都是征韩论者。他们的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焦头烂额的内政问题转到外交上去。明治6年前后，征韩论着眼的并不是对朝问题，而是谁来执掌日本国内的权力问题，隐藏其后的真相是西乡等反官僚派与岩仓、木户、大久保等官僚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有人认为西乡担心俄、英、法、美等国统治朝鲜，日本无法插手，因而提出由日本抢先下手统治朝鲜的对俄防卫的主张。不过，这事发生在西乡下野之后，很难令人信服，也没有探讨的必要。

壬辰倭乱之后，朝日关系不佳，朝鲜朝廷也确实曾经因怀疑日本有在幕府末年与洋夷携手征服朝鲜的野心而心怀戒心。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1866年非法侵入大同江的美国商船色门号被击退，1871年再次出动舰队远征朝鲜，目的在于兴师问罪及强迫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他们劝导熟知朝鲜军备、国情的日本官吏搭乘其舰队，日本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

英国也煽动日本人：“今后日本应该插手朝鲜事务，如果这样，英国会最先给予援助，这对日本来说是上策。”并且鼓动日本：“日本插手朝鲜是有利的，日本这么做，欧洲是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我们英国将助你们一臂之力。”英、法、美并不是支持日本征服朝鲜，而是希望日本能起到打开朝鲜门户，将其引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的作用。

他们和日本人的这种阴谋由日俄战争前后为防止俄国南下而结成英日同盟，一直发展到后来将统治朝鲜事宜委托给日本。

国际政治毫无信义可言，利害关系贯穿其始终，讲究的是势力均衡。虽然靠的主要是力量的对比，但根据利害关系随时都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国际政治关系。

提到没有负罪感的社会，也许有人会震惊，其实国际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大肆虐杀、抢劫、强奸在这个社会里也会变成正当化的行为。

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当时我们的祖先好像对国际政治太缺乏认识了。率先接受欧洲文明的日本则与此不同，正如前文介绍的 在列强的怂恿下 获得了力量 挥舞着明晃晃的钢刀 开始了征服朝鲜的行动。

这是征韩论的最后一章，这就是日本人毫无掩饰的良心、道德及理智。

美国驻日公使平坎在将泰勒的《培里日本远征记》一书转给日本外务省时提示说：“好好阅读此书 照此行事 就一定能在朝鲜取得成功。”

第二年即 1875 年，日本军舰远洋号到朝鲜近海伪装测量。9 月 19 日接近江华岛 以寻找饮用水为名 放下跳板准备上岸。朝鲜炮台发炮示警时，日本军舰好像老早就在等候此举似的立即发炮回应 炸毁了炮台 登上永宗岛 使其受损之后 于 9 月 28 日回到长崎。

无端闯入他国领海进行测量，以及放下跳板接近他国领土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在没有特别补充饮用水的情况下便径自返回日本，更证明这是一次明确的、有计划的武力威胁。

这时，大院君执政时代已经过去，正是闵妃政权时代，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动荡。

借此时机，黑田清隆率领 7 艘军舰于 1876 年再次出现在朝鲜近海进行示威，并且不分青红皂白便袭击了江华岛。他们摆出一付

军事侵略的架式，连让对方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一味地逼迫朝鲜立即在条约上签字。闵氏政权惊慌失措，没对条约内容进行认真推敲就接受了该条约。

《江华条约》这一单方面的不平等条约又名《丙子保护条约》。

该条约包括在开港地为日本商人设置居留地，对日本居民实行治外法权，对日本商品实行无关税等不平等条款。日本人将其在 1858 年由培里引起的《美日保护通商条约》中曾经承受过的东西又转而施加给朝鲜，而且更加苛刻。

鸦片战争之后，怀有危机感的大院君所固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以这种结局宣告破产 此后便是壬午军乱、甲申政变、东学党乱、中日战争、俄日战争连接的无法收拾的历史。

以征韩论为源流的日本侵略行径，没过 70 年就诱发了美日战争，人类历史上首次在广岛经受了原子弹的洗礼。

自从培里来到浦和之后 92 年间，日本不断发动战争，对邻国进行侵略，其战争欲望日益膨胀，然而 1945 年 9 月 2 日却在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文书。第二天 3 日 清晨 盟军当局发表公告《告日本国民书》文中规定“天皇受盟军最高司令官领导 禁止日本货币的流通而使用军票；废除日本审判所，由美军司法厅执行审判”等三项内容。

这时，日本已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了，而是盟军占领下的战败国。

第二年正月，天皇向国民发表了罕见的《人间宣言》，4 月 10 日举行的第 22 届总选举中出现了 363 个政党，一人政党达 184 个。国会议员定员为 466 名 候补为 1519 名。这种大混乱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设在东京市谷原陆军参谋本部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庭于 1946 年 5 月 3 日开庭，历时两年 6 个月，于

1948年4月16日结束。同年11月4日~12日，威布审判长宣布了对25名战犯的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16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20年监禁的有1名，还有1名被判7年。

从战争中受灾的情况看，遭到空袭的城市有90个，221万户人家家破人亡，9万户房屋残缺不全，有920万人遭灾。尤其是战前，日本通过中日战争占领了台湾，通过日俄战争占领了萨哈林，通过“韩日合邦”占领了朝鲜，加上关东州的租借地及对南洋诸岛的委任统治令，统治的地域达680924.48平方公里。由于日本答应《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条件，归还强占的领土，其统治的地域缩小到372511.26平方公里，即缩小到原来的54.7%。又因为冲绳和小笠原由美国管理，千岛、南萨哈林事实上被苏联占领，因而日本实际统治的地域不过369665.34平方公里，只有战前的54.3%。

在太平洋战争中，陆、海军军人及文职人员死亡人数为1555308名，负伤及失踪者有309402名，普通百姓死亡人数为299485名，负伤、失踪者达368830名。

此外，1937年~1941年在中日战争中有185647名军人及文职人员死亡，325806人负伤或失踪，合计死亡人数为2040440名，负伤或失踪者有1004038人，死伤者合计达3044478人，牺牲者数目庞大。这是根据接受政府发放伤亡补贴的数统计的，因而朝鲜人、台湾人被征兵、征发到战场而发生的死伤人数并未包括在其中，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这可以算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清单。征韩论这种用别人的饭碗填饱自己肚皮的强盗逻辑终于寿终正寝。

不过，当时将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说成是玉音而泪流满面聆听收音机的国民中，能够正确理解这一切都是自食其果的能有几人？

还有，现在成了经济大国，因而要强化自卫队的武力，日本国

民是以何种心情看待此事的呢？令人纳闷。如果彻底洗刷净战败的痛苦，并以此为新的出发点而自满的话，毫无疑问这既会成为侵略的起点，同时也将成为破灭的出发点。

历史意识是不会轻易变更的，乡愁也将随着岁月而增加。

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或多或少都会留有征韩论的印记，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脱 亚 论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是与征韩论互为表里的主张。

福泽结束在欧洲的留学生活归国后，于 1872 年撰写了一部名为《劝学》的书。他在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天不造人上人。”抨击了官尊民卑的风气，引导国民走向自由与进步。因此，当时也好，现在也好，福泽都被看作是日本明治以来的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始祖。他在三田会堂开设讲坛，赢得了日本青年的尊重。他与朝鲜开化派金玉均、朴泳孝等交往密切。

不过，福泽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心下有利用金玉均等人的意图，他把 1884 年 12 月发生的甲申政变看作是在朝鲜扶植日本势力的良机，结果却因失败无功而返，便于 1885 年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入欧”的观点。

他主张：“我们国家没有理由要等到邻国开明之后再一起振兴亚洲。相反，我们应该脱离这个行列，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和朝鲜，我们没必要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的待遇。只须如西方人同他们接触时采用的方式那样处理即可。”他还宣称：“与恶友相交者难免同落骂名，我从心底里拒绝同亚洲东方恶友相交。”

福泽在国内问题上虽然力主民主主义的处理方式，但在对外问题上却不过是强硬的、富有侵略倾向的国权论者。可以说，他是个表里不一、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堪称日本近代史上绝好的范本

及象征。在他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对黑人和白人要进行差别对待的美国式民主主义的身影。

日本一万日元的纸币上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也许日本国会以此为荣吧。不过，看到年轻一代的日本人以这位具有两张面孔的男人为榜样，总让人感觉其中好像孕育着不幸。

在其珍惜的民主主义假面之下，是一张美化资本主义侵略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面孔，这与一千日元的纸币上印着伊藤头像，只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日本国家的真实心态尽在其中。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个与征韩论有关的故事吧。

进入本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作为一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可以说是日本人的脸面。他担任过四届总理大臣的职位，时间之长颇为罕见，作为主谋韩日合邦的侵略罪魁，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1909年(明治42年)10月26日上午9时三颗子弹结束了伊藤的性命，击毙伊藤博文、粉碎了侵略大陆之梦的伟人是安重根、字应七义士。

安义士是韩国人的代表，是东方人引以为荣的形象，这是谁都无法否定的。

事件发生后的第151天即1910年3月26日霪雨连绵安义士留下遗言：“我的行为就是为了东洋的和平。”然后慷慨就义，虽然年仅32岁便遭此厄运，但他不顾刑期迫近，写下了自己的见解“东洋和平论。”撇开加害者与受害者固有的观念，只要看一看征韩论者和东方和平论者两位具有完全相反哲学观的代表人物之间的决战，谁是真正的罪人，谁是真正的义士，是不难辨明的。

安义士在回答沟渊孝雄检察官的问题时，列举了15种杀人动机，其中没有一种是不正当的。尤其是第十四条枪杀理由指出伊藤犯下了杀害明治天皇的父亲明天皇的罪行。

伊藤不仅对韩国犯下了罪行，而且对日本而言，他也犯下了大

逆不道之罪，安义士的义举可以看成是代行了断。

安义士义举之前曾作过《丈夫歌》。1910年2月7日上午9时，他在第一次的公开审判中主张：“我是义军参谋中将，我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带着任务来到哈尔滨作战，在袭击后成为俘虏来到这里的。作为俘虏而不是杀人犯，应该由万国公法和国际公法来裁决。”并且抗辩道：“既然住在三浦梧楼在日本公使杀害明成皇后（闵妃）按无罪处理，那么我也是无罪的。”

安义士还慷慨陈词：“我的确犯了大罪，我犯的不是别的罪，我的罪就在于我是仁厚、弱小的韩国人之一员。”一吐剜心刺骨的悲痛心情。这不是安义士一人的悲痛，而是2000万全体国民的悲痛。

这次审判是由真锅十藏法官主持审理的，朝鲜律师安秉瓚、英国人道格拉斯律师、俄罗斯人米加洛夫律师先后被提名作辩护人，但都没有被接受。安秉瓚律师和英人律师只得到了旁听的机会，而由水野吉太郎和锄田正治两位国选律师现场辩护。

出人意料的是，这是一次发放了230张旁听券旁听席上座无虚席的公开审判，这实在值得庆幸。

这次审判在法律上留下了令人不解的问题。

伊藤是为了会见俄国财政大臣出现在哈尔滨的，袭击他的则是朝鲜人。哈尔滨是清朝领土的一部分。安义士则是被俄国军人逮捕的。

这就引出了日本是否拥有审判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能否适用日本刑法进行审判。

首先，俄国将安义士引渡给日本是不妥当的。当时俄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引渡犯人的约定，根据国籍或领土权，应该引渡给韩国或中国才对，不然就由俄国自己审判才妥当。无视国际法而将犯人引渡到被害者所属的国度进行审判，这从法律或者人道主义精神的视角看，俄国都负有无法洗刷的过错。

第二，当时沟渊检察官谈道：哈尔滨是清朝领土上的开放地，光武 3 年的《韩中通商条约》第五条规定双方互相拥有治外法权，因此，清朝对这一事件没有审判权；明治 38 年 11 月 17 日签定的《韩日保护条约》第一条规定 在国外的韩国臣民受日本保护 因此根据该条约，在满洲的韩国人当然归帝国领事馆管辖。

他还解释说，保护韩国国民不只是取缔保护之类的诉讼法，还包含总法，而且在认定被保护人受其管辖同时，还认定了在国外的韩国人也要服从日本的法令。

辩护人方面则认为，该保护条约的宗旨并不是取消外交权，而是由于韩国基础并不稳固，因而在其实现独立、坚固之前由日本代替行使这一权利，而不是完全丧失这一主权。代行权并不是用来维护日本人享有的权利，代理关系必须用于保护韩国的利益。控辩双方就管辖权问题发生了冲突。

在适用法律的问题上，与管辖权毫不相干，因为是韩国人，就应适用韩国宪法才对。

让我们对保护条约作番分析，然后再回到正题上吧。

俄日战争一结束，日本在领先获得天皇许可的情况下推出了《确立韩国保护权案》其中第一条明确表示：“韩国的对外关系全都由帝国担当，在外韩国臣民均归帝国保护。”

为了落实这一提案，1905 年 11 月 9 日，日本将军队派到汉城市内，伊藤一行来到汉城。他在朝鲜驻留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大校的陪同下，就是否赞同协约一一征询处于宪兵监视下的韩国阁僚。除了参政大臣 相当于总理 韩圭高、度支部大臣闵泳绮、农商工大臣权重显三人反对外，其余人全部赞成。权重显最后也转向赞成的一方。

也许是怕韩圭高誓死反对连累自己，积极赞成协约的李完用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征得 5 名坐立不安的阁僚赞同之后，签

定了保护条约。这些阁僚就是广遭世人唾骂的“乙巳五贼”他们是学府大臣李完用、外府大臣朴齐纯、军部大臣李根泽、内府大臣李址镛、农商工大臣权重显。

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光武9年，明治38年）11月17日，外部大臣朴齐纯被迫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林权助签订了《韩日协约》。

协约共有5条。第一条规定，日本国政府依靠在东京的外务省监理、指挥今后韩国的对外关系及事务，日本国代表及领事保护在外国的韩国臣民及利益。

第二条规定，日本国政府负责履行韩国与他国之间现存的条约，并约定今后在没有日本政府为中介时，韩国政府不得签定任何具有国际性的条约及协约。

第三条规定，日本国政府在韩国皇帝陛下阙下设置一名统监作为其代表。统监为了专心管理与外交相关的事项要住在汉城，并享有亲自谒见韩国皇帝陛下的权利。日本国政府还享有在韩国各开放港口及其他日本政府认定有必要的地方设置理事官的权利。理事官行使一向归日本驻韩领事馆所属的一切职权，同时为了彻底实行本协约条款，掌理必要的一切事务。

第四条规定，日本国与韩国之间现存的条约和协约除与本协约条款相抵触的以外，全部继续发挥效力。

第五条规定，韩国皇室的安宁与尊严由日本国政府予以保证。以下由受本国政府委以重任的官员署名为证。

这天，《新城新闻》刊登了“是日也放声大哭而哀告国民”的文字，主编张志渊被逮捕。

侍从武官长闵泳焕写下遗书，愤然自尽，前议政大臣赵秉世、经筵官宋秉璋、前参判洪万植、学府主使李相哲、法府部主使安秉

璜、驻英公使李汉应、尹斗炳、李相尚及军人金奉学等全都服毒殉国。

该条约因使用了“保护”的字眼，同时那年又是乙巳年，因而通常都称之为《乙巳保护条约》。

“近 90 年来，人们一直以为，1905 年 11 月 17 日签订了被称为所谓的《乙巳条约》的韩日协定。直到 1992 年 5 月 11 日，汉城大学奎章阁科长、李泰镇教授才首次弄清事实：《乙巳条约》和《丁未条约》都未获高宗承认，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国玺印章，纯宗皇帝的画押也是伪造的。这表明两种条约在国际法上均属无效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占掠夺我国，不惜采用暴力、欺诈等犯罪行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粉饰自己，处于压抑中，对文书的虚假性一无所知的我国国民，直到这时才面对耻辱、悲愤已极的命运，咬牙切齿地向世界舆论控诉他们的罪状，而后只能袖手旁观，这有什么用吗？……”

话题扯的有些远了。《日韩合并条约》缔结，并且设置朝鲜总督府后，日帝于 1910 年 10 月 7 日授予李完用等 76 人贵族爵位，另外，将当时的货币 50.4 万日元作为“合邦赏赐金”分发下去。28 名有积极“亲日行为”者还被授予一、二等级勋章。

但获得爵位的人中金奭镇、闵泳达、俞吉濬、尹用求、赵庆镐、赵鼎九、韩圭高、洪淳馨等 8 人拒绝受爵或交还爵位，拒绝作日本的贵族。尤其是金奭镇元老服毒自尽，公开了亡国的责任。

由此开始的令人痛彻心肺的 36 年过去了，韩日会谈结束时，朴正熙党伙只无偿索要可怜的 3 亿美元，及长期借款 2 亿美元，便背着国民将民族的血泪廉价出卖了。

虽然话归正题，但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该条约所指的保护并不意味着韩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只是像治外法权之类属于国家主权一部分的外交权暂时由日本代行。因而，与邦交有关的事项及与在海外的韩国人有关的领事业务只能由日本代行处理。保护之意

仅此而已。至于立法权、司法权及军事统帅权等在保护条约上根本找不到应由日本行使的根据。

从这种显而易见的法学理论着眼，《乙巳保护条约》第一条原则上根本不能成为检察官所主张的审判管辖权的根据，保护之类的用语也不能作为排斥对韩国人适用韩国法的依据。因此，辩护人的主张是正当的，毫无司法审判权的日本对安义士的审判显然是非法审判，检察官的主张不过是毫无根据的强词夺理、诡辩而已。

如上所述，日本对伊藤被杀案件的强行审判从根本上说是非法审判。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点。

1910年2月14日，得知已作出死刑判决的消息后，安义士的母亲向儿子转达了最后的爱心：“既然得到死刑判决，就要死的清清白白，不要辱没了家门，早升天国，到天主的身边去吧。”母亲痛彻心肺的悲痛恐怕比死亡更令他畏惧。但是，有什么能超过对日本的憎恶和反抗呢？

与韩日合邦时接受日本名为“恩赐金”的合并功劳金的达官显贵们相比，为了几文钱就出卖自己良心和国家作威作福的老爷们和守在农屋思念儿子的母亲，两者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安义士根据母亲的意思放弃了抗诉，选择了死刑。

在旅顺监狱，他与安定根、安恭根两兄弟及自己希望见到的洪锡九（法国名为贝尔海姆）神父见了面。在进行圣体圣事和圣餐式之后，洪神父与他作别：“仁慈的天主不会抛弃你，一定会关照你，放心地去吧。”这时是1910年2月10日下午2时，56天之后，32岁的安义士便走上刑场，英勇就义。

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东洋和平论”吧。

据推测，其序文大约完成于 1910 年 2 月 是在狱中的事。其大意为：

“现在世界趋势是烽烟四起，战乱频仍。虽然东方各国仍把精力放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上，维持着和平的局面，但是，与此相对照的是，欧洲数百年来时兴的相互侵略的余波已经波及到了东洋。

“其中 俄罗斯的侵略最为严重。不过 以满洲为舞台的俄日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取得了胜利。从日本人的立场上看，是因为日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之利 顺应了自然的法则。这时 如果韩、中两国排斥自古就为冤家的日本，转而帮助俄国，日本就不可能取得俄日战争的巨大胜利。

“但是 当时韩国之所以协助日本 正如俄日战争时的《宣战诏书》所言，是出于维护东洋和平及巩固韩国独立之大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黄白人种的战争中，助同色人种一臂之力。

“然而 日本战后却奴役韩国、入侵满洲 其行径与俄国并无不同 妨碍了东洋的和平。”

正文预定分 4 章 前车之鉴、现状、未雨绸缪、问答。在执笔撰写《前车之鉴》途中 因刑期已到而成为未竟作。

在当时，征韩论是侵略者的观念意识，而东洋和平论则是被侵略者的思想意识，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察今后的世界，长期对立的这两种观念意识毫无疑问依然留存，这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人将伊藤被杀事件看成是恐怖活动，他们充满了报复心，并于事件发生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韩国人民。

而中国人和朝鲜人却把安重根作为东方的伟人来崇拜、敬仰。英国并没有处置甘地，日本却把安义士杀害了，结下了永久的冤仇。他们企图凭借刀枪来维持东洋的安定。

安义士的名字并不属于他个人，他是东方之子。我去中国的时候，不知道韩国地处何方的人要比知道韩国在哪儿的人还多，然

而，不知道安重根、尹奉吉两位义士的人却不多。因为他们是东方的恩人，东方之宝。安义士作为名垂千古的伟人。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令我们骄傲，令我们自豪。从这个意义上说，安义士获得了永生。

既然话题扯到了这里，那么，就再闲谈几句吧。

伊藤作为侵略者虽然坐上了统监的位置，但对当时的反日义兵斗争及全民族的抵抗与斗争，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怖感。

1906年7月1日，他给儿子勇吉发去了一封近乎遗书的信。信中写道：

“因赴任伊始工作生疏，公务繁多，特别是赴任前的宫廷纠纷与韩南地区暴动等等尚未完全平息，善后的手段还在思考之中……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作为遗嘱，希望能念在妈妈对祖父母多年尽孝，曾与我同甘共患难，内助我终生事业的坚贞份上，分10万元钱供她隐居之用……今天我之所以讲述内情……为以防万一，希照办为盼。”

三年后，他中弹身亡。可见，实际统治朝鲜三年半的伊藤也不过尔尔。

布施辰治律师

负责安义士一案的沟渊孝雄检察官因在该事件中立下的功劳回本国去了。1932年1月28日，在大审院检事局任检察官的沟渊，担当了布施辰治律师惩戒审判案第一次公判的检察官一职。他作为检察官介入这个被法律界人士非难为政治审判的案件会是偶然的吗？

正如托尔斯泰羞为大地主一样，布施律师也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羞愧。他不遗余力地维护着在东京的朝鲜人和台湾人的人

权。因为他当时为很多社会主义案件作过辩护，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律师”。

布施律师在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写过“向朝鲜独立运动致敬”的文字而酿成最初的“笔祸案”遭到检事局的审问。他指责美国威尔逊总统缺乏勇气，没有像朝鲜人所期望的那样对日本提出强硬的劝告。他为了给1923年7月“义烈团事件”及1927年9月的“朝鲜共产团事件”作辩护来到汉城。朴宪永为101名被告之一。他在辩论时开门见山地说：“全朝鲜的民众都在注视着这次审判，因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被告人的活动上了。法院对这一案件的事实关系的把握不应令民众提出异议，认为‘不是那么一回事’。对该事实，如果民众说：‘处罚他们吧！’那么就该处罚他们。法院应该凭良心倾听朝鲜民众悲痛的呼声。”

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时发生朝鲜人遭屠杀事件之后，他慨叹道：“由于日本人总是难为朝鲜人，不让他们过安生日子，因而惟恐他们利用震灾的混乱之机予以报复，戒严司令部、警视厅等便率先产生‘朝鲜人来袭’的妄念，使流言原封不动地刊登在报纸的号外上，使得一般市民丧失了作为民众的良知。”

继屠杀朝鲜人事件之后，1926年2月26日～3月1日，为被控大逆罪年仅25岁的朴烈辩护的也是布施律师。由于朴烈希望“能以朝鲜国王的威仪与以天皇名义行使司法权的审判官相对”，布施律师在与大审院达成折衷意见之后，朴烈身着王朝礼服出现在法庭。当时的新闻报道了第一次公判时出庭的情景：“手执礼扇，身着礼装，堂堂正正地走进法庭，走向旁听席，等候在旁听席上的人一致起立俯首致意。朴作为大礼予以接受。”

3月25日，朴烈夫妻均被判死刑。

布施律师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与众不同的日本人，他是韩国人民的老朋友。

日本也有这样的人！

韩日合邦的时候，少数社会主义者中也有批评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认为殖民统治对平民阶层有害无益的人。1907年他们反对保护条约，并向国际上发出呼吁：维护朝鲜的独立。

1910年(明治44年)1月，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26人被无中生有地扣上大逆罪的罪名，公开宣判时有24人被处死刑，当时大逆罪由大审院负责一审。在这种情况下，对韩日合邦的批评被连根斩断，像泡沫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一运动”时柳宗悦写过一篇名为《想朝鲜人》的文章，批评日本殖民统治剥夺了朝鲜的独立、抹杀了其固有的文化，指责日本把“三一运动”硬说成是外国传教士煽动所致，其实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还向朝鲜人发出呼声：“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我们之中也有人对我们国家不人道的行径作过反省。”

《中央公论》6月号就“五四运动”发表过卷头语《不要谩骂北京学生的行动》是由吉野作造撰写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在日本人当中也有像布施这样的律师和一部分有良心的可亲可敬的人。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征韩论的背后有英、美的怂恿，在旧韩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之中就有美国人斯蒂芬这样的亲日双重间谍。他是在日本外务省工作的日本外交的忠实代理人。1908年3月21日，他回国度假在圣弗兰西斯科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鼓吹韩日合邦的正当性，大放冒读韩国人民的厥词。此前便一直追踪他的田明云义士3月23日在奥格兰特车站面对面地向前往华盛顿的斯蒂芬开了枪。不料，枪哑火了，田义士陷入肉搏的危机之中。正巧这时，从别处飞来枪弹结果了斯蒂芬的性命。这是另一位追踪斯蒂芬的义士张仁焕开的枪。田义士肩膀负了伤。

信仰佛教的日本人及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并没有成为真正值得信赖的人。利害关系改变着历史的流程。

关东大震灾和屠杀朝鲜人

要想理解日本就不能不谈到关东大地震。

日本地处亚洲东北方，由火山列岛构成。因此，虽然以温泉众多闻名于世，不过其地震之多也很有名。在现代洋房兴建之前，木制房屋是日本传统的建筑。用横推门代替，墙将屋与屋分隔开。窗户名为障子，也是用横推门做的门。这种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的建筑样式可以说反映了自古以来日本人为防备地震而表现出的智慧。随时都可以轻易逃到户外，被房子压住也会减轻受害程度，这就是这种建筑的着眼点。

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恐怕不会否认曾有过一两次因地震而逃到屋外的事实吧。电灯摇晃，窗门咯咯抖动已经不足为奇了。

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正午前2分钟，关东南部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中央气象台的地震仪的针全都掉了，无法测定，东京帝大理学部的地震仪记录了本次地震的最大震幅为88.6毫米，这可是空前绝后的大天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和平条约刚刚签定，日本作为战胜国正处于大好形势下，前一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掌握了政权，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地震当年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之年。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诱发了火灾，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灾难，在短时间内就有340余万人受灾。具体数据为：死亡91344人，失踪13275人，伤者52074人，有447128户房屋烧毁，房屋倒塌和部分

倒塌的各为 12 万户，作为日本经济枢纽的东京和横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自从 1707 年富士山火山爆发之后，这是 200 年来的最大惨案。只是在短短的一瞬间，仿佛地狱来临，这是怎样的悲剧啊！

不过 这纯属自然现象 怨不得任何人 也没法同人论是非。幸存的人们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却像失魂落魄的人一样，理性与感情全都荡然无存。

当时的日本政府，首相是山本权兵卫，内相是水野练太郎，警视总监为赤池让，他们可以说是直接的负责人。

水野在斋藤实任朝鲜总督时，作为政府总监曾处理过“三一运动”的后事，当时还起用赤池为警务局长，二人都是镇压朝鲜独立运动的当事人。

赤池总监为借助兵力稳定人心，于当天下午 4 时半 请东京卫戍司令官、近卫师团长森山守成出兵，与军队一起维持治安。

然而 从 2 日早晨开始“不逞鲜人来袭”的谣言便传开了。“不逞鲜人来袭 他们向井中投毒、放火、强盗、强奸 无所不为”的谣言传遍了横滨城的大街小巷。连警方也相信了此事，采取了应战措施。

当天 6 点左右，涉谷警察署长报告，有消息说有大约 200 名鲜人携带枪械经过玉川二子的渡船场正朝市里行进；中野署长也有相似的报告。

警视厅利用汽车、信件、扩音器等将“朝鲜人来袭”的宣传扩散到全市。内务省后藤文夫致电各地方长官：“朝鲜人正利用东京地震之际在各地纵火以达到泻愤（不逞）的目的，现在东京市内就有持有炸弹，用石油放火的人。由于东京府下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望你们对鲜人的行动严加取缔。”

关于朝鲜人暴动的流言蜚语通过警方和军队的通讯网眨眼间便传扬开了。报纸也对此大书特书。

这种无稽之谈甚至被人添油加醋，说成不光是朝鲜人的计策，其背后还有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的激进派在操纵。

尽管大地震使东京附近遭到巨大破坏，但当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文明程度应该达到较高的水准了，然而，这种荒唐已极的假话居然能迷惑住日本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做贼心虚，这可能是肆意掠夺韩国的日本人的犯罪意识和不安感使然吧，他们似乎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将来到东京生活的朝鲜人斩草除根。由水野和赤池组成的二人组合更令人怀疑他们是操纵这一流言的最高责任者。

日本人也认为，屠杀朝鲜人的真相在于日本政府统治阶层害怕及为了防备在震灾的混乱之中变得一无所有的民众将不满或不安的情绪指向自己，而将民众的注意力转向对朝鲜人或社会主义者的不安与恐怖感，以使民众能够协助警察和军队维持秩序，是当局有计划的阴谋。

通过警察和军队的情报网率先传播荒诞不经的流言，由报纸煽动民众的事实，与其说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将朝鲜人当作替罪羊，不如说是为了屠杀朝鲜人而进行的作战更准确。

朝鲜人暴动的谣言一传开，各地便纷纷以青年团、复员军人团、消防队为中心组成了自警团，迫害朝鲜人。以刀、竹枪、棍棒、钩、镰等武装起来的自警团在各重要场所设置检查站盘查路人。只要认定是朝鲜人就会当场用残忍的手段予以残杀。龟户警察署就在署内杀害了很多朝鲜人，被称为“龟户事件”。

其残忍与野蛮与“三一运动”时在京畿道水原邑堤岩里教会将教人与众多朝鲜人锁在教堂里放火烧死的日本人毫无不同。

这一事件是与东京邻近的 5 个郡实施戒严后发生的事。

据内务省警保局公布的死亡数据看，朝鲜人为 321 名 中国人有 3 名 日本人为 59 名，但据朝鲜受害同胞慰问班在日本当局给予种种阻挠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查情况看，有 2613 名朝鲜人遇害，

而中国公使馆调查情况表明，约有 160~170 名中国人失踪。

可是据朝鲜史研究会编撰的《朝鲜历史》记载 朝鲜人遭屠杀数超过 6600 名。

当时住在东京的在日朝鲜人有一万两三千人，神奈有 3000 名，相当于两人中几乎就有一人被害，其罪恶之大堪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一事相比肩。

此外 在保护的美名之下 全国 30 个府县监禁了 23715 人。他们随时都会遭到悲惨的命运。到了 9 月中旬，日本政府以消除日本人对朝鲜人的厌恶感为借口，以清理废墟及道路进行社会服务为名，强迫、驱使被收容的朝鲜人做牛做马。

日本政府结合“屠杀朝鲜人事件”，也加紧了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

堺利彦等因关押在狱中反而可以避开灾祸，近藤宪二、福男狂二、浅沼稻二郎、稻村顺三、麻生久夫妇等从 9 月 5 日开始遭到拘留。

当年 7 月从巴黎归国到新宿附近的柏木生活的大杉荣 9 月 16 日与妻子一起失踪。后来查明，杀人凶犯是东京宪兵队麹町分队队长甘粕正彦宪兵大尉。尽管报界严厉批评这是“陆军的奇耻大辱”“军人之敌、人道之敌”但是 甘粕只判了十年徒刑 从犯森被判三年 二人均被从轻发落。我们不难看出其身后有后台 不过 更为可笑的是，甘粕三年后便出了狱，并和夫人出国旅行，之后去满洲，作为满洲电影会社理事长而作威作福。我们仿佛看到了杀害白凡的安斗熙所感受到的荣辱。

这就是所谓的“大杉荣事件”。解除对该事报道的禁令是在 10 月 8 日 第二天 也就是 9 日 报道了被称为“阴谋暗杀摄政事件”的朴烈、金子文子事件。

9月3日，朴烈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而遭逮捕。日本人的意图在于，表明朝鲜人的阴谋确实存在，以此加深世人的印象，使屠杀朝鲜人事件正当化，另外，也是为了给其背后“有社会主义者在操纵”的流言作注脚。

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朴烈一解放就回了国。

与东京大震灾不同，地震发生的前一年，即1922年7月29日据《读卖新闻》报道信浓川上游在建的信越电力株式会社正在兴建的水力发电所工程，流出了被杀戮的朝鲜人尸体。

当时工程现场有1200名工人，其中半数为朝鲜人。矿山及建筑工地都建有被称为“监狱”的住宿设施，工人们被关在里面像奴隶一样任人驱使，在肉体上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用计者或逃跑的人一旦被抓住就会被残忍地私刑处死，这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这就是屠杀朝鲜人事件的真相。

9月7日，以朴烈为首的朝鲜人在神田基督教青年会馆就“信浓川屠杀事件”举行了大型演讲会。尽管收了十分钱的门票，但仍来了1000多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各半。不过，却因“中止辩论”的禁令而被解散。

对这一事件的真相追寻最终因第二年发生的东京地震而中止。

上野英信在《地底下可笑的故事》中描述了在日本矿工遭受的地狱般的待遇。催人泪下的悲惨场面不计其数。

我们不应仅仅把这看成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还应看到，这是日本罪恶形象的又一丑陋面孔。

用“恶魔之子”来形容恐怕也不足以表现吧。

关东大地震之后，在日本政府中，迁都论开始抬头。

其中，陆军从战争与地震着眼，着手制定具体的方案。东京距离太平洋沿岸太近，从国防角度考虑是不合适的，不仅如此，东京

的位置过于偏向东北，不方便进入满洲和台湾。接受秘命选定候选地的今村均少佐选定的候选地，第一个是朝鲜的龙山，第二个是播州加古川流域，第三个是八王子。

为复兴帝都而提出的设想是奇特的，富于侵略性的日本人的妄想令人惊愕，为消除迁都论带来的不安，9月12日天皇发表了在东京原地重新复兴京都的诏书，令人啼笑皆非。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日本人超乎寻常的蛮行，令英国人乃海盗后裔之流也黯然失色。

让我们先把这话题放到后面，来看一看与征韩论一脉相通的北一辉辉次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吧。

1881年(明治14年)日本建立了玄洋社，1901年建立了黑龙会，尽管日本右翼运动拥有很长的历史，但其鼎盛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与活跃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对抗中开始的。

明治末年，年仅24岁的北一辉便对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并独自撰著了强调国体论的《国体论及纯正的社会主义》。此后，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表现积极。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排日运动热浪席卷中国全境，他在上海的病榻上思绪不宁，烦闷之余，开始着眼于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出路。

1919年在上海脱稿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来改称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其后被西田税等军部法西斯军官奉为经典，成为他们所说的昭和维新的革新思潮的根源。

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如果可以说是纳粹独裁政治的经典，那么，这本书也可以说具有同样性质的作用。

他在书中认为：“像日本这样只拥有狭小领土的国家，为了发

展 有权利同占有广阔领土的英国或俄国进行战争。”还认为：“日本国民应该形成大同团结，使日本成为护卫全亚洲 7 亿人民的最后的封建城郭。”并主张“应该排斥英、俄 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为此 就要在国内拥戴天皇 实行彻底改造 由天皇运用国家大权 于三年停止宪法 宣布戒严 废除华族和贵族院 禁止拥有百万日元以上的私有财产及价值 10 万日元以上的私有土地等等。

该书的毛病在于，接下来没有对即将面临的日本经济的组织和运营作说明，缺乏具体性。

尤其从民族问题引起巨大动荡的东方的现实着眼，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设想是否正当，这应该成为批评的对象才对，他却视而不见，只字不提殖民地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没有摆脱心胸狭窄、贪婪的日本人的窠臼。因此 不客气地说 此书只有他那一派之人才能欣赏。

明治维新时的征韩论，昭和维新时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两种理论分别形成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实在令人惊愕。

理由似乎很充分，不过说穿了，其实不过就是为了掩饰侵略者迫不及待的内心。二次大战末期 日本高喊“大东亚共荣圈”。如果只是宣传口号也就罢了，真正相信这一套的亚洲民族能有几人？作为北一辉理论的翻版，日本人的假面及骗局实在太过喧闹了。

由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策划，并召住在上海的北一辉入伙于 1919 年成立的犹存社，对日本法西斯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犹存社还公开出版了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大力宣传和普及其思想。部分青年军官及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还组成团体予以支持。犹存社开展这种活动的资金来源仅靠这三人之力当然无法解决，他们依靠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团体，及间接来自财阀们的钱，这是毫无疑问的。

1922 年 1 月 22 日，莫斯科召开了远东民族大会，同年 8 月，

山川均宣布转换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不知因为什么重大因由，北一辉与大川发生严重对立，犹存社因此解散。此后，尽管两派继续反目使右翼产生分裂，但将北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军官的却是大川一派。

大川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国事研究之后开始成为日本精神的鼓吹者。他在学生时代应邀任参谋本部的德语翻译，这使他结识了很多军人朋友。1919年加入满铁公司之后，与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人接触频繁。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及河本大作等革新派军人都是大川的朋友。

犹存社一解散，大川就与满川等一起组建了大学寮，掀起了对青年进行日本主义教育的热潮。西田税骑兵少尉加入其中，在他的劝导下年青的军官们出入其间。以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的关连者中受大学寮影响的人为数不少。

日本法西斯的兴起

这种日本改造论在日本军部开始逐渐生根，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1928年还是以石原莞尔、铃木贞一、武藤章等佐级军官为中心在陆军中成立了无名会。第二年发展为一夕会。东条、永田、板垣等佐级军官革新派大部分都包容其中。他们也是后来中日战争中的核心人物。

另外，1930年夏，以毕业于陆军大学在满洲里特务机关研究过俄国革命并于其后作为驻土耳其武官研究过土耳其革命的桥本欣五郎为中心，影佐祯昭等在参谋本部任职的陆大出身的50名佐官与尉官组织了樱花会。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军事政变改造日本。他们还与民间右翼意识形态发生了关系。大川周明

与岩田爱之助也加入了这一组织。

他们的不满情绪源于对日本及世界局势的危机意识。在政治方面的危机有，民主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中国问题的激化和满蒙危机，经济方面的危机是普通经济的不景气及农村经济严重萧条。

1931年2月末，发生了以樱花会为中心的未遂军事政变，即“三月事件”。那年9月18日爆发了“柳条沟事变”（俗称“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及东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等人阴谋策划的。在9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币原对议会局部范围内解决的方针产生不满，因而，以樱花会为中心确立了发动第二次政变的计划。

外部民间人士除大川和岩田外，北一辉和西田等也参加了。

可是，10月16日该计划也被泄漏到陆军省和参谋总部的最高层，17日，以桥本为首的中心人物被宪兵队一网打尽。

被称为所谓“十月事件”的该事件以当事人闭门思过20日的极轻的行政处分而不了了之。其实他们是在东京附近宪兵的保护下软禁的，天天与酒和妓女相伴为乐。其后，主谋者们因为调动分散到满洲或地方，樱花会也因而解体。

其后，以日莲宗僧侣日召井上昭为中心的右翼民间团体不借助军人之力，确立了采取暗杀统治阶级领导人的恐怖活动以加快改造国家步伐的计划。这就是“血盟团事件”。他们选定首相以下的政界、财界巨头13人为暗杀对象，1932年2月9日任大藏相的井上准之助成为最早的牺牲者，一个月后的3月5日三井财阀的统帅团琢磨中弹身亡。

3月15日僧侣井上自首，其党羽遭到逮捕，“血盟团事件”告

一段落。

不过，以无法过问国事的残党为中心，海军士官、陆军士官候补生及民间右翼分子 30 余人在 1932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晚袭击了首相官邸，杀害了犬养毅首相。这一事件被称为“五一五事件”。

“五一五事件”的中心人物是橘孝三郎。他在《日本爱国革新主义》一书中强调了农本主义的思想。右翼的代表性思想家权藤成卿也是农本主义者。

由农民的保守性及乡土意识生成的偏狭的爱国主义构成了右翼思想滋生的土壤，这是这一事件的思想根源。

在此前的“九一八事变”之前，政府发生了 2200 万日元的赤字公债，9 月事变爆发后，军费开支膨胀，国民生活开始紧缩，这是该事件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犬养毅首相对手枪面对自己的三上海军中尉说：“说了就会知道。”对方回了一句“问答无用”便开了枪。这两句象征当时民主主义与法西斯精神的对话恰成对照，成为有名的流行语。

第二年即 1933 年 7 月，对这一事件的公判开庭。在陆军方面的公判中，检察官与被告人互相呼应，称之为“义举”来炫耀。而海军方面的公判却与之相反，检察官指责军人干预政治，要求法庭处以死刑。青年军官们立即团结起来，提出反对检察官提刑的决议，大造军国主义的舆论。因而，公判中途，37 万封减刑请愿书铺天盖地涌来。这是对审判的嘲弄与威胁。判决结果橘最重，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人从轻发落，徒刑 15 年~4 年不等。

从 1931 年到 1932 年期间，由“三月事件”开始，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五一五事件”，出现军事政变，议会政治的影象逐渐模糊起来。

不过，发生这些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日本大正时期正是民主主义发展时期，民主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力量激增，以天皇为中心的保守势力感到了威胁。

尤其是到了 1927 年 3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及关东大震灾的善后问题使得很多银行和会社背上了巨额债务，陷入了严重的金融恐慌之中，破产失业者不断增多。政府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 实施了三周延期偿付措施 使得 37 家银行休业。休业及压缩生产更加大了失业人数。饥饿儿童、买卖妇女、全家自杀、卖淫、强盗、流浪汉等等屡见不鲜，社会处于极度困苦与混乱状态之中，这使工人、农民们拧成一股绳，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

镇压社会主义团体

在 1928 年 2 月实行的普通选举中，无产阶级政党得票数虽然未到 49 万，但却占了选举人数的 1/20。这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3 月 15 日凌晨，在特别议会召开之前，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嫌疑非法拘留了 1600 名共产党、工农党、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等方面的人士，4 月 10 日发布了禁止工农党以下三个团体结社的禁令。

这与其说是警方的恐怖活动，不如说是政府发动的突然袭击。

接着便解散了各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京都帝大的河上肇，九州帝大的向坂逸郎、佐佐弘雄、石浜知行，东京帝大的大森义太郎等教授却被赶下了讲坛。

此举暴露出天皇政治的真面目：不是为了填饱国民大众的肚皮，而是官吏滥用暴力的恐怖政治。

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从“三月事件”到“五一五事件”等国内革新政治的活动遭到镇压，黑暗笼罩着全国。对外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挑起侵略战争 寻找出路。

根据治安维持法逮捕的人数，1931年为1187名，1932年为2489名，1933年为4288名，1934年为2102名，多么惊人的数字呀！其中小林多喜二、野吕荣太郎、岩田义道等共产党领导人在警察的严刑拷打之下，惨遭不幸。

小林于1933年2月被捕，仅数小时就在筑地警署惨遭杀害。这种公然的非人道的拷打与肆意残杀，被当作威慑和预防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佳手段及工具来使用。

我们从人道主义立场介绍一下小林多喜二的小说《1928.3.15》。

“渡被剥光了衣服，二话没有就被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用竹刀从后面打将过来。由于使出了一身力气，竹刀‘咻咻’直响，每逢此时刀尖便会弯折。他‘哼哼’地呻吟着，把力量集中到体表强忍住痛苦。一直延续了30分钟。他在木板地上呻吟着，身子像放在炭火上的鱿鱼一样扭动着。

“不过这次渡尖叫起来。这次是用缝制塌塌米的粗针扎他的身子。每扎一起都像触到了强烈的电流似的，瞬间身子便仿佛缩到极点。他扭动着吊起来的身子，咬着牙叫喊：‘杀我，杀了我，杀了我吧！！’……

“后来，警官随心所欲劈头盖脸地痛打之后，又用钉着鞋钉的皮鞋连踢带踹，这持续了一个小时。渡的躯体像土豆袋子一样滚来滚去。他的脸孔变成了蜂窝。连续三小时的拷打结束后，渡像猪内脏一样被人丢进了监狱里……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受到了更危险的拷问。他既没挨打，也没被踢，只是连续八次（是连续八次！）窒息。法医！自始至终都抓着他的手腕测他的脉搏。掐他的脖子使其晕厥，醒来后连一分钟都不再到再让他窒息，醒过来之后再……这样反复八次……

“审讯室天棚的横梁上悬着一辆滑车，两端露出长长的绳索。

龙吉两脚被拴着倒吊在一端。然后就像舂米用的杵头一样头‘通通’地捣在木板地上。血就像冲决堤坝的洪峰一样涌到头部，他的头和脸变得像火球一样，眼睛青青地肿胀起来。”

这里描写的是对小樽的劳动组合成员们的拷打。

作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断面，这实在太悲惨了。人类只不过生活在思想自由的假说中。

侵略东北战争“九一八事变”

日本失业人口，1929年为268590人，1930年9月为395244人，1931年9月为425526人，1932年9月为505969人，数字相当庞大。以上统计数字还不包括一周内有些微收入的人，因而失业人数远不止这些。

日本面对崩溃的国民生活束手无策，寻找到的唯一出路就是所谓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说穿了，将众多失业者引入战争中予以消耗，并对满洲这一新殖民地进行掠夺，便是他们所言的国防国家之路的阴谋，也是隐藏于“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假面具背后的掠夺者的真面目。

日本于1932年9月15日正式承认了由自己扶植的傀儡“满洲国”。此前的1931年12月10日，国际联盟设立了满洲调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任团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开始起草报告书。

可是，日本却认为中国不能算是近代才组织起来的国家，无论从地缘政治学还是历史的角度看，满洲都是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存在。建立“满洲国”是满洲人民自发的行为，满洲的独立是防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屏障，以此牵强附会，企图使其侵略行径正当化。

1933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山海关，并宣布热河省为“满洲国领土”。尽管国联召开大会采纳了《对日劝告案》，但日本代表拂袖而去。

3月28日,日本政府声称其“实现东洋和平的根本方针与国联及其宗旨完全不同”,退出了国际联盟。

日本开始迈出了其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脚步。就像脱缰了的野马,露骨地推进其侵略的铁蹄。由军队掌舵的日本战船驶向了与国民毫不相干的太平洋战争。

换个角度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恐慌所做的努力有:压制国内的劳工运动,提高关税壁垒,强化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这激化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倾轧,加快了军备扩张及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矛盾和速度。

结果除了陷入法西斯战争的危机之中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在日本人耿耿于怀的侵略大陆的观念背后,有北一辉侵略哲学作支撑,作为一种潜意识,除了一部分学者和宗教家,它至今还残留在很多日本国民的脑海之中。

显然,昔日辉煌的美梦像神话般的迷信一样令他们感到痛苦。

话题既然扯到了这里,那么就让我们寻觅一下侵略东北战争又名‘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吧。

如前所述,为了扭转日本社会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的局面,日本军部策划了侵略中国东三省又称东北的满洲的阴谋。

从军队立场上看,不仅是日本国内问题,他们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排日情绪及在进出口国和苏联五年计划进展方面的威胁。这些也是挑起“九一八事变”的重要理由。

“三月事件”之后,一夕会成员掌握了军队的实权,中央便接受了关东军的计划,8月,陆军首脑部召开会议,决定到1935年为止解决满蒙问题。这不过是照搬一夕会秘密会议决定的《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大纲》而已,只是时间推迟了三天。

但是,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两参谋未告知本庄繁司令官,就于

1931年夏天先期将 24 厘米大炮秘密运送到满洲，暗地里作炮击奉天（现在的沈阳）的准备。一夕会和樱花会的帮派还帮着他们与中央联络，支持他们的阴谋。

这时节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

万宝山地处长春西北约 30 公里处。1931 年 5 月，200 余名移民到这里的朝鲜人为种水稻开始修筑水渠，与中国农民产生了纠纷。当地中国官府根据农民的投诉，逮捕了 10 名朝鲜人并命令中止修渠。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出面派出警官保护朝鲜人，使事件演变为国家间的问题。

7 月初，万宝山一带的数百名中国农民围拢过来阻止修筑。日本方面派出 50 名警官和 3 挺机关枪，中国农民也拿起了枪。7 月 2 日，双方发生枪击骚乱。所幸的是没有人伤亡。在武装警察的保护下工程强行进行，7 月 11 日成功通水。

该事件尽管只是单纯的农田用水纠纷，但它却陷入企图伤害朝中之间的感情、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日本方面的险恶阴谋之中。

日本方面捏造了朝鲜农民多半被杀的无稽之谈，《朝鲜日报》则发出了这一误报。

消息一传开从 7 月 3 日开始，仁川、汉城、元山、新义州及平壤等地便对住在朝鲜的华侨大肆进行抢夺、破坏等闪电式的报复行动，结果 109 名中国人成为牺牲者，160 余人受伤。

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伤害事件，在怪罪失去理智的朝鲜人的蛮行之前，看一看不去制止而是作壁上观的日本警察的态度，我们实在是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的愚人。

7 月 14 日，尽管《朝鲜日报》特派员金利三发表谢罪书指出那篇误报纯属日本机关捏造的谎言，但第二天仍然发生了由朝鲜人动手进行暗杀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

这种结果百分之百地达到了日本人编造这出戏的目的。没留

下任何证据的关东军尽管掩饰住了喜悦之情，但他们却达到了破坏朝中两国关系的目的。

这并没有脱离开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人强行移民到满洲作为日本侵略的“尖兵”与中国人民对立的原则。

“中村大尉事件”在时间上与“万宝山事件”相重叠，发生在1931年6月末到7月间。为准备与苏作战，日本派遣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及在昂昂溪经营旅馆的井杉延太郎曹长制作兴安岭方面的《兵要地志》。

6月27日，在洮南和索伦中间的泰来附近，二人被中国军队驻当地屯垦军关玉衡的部下抓获杀害。

中村是伪装成农业技师从哈尔滨弄到榷子之后赶往当地的，不过他的本来目的是作为间谍收集当地情报的，而且他被逮捕的地方是外国人禁止出入的地方。

关东军起初并不知道中村的下落，后来通过关玉衡的日本小妾获得情报便出面调查真相，中国方面并没有轻易认帐，以后虽然说好9月18日处理关，但正巧“九一八事变”爆发，便不了了之了。

日本陆军隐瞒了自己的过失，反而向日本国宣传这是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一种压迫。

这两次被歪曲了的事件之后便迎来了1931年9月18日。

当天报纸的号外上刊登出令人震惊的内容：“18日下午10时半，奉天北郊北大营附近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被炸毁，在中国军官指挥下，三四百名中国兵有计划地袭击了我铁路守备队，我军予以回击，日军队终于交火。下午11时，我军下达了奉天驻军第29联队和铁路守备队准备出击的命令。19日早晨0时45分，奉天驻军开始了军事行动，目前正在交战之中……上午1时25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由此掀开了连接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命运攸关的“十五年战争”之序幕。

虽然日本参谋本部发行的小册子也称这次“九一八事变”起因于中国士兵炸毁满铁，但是，实际上却是以板垣和石原为中心的关东军的阴谋。

炸毁南满铁路路轨的其实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及部下数人，而且损害程度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仅只是刚刚可以供作口实罢了。事件发生不久，由长春始发的紧急列车便平安地通过现场到达奉天车站。

虽然当时石原在旅顺，板垣在奉天，但正如他们所策划的那样，日军占领了中国兵士驻扎的北大营，并在当天晚上迅速对奉天、长春、公主岭及四平街等满铁沿线重要城市采取了军事行动。

19日上午3时半，关东军司令官从旅顺出发于11时到达奉天，扩大了如疾风般的战争。

下面的说法是否应该相信，现在已没必要作出判断，据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都不知道会发生9月18日的事件。这完全是板垣、石原以及花谷少佐、川岛大尉等几人的杰作。

毫无疑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那年夏天，板垣在东京与桥本欣五郎相见，并密约9月28日采取行动，如果政府不顺从就由桥本发动政变。还同朝鲜军的神田正种参谋约定，如十月行事，便出动朝鲜军占领间岛。

板垣等人之所以提前行动，是因为前面说过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导致中日关系紧张，舆论也沸沸扬扬，他们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上苏联埋头于五年计划，此时不行动就很难保证苏联会保持中立，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虽然中国东北地区转眼间便落入日军之手，但中国政府没有应战，而是于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投诉，指出这是日本有预谋的

行动。尽管国际联盟和美国政府提出停战劝告，但日本以自己的行动是为侨民的安全而采取的自卫措施为由，非但没有接受劝告，反而于 10 月 8 日炮击了锦州。日本违背自己逐渐撤军声明的行径令国际联盟震惊。11 月 27 日，日军占领了锦州，由于涉及英国利益的铁路由此通过，美国史蒂文森长官提出了强烈抗议。

日本没有理由再硬赖下去了，于是，关东军暂时撤离了锦州，可是为了将张学良的军队赶到长城以南，12 月 28 日关东军再次占领了锦州，1932 年 2 月还占领了哈尔滨。然而这不过是日本借“上海事变”之机玩弄的一个小伎俩而已。

关东军开战半年便控制了除热河之外的其余土地，同年 5 月又占领了黑河省，军事行动就此暂告一段落。

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扶植清朝废帝宣统帝溥仪为伪皇帝，成立了其傀儡“满洲国”。

这是关东军当初就定好的目的，尽管初期遭到政府的反对，但政府见结果不错，便不问是非曲直，承认既成事实，并积极推行其侵略政策，奉之为不变的国策，赢得了政党、财界及元老们的一致拥护。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扭住小孩子的胳膊抢夺其食物的行为也比这光彩多了。

没有像样的正当理由，日本就抢夺了数倍于自己的土地，还要夸夸其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国际社会的信义。虽说盗亦有道，不过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杀人、抢劫，却厚颜无耻地狡辩说那不是抢夺而是神圣的事业。

由于个人和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野蛮的，因而女人要保持贞操、国家要维持主权都不是易事。对弱者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牺牲和受辱的奴隶哲学，而推动杀人的匪徒哲学则是强者的哲学。对自己而言，什么文明、法律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暴力统治。为了建立

力的均衡而进行无休无止的斗争的无法地带，这就是国际社会。因而力量就是法。

我们无须怪罪谁。

我们还活着，这就证明我们有生存下去的力量，国家的存在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明白：国际社会的盟约不过是梦呓或笑料罢了。

中国人是要顿足捶胸、咬牙切齿的，不过在把这愤怒指向日本之前，他们应该怨恨自己没有培养自己的力量，这样才合乎情理吧。

国际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道义而言，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这点，相信不会是多余的吧。

第一次上海事变

当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行动正在进行时，中国各地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掀起了抵制日货、断绝经济往来的运动。与各种社会团体的这些活动相呼应，广东出身、具有强烈排日思想的第十九路军没有理睬中央政府的对日妥协方针，而是投身到抗日斗争的大潮中。

不过，交战的导火索并不是这种政局，而是出自板垣的阴谋。

由于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列强也加紧干涉，因而日方认为有必要在满洲之外再生事端，将列强的注意力转到别处。于是，板垣将驻上海公使馆所属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召到满洲，给了他 2 万日元，嘱咐他在上海制造骚动。田中与重藤宪兵少佐一起通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收买中国人，他们便在马玉山路袭击了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及 4 名信徒。

这就是 1932 年 1 月 18 日发生的事件，该事件扩大了日本侨民与中国人之间的纷争。该事件发生之前的 1 月 8 日在东京樱花门附近还发生了李奉昌向日本天皇投掷手榴弹刺杀天皇未遂事

件，中国方面借此之机召开了抗日市民大会，各种事态交织，使形势愈发严峻。

尽管中国方面为了稳定局势在上海颁布了全市戒严令，但是 1932 年 1 月 28 日，中国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之间的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以 3 月 3 日中国军队撤出而告终。在英国的调停下，5 月 5 日中日签署了《华日停战协定》。

由于上海集中了列强的权益，是举世瞩目的地方，日本军队没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不过这期间 2 月占领哈尔滨，3 月成立“满洲国”板垣的阴谋可以说大获成功。

协定签署后，陆战队便撤离了上海。不过此前的 4 月 29 日是天皇的生日，日本占领军首脑与侨民聚在虹口公园摆开了祝寿筵。尹奉吉义士向酒筵场所投掷了炸弹，白川义则司令官身亡，野村吉三郎中将炸瞎了一只眼，重光葵炸飞了一条腿，此外，还有数人受伤。面对尹义士的义举，我们朝鲜同胞和 10 亿中国人民一天也不会忘记他的恩德。

上述就是第一次上海事变的概况，总之，这起伴随“九一八事变”而发生的事件，完全是日本军部一手策划的。

日本自 1931 年‘三月事件’后由军部一手策划的东北侵略战争即‘九一八事变’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十月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政变最后又发展为‘二二六政变’。

换句话说，军部这一暴力组织利用恐怖活动闭塞国民视听，蒙蔽了他们的理智。名为帝国主义的犯罪集团将日本当作监狱，在他们恐怖的黑手下，我们韩国人任人宰割、奴役，这是一场多么令人愤慨而又可怕的恶梦啊！

琿春事件

尽管按顺序说有些晚了，不过还是让我们看一看“琿春事件”吧。

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众多的爱国志士越过图们江来到延边一带。这里是中国领地，也成了韩国独立运动的圣地。

冬季来临时，从这里出击朝鲜很方便。随着袭击警官派出所等武力冲突的展开，日本意识到了不对延边的朝鲜人予以重创，对朝鲜的统治就会摇摇欲坠。

“三一运动”之后，斋藤实作为总督前往汉城赴任，一下火车就发生了白发老人姜宇奎义士不顾警察的重重防护投掷炸弹的事件。这事件非常闻名，而姜义士本人在延边俄领地也是位为独立运动培养人才出过大力的人士。

日本军队又一次使出了阴险的手段。1920年12月2日用金钱和武器收买中国的马贼头目袭击了琿春，杀害了日本领事馆更夫涉谷的家属等9名日本妇女。造成好像是朝鲜人袭击了日本侨民的假相。

日本自己挖好了陷阱，好像这是朝鲜人所为似的，并以此为由，派出大部队出兵延边。不过，10月下旬在长白山附近和龙县青山里战斗中，日本军队遭到了独立军的沉重打击，焦躁不堪，作为报复，便按原计划以延边为中心对朝鲜人村落进行毫无顾忌的疯狂袭击，展开了大屠杀。

从1920年10月5日起至11月23日止，50日间有3000余人被杀害，2500余户房屋、38000石粮食被烧毁。

他们对朝鲜的独立运动非常恐惧，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当时《东亚日报》记者张德俊为采访琿春事件来到当地却未能回国，反遭日本凶手杀害。可惜了青春年华。虽然他没有全部完成

自己的使命，但他却已成为与“珲春事件”不能分割开的人物。他还是张德秀、雪山的二哥。

再插句题外话，延边明月沟有一支朝鲜人构成的特别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讨伐从事独立运动的朝鲜游击队。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骨肉相残，不过，看样子当时这支特别部队的军人有不少已经摇身一变成大韩民国的高官和爱国者。

“韩日合邦”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了种种虐政和压迫。编造出同宗同根之类的无稽之谈，将“皇国臣民誓词”及“创氏制度”强加到朝鲜人民头上。

这就是他们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挥舞大棒的政策。

在“尽忠报国”、“宁为玉碎”之名下，有多少朝鲜同胞被赶上战场，走向死亡之路。

回想起来虽然如同一场可怕的恶梦，不过，这从反面证明了我们朝鲜民族不是轻易就能被同化的懦弱民族，这不能不令我们自豪。

历史告诉我们，维持一个殖民地本质上就是抢夺别人的食物，因而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还证明，要想完全消化一个殖民地更困难。

是顺从，还是反抗，人们常常徘徊在十字路口上。在这种事关作奴隶还是作自由民的选择关头，总是需要勇气。

应该抱着盛极必衰，强者总有一天会灭亡的信念和哲学生存下去。这是古今相通的信念，弱者的宗教。

江水流淌，历史也悠悠。一代过去，新的一代又会来临，苍茫大地，谁与永生？

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悲惨生活的记忆都化成了黄土与化石，这是多么令人痛苦而又可怖的历史啊！

“二二六政变”

“五一五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即 1936 年 2 月 25 日晚东京飘起雪花。这是 30 年不遇的大雪。第二天 26 日凌晨 3 时数百名以步枪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军人出现在街头。

这些青年军官起来的目的是：“在国内外面临重大危机之际，通过铲除元老、重臣、财阀、军阀、官僚、政党等破坏国体的元凶，端正大义，拥护、展示国体。”

他们断然采取大量的暗杀行动，其“战果”据 2 月 26 日下午 8 时 15 分陆军省首次公布的情况：“今天上午 5 时，日本青年军官们袭击了下列场所：在首相官邸冈田启介身亡，斋藤实内大臣在私邸身亡，渡迅教育总监在私邸身亡，高桥大藏大臣在私邸负伤等等。”不过，这则报道有很多误报。

冈田首相躲了起来，其妹夫松尾传藏预备役陆军大佐代他而死，高桥大藏相身亡，斋藤内相在财阀处避难。警视厅一时间被 400 余名军人占领。

到 29 日镇压时为止，以议事党为中心的官厅附近全被叛军所占领。

该事件就是“二二六事件”，这些叛乱军官们在思想上都受到过北一辉和西田辉的影响，与“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主谋者都有密切联系。

只不过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仅只是破坏和杀戮，至于具体的建设计划则根本没有。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摆脱掉年轻气盛的幼稚之气。

不过，由于这一事件有很深而且复杂的背景，我们不能把它看得过于简单了。

1932年，日本虽然建立了傀儡“满洲国”，但这并未使日本立刻便获得“王道乐土”。

承认“满洲国”之后，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了“驻满大使”和“关东长官”。1934年12月设置了“台湾事务局”，由陆相兼任“总裁”，台湾政策的决定权落入陆军手中。虽然在1932年~1936年5年间，向台湾投入了10亿日元资金，但对“满洲”市场和人民生活提高没有帮助。

“满洲国”全年预算支出的55%用于军事、警察费用，而没有用于挽救农民的贫困和民族产业的凋弊，因而，满洲人民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和掠夺进行了有组织的强烈反抗。

而且，在国内，从1931年~1935年间发行了35亿日元的公债，酿成了“百亿公债”的危机。

1934年10月，陆军发行了名为《国防宗旨及强化国防的倡议》的小册子，为了国防目的应当对国家机器进行综合统制。为此就应抛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念，极力鼓吹建设国防国家的必要性。

而对军部的这种攻势，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在1935年初第67次议会上，对根据陆军小册子军人参政和预算偏重军费开支现象进行了攻讦。

对军部的这种批评遭到了军部及右翼的反击，他们又针对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制造了“天皇弃管说”问题。指责他是主张反国体的学匪，是谋反的叛逆。此外，在2月21日右翼团体的暴行中，美浓部还受了伤。

1935年2月19日，国会提出整肃国体决议案，并一致通过禁止贩卖其著述《宪法撮要》。

动荡年代的思想统制压制了自由，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天皇弃管说”问题没有停留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论，而是成了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明争暗斗的重要原因，作为军部内部反对“弃管

说”的先锋，真崎教育总监尽管在青年军官及右翼之中的声望大大提高，但却被元老、重臣和政府视为危险人物。

这时陆军内部正好展开了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派别斗争，随着荒木贞夫成为陆相，樱花会的中心人物桥本和重藤等被逐，同时，宇垣派的重要人物二宫治重和建川美次分别升任参谋次长和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真崎为参谋次长，柳川平助为陆军次官，山下奉文为军事课长，秦真次为宪兵司令官，大力扶植己派势力，陆军落入皇道派掌握之中。

荒木一派之所以被称为皇道派，是因为他们倾心于“天皇亲政论”和“观念革新论”崇尚精神主义，我们可以用“皇道、皇军、皇威”六个字来概括其精神实质，其实其内涵空洞无物。就是说他们只是强调天皇主义，欲以天皇的威势大展身手的帮派。

对此，由于身受樱花会影响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等的幕僚们的努力，林銑四郎成为陆相。他一上台，荒木派便遭到排挤，从1934年3月起用永田铁山为军务局长开始，掌握了陆军的实权。

他们还使军部和右翼恐怖分子建立了联系，与官僚们携起手来，策划了以军部为中心的“全力战体制”。因为他们是排斥政变，维持军队的统制，梦想通过合法途径改造国家的政策派，所以被称为“统制派”。不过，在统制派内部也有像桥本欣五郎大佐和长勇中佐这样的激进派，他们把军部称霸的希望寄托在政变上。

两派在军部独裁这点都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方法，统制派的方法被皇道派指责为“幕僚法西斯”、“反国体的”。

军队内部两派之间的这种暗斗由于真崎教育总监的更替而进一步加剧。

平素就崇拜真崎的福山联队相泽三郎中佐，于1935年8月11日9时半无端侵入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房内，接近了正在听取宪兵队长新见英夫大佐报告的永田。永田察觉苗头不对，撒身便逃，

相泽大叫着“天诛！”从牌位上举刀朝永田刺去。相泽是户山学校的剑道教官，是个狂热分子，常有越轨行为。虽然被世人非难为疯子，但却被青年军官们视为伟大的义士和先觉者。

1936年1月8日，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召开，但审判变成了彻底暴露统制派阴谋的法庭斗争，一时间永田似乎成了十恶不赦的伪善者，而相泽则相反俨然成了爱国者。

他于当年7月被处以极刑。

利用相泽事件所掀起的波澜，皇道派欲赶走统制派，谋求新的所谓维新 这就是“二二六政变”可怕的背景和真相。

日本军人以皇军自诩，不过，经过军人要绝对服从命令的教育洗过脑的士兵们，不论是非曲直，把听到杀人的命令就去杀人视为正当的行为。他们不是人，只不过是机器而已。

这帮家伙在利害关系面前当然会争得头破血流。不过，在这种争斗中被当作炮灰或工具的兵士们，作为皇军，其身份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可笑的玩物或奇特的景观罢了。

面对自私利益或是派别之战，也以皇军自居，并产生错觉，仿佛是为了了不起的大义而冲锋陷阵，侵略外国时也是如此。

所谓皇军不过是侵略军的别称，是以掠夺、杀人、强奸为本业的，我们这么说恐怕也决无过分之处。

从“二二六事件”之后到当年7月 由于戒严 舆论、报道、集会自由极受限制。不过，国民内部对军部的不满和反感日益膨胀，对军部要求肃军的批评之声日益高涨。

1936年5月7日，斋藤隆夫在第69次议会特别议会上对陆相进行了质问，批评军部首脑对“三月事件”以来军人所干的坏事不闻不问。他在指出“二二六事件”是对明治天皇立宪政治的伟大精神的践踏并表示出震惊之后 发表了所谓的《肃军演说》：“国民

们全都义愤填膺，只是他们已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无法表达心中的意愿。但是，国民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我衷心希望国民的忍耐力再也无法继续的那一天不会到来。”各报都对此作了报道，引起了国民的共鸣。

然而，陆军内部以肃军之名假装回报众论，暗中却恢复了对军队内部的统制，强化了领导权。

1936年7月5日举行了非公开、无辩论的一审制黑暗审判，在特设军法会议上，15名叛乱军官占大部分和北一辉、西田税等4名民间人士全都被判死刑。与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也因同情或与被告关系密切受到牵连，皇道派的军官们被扣以包庇罪遭到追究。随之而来的人事变动使皇道派的头目荒木和真崎退役，之后大多数军官四散而去，涉及3000人的人事变动使统制派完完全全地垄断了军部。

由此，曾经著述过青年军官的经典之作的北一辉和西田税成为昨日黄花，“二二六事件”就此告终。

不过，在该事件发生的同一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并组成以抗日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中国的抗日运动开展得更加如火如荼。日本则于1937年7月7日抢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挑起了中日战争。

尽管北一辉魂断死刑台，可是他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却为军部所继承，成为中日战争的精神支柱。

如果说今天的日本自卫队干部之中没有一个人思想深处有其幽灵游荡，全都信奉民主主义恐怕不够聪明吧。

关东军第731部队

关于日本人，我们再谈谈一件事吧。

这就是关于关东军第731部队令人震惊、恐怖的故事。不，这

是令人瞠目结舌、毛骨悚然的故事。

第 731 部队是于 1932 年傀儡政权“满洲国”建立后的第二年，以加茂部队之名成立的。其后于 1938 年 6 月 13 日 迁移到距哈尔滨市中心约 20 公里处，名为平房的地方，方圆 6 公里的广阔地域被划为关东军特别军事区，在里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1939 年，加茂部队迁入四周围有配着高压线和铁丝网的高墙之内，并改名为东乡部队。

关东军 731 部队虽然更换过两次名，不过，被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通称石井部队的这个细菌战秘密研究所制造了这支魔鬼部队。

即使友军的飞机在其上空无端飞行，该部队也可以将其击落，他们还拥有专用的战斗机。如果想去 731 部队，不通过其设在哈尔滨市内的秘密联络处是不可能的。

该部队的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他从京都帝大医学部毕业后选择了职业军人这条路。39 岁时升为三等军医官，成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同时任陆军兵器总库的干部。

从 1930 年春一直到 1931 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他作为军事间谍到欧洲旅行。他向派遣自己的永田大佐报告说，当时纳粹德国正在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日本如果不开始基础研究就会落伍。特别是着眼于 14 世纪下半叶人口不足 1 亿的欧洲流行黑死病、使 1/4 人口即 2500 万人死亡的事实，而选择黑死病菌为细菌战最有力的武器。

将细菌转化为武器的恶魔念头在石井的脑海中生根发芽，正是因为与此有渊源吧，在部队长室的书案上，永田铁山陆军军务局长的胸像总是和一架双筒显微镜放在一起。陆军统制派枪手相泽中佐呐喊着“天诛”一刀将其毙命。对皇道派的报复，是 1935 年 8 月 12 日发生的。

从渊源上看，永田可以说是 731 部队的创始人。从这个角度

看可以说相泽喝叫的“天诛”是正当的。撇开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派别斗争，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看，即使永田遭天谴也没什么不对。

石井才华出众，在京都帝大读书期间成绩出类拔萃，校长认为他前途无量，还把他招为女婿。

731 部队在进行细菌实验时用人代替白鼠作实验材料。与用白鼠代替人的惯用方法正好相反，这是这支部队的特色。

被选作实验用的人被当成物体而不是人来看待。随着研究目的不同，用作活体实验材料的人不是被称作白鼠，而是叫马路大，即木头之意，胸前贴着的标牌上，除了数字号码外，姓名之类的固有名词早就没了。

马路大是由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以及其属下哈尔滨保护院抓来的苏联人、中国人、蒙古人及朝鲜人。其中有潜伏在中国各地的苏联红军情报军官，成为战俘的中国八路军干部和士兵，反对日帝侵略、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学者、工人、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属。

作为战俘本应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但他们却被捆在一起，经过特别押解运送到第 731 部队 X 号栋内特别监狱中。到该部队之前，无论宪兵的拷打多么残酷，仍有反抗的机会，可一旦被这支部队收容，所有人便都立时成为无法生还的实验材料。马路大中有因反日分子嫌疑被捕的俄罗斯女子和中国女学生，她们主要被用作梅毒实验材料。

在哈巴洛夫斯克远东军事审判中，曾为高参干部的军医少将川岛在证词中说，731 部队平时总要准备二三百名马路大。还说，从 1939 年到 1949 年不到 7 年时间消耗的马路大数超过了 3000 名，曾经担任过队员的人说恐怕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马路大不是分别被注射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梅毒菌等细菌，就是通过饮食物人为地使马路大感染。马路大还被用作冻伤实验、枪杀实验、坏疽实验材料。

在这支部队中有 2600 余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他们是由日本国内许多大学医学部、医科大学或是民间研究所派来的研究人员、学者以文职人员、技师等身份做事。

作为关东军的绝密部队，731 部队得到了庞大的预算经费，1940 年共下达 1000 万日元经费，其中以研究事业费名目下达 500 万日元，以工资支出名目下达 500 万日元。当时大将、中将的年薪为 8000~10000 日元，可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而这支部队雇员的月薪比大臣的月薪还要高。

石井四郎还将大笔公款用于游乐。至于马路大的确切价格无从查考，不过给宪兵队本部和特务机关支付了不定数量的金品。与 731 部队有关系的宪兵或特务机关的人之奢华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

有些日本军人慨叹道：“很多嘴上高喊爱国的忧国之士背地里都成了寻欢好色、腐化堕落的标本。尤其是军队上层的腐败并不只局限于 731 部队。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的将官将他国当作侵略对象，将军队当成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在爱国、卫国的漂亮招牌下，将军队当作肥食分食。”

日本把侵略战争说成是“圣战”。侵略者的逻辑总是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使者。怀着爱国热情与民族独立的火热信念而活的抗日志士，以及在黑暗中战斗的年轻人成为马路大而牺牲。为了探望被捕的丈夫来到警署或监狱的妻子或儿女，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地抓起来押送到 731 部队。这种丧尽天良的行径竟使“圣战”“生辉”成为授予勋章的大功绩。这点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

当时以军人、文职人员身份在 731 部队工作的人现在作为日本医学界代表性学者活跃在第一线，这不能不令人震惊。或许否认、无视我们所信奉、恪守的道德和宗教价值的必要性才是正当的

吧。

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可以 and 任何恶魔妥协。

哈尔滨的冬天低于零下 40°C 时是经常事。在晚 11 时到 12 时，将马路大的手脚放入装有冷水的桶内，使之人为冻伤。在冻伤过程中，检测皮肤变化的时间，并进行缜密的观察。偶而用方木击打其手，如果有痛觉就可判断尚未完全冻伤。就像弄折糖条一样还将手指头弄折以为验证。

在确认马路大四肢已经坏死后，再拖回房内，用温度不同的热水轮流慢慢浸泡马路大的手脚，观察其变化。有时，马路大完全冻伤的四肢放入热水中后，冻伤部分的组织就会整块脱落，露出白色的骨头。之后除了截断四肢外，马路大别无生路。

活体解剖前，各班都要约好所需部位，如 ×× 班需要心脏，班需要脑 □□ 班需要胰脏等。

作为学者或医师的班长基本不亲自主刀，主刀的都是作为助手的班员，他们对活体解剖毫无负咎感，各班都热衷于能够采取到什么样的标本。

一般在一个小时之后，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的马路大就会变成活生生的标本。

用解剖刀从脖颈到下部直线切开，胃和肝脏便在黄色的脂肪内部蹦出，将其左右分开，再摸一摸看看马路大的反应。有时也切断神经或血管，或者再接上；还会将左右臂互换移接，或是将内脏一个一个地切除，真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他们最关心的是脑。

一次，有个才十二三岁的中国少年被领进了解剖室。他不是抗日分子，所以也不是马路大。他是被诱拐来的。解剖刀在他身上划了个丫字 内脏也都分配给了各班。这是 1943 年发生的事 就是因

为需要健康少年的内脏，少年便魂断实验台。

马路大体内还被注入各种物质，有时还注入空气。这是为了了解内脏发生的变化和时间结果。实验过被倒吊后几小时几分能死，还实验过身体的各种变化，还做过把人放入离心分离机高速旋转实验。做过用猿猴或马的血与人血互换观察此后发生的变化，或观察血挤出多少马路大还能生存的榨血实验。将烟气灌入肺中或者以毒气代替烟气灌入肺中会怎么样？还有用 X 射线长时间照射的活体实验。

这些实验都是为了采制标本。

对女马路大进行活体解剖所需时间是普遍病理解剖的 3 倍，因为要以生殖机能为中心动用多种测试仪器调查排卵机能等。

活体实验中还有饥饿实验，在只供水的情况下，马路大能活 60~70 日。只给面包时 实验 5 日脸部浮肿 表情痛苦 实验 7 日，马路大毫无例外地吐血而死。

除此之外，像干燥实验、电击实验、热汤实验等等犹如家常便饭。

将马路大绑在椅子上塞进高温的干燥室里再吹上热风，马路大就会大汗淋漓，汗珠没了，人也就干巴了。将近 15 个小时时 马路大体内渗出的水分便干没了，在这桑那地狱中，马路大的躯体变成了木乃伊。用计量器一量，体重只有生前的 22%。由此可以认证人体的 78% 是水分。

731 部队为了培养鼠疫菌使用了很多老鼠。一个油筒里固定一两只注入鼠疫菌的老鼠，再放入跳蚤使之吸血繁殖直到将血吸干。

一共有 4500 个鼠菌、跳蚤饲育器，只要过了两个月，就能制造出数十公斤的鼠疫菌、跳蚤。

这就是 731 部队的所作所为。对有生命的马路大而言，只有入口而无出口，指的就是此处恐怖的解剖室。

马路大的年龄绝大多数都在二三十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也只有 40 来岁，没有一人超过 50 岁。

《恶魔的饱食》一书揭露了 731 部队的内幕，其作者年轻作家森村诚一写道：“将人与恶魔分隔开的万里长城是不存在的。在为战争、为国家、为集团大义的美名下，很多日本人都转化成了‘智的恶魔’。731 部队实录便明确展示了这一事实。”

我认为日本人没有权利抗议向广岛投掷原子弹。而应该将其作为“上天的惩罚”来反省才对。尽管日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民主主义国家，但他们却是随时都可能疯狂起来的天皇之国。世人绝不能忘记这是个拥有天皇和魔鬼两张面孔而其国民趾高气扬的国度。731 部队的亡灵和饱食的恶魔或多或少都停留在日本人所热衷供奉的神社里，我们很久很久都不会遗忘。

日本人恐怕不只一次自愧，怎么会这样就拉倒了呢？……

人类的残忍是有限度的。我们能够幸存，经历的是一种可怕的冒险，不能不说是奇迹。

纳粹是靠吸犹太人的血，“皇军”是靠吸黄色人种的血而发展起来的，这不是仅仅忏悔便可以了事的。

毫无疑问，地球的确是令人诅咒的恶魔的所有物。

四、中国面面观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要想寻觅时间最久、空间最广的国家，就不能不提到中国。

尽管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给中国造成的种种屈辱和惨相难以一一尽数，不过，考虑到号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白人文明是靠剥削、榨取有色人种建立起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忽视中国在今后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尤其考虑到中国是极少数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之一，现在排斥大国中国便无法探讨世界问题，而今后，只要再过半个世纪，离开无比强大的中国，世界问题将不复存在。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这不需要漫长的岁月，实际就在眼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耕社会，农业成为经济之本。因而，土地所有的面积及产量多寡就成了衡量个人及国家权力强弱的尺度。由于实物谷物的多寡决定了税收的多寡，进而决定了常备兵力的多寡，因此，在灌溉农业中，水利权成了可与土地所有权比肩的重要财产。政府在决定租税时不仅要看国税大帐、地租帐簿，也要看有关水利权的记录。在中国要想成为征收租税的官吏，就要具备如何计算才能使地主更为有利及收集各种有利于地主的各种资料的能力。与其说官吏们的任务是向富有的地主课税，不如说是以将租税沉重的负担转嫁给农民为己任，因而农民根本无法摆脱贫困的深渊。

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每逢国家出现繁荣，奢华的宫廷及全国

各地拥有巨大家产及教养与腐败集于一身的权贵便会应运而生。过不了多久就会引发农民暴动，造成巨大的破坏力。

在这种暴动之中，手持长剑的武士夺取政权，开始新一轮次的统治。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便形成了中国历史。

中国的皇帝为了阻止自己仆从同时又是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地主阶级的壮大，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固皇帝的地位，建立了宦官——内侍制度。但是，宦官们并没有成为帝王单纯的仆从，他们借助帝王的威势行事，还插手王室内部的政务，成为出现恶政的原因。

他们在帝王性格优柔寡断或被腐败的权臣包围时，可以很容易地用财物使之走向腐败、崩溃，如果是一心追求奢侈享乐的皇帝，他们就会使之沉迷于酒色，然后撇开皇帝，随意行使其傲慢、苛薄的权势。在宫廷内部，由于与帝王与后宫有密切的关系，还会成为使帝王走向腐败与没落的力量。

我们将话题扯得再远点儿。在中国，历代王朝都是由武士建立的，原因在于这是个土地经济，即使中国未经历战国时代，为了维持权势，为了争夺权势，也仍然需要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中国就没有停止过内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导力量是农民和工人，作为农业经济社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中国自古以来战火兵乱连续不断，因而，关于战争的有趣的和启迪智慧的书很多，如《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等兵书，甚至出现了以《三国志》、《水浒传》为首的战争及武侠小说。

不过，中国是个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国家。翻开中国的文化史，有无数群星闪烁，光彩夺目，其中包括李太白、杜甫这样的诗人和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

还有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勾勒了时代面貌的《金瓶梅》、

《红楼梦》这样的著名小说。

思想与文化博大精深，比这更优越的文化在地球上是不找到的。

物质文明似乎全都起源于欧洲 其实 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以及丝绸、茶、中医学、陶器等全都是中国发明的。

中国有固有的语言和固有的文字。中国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讲自己的母语。无论自己的生活如何，身份如何，他们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国人大部分都豪爽、诚实，具有大陆人的性格，有时与日本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非常看重并特别信守诺言，常常以此代替合约。

从他们的语言结构看，敬语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虽然根据具体情况略有不同，但在贫富差别或对待年长者方面并不像朝鲜语这样以繁杂的形式予以一一区别，上流社会的语言和平民也没有大的差别，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英语。从这点看，他们简直不像是长期处于帝王统治制度下的百姓，其思考和行动方式含有不少民主的成份。

不过“面子”是中国特有的风习。面子指的是以东方道德观为基础的体面，自己的面子固然重要，为顾及对方的面子也常常不说出真相，使秘密不致泄露出去。我们韩国人根据自己的风俗习惯以为是无所谓的话，对中国人而言，可能事关面子问题而生气，甚至打起来。

现在，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大众化，情况不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土话——方言还是多得不得了。长江以南和以北地区便完全像另一国家的人似的需要翻译。此外，大大小小的方言不计其数，常常使意思的表达变得非常困难，而且文盲过多，在现代文明的传播方面相信会令中国感到头痛的。

在中国 封建、落后的东西与现代、文明并存 地域辽阔 又是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人口过多，要想完全消除文盲似乎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中国，北方接受了游牧民族的骑马战术，学会了大范围的机动战术。而南方由于河流及运河很多，不能不依靠船。这被称为“南船北马”。由于是农业国 水利和土木技术就成了全民族世袭的共同财产。江与江连接 与湖泊连接 首都与地方连接 运河地区以大运河为中心形成了运河网。这在行政上及文化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从军事上的重要性而言，运河堪称第二座万里长城。

中国自然经济的中心是在长江流域，但政治中心却在黄河流域。而通过大运河系统，经济中心迁到黄河流域，中国的运河担负起了铁路的功能。

到了唐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得到发展，作为录用文官制度的科举，虽然在名义上是采用了民主的形式，但高级官吏实际上是半贵族、半世袭的，地位非常稳固。

贫富差异，以及因权势不同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有所不同，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宫廷有后宫，上流社会则允许一夫多妻制。直到 1945 年之前，距今还不到半个世纪，有的家庭仍有四五名小妾，可否称之为大家族制度呢？正室和年轻的小妾的年龄差就像妈妈与小女儿之差一样。

从这方面看 夫权与女权相比 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不过 在下层大众社会里，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成不了亲，就那么活下去。

不知是因为什么，女性稀少，这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上流社会的厨房留用的厨师都是男人，而普通家庭的一日三餐也由男人准备。

除了劳动赚钱，还要承担厨师的功能，这才是模范丈夫。

中国在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女性都要缠足，就是从小孩的时候就把脚绑起来，使之不再生长。有说这开始是因为女性不足而为防止逃跑才这么做的，也有人戏称与性有关。

中国话中有“窑子”、“窑姐儿”之类的话。窑子指妓院，窑姐儿指的就是妓女，革命前到中国旅游的话，在不到万人的小街上就能看到名为窑子的妓院。

中国春秋两季西北风就会卷起黄尘，黄土和沙尘遮天蔽日，风沙一刮就是一周，因而就连小城市公共浴池都很发达。

这两种设施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是由社会需要而发达起来的，与国家命运无关，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发展，成为中国大众文化之一，而具有了生命力。

那时候，走在中国的街道上可以看到临时搭成的戏台子，留着张飞胡须、手持龙天剑看起来有些愚鲁的汉子和打扮得像杨贵妃那么漂亮的女人变换着台词在唱歌。一般称之为唱戏，说这是中国式的歌剧也可以，观众的表情随着台词的变换而变化并鼓掌喝彩。这又有点儿像街头歌舞，是古代、现代与大众化的杂糅。常使人联想起《春香歌》和《沈清歌》。

在人们聚集的街市角落，用来赌钱的赌摊也很盛行。

从掷色子到不知名的赌博，在行人摩肩接踵全神贯注的地面或草席、桌子上摆开。

去过拉斯维加斯的人或许会为那里辉煌灿烂的灯火和卡斯诺（有音乐、舞蹈设施的娱乐场、赌场）各种趣味横生的设施所惊诧，不过从种类也好，历史也好，都很难比得了中国。

西方赌博大体上都是机械化的，往往靠侥幸，至于比试脑力的游戏，最好的恐怕也就是国际象棋和桥牌了，不过远不及复杂的东方象棋，显然也无法与麻将、骨牌、围棋相比。高尔夫和扑克是用来

交际或作为绅士娱乐的，而作为凭能力决定胜负的游戏而言，没有能够超越象棋或围棋世界的游戏。在中国，围棋作为琴棋书画之一成为名流雅士必通之雅趣，中国在游戏消遣方面境界之深不能不令人惊讶！

在烹饪方面，中国烹饪堪称世界第一。无论从色、香、味哪方面看，烹饪之王非中国烹饪莫属。西餐中的叉、刀、勺尽管精致华丽，味道却怎么也赶不上用长长的筷子夹吃山珍海味的中国烹饪，也比不了韩国料理。

近来，与机械文明相伴而来的西方医学感觉好像统治了医学界。然而，它只能延长死亡时间，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赶走死神和病魔。

而在东方漫长的岁月中，有本身为草根树皮的中草药和自古流传的针灸医术。

这是中国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结下的果实，从时间上看，东方医学远远走在了西方医学的前面。我们撇开解剖学不谈，西药或多或少都有药害即副作用。而中药可以长期服用，慢慢发挥药效，常用于成人病。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汉方医学好像与中国的国民性互为表里，其前景非常乐观。

佛教是公元 62 年后汉初传入中国的，寺院作为宗教集团，同时也成了财产所有集团。唐代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意识到消除寺院势力和取消特免权的必要性，对寺院的迫害及对寺院私有地的没收公开化了。

其后，佛教由于得不到恢复元气的力量，其地位被作为地主阶级重要组成的官僚制度的基础、尊重君臣间的秩序和等级的儒教取代。

不过，分散在各地的寺院和佛像对绘画、雕刻及学艺来说留下

的是不朽的贡献。

在唐代，回教绕道新加坡，经海路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西北部扎下了根。

中国有好多种密教，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佛教和回教作为两大宗教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五、清朝的崩溃

中国有时被称为沉睡的狮子，有时也被戏称为纸老虎。这话不知起自何时，不过作为对中国实力的评价，尽管有其不当之处，但总体看来，也可能说表现得恰如其分。

这样的话得以流行恐怕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可以说鸦片战争左右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把东方人赶入悲惨的命运之中。中国有无数苦力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与其说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历史遗物，不如说是殖民地社会残酷剥削和压榨的牺牲品和排泄物。在上海，公园入口处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嘴上高唱什么人人平等，人道主义如何如何，而实际做的却正相反，这就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把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反抗殖民统治列为第一目标解释为将国权强化、恢复到鸦片战争之前的状态的主张是不会有什麼大错的。

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占领了中国的很多角落，丧失关税自主权的中国产业犹如被解除了武装的俘虏。

正如淋病、梅毒能使人破人亡一样，鸦片是亡国的捷径，明知如此仍然将鸦片强卖到中国大地的是西方人，把枪口对准中国的也是西方人。究竟是他们戴上了基督教文明的假面具，还是基督教文明本身如此，实在令人难以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鸦片战争确实是拥有基督教文明的白人留下的一大罪恶。

鸦片战争是 1840 年爆发的，10 年后的 1850 年爆发了太平天

国运动。又过了 10 年，《北京条约》签订。

如此看来，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导致了如洪水决堤般的惨剧。

鸦片之毒侵蚀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吸鸦片的人虽以满族贵族、官吏、地主等统治阶层及其周围的寄生虫们居多，但是军队也刮起了吸毒之风。

清朝虽然自 1800 年起便严禁进口、买卖及吸食鸦片，但由于大小官吏受贿成风，鸦片畅通无阻。

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古特拉伯因精通广东话，做过英国驻华代表的翻译，参加过《南京条约》的签订，做过香港英国政府的中国关系秘书。但他作为手持《圣经》的鸦片贩子更为有名。

鸦片虽然以其药效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吸食鸦片之流弊却像传染病一样，理应受到文明国家的一致唾弃，这才合乎人道。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

尽管如此，英国为了助长鸦片的消费及强行推销鸦片，仍然处心积虑地单方面挑起了战争。这与身为警察不抓强盗反帮强盗、与强盗同流合污有何区别？

鸦片输入之前还是白银储备国的中国，因鸦片消费量激增而导致贸易急速逆转，白银储备几乎荡尽。

这固然是由于鸦片战争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原因，而不分青红皂白枪炮相加的却是有过蹂躏印度经历的英国人。

前面我们介绍过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而使清朝由闭关锁国政策走向产生出不平等条约的溃败之路的情况。

当时英国产业资本家在本国和殖民地关系方面认为，取消贸

易上的一切限制更为有利，因而迎来了自由贸易时代，但是固守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却未能形成这种环境。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将原始殖民地的从属文化强加给对方。于是，在国内从属化形成制度的封建社会在国际上又摇身一变成了从属异民族的殖民地社会。

关于《南京条约》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概括的介绍在此不必赘言。不过，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了追加条约规定了最惠国条款。

这意味着一国从中国获得特权后，其他国家也同样均沾，这一新原则使中国遭到更广泛的欺凌。

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引入了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最早的最惠国条款。实际上，中国不是被某个特定国家征服的殖民地，而是沦为带着炮舰护卫着的商船驶向中国的列强的国际性殖民地。

继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

各地民众都对英军进行了抵抗，广东方面的抗争尤其激烈。尽管清政府将民众视为无赖汉，对他们的斗争进行了压制，但 1841 年春广州附近百余村数千名男女群众打起了“平英团”的旗帜，敲着铜锣，和义勇队一起，同侵略者的暴行展开了英勇斗争。在广州街道上还数次贴出攻击与英国人妥协的官僚的榜文，呼吁全体市民共同斗争，阻止外国人入城。这一斗争由于有名为升平社学的村塾及科举中第却未做官的忧国志士参加指导，参加者不仅有中、小地主阶级，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及妇女。

1858 年，民众的斗争在英法联军再度侵略后遭到失败，抵抗中止。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暗无天日的泥潭中。在这种黑暗的岁月中，闪闪发光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运动持续时间超过了 15 年。

英国所产棉丝布的进口极大地影响了广东所产南方木棉和长江流域棉制品的销量，使制丝工和其他职工失业人数增加，农民的生活愈发贫困。雪上加霜的是，1850 年进口的鸦片量超过了 5 万箱。于是白银如洪水般流失，银价一跃而为 20 年前的 2 倍。农民的土地税要用银价支付，因而要缴纳的税也是以前的 2 倍。此外，还要负担战争赔偿。与此同时，地租上扬。官僚及其他上层阶级贪恋鸦片及舶来品，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民及手工业者血汗的榨取。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又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土地日益集中到了官僚、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的手中。

农民的贫困化使国内市场萎缩，不利于产业发展。尤其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工业新芽枯萎。国内产业状况恶化，商人买办化，成了外国商人的马前卒。

这种现象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瓦解，流民和贫民数猛增，苦力的输出也持续增长。以这种形态输出中国移民的交易被蔑称为“猪仔贸易”可以说这是黑奴贸易的延续。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苦力流往西印度群岛的甘蔗地和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当时东南亚的移民就是现在成为东南亚社会重要力量的华侨的前身。

问题不只局限于苦力，鸦片战争之后，军队缩编又造成众多士兵失业；由于贸易中心迁移到上海，广东一带搬运外国货物的力工失业数也增多了。

国家财政困难和行政腐败使治水事业得不到扶持，从 1846 年起至 1850 年，黄河与长江的泛滥使流域内十几个省蒙受巨大的洪涝灾害。

从 1841 年到 1849 年期间，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贵州等华南各省掀起的回教徒和瑶族民众起义及天地会等秘密组织领导下的农民起义不下百起。这期间，少数民族和汉族又联合起来使运动转向对清朝分割统治的共同斗争。

1849 年广西闹大饥荒。饥饿的农民组织起来向地主、富豪要粮要钱，地主和商人组成了自卫队与之对抗。农民们虽诛杀官吏，与地主和商人的武装进行冲突，但他们却打起了“复明”的旗号，并在广州一带展现了反英的民族斗争的风貌。

在这种国家危急的漩流中，首次以宗教形式结社的上帝会，在广东人洪秀全和杨秀清领导下出现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洪秀全对西欧人传入的基督教理进行了改造，树立了以自己为救世主的新信仰，并且宣传，从此要扫除恶魔清朝统治，建设一个新型的地上天国。在这个国度里，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财产上，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霎时，贫农、矿工、贱民阶层和流民阶层全都聚集在上帝会周围，对清朝统治不满的少数民族、地主、商人、忧国之士也都参加进来，连天地会也归入上帝会。

上帝会开始与地主的自卫队发生磨擦，从 1850 年 7 月起进入与政府军正面斗争的阶段。他们打出了“太平天国”的国号 喊出了“打倒清朝”的口号。

此后，太平军在华南各天地会的帮助下，由广西挺进湖南，1852 年秋，以破竹之势杀入长江流域。

在这个过程中 太平军处决地方官吏 烧毁官府、祠堂 税收帐簿、土地文契、债务文书全都付之一炬。赶走地主、富农、乡绅、僧侣、道士，抢夺的粮食和物品则分给了贫民百姓。并规定三年免征地税和地租。民众欢迎太平军的到来，而对政府军陷入的处境却置之不理。

1853 年 3 月太平军终于占领了南京，并定为首都。起初人数不足一万的太平军总数已达 100 万。从那时起 太平天国占据华南一带，与清朝对峙长达十余年。

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朝成鲜明对照的新秩序。

在土地政策方面，从法律条文上规定了土地均分制和废止私有财产等，这在当时近乎空想。实际上，太平天国是通过禁止或限制地租、承认土地税、减轻农民负担来保护农民利益的。

对商业，也以轻税赋使其自由发展，使人们能够安心地谋求生计。

地方行政官，在兵农一致的制度下，由军队指挥官兼任，都由民众选出。军纪非常严明。

1928 年 4 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制定了八项军纪，其中某些条款便是对太平军军纪的继承。

太平天国对男女平等的原则贯彻得非常彻底，在土地分配上不分男女，国家考试妇女也可以自由应试。还有妇女队长领导的女子部队。缠足、买卖婚姻、蓄妾及卖淫同吸食鸦片、饮酒及赌博一起

遭到禁止。

根据外国人目击的情况看，南京的妇女们不论在街上走路还是骑马都非常自然大方，而且与别处的中国妇女不同，一点儿都不怵外国人。这种令人惊叹的举止正是解放了的妇女形象。

在文化政策方面，有一阵子曾将儒教、佛教、道教的书斥为妖书予以毁弃，但后来又将儒教经典改造之后予以采用。语言方面也提倡使用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主张破除迷信，鼓励使用一年 366 日的太平历。

现在细细思量，在封建清朝这个胎盘中孕育而具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性质及提高了女性地位的与先进社会相当的太平天国的诞生实在是令人惊讶。

这固然从鸦片战争之后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机会多了而有关，并在洪秀全本人又是个基督教徒中寻找答案，不过，想到如果这一革命获得成功，世界史就会大变样时，而其失败又不能不令人痛惜。

洪秀全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方面选择了平等、和平主义的政策，也考虑过国际贸易的自由和资本主义文化，同时也绝对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和进口鸦片。

然而，在国际贸易上，进口工业制品与出口茶和丝绸不会产生大的逆差，以贪婪成性的英国为首的列强并不想放弃鸦片交易。

清政府知道自己力所不及，以太平天国严禁进口鸦片为由，希望外国能够给予武装干涉。当初，各国与太平天国维持着通商关系，保持着中立，但后来却倾向于采取只要清政府满足其输入鸦片的要求就协助清朝讨伐太平天国的奸计。

这时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英国和法国的俄罗斯企图从中国内战中捞取资本，因而强化了占领黑龙江流域的计划。不喜欢俄罗斯进入的英国资本主义同法国一道挑起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

片战争，抢先使清朝屈服。到 1860 年为止，共进行了两次战争，其结果是《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定。条约规定，其公使驻扎北京，在中国国内可自由旅行，享有长江航行权，并开放汉口、九江、镇江、南京、汕头和天津等 11 个通商口岸，基督教有传教自由，认可输入鸦片和输出苦力等。

美国也签订了同样内容的《天津条约》。

1858 年，俄罗斯乘英法进入清朝之机与清政府签订了《璦琿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北岸割归俄国，由乌苏里江东岸至大海一带为中俄“共管之地”。

2 年后的 1860 年，英法入侵北京时，俄国通过《北京条约》连乌苏里江东岸地带也掠为己有，并以此作为调停的代价。

到了这步田地，列强知道确保自己的利益更为重要，他们害怕腐败不堪的清朝彻底灭亡，转而积极支持清朝剿灭太平天国。

从 1860 年到 1862 年，太平军在优秀的领导人李秀成的指挥下，占领了江苏省、浙江省一带，并对上海进行了数次进攻。从两省逃亡的地方和豪商都集中到了上海，他们与外国人或买办商人相勾结，雇佣英美人作为军官，组织了洋枪队。这些外国干涉军援助反革命和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采取了公然的敌对行为。

1864 年，太平天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瓦解，洪秀全自杀。

第二年即 1865 年，林肯总统遭到暗杀，1866 年发生了“江华岛击退洋夷事件”。1867 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马克思写出了《资本论》第一卷。还有美国从俄国买来了阿拉斯加。

这时正是欧洲汹涌的资本主义铺天盖地涌向东方天地的时候。

在中国话里有洋鬼子、鬼子之称，还有东洋鬼子和日本鬼子的叫法。这种词源染上了历史的色彩。

虽然通常因西方人个高而称之为大个子，但加上“鬼子”字，称为“洋鬼子”就不是善意了，这也许是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之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且无恶不做的欧洲人赋予的类似于商标、商号之类的别称吧。

太平天国溃灭的内在原因不只一二。

当时，尽管广州有反英运动，北方有捻党、白莲教起义，西北西南地区有回教徒和苗族起义，但是由于太平军方面陷入宗派主义，没能给予充分的关怀与包容，以致天地会也脱离了太平军。1856年以后，太平军领导内部之间因利害关系而使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到了后半期，太平军采取了种种维护地主利益的政策，革命空气日渐稀薄。很多领导人都陷入宗教迷信之中，对民众漠不关心，一味地追逐王侯般的腐败生活和梦想。更荒唐的是，由于信仰与外国相近的宗教，而想当然地以为人们更应该支持太平天国而不是清朝。

我们常常可以从历史中看清楚一场革命失败的过程。在各种因素当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腐败，这也是共通的原因。有句很不雅的话说：“人在大便前后不一样。”用中国话说就是“吃饱了不想家”。时过境迁，人就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具有这种属性的动物就是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大还是小，处理国家大事的人都应想的周密些，多留心些。

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的关系因协力剿灭太平天国而更加密切。英国选择了稳固清朝反动政权，并加以改造，使之方便于己，以此进行间接统治的方法。

1859年，清朝起用英国人任总税务司，管理全国的海关。

不过，与清朝相比，外国方面更加青睐拥有土地、其他财产及

私人武装的汉族商官。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阀，是能够取代清朝的新势力。他们中的顶尖人物在外国的援助下着手军工业。曾国藩在安徽省的安庆，李鸿章在上海分别办起了军工厂，制造镇压民众起义的枪支弹药。

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名，接受了欧洲的技术和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同治中兴，也称洋务运动。其实这正顺应了试图培养军阀的外来势力的政策。

太平天国运动既是一次民族振兴运动，同时又是一场农民战争，尽管最后被武力所镇压，但却在长江流域横跨 11 个省份，以 2000 万人的生命支撑了 15 年之久。

让我们看看这时候的世界形势吧。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下半期开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导致小企业被大企业兼并、集中现象，少数大企业按产业类别达成协议，导致垄断结果。通过卡特尔、托拉斯及辛迪加等方法进行的垄断竞争很激烈。

这一来，为大企业融资的大银行也形成了以资金来源控制产业的金融垄断资本。

垄断产业的生产力远远超出了国民购买力，导致了产品生产过剩和资本高度积累。不过，这种过剩商品和资本并没有用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上，而是热衷于开拓国际市场。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工资和原料价格低廉可以牟求高额利润，90 年代后，资本输出更加活跃。

尽管在世界市场，各国垄断资本主义相互间的竞争有国际卡特尔等协定制约，但是人的欲望无穷，竞争无法避免。各国政府为了保护垄断资本主义，根据垄断资本主义的旨意力图确保他们能够垄断本国工业原料资源和市场销路，而且为了给资本输出创造有利条件，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竞争更加眼红。

也就是说，从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以自由竞争为

企业经营准则形成的商品经济，仿佛是为了印证列宁的其结果必然导致殖民地战争的“帝国主义论”似的，暴露出列强之间的矛盾。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争夺战使世界完全变得四分五裂。从非洲到亚洲的广阔地域没有一个地方没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犯，一眼望去，满目疮痍。

缅甸被英国占领，印度支那半岛被法国占领，运气不错免遭侵略的日本却对邻国展开了疯狂的侵略。

中日战争

1894 年爆发了中日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所谓“征韩论”作为日本未来发展的当然国策为所有领导人所接受。

日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企图通过帮助 1884 年甲申政变中的开化派而打下支配韩国的根基，但却失败而归。

甲申政变仅有三日天下而告终，当时，国王得到闵妃方面的联络，让袁世凯率领的清军介入，使日本势力遭到失败，由此使得中日对立表面化。

甲申政变前后，最先是 1882 年，中国通过《朝清水陆贸易章程》确立了中国商人的内陆行商权，1883 年随着《朝英通商条约》的签订国内行商权进一步扩大。就在同一年，是美国和德国，第二年，是俄国和意大利，1886 年是法国，分别同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就这样，80 年代竟成了资本主义列强把朝鲜当作侵略跳板的时代。

这时节打出“斥倭洋倡议——打倒日本、西方侵略者”的政治标语的东学党起义，又名甲午农民起义在全罗道古阜爆发。该运动从表面上看有反抗西方天主教之意，因而起名为东学，似乎具有新

ÐËÛ½µÄÊ «ÊË-ÊµÄÏËÊ'ÊÇ' ·à ½"ç· ÇÒÖç· Ó³ÄÏ±úÒÊµÄ' Ìó³ µÄÊÒâÊ

µ±Ê±-Àí³ ²çÍ' Ìë ,Ä±ä±ÒÏÞË 1894 Äê5 ÒÁ31 ÊÖ¶«ÑÓÄË½µ ÖÒÒÓÁìÊ «ÖË-ÒÓÄ¶Í ¹Ù¾µÁ:Á²» xâË-6 ÒÁ1 ÊÖ-ÒÏÏ¾¾ÐÐ ¾µ» á ÒÊ¼¶" ½ðÁá ¹ú¾¶¶Ö-ÓÏÇÇ-Í" ¹ý ±ðÛÄÊÊâÉÓ¾¶½ Ò-ÊÄ: -ç ³ðÑÚ ÇÊ-ÇÇâ¼Þò ±ðË

Çâ¼¶ ÄÊ·è¹ÁËË¼½²⁹⁰⁰ ³ÇË-ÓÚ6 ÒÁ9 ÊÖÖÏÄË¹á µÇÁ¹æÖÚ ÖÇ¶µÄ¹µÄ 2500 ÁÚÇ±ðË

¶ðÊÖ³ÄÍÖÇ¼ÍÖÏË½Ç±" Ê-ºµµÒÁí² ³ð±ðöx½±, ãË¹ ¹ Äí¹Êè ÒÏ±µµÄÊÖ ¹x-£1885 Äê 4 ÒÁ18 ÊÖ-ÒÁÚ²çÍÁÓ ÄíºèÒÁÛ ½ÇÇ ¶¶Ä¶¶Ì ½ðò Ò¼ ËÊð-ÒÁËËËÇ. Á½µ ¾¶¶ÖÏËÆ³ ÒÄÚÓºº ³Ç³. ±ðË2. ½ðò ÒÏ½µ² »ÒÁËËËËËË².º «¹ú¾¶¶Ö» 3. ½Ä³ ÌÊÈðç Êú Öð ÆÄÇ-ÒÏÏ¾µ »ðÊðð»ú³ð ±ðÊ±³»¶à ÐÐÁ ÒºÖ-ÊÇÇ¾¾ð òó¼ Ðð. ±ðËË Ó³" ÌÊÑÇðð ±ðµÇÇ ÖÏÒÌò ÊÖ¾º ÐÐÁ ÒºÖ±Ë

¾ÍÛÊÇÊË-Û±¾¼Ä»ÓÏËË¼ÑÇ¶µÄÊÖ¾±¾µÄ±» ÛÄ' ÁË-ÓÚ6 ÒÁ2 ÊÖ¼¶" ³ð ±ðË5 ÊÏèÖÁò ±³º±-ò µÛâ Êí:Á· ç³ Ò ÁËË Ò±ÁË ËÒâ Ê±ÊÖ¾ð ±ðµÄ½èË ËÇ¶Ì ½ðò Ò¼ µËËËË» ¹ý ¶¶Ì ½ðò Ò¼ ÒÊÇð ËÖÁ½µ ¼¶µÐ-Ò½-Òºº ±ð" ÌÊ¾±Ðòð ÌÊµÄÑÇçËº ÄÍ-ÒÏË-ÊÖ ±³ð ±ðÊÇÇ." µÄË

ÊÖ¾±-Ö±Ê, Ê-ÓÚ6 ÒÁ9 ÊÖ6000 ÊËµÄ» ÌÉÄÄÁ ÓÛº ³ÇÊÊ" µÇµÇµÄ¹Ë ÓâÊ Ê«ÊËÊ¾¾µú Ò-ÒðÒð ðÄµÁ'ó±Ç¶Ë

ÓÛÊÖ±ðºÒÁË½²»¼ÖÏËÖÖÖ½µÄ±¾µ¹ ¹ú¼ÐËÊË 1876 ÄêÊÖ¾ºð. ÒÁÊµÄ ÒÄÍºÁ¾½ÊÊÄµ¶¶µÇ ðËÇ¶¶ÁË ìá ¶¶½»µ¹ò Ò¼ µÄÊ×ÝÌò Ò¼Ë

ÆðÊ-ÍÓ ÊÆÁÐðº¹ ³ ÌÊÖÇ¶µÀÛººµµ Ê-ÊÖ¾ºððð µ·ç Êú¶ Ò ÁÇ-±íÏÏÄ äÊÊÏÒÁËË» »-ÄËÖÇ¶µÄ' Ð¶. ½ÇÇ

6 ÄðóµÄ ■■■ Äê ÒÆ-ÇÍÀÓÁÊµ¹µÄÊË¶Í ±ðÊËÇÇº¹ ËÊ'ÓÚ

8 26

1860

1885

1885 5 15

1987 2

27

1886

6 10

11

1894 7 25

战略需要，不过，日本不宣而战的侵略习性与在俄日战争、中日战争、偷袭珍珠港中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

7月29日，在日军的攻击下，派往牙山和成欢的清军败退，8月1日两国才正式宣战。9月16日在平壤战斗中以绝对优势战胜增派的清军的日本军队，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尤其是9月1日在黄海战役中，丁汝昌率领的中国北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一阶段决定了中日战争的大势，这一结果还对亚洲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在日本的马关由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了和约。其间，日本提出了原案，中国提出修正案，然后日本又提出再修正案。关于第一条：

日本提出的原案为：“清朝确认朝鲜完全独立。”而清朝的修正案改为：“朝鲜的独立由清、日两国予以确认。”日本的再修正案则是：“关于朝鲜独立问题，我原案第一条字句不得改动。”最终条约是按原案签订了事。

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置当事国于一旁而不顾，大国之间随心所欲任意处置朝鲜问题。

第二，中国的修正案提出朝鲜独立由中日两国确认，而日本的原案却只提出由中国确认。换句话说，只确认了朝中之间的宗主关系完全消失，而日本在这方面却不受约束。这不仅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也是对独立主权的侵害。这一点同修正案中不许修改原案字句一起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本意。

因而，中日战争表明争夺朝鲜是日本的主要目的，不仅如此，它是侵略中国的第一步，而且，这还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行列中，日本迈出了第一步。

中日战争日本获胜 朝鲜得到中国的保证 获得了表面上的独立。1896 年 11 月，以独立协会为主导，拆了迎接清朝使臣的慕华馆和迎恩门，并就地建起了独立馆和独立门。

另外，1897 年 10 月宣布国王为大韩皇帝，国号为大韩帝国。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手里抢走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此外，欧洲强国也签订了同样的不平等条约。7 年间 中国支付了 2 亿两赔偿金。

除此之外，日本还获得了长江航行权，并约定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尽管中日战争就此告一段落，但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由此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换句话说，这一结果使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实力连日本都赢不了。中日战争可以说是又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的败因不是由于日本强大，而是因为中国太腐败了。

当时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支配着 19 世纪末清朝的政治、军事、外交。

他倡导洋务运动，虽然看起来是以国内产业为主导，但其实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并导致促使美国军需品进口的矛盾。而且他拥有银号 既是地主 又是买办 是拥有私兵的军阀前身。在国内问题上虽然可以大刀阔斧地行使其支配力，颇为强硬；但对外国却唯命是从 非常软弱。在中日战争中 极力压制主战论 依赖英、法、俄的调停，与日本妥协，开战后也想方设法不使自己的私兵受损。他所建立的军备徒有其表，国防也只剩下空名而已。庞大的军费大部分为宫中和李家一门所挪用，于是出现了没有瞄准镜的军舰，枪弹与口径不一致的枪枝也很多，炮弹也没有几发，令人震惊不已。

另一方面，日本正为自己在中日战争中大捞了一笔横财而自得 却不料，1895 年 4 月 23 日 驻东京的俄、德、法三国公使会见

了日本外务省的林外务次官，受本国政府之命对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走了辽东半岛提出疑议。大意是，他们担心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到中国首都北京，而且会使朝鲜的国家独立有名无实，认为这对远东的永久和平是个障碍，因而劝日本政府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

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寻求对策，最终认识到根本没有能同三国相对抗的力量，便通告了他们的答复：“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的友好忠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所有权。”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悲惨、扭曲的解决。

不过，中日战争这种收尾工作导致了实行南下政策的俄国与奉行北上大陆政策的日本之间的冲突。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之后，又跻身瓜分中国的行列中，俄国从清朝手中获得了在满洲的权利，并显露出觊觎朝鲜的苗头，于是，英美两国出面支持日本的野心。这并不是喜欢日本，而是出于一己之心，企图利用日本阻止俄国的南下。

英日之间是有来有往、互惠互利的关系。在瓜分中国时，日本对英国给予协助，而反过来在朝鲜，日本的优势地位获得了英国的认可，在英国的援助下，日本与俄国对抗，并进一步强化了对朝鲜的控制，两国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

这种利害关系的一致就构成了1902年1月30日英日结成同盟的背景。

《马关条约》是清日对朝鲜宗主关系的更迭，而英日同盟演出的则是围绕朝鲜这块肥肉进行讨价还价的一幕。俄国和日本也围绕朝鲜问题演出过讨价还价的二幕、三幕，最终却发展为日俄战争。

当时日本是作为英国的鹰犬为主人而战的。为什么说它是鹰犬呢？如果没有根据英日同盟给予英国的援助和英国的力量作后盾，日本根本没有力量与俄国对抗，反过来，英国要在俄国的阴影

下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也需要日本宪兵，因而，从日本所发挥的作用看，它不过是英国的鹰犬罢了。

列强瓜分中国

中日战争中，中国败北，中国就像遭过雷击或是经历过地震的冲击 犹如无主的废墟 满目疮痍、荒凉凄惨。

清朝为支付战争中的外债和赔偿金，以主要财政收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或者提供权利 向英、德、法、俄借款 3.7 亿两 相当于国库年收入的 4 倍。外国银行通过接收政府借款或融资给民间企业掌握了中国财政、经济的命脉，这成为对华政策的重要武器。

在《马关条约》行将批准之际，俄国在通过三国干涉使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所有权要求之后，于 1896 年 6 月 3 日花了 300 万卢布收买了李鸿章，签订了对抗日本扩张的中俄同盟密约，将东清铁道的铺设权及沿线地带的管理权拿到手中。这时，在协定上盖印的中国外交官得到归国命令回国后被处刑。1898 年 3 月 27 日 俄国以保护中国之名获得了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由此开始发动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1898 年 3 月 6 日，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害事件为借口，获得了胶州湾的租借权、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沿线一带的采矿权。于是，山东省成了德国的侵略基地。

当时俄国未动一兵一卒便连续获得了辽东半岛 25 年的租借权、长春大连间东清铁路南北线的铺设权及沿线地带的采矿权，其势力由此渗入满洲。

与此相抗衡，英国以借款为诱饵获得了山东省威海卫及香港对岸九龙半岛的租借权，而且商定长江流域不得割让给他国。还获得了铁路铺设权和采矿权。

法国则租借了广东省的广州湾，并获得了广东、广西、云南的

铁路铺设权及采矿权，使这些地带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日本由于三国干涉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1898年4月，只得到了不将福建省割让给他国的允诺。

1899年9月6日美国站出来鼓吹“门户开放”政策。这看起来有利于保全中国的领土，似乎是在反对各国划分势力范围，其实，美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要求各国不要妨碍美国的资本。

列强在划分好各自的势力范围后，就在国内扶植起了代表其利益的买办势力。清朝和李鸿章倾向于俄国而不是英国。而南方诸省的总督张之洞却以英国势力为背景。

太平天国败亡之后，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的军阀成为日趋没落的政治势力，而买办势力则随着外国银行、商社、工厂的繁荣而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虽然开始形成，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和不当重税及贿赂官僚之风，民族产业没有多少发展，工人阶级也没有形成整体自觉的势力。

这样一来，中国自身便迅速沦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中国的政局越来越黑暗，奴役化的程度也日趋严重。接受过资本主义影响的知识界及地主、商人等面对这种现实，展望国家的未来，开始寻求救国之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便是开这种社会变革先河之人。1888年，康有为上疏光绪皇帝，谴责洋务派的官僚，力陈改革的必要。而且不仅在中日战争之前上疏应摒弃李鸿章的买办外交，在中日准备签订和约之际，也曾进言力主抗战和改革。这时节，来自全国各地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千余名考生联名上书。尽管顽固的满族贵族予以镇压，但变革的呼声仍在湖南、江苏、广东等地掀起激浪。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一步推动了改革运动。

1898年，清朝认可了包括兵器制造在内的民间工厂的生产，

并把改革事宜委托给康有为。于是 皇帝颁布敕命 开办学校 整顿不必要的军队和官厅，废除满洲贵族的年金；开设银行，设置矿山、铁路、农、工、商的督励机构 奖励提倡实业和发明 言论自由；公开国家预算等。这就是戊戌变法。

以西太后为中心的洋务派官僚为维护专制政治对这一改革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对。改革派为扫除反对派，试图借助袁世凯的兵力发动政变，但袁世凯却反过来与洋务派相勾结，出卖了改革派，使得改革不到百日便流产了，光绪皇帝被夺去了实权，康有为流亡日本。

义和团事件

改良派由于站在试图将官僚、地主、商人资本家化的立场上，因而具有未能与封建势力彻底断绝关系的弱点。而且非常憎恶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这点与反对派的态度是一样的。此外，改良派得到了身为侵略者的英国的支持，并认为英国是朋友。就是说，既没准备好革命势力，也没有准备好革命的哲学。

改良派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没有民众自觉的参与，就无法将中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这时，以遭受外国资本新的侵略最多的山东省为中心，民众积怨极深。尤其是 1898~1899 年黄河泛滥，造成了从直隶到山东一带 16 万人溺死的惨相。

民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 1900 年 6 月 4 日发生的事，该运动是由黄及周聚集徒众组建宗教性秘密团体义和团，并以此为中心发动的，故被称为义和团运动，运动覆盖了华北一带。

经受了失业和灾害之痛的民众将怒火对准了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们态度傲慢，瞧不起中国人，蔑视中国风俗和

信仰，而且还担负起向本国通报中国内情的作用。不仅如此，在中国的罪犯和不法之徒逃入教堂后，还包庇他们，以轻蔑的态度摆布地方官吏。

义和团高喊‘排斥洋教’‘扶清仇教’的口号，捣毁经营外国商品的商店，破坏铁路通信设施。

清朝贵族和官吏为了根除英日两国包庇流亡的改革派给他们带来的恐惧感，阴谋利用义和团来牵制外国势力。而且他们打算帮助义和团，使其转向排外的方向，从而避开指向自己的锋芒。由于义和团呐喊‘扶清仇教’‘兴清灭洋’，清朝积极支持义和团，但以山东巡抚袁世凯为首的南方诸省洋务派总督们不仅没有理睬清朝的开战命令，袁世凯还对义和团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

头戴黄巾和红巾的义和团，包围了北京的公使馆，英、美、德、法、俄、澳、意、日等八国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出了 2400 名联合海军和日军一个师团的援军，于 8 月 15 日占领北京，运动平息。

这被称为北京事变。

西太后和皇帝躲到了西安，北京成了八国联军洗劫的场所。连哈巴狗也成了英国军人从宫中获得的战利品。

该事件起因于数十年间各国既动摇清朝的根基，有时又扶它一把，使这一王朝削弱到无法有效地进行国内统治的地步，却又使其苟延残喘，继续维护艰难的治疗，使政府威信扫地。再有就是从支付赔偿金和国库收入中榨取大笔款项而尝到了甜头，因此对濒危的清朝采取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

在殖民地或落后国家的领导人中，因有弱点或缺点而遭非难的人比受到全民族尊重的人物更多。他们不过是大国的表皮或面具，其议事决定权往往攥在大国的手中。与睿智的领导人相比，接近昏庸或有缺点的领导人，或是腐败的领导人更容易受人摆布、任人指使，成为傀儡。我们可以从手眼通天的去势宦官身上领略到现

代版领导人的真面目。

国际政治既可以站在民众一方操纵政变，也可以假装征服现政权，暗地里却与之相勾结，还可以威胁、收买政权使之妥协并操纵它，有时甚至无情地破坏政权，将政局引向随时都能保证本国权利的方向。

这种复杂的外交活动不过是软硬兼施的国际政治的初步的方程式。

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政治、经济的手段自不必言 宗教、文化、体育等手段都可以调动起来。有人以为自己所做的是最爱国的而为帮助正相反的势力献出了生命，与之相反的情况在历史上也并不鲜见。

想想看吧，地球上除了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及苏联的克格勃等有名的情报机关，还有许许多多大小不知名的情报机关，它们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他们收集现代尖端科技，每年都投入巨大情报费用而进行的情报战，即使头脑再清醒的人也会头晕目眩，头昏脑胀。

这就是现代社会。残酷无情的黑手党进行的弱肉强食的激战一年 365 天昼夜不停地进行。

围绕着义和团事件，清朝、义和团及外来势力形成的三角关系最终却使外国侵略者获得了更大的好处。

善后工作与占领北京时的情况不同，各国利害关系的对立虽然更加露骨，但清朝与列强之间互换的议定书却使中国主权进一步削弱。两年内禁止进口兵器和制造兵器的材料，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总额 4.5 亿两款项作为赔偿金被抢走。公使馆区域驻扎了外国军队，禁止中国人居住，拆除沿岸炮台，外国获得北京到沿岸中间要地的驻军权。而且要求对参加排外团体的人处以死刑。

这是 1901 年 9 月事件发生一年后出现的事。

太平天国运动也好，义和团运动也好，

组成了以开化派金弘集为中心的亲日傀儡政府。而且以反闵氏、反事大党的开化派的亲日分子为中心设立了相当于最高立法机关的“军国机务处”赋予其实权牵制政府和国王并实行改革。

同年 10 月，第二期金弘集内阁赶走了大院君，朴泳孝和徐光范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进入内阁。

这就是甲午改革，很多方面都参照了东学农民运动时在全州和约中商议的《弊政改革条目》。

但在民众的眼里，这次改革被看作是侵略的表现，对与侵略并行的现代化不是欢迎而是拒绝。

1895 年 7 月 6 日，中日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因日本公使协助而成为内务大臣的朴泳孝遭到守旧派咨政官沈相薰的诬告，成了策划杀害闵妃阴谋的嫌犯——一说是废除高宗阴谋。他刚刚逃到日本，闵妃一党便恢复政权，并为赶走亲日派选择了借助俄国公使和美国公使之力的途径。

这一来就使得军国机务处因大院君派与闵妃派对立的公开化而无法发挥其实际效力，而且闵妃企图以俄国力量排斥日本势力。现政府也好，大院君也好，日本也好，他们对闵妃复归权力宝座均感到惧怕，都相信必须采取某种行动。

但是，1895 年 7 月 6 日被称为“贞洞派”的闵氏一派与驻汉城的俄国公使韦伯相勾结，正如前面所述的将朴泳孝及金嘉镇、徐光范等人赶出了政府，让亲俄派的李允用、李完用、李范晋等取而代之，进入内阁。后来还解散了由日本人训练的军队。

这并不是单纯的内阁改组，而是以与俄国势力相勾结的宫廷势力为中心发动的政变，而且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日本大为吃惊，至此为止所作的侵略朝鲜的所有努力转眼间化作了泡影。

当时日本公使三浦梧楼、一等秘书杉村濬和浪人（政治流氓）

冈本柳之助三人与大院君商议，认为日本人出面不利，便计划用朝鲜人的训练队在 1895 年 10 月 10 日发动政变。

但是，国王却抢先下手于 6 日下令解散训练队，政变突然改于 8 日凌晨举行。

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是杀害闵妃，将大院君推到前台，一举组建亲日政府。从 7 日晚到 8 日凌晨，护卫大院君的训练队和持刀的日本守备队翻过高墙杀进了景福宫。正巧在宫的俄国电器师萨巴金和训练守备王宫的亲卫队的美国人杰尼尔目击了现场。“冲入后宫的日本人从外面踹开门，闯了进来，他们用短刀捅死了叫喊着逃命的妇人中衣着、容貌都很优雅的三名女子。经过检验尸体，发现都太年轻，与王妃年龄不符，才知道她已逃跑。他们用刀顶住一个宫女的胸口逼问王妃的去处，但因听不懂话，宫女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在继续搜索中，有个宫女说王妃脸上部有疤痕，于是他们在一个被杀女子的太阳穴处发现了疤痕，经过宫女辨认，得以确定，将此事报给大院君后，大院君也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满足。”这是京城领事向日本外务大臣报告闵妃被杀事件经过的大致内容。

他们不仅杀害了闵妃及侍卫队长洪启薰、宫内大臣李耕植，而且还掠夺了宫中财物，并在凌辱王妃尸体之后，浇上油点着了火。

公使以下参与此事的人都以为取得了莫大成果，但日本政府却大惊失色。美俄目击证人披露了事件的经过。因怕外国责难，日本采取了将三浦公使等 48 人召回本国予以逮捕的举措。

但是，这一野蛮行径已经激起了朝鲜民众的义愤，终于引发了乙未义兵运动。

俄国看穿了时局，为了把握时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于 1896 年 2 月 11 日从停泊在仁川的军舰上派出了百余名俄国军人赶往汉城，将处于日军看管下的国王和世子转移到俄国公馆。

国王在俄国的保护和监视下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光，这被称

为‘俄馆避难’。

闵妃被害事件的直接施害者三浦公使等人于 1896 年 1 月 20 日在广岛的军法会议和地方法院两处开庭受审。尽管动手杀人的高桥源次写过《罪行自白手记》但全部人员均以“证据不足”而免于起诉。

而另一方面，在由亲日派、法务大臣张博和刑事局长赵重应等在汉城开庭的特别法院上，朴铄、李周会、尹锡禹却含冤受屈被扣上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而于 12 月 9 日被处以极刑，成了替罪羊。这再一次使人感到了震惊。

亲日内阁中因‘俄馆避难’而感到不安的李范晋、李载纯、李道彻、李完用、李允用等纷纷到美国公使馆或俄国公使馆避难。金弘集总理大臣被当成了逆贼，并在 1896 年 2 月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被民众杀害。郑秉夏农商工大臣也遭到杀害。曾经避难的军部大臣鱼允中也在逃亡时在龙仁被杀。

其他如俞吉濬、金允植、赵文渊、张博、权揆镇、李斗璜、禹范善、李轸镐等流亡日本。

这可以说是为日本卖命的凶手们的穷途末路。

三浦的位置由小村寿太郎接替。井上馨于其后来汉城，追究大院君的责任，让他隐退。

1898 年，79 岁的大院君在隐退生活中结束了他波折坎坷的一生。

以上可以说就是闵妃被害事件，又名乙未之变的事后处理的全貌。

也有人把高宗王妃被称为明城皇后的闵妃称为国母，不过称之为‘风云女子’更切合实际。

日俄之间的争端与协定

另一方面 到俄国公馆避难的李范晋、金炳始、朴定阳、李完用等在公馆内组成了新内阁，排斥了亲日势力。

在俄国公馆滞留一年并处理政务的国王，其经济权利在日俄对立中被各国夺走。

这时，从俄国侵入下的朝鲜撤退的日本，为维持其在朝鲜的地位开始与俄国妥协。

妥协的第一步就是在汉城的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和俄国代表韦伯间的照会。这是 1896 年俄馆避难之年 5 月 14 日的事 其内容是关于闵妃被害的善后处理问题。照会大意为：

照 会

1. 俄日两国忠告陛下返回王宫，日本代表将采取严厉措施取缔日本壮士。

2. 俄日两国劝告陛下任命心胸宽广、温和的人物进入内阁。

3. 为保护釜山至京城之间的日本战船，日本所留宪兵总数不得超过 200 人。

4. 为保护京城和通商口岸的日本居留地，日本可在京城驻扎 2 个中队 釜山 1 个中队 元山 1 个中队的兵力。一个中队的人数不得超过 200 人。而且为保护俄国公使馆及领事馆，俄国政府在各地驻扎的军队不应超过日本兵的数量。

同年 6 月 9 日，俄国代表罗曼诺夫和日本代表山县有朋在莫斯科签订了协约。

该协约成了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山县与俄国外相罗曼

诺夫之间缔结的议定书和秘密条款。

罗曼诺夫与山县协约要旨

1. 俄日两国政府劝告朝鲜政府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维持收支平衡，如有借外债之必要，两国政府将协商援助朝鲜。

2. 俄日两国政府将朝鲜国政府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不借助外援创建由本国人组成的军队和警察，并予以维持事宜委托给朝鲜国。

3. 日本国政府继续管理现在占有的电话线，俄国政府拥有架设从京城到其国境的电信线的权利。上述电信线将来可由朝鲜国买入。

4. 上述事项日后若出现有必要再行商议的情况时，两国代表将友好协商。

秘密条款

第一条 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朝鲜国内出现秩序紊乱或面临严重危机时，除经两国政府商议，为了给地方官予以援助，以及为了保证两国臣民的安宁及保护电信线之外，确有再次派出军队的必要时，两帝国政府为防止军队之间发生任何冲突，以两军之间留下互不占用的空地的方法，确定两国军队的用兵区域。

第二条 在朝鲜国根据本议定书公开条款第二条所载组织本国人的军队之前，韦伯与山县达成的俄日两国拥有留驻同等数量军队权利的约定一直有效。为保卫国王的人身安全，在现存情况下，特别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本国人的一队创建之前，要维持现状。

上述协约主要是日俄两国为在朝鲜的驻兵权和干涉朝鲜内政及财政问题上形成均衡而将朝鲜撇在一旁签订的文件。

本是中日之间商讨的朝鲜问题又变成了日俄之间的事，这就是变化无常的国际局势。

这时候，山县提出以三八线为中心划分俄日势力范围的一种分割朝鲜的提案 不过 俄国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局势 因另有所图，回避了该提案。

今天，在现实中将我国分隔的三八线，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早已经成了人家用来分割朝鲜的话题，而在更早些时候的 1592 年壬辰倭乱时，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明朝的魏学令间也曾议论过朝鲜八道两分论。

300 年后 1894 年，英国津伯里外相提出为防止中日战争爆发对朝鲜进行分割占领的提案，清朝李鸿章以将汉城划入占领区内为条件同意了该提案，但日本判断自己胜券在握予以拒绝。

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 朝鲜也派了特使闵泳焕参加。罗曼诺夫与闵氏还签订了“朝鲜雇佣俄国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 国王回到王宫后 其安全问题仍由俄国保障”的密约。

派往俄国的大使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缔结了铁路通过权和针对日本的攻守密约 形成了三方协约。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俄国同三国间的个别协约，而实际上协定却是以俄国和日本的对立为内容的。

第三次协定是 1899 年 4 月 25 日 西德次郎和劳杰恩在东京签订的。其内容为：

第一条 俄日两帝国政府承认朝鲜的主权和完全独立，并约定均不对朝鲜内政给予直接干涉。

第二条 为了避免将来产生误会，俄日两帝国政府约定

在朝鲜请求俄国和日本国给予劝诫及协助时，在任命练兵教官和财务顾问问题上，在双方协商之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第三条 俄罗斯帝国政府承认在朝鲜，日本的工商企业取得了大发展以及在朝鲜居留的日本臣民为多数，并且不妨碍朝日两国间在商业及工业上的关系的发达。

俄国在该协定上作了让步，因而该协定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其原因在于，俄国将重点由朝鲜转移到满洲的远东政策上的变化，以及朝鲜国内民众的反侵略斗争取得的成果。

政局似乎进入到了日俄休战的状态，然而，1882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后，1891 年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开工 几年后的 1903 年，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全线开通。与其说这是为了俄国产业，不如说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这种战争准备的结果就是 1904 年的俄日战争。

俄国与战争准备相关连，在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租借旅顺、大连之后，不能不谋求往来两地之间的舰队在朝鲜海峡的运行安全。而且有必要在朝鲜沿岸建立海军基地。

1899 年 4 月，驻汉城的俄国公使巴甫洛夫休假归国途中乘军舰曼乔尔号进入马山浦，将写有“东洋船运公司”字样的橛子钉在马山浦要地一带。日本闻听此讯如火烧眉毛般以住在釜山的迫间房太郎的名义买下了俄国钉下标牌的区域内的私有地。

不过，这只是借用个人名义而已，实际出资的是日本参谋本部，日本军部的企图是在必要的时候修建军事设施。

结果，俄国在马山浦借地的行动失败，这被称为“马山浦事件”。

朝鲜国王在俄馆避难期间，国内很多权益都转让给了外国，其中，鸭绿江、图们江上游地区和郁陵岛山林采伐权于 1896 年 4 月给了俄国人布留涅尔，两年后，俄国宫廷的资金便到了前驻汉城的俄国公使马乔宁手中。其后，表面上又把权利转给了鸭绿江木材公司。1903 年 5 月，俄国政府通告朝鲜政府要开始采伐山林之后，60 多名军人和土匪头目林成岱率领的 80 余名中国人越过鸭绿江，在朝鲜国土龙岩浦收买土地，建造军事基地。

6 月，170 余名俄国炮兵来到安东县，架设到龙岩浦的跨越鸭绿江的电信设施。之后于 7 月 20 日向朝鲜政府提出租借龙岩浦的要求。

由于日本公使林权助的抗议，租借协约没有达成，但是，俄国事实上继续占领着该地，10 月，修筑了炮台。

日本公使馆虽派出书记官萩原，但被拒绝上陆。

不仅如此，从满洲撤兵的期限已到，但俄国却不仅不撤兵，反而借口保护铁路向南满增派了军队。

就这样，龙岩浦事件播下了俄日战争的火种。直到这时，日本才面对紧急状态“，俄日开战论”、“伐俄论”才占了上风。

这时，美国耶鲁大学要授予伊藤博文名誉博士学位，为此赶到美国的伊藤捎带休假去了欧洲，为推进与俄国当局的俄日协商匆匆赶往那里。

那时正是 1901 年，英日间的交涉也正在进行之中，日本觉得俄日之间应该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他们提出了默认俄国在满洲的行动，作为交换，俄国认可日本在朝鲜的工商业和政治上以及军事上一一定的自由行动的提案。这就是“朝满交换论”。不过，俄国并不赞成日本独占朝鲜的条件。

这时，英国对伊藤不经英国而直接到俄国颇感不安，因为更怕俄日协商，这反而促成了英日同盟。1902 年 1 月 30 日，英日结成

同盟。

在当时 是结成英日同盟 还是达成俄日协商 日本舆论徘徊不定。如果达成俄日协商 今天的世界史 尤其是东方的政局相信会是另一种局面。

俄 日 战 争

如上所述，俄国和日本围绕满洲和朝鲜进行长期角逐而展开的露骨的外交战和战争准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 1904 年的俄日战争。

一直到这一时刻，尽管有英日同盟为靠山，但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日本能够战胜俄国。

从 1903 年 8 月 12 日起，日本通过驻俄国公使栗原慎一郎同兰斯道尔夫外相不断协商，1904 年 2 月甚至发出了外交上的最后通牒。

另一方面，日本于 1903 年末起就向陆军发出了“准备随时出兵”的准备命令，不过时局到了再也不能延长的地步了。

1904 年 2 月 4 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出席者有伊藤、山县、大山、松方、井上五位元老及桂首相、小村外相、曾根藏相、山本海相、寺内陆相。

会上作出决断：“毫无疑问，再继续拖下去，我们就会在外交与军事上陷入难以恢复元气的不利境地。事到如今，由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最要紧的是，日本政府要通告俄国政府，为自卫，也为保护帝国的既得权利，将采取认为确属必要的独立行动。与此同时采取军事行动。”

御前会议结束之夜，伊藤召来金子坚太郎，对他说：

“在今天下午的御前会议上确定，俄日关系只能靠战争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站在我们这一方则是上策。万一

美国站在俄国一方问题就严重了。这一来战争要历时一年还是两年就难说了。所以 你到美国去 要尽力使美国援助我们。”接着他对局势作了如下展望：

“对这次战争 陆海军也没有成功的希望。日本倾国出击 并没有把胜负放在眼里。如果强大的俄国军队侵入朝鲜，我们也许就会失去朝鲜。虽然陆军在朝鲜的战略是防御战，但并没有充分的胜算。海军与旅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舰队交战也许会全军覆没。如果事态发展到俄国军队大举侵袭九州海岸，我也打算参军扛枪上战场。

“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无理的。认为能够成功是不对的。我们只是尽自己的全力罢了。”对这场悲惨的生死之战作了预测。

2月5日晚，对陆军发出动员令，6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发，9日正午，向停泊在江川前海的俄国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另外 陆军于8日在江川登陆 接着便进入汉城。

驶往旅顺的联合舰队于8日晚，乘着夜色袭击了俄国的新锐战舰，控制了旅顺港。

掌握了黄海制海权的日本于2月10日才发表宣战通告。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朝鲜宣布局外中立，日本仍然挥兵进军，强行签订了《韩日议政书》。

1904年（光武8年）2月23日 临时代理外部大臣的李址镕与林权助签订的议定书全文共六条，当初是想签成秘密条约。其内容如下：

议 定 书

第一条 为保持韩日两帝国间恒久不易的亲密交往并实现东方的和平，大韩帝国政府应信赖大日本政府，听从关于改善设施的忠告。

第二条 大日本政府出于真切、亲密的情谊，将维护大韩帝国皇室的安全。

第三条 大日本政府明确保证大韩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

第四条 由于第三国的入侵或因内乱而使大韩帝国的安宁和领土完整确实遭到威胁时，大日本帝国将迅速采取应急措施，而大韩帝国为使大日本政府的行动畅通无阻将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

第五条 两国政府未经相互认可，以后不得与第三国签订有违本协约宗旨的协约。

第六条 与本协约相关连的细则由大日本帝国代表与大韩帝国外部大臣相机商定。

该文书因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间签订的安保条约极为相像而非常有名。

反对该条约的李容翊被带到了日本，李址镛得到了收买他的一万元资金，同时用威胁的手段堵住了李根泽等人的嘴。

《韩日议定书》只是日本为获得军事上的利益而签订的。同年 8 月 22 日，俄日战争转向有利于日本方面时，代理外部大臣尹致昊与林权助又签订了第一次韩日协约。

就像对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样，日本是以胜战的余威来强迫签订了三条的。

1. 韩国政府聘用日本政府推荐的一名日本人作为财政顾问，有关财务的事项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后实行。

2. 韩国政府聘用日本政府推荐的一名外国人在外务部任外交顾问，有关外交方面的事务均听取他的意见后实行。

3. 韩国政府签订条约或处理其他重要的外交事物，即将

特权转让给外国人及与外国人订立契约等，事先应同日本政府商议。

以上条款实际上是日本对朝鲜主权的剥夺，这意味着日本已迈出了奴役朝鲜的第二步。财政与外交都受到干涉 实际上与保护条约没什么区别。

1905年1月 旅顺陷落 ,3月10日 奉天 沈阳 战斗结束。

在5月日本海海战中取胜的日本于8月12日在伦敦与英国签订了将英日同盟改换成攻守同盟的扩张协约。这意味着在日俄战争战后处理上已经得到了英国的保障。

该协约第三条为：

“日本国在韩国拥有政事、军事及经济上的巨大利益，大不列颠国承认日本有权利为保护、增进该利益而采取被认为是正当和必要的指导、监理及保护措施。只是该措施不能违反英国在工商业上的机会均等主义原则。”英国对日本侵略朝鲜给予了支持。

大国的蛮横 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中国的瓜分中领略到 这说明随心所欲地分割地球上的大块土地的自由并非强盗们的专利。

英国和朝鲜是分处地球两端的两个领土狭小的国家，而英国却毫不犹豫地起到了将朝鲜卖给日本的作用。

当时，虽然朝鲜外务大臣曾就此向英国驻汉城的公使抗议其不正当性，而英国人反把此事告诉给了日本驻汉城的临时代理公使萩原。

这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让以色列建国而种下阿拉伯世界分裂和战争的种子一事相仿，是欧洲绅士们的骑士精神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奉天会战中败北的俄国以古劳巴道基替换里涅

比基将军成为总司令官，在哈尔滨集结大军计划击溃日本军。

不过，俄日两国同样都经受着来自内部的困扰。

俄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的 7 月，治安和镇压政策的总负责人内务大臣布雷别被社会革命党人投掷的炸弹炸死了。第二年 2 月尼古拉皇帝的叔父、专制政治的支柱之一谢尔盖大公也被革命党人投掷的炸弹夺去了生命。

在俄国，以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中心采用恐怖主义行动的社会革命党与以工农组织运动为重点的社会民主党拧成了一股绳，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的独立运动为光复祖国高扬起反抗的旗帜，期盼着俄国战败。

在日本由堺利彦——枯川幸德传次郎——秋水、片山潜、安部矶雄等社会主义者和内村鉴三等基督徒开展的反战运动及因不堪忍受增税的沉重负担而产生的严重的厌战情绪，再加上日益膨胀的外债，战争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这时战争费用已超过了 19 亿日元。

静观两国这种局势发展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判断两国讲和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他得到了日本请他进行讲和斡旋的委托。

由于中日战争之后三国干涉给日本带来的沉痛教训，日本虽然反对召开列强会议讨论讲和问题。不过他们判断这有助于对日本有好感的美国作中介。

美国算计的是由于进入亚洲过迟，它不希望俄日两国任何一方成为强大的国家，而且现在帮助日本对维持其对菲律宾的支配权有利。

当事国俄国出于大国的面子表示反对，并以“俄国没有失去一寸土地，没理由要求讲和”为由予以拒绝。

罗斯福针对这种情况，在对日本予以牵制的同时居然得到了俄国皇帝的赞许。

和谈是由日本代表小村寿一郎与俄国代表维德从 1908 年 8 月 10 日起在美国普茨茅斯举行。

第一个条件是俄国同意将韩国交由日本自由处置。

第二个条件是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哈尔滨到旅顺之间的铁路让予日本。

第三个条件是割让萨哈林 赔偿 12 亿元的赔偿金。

但是，俄国代表一口咬定无法接受第三个条件，谈判几乎中止，但最后还是以将萨哈林南半部让与日本达成和议。

对此 俄国因会谈成功而欣喜 而日本却因签订了屈辱条约而引起全国群情激愤，9 月 5 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了全国大会。在这里 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 形成骚乱 内务大臣官邸、警署、教会及民房等遭到火烧 6 日进入戒严状态。

1905 年 9 月 5 日，《普茨茅斯条约》签定 第二条的内容是：

“俄罗斯帝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在韩国拥有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巨大利益，并约定不对日本帝国政府在韩国采取的被认定为必要的指导、保护及监督措施进行阻挠和干涉。”

有趣的是该条约的内容与不到一个月前的 8 月 12 日达成的英日同盟扩张协约第三条的语句没什么大的差别。

3 日后的 9 月 8 日，日本的小村与美国国务卿路得会见时提出了有关日本对朝鲜实施保护化的提案 路得表示同意 说美国是不会反对的。第二天 见到了罗斯福总统 他也赞成由日本保护朝鲜。

就这样 从 1907 年 7 月到 9 月期间 经过 7 月 27 日总理大臣桂与美陆军长官泰彼特签定的同意日本支配韩国的秘密协定，以及前面介绍过的英日同盟扩张协约、俄日和约、美国总统直接认可等等，日本完全排除了反对势力，便着手签订韩日保护条约。

说到底 协助英美维护其在远东利益的代价 使日本巩固了远东宪兵的地位，在排除俄国势力之后，又强化了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在中国 日本是和列强一道 而在朝鲜走的则是独自侵略之路。

六、中国革命()

中国是个拥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的国度，是与韩国最近的国家，两国形成了类似的文化，可以说同属一个文化圈。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王道和霸道的分流，以及人心即天心之说。换句话说，在民众即大众的意愿就是天意的观念之下，服从天心就是正义的，而顺理的反面背逆则是逆天行为，是邪恶的。

从匹夫到王者，这种观念作为超越实际法规的自然法的观念而成为一种信仰、一种宗教而存在。

因为民心就是天心，它可以是天命，因为是上天的意旨，又可以是一种使命。正确地执行这一原则既是人类的义务，同时也是权利。

这里便蕴含着革命的因素，因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改朝换代选择的途径只有政变和革命两种。

不过，鸦片战争以前的政权交替可以说都只是封建专制主义王朝的交替。而鸦片战争之后则变成了针对列强瓜分中国而展开的反清、反帝国主义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转向了反封建、反殖民地运动。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出近代中国的革命史意义。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事件是近似于民众起义的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同时它们又为中国民众的觉醒、团结和革命准备了排期。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蹄声固然刺耳，不过，也相应地起到了在中国大众悲痛的心境上浇油的作用。只要有人把火点着，熊熊的烈火就会燃烧起来，这是资本主义侵略剥削、压迫、蔑视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侵略成了中国革命的助产士。说产业革命

培育了中国革命可能会被当作一个玩笑，不过，将之作为具有两面性的历史的讽刺性忠告来接受还是正确的。

进入 1905 年后，俄国在俄日战争中呈现败相，同年 1 月 22 日发生了被称为“血的星期日”的惨案。

依靠秘密警察组织起来的众多组合之一在勇敢的神父加邦领导下向皇帝递交请愿书后，以十字架开路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在队伍来到挤满了人的宫殿前的广场时，出现了一个团的士兵，他们朝密集的人民的大集团开了火。死亡人数超过了 1500 名，负伤者超过了两倍。

请愿书写道：“……我们已经成了乞丐。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与其让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继续下去，还不如死了便好，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令人颤栗的时刻。”

尽管皇帝声称不追究他们的罪，但因罢工和暴动，庄园领主们的宅邸有 2000 多家被烧。在莫斯科，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俄国革命爆发。

这种事态对中国人民来说并非事不关己，因为邻近国家的事，与俄国人民产生的共鸣像电击一样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辛亥革命前后

这时，有人站出来倡导继承太平天国“灭满兴汉”的传统，以共和思想代替皇权思想，建设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国家。

孙中山（又名孙文）于 1894 年在夏威夷组织兴中会，1899 年组织兴汉会并起事均告失败，又于 1905 年建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

正如列宁所评价的“将旧中国暴动的朴素运动转换为有意识

的民主主义运动”，中国已经显露出培养革命运动的现代化色彩。

但是，革命并不会马到成功。

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后，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买办化愈演愈烈，民众对此的反击也进一步强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和拒绝苛捐杂税的暴动。应该收回对矿山和铁路的权利的民族意识迅速高涨，各地纷纷组织起革命团体。

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从事民族教育事业的蔡元培和章炳麟等于 1902 年组建了光复会。在这里就读过的邹容被捕入狱，章炳麟流亡日本。

黄兴于 1903 年在日本留学后回到湖南，开办了明德学堂，在致力于教育的同时，与宋教仁组织了华兴会。

第二年，他们同哥老会的头领马福益等一起试图在长沙发动起义而遭到失败，马被杀，黄、宋流亡日本。

随着这种革命浪潮的高涨，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带有欺骗性质的改良政策。1902 年以后，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数有一阵子接近万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投身于革命运动，集结到兴中会的旗下。

各种革命团体同样以兴中会为中心集结起来，形成了革命的中心势力中国革命同盟会，这是 1905 年 8 月 2 日发生的事。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为纲领，倡导由民族平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的三民主义。

而且，这次革命一以贯之的精神与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样的。

1906 年创办了党的机关刊物《民报》，刊登了许多有关三民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报道，由此可知俄国革命的影响。

《民报》同 1902 年 1 月梁启超等人在日本创刊的《新民丛报》展开了论战。一方主张民主共和制，而另一方主张君主立宪制。前者认为革命是必要的；后者要实行渐进式的改良主义。前者主张依靠外资的资源开发论；后者主张利用本国人民的资源和外国机械。

前者将通过分配保护工人和土地问题看作第一性的重点问题；而后者更重视生产而不是分配，更重视奖励资本家而不是保护工人，更重视资本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革命派计划同时实现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改良派则做着明治维新式的政治革命的美梦。

正如论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孙文构想的是由民族、民权、民生构成的三民主义和加上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分立。其实现方法据《革命方略》要经历军政时代、训政时代、宪政时代的阶段。

不过，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心眼，在很多人都为了一己之利相互冲突的社会里，个人与个人、党派与党派间要找出妥协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耶稣基督为数不多的弟子中还有犹太这种为了几文钱出卖先生的叛徒，孙文的三民主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圣典。

事实上，国共合作以前三民主义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统一。

面对三民主义，既有缺少民生主义观点的宋教仁的二民主义，也有只主张民族主义的章炳麟的一民主义。

这是同盟会内部的实际情况，革命派内部这种思想分歧成为革命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 1908 年，华兴会的焦达峰等在东京建立了共进会，陶成章在东南亚重建了光复会。并一起非难孙文，还要求改选陶为总理，并推举章炳麟为领袖。

另一方面，中日战争时全长才不过 360 公里的铁路到了 1911 年发展为 9600 公里 其中 90% 以上是由外国人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对铁路的大部分投资都控制在英国的香港上海银行手中。1908 年，在国内棉织品消费量上，外国制品也占据了国内消费市场的 75%。在贸易方面，1885~1895 年贸易逆差达 2.9 亿两，1899~1913 年间则增长至 16.5 亿两。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日趋衰落。日俄战争后，在中国由英俄对立转换为美日对立的势力圈。与此相反的是，俄日在满洲维持现

1912

2 13

4

5

1912 8

1913 3

4

2500

11

20

新工具而诞生了。

一直支撑到辛亥革命，有 200 多年历史的君主专制政治结束了，本以为可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但转眼间却成为昙花一现，重又复归帝政，改变了历史的流程。

中国共产党到了 20 年代 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 对孙文进行了批评。

在 1922 年 5 月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及同年 6 月 15 日的第一次时局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工人应该对此予以援助。通过这种方法建立民主主义联合统一战线。”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是将政权转让给了北洋派领袖袁世凯；二是在第二次反袁斗争中又将政权转让给了北洋领袖段祺瑞；三是与军阀妥协。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中国遭受新军阀袁世凯蹂躏之际，人们迎来了 1914 年 6 月 28 日这一天。这天发生了为参观陆军大演习而来到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奥地利皇太子费迪南多夫妇遭到塞维利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的事件。

这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信号，很多无辜的人遭到杀害。这次陆军大演习是为了向该地区斯拉夫系民族显示奥匈帝国的威势，对塞维利亚是巨大的威胁。塞维利亚的反奥秘密组织派出 7 名暗杀人员对奥地利进行反击，这就是该事件的内幕。

奥地利向塞维利亚发出了强硬的最后通牒，因为其背后有德国支持。另一方面，以前就支援过塞维利亚的俄国依仗法国和英国

的支援，迫不及待地卷入战争之中。

7月28日奥地利向塞维利亚宣战，俄国便开始总动员。德国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3日向法国宣战。4日德国军队无视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悍然入侵比利时，于是英国立即向德国宣战。历时4年半的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不过，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洲列强展开殖民地争夺开始，面对世界先进帝国号称“世界的工厂”的英国迅速崛起的势力便是德国。两国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获得殖民地方面形成对立，在军舰竞争方面也很激烈，打破了势力均衡。

面对先前与奥匈帝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的德国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的企图，英国则与法国、俄国达成三国协约，意欲形成对德国的包围圈。

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是两大阵营间的利害冲突所致，在巴尔干半岛的延长线上有阿拉伯的油田地带，如果德国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一带，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制海权就会受到威胁，因而从地缘政治学以及军事战略方面考虑。这里交织着双方相互都无法退让的利害关系，可以说这是这次战争无法避免的决定性原因。

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谈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与此也相仿，在巴尔干的阿拉伯油田地带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现在美苏两大阵营也不例外，围绕这一地带展开了外交战、军事行动等角逐，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毫无二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日本的井上馨便叫嚣道：“今番欧洲大战乱正是发展日本国军的大正新时代的天赐良机。”也就是说，其用心就如同趁火打劫的强盗一般。

当时，德国以胶州湾的青岛为基地驻扎着东洋舰队。大战一爆发，德国军舰和武装商船开始打击英国的商船。8月7日开战三天

后，英国为了击溃德国舰队要求日本参战。

日本以英日同盟的情谊及将德国势力扫除东洋为由，当天便决定参战并向英国通告了开战决定。英国却反而慌乱起来。他们担心战火波及到陆上会使中国内政和贸易陷入混乱，因而取消了对日本的参战依赖。

中国也担心自己的领土、水域以及租借地出现战火，因而宣布局外中立。

尽管如此，加藤高明外相仍硬着头皮推行参战政策。8月15日发出最后通牒，接着23日宣战，开始了作战行动。

本来这次战争的动机在于欧洲各国间的利害关系交织，然而将战火引到东方天地却是日本出于前文所述的贪婪与侵略中国的目的，此外别无其他。

日本进攻青岛的军队于9月2日在龙口上陆，在作了一个月的攻城准备后，11月7日战争结束。

而南下的日本舰队则占领了曾经是德国根据地的马绍尔、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

从青岛攻坚战起，日中就有了摩擦。9月25日，日军占领了潍县。中国政府当即抗议日军侵入非交战地区。但是，日本未予理睬，并厚颜无耻地对胶济铁路管理权提出要求。中国认为青岛陷落，战斗就会告一段落，便于1915年1月7日正式宣布山东省不再划为交战区域，并要求日军撤离，但日本没有正当理由就拒绝了。

日本算计好了列强忙于在欧洲交战，无力顾及东方，便于1915年1月18日与中国的要求正相反，由日置益公使拜访了袁世凯大总统，提出了五号二十一条对华要求，并要求秘密进行这次交涉。

但是，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中国大地，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兴起，不仅列强对此给予了关注，美国也严厉指责日本此举是企图将

中国变成日本的属国。

今天，日本不仅以经济大国自傲，而且以民主主义国家自诩，不过，帝国主义霸权时代的幽灵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这是很值得多数东方人关注的问题。

从 2 月 2 日起，中日两国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 20 余次的会谈。英、法、俄三国公使忠告袁世凯，试图与日本进行武力抗争是不明智的。

1915 年 5 月 7 日，日置公使拜访了外交总长陆徵祥，递交了以 9 日下午 6 时为限的最后通牒。尽管这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但中国政府却不得不答应。

这种以强迫手段进行的日本扩张主义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怒，排日运动扩展到全国各地，接收和同意最后通牒的日子 5 月 7 日与 9 日被选定为中国的国耻日。

中国在条约签订后，仍于同年 6 月公布了《惩办卖国贼条例》，禁止租借给外国人土地，违者处以死刑。该条例对东北及内蒙古土地的商租权是一种障碍，因而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一直是中日两国进行交涉的问题之一。

本以为战争很容易就会结束，但第一次进击的德军就在玛恩河畔战斗中退却，西部战线呈胶着状态。在东部战线，当初侵入东普鲁士的俄国军队在马索尔湖一带遭到围歼。10 月土耳其参战帮助德国，这使俄国和英法之间的通路被切断。

两个阵营在拉锯战中死伤无数，并且投入了全部的力量，但为了补充军需物资仍不惜余力。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在局外坐山观虎斗的工业国家就是美国和日本。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形势蒸蒸日上。就好比不曾辛苦便得到飞

来横财的暴发户一般。

但是，伴随女工们的却是结核病菌，工资上升的幅度根本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1916年9月11日起，大阪《朝日新闻》开始连载河上肇有名的《贫困物语》亦即穷人的故事，深深地刺痛了数十万读者的心。

欧洲战局日趋胶着，英法俄联军希望日本积极协助。日本认为这是将从德国获得的权益及根据《二十一条》要求从中国获得的权益在和会之前变成既成事实的良机。

1916年1月，俄国皇帝特派杰奥尔基大众为特使到日本，希望日本能够提供军需品，并签订俄日同盟，作为报偿，将松花江以南的满州铁路卖给日本。其实俄日同盟也是日本所期望的，同年7月3日，双方签订了第四次俄日协定。

以前的俄日协约都是将满州和蒙古划为俄日两国的势力范围，但这次签订的秘密协约却扩大到了中国的全部国土。换句话说，俄日两国是为将中国置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而结成的全方位的同盟。

俄国由此保障了身后的安全，但是倒卖劣质商品的日本商术并没有让俄国尝到甜头。

1915年秋天，大总统袁世凯采用帝制想成为皇帝。袁同日本的关系不佳，因而日本进行了干扰，帮助张作霖策划南满独立。

1916年6月6日，在反帝制的第三革命的漩流中，袁世凯因失意而猝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

这时日本在中国国土上的军事顾问、特务机关、驻华武官、谍报机关形成网络，为更积极地侵略中国铺平道路。

黎元洪就职是南北两派妥协的结果，他恢复了民国元年的约法和国会，推出了以北洋军巨头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南北两派协作内阁。

这时日本推出“华日经济提携”的主张，为段政府提供八种无担保借款，共计 1.45 亿元，作为击溃反对派的军事费用，掀起了以这种军事力量为背景的经济侵略浪潮。

到了 1917 年，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面对英国海军的海上封锁，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协约国为保护运输队，请求日本派遣驱逐舰。日本认为这是绝好时机，便以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国所属诸岛的要求为条件，得到英国保证在和谈会议上支持日本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及赤道以北德属诸岛的要求后，签订了秘密条约。

正如在奴隶制度尚存的时候，主人们就奴隶的所有权进行讨价还价一样，大国针对弱小国家讨价还价时从来就没有从人道主义立场或宗教精神出发考虑过问题。

狗、猪或其他禽兽常常为争食而打得不可开交，不过从没听说过强者之间会背着弱者将其卖来卖去的。

到那年 3 月为止一直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以同意为条件，使得法国、俄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对日本前述权益作了保证。

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与之断交，并于 1917 年 4 月 6 日向德宣战。美国作为英法的债权国，对他们进行的经济援助使战争分出了胜负。

日本还想让美国也承认其对中国的权益，却遭到美国的反对。石井菊次郎特使与蓝辛外务长官会谈结果仅是签订了这样的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权，同时，两国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

俄国革命

另一方面，在美国参战前连战连败的俄国爆发了革命。

在 3 月 8 日（俄历 2 月 23 日）国际妇女节，首都彼得格勒的纤维女工举行了示威游行，很多妇女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她们高呼着“给我们面包”涌向市府。当时警察向排起长队的群众开了火。12 日，士兵发动起义，与工人会合，组成了工人、士兵委员会，控制了彼得格勒全市。

这就是“二月革命”。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因如何对待沙皇专制政治而分裂为主张作为少数精锐党应进行地下革命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和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合法政党孟什维克两派。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改变态度协助战争，只有布尔什维克和英国劳动党内麦道纳尔得一派呼吁反对战争。

流亡在瑞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于 1916 年写完了《帝国主义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是：“为寻求资本输出地区，及为扩大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而展开纷争。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造成的巨大荒废使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可能。因此，他主张应将帝国主义战争诱导成内乱。

革命爆发后，掌握国会领导权的资本家们便不分孟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均予以提携，组成了临时政府。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战就等于在催促罗曼诺夫王朝末日来临的死亡宣告书上签字都不知道的尼古拉二世，在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而退位，沙俄画上了终止符。

临时政府想得到协约国的援助积极促进战争，协约国也宣传战争是为了维护民主主义，并借给俄国 3 亿美元。

该政权是以律师亚历山得鲁·克伦斯基为首的。在开始阶段，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部并未占据重要地位，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经德国参谋本部同意，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乘坐著名的“封印列车”到达俄国，这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托洛茨基比他们更迟些从加拿大归国。

战争的持续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的危机。7月初，俄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势失败后，工人们打出“反对战争”、“把权力交给苏维埃”等布尔什维克的标语，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克伦斯基内阁召回前线的军队予以镇压，但到了9月，最高司令官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援助下击溃了叛军，但是政局更加动荡。

列宁没有错过这种局面。掌握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于11月6日发动了武装起义。1917年11月7日便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革命迈出了胜利的一步，说列宁的革命公式是恰当的也并不过分。从11月5日（俄历10月23日）到17日有组织又有杰出领导的行动只死了6人便轻松地掌握了首都。

这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评论家赞巴林谈列宁战术的胜利时对列宁的特征作了“革命领导的最高天分”的评价，并补充说：“要想在俄国的统治者中找出可与列宁相比的人物，不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是不行的。”

7日晚，全俄苏维埃大会呼吁全体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达成不割地不赔偿的和议。并宣布无偿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由工人管理工厂、银行国有化、民族自决等措施。还宣布废止秘密外交，公开了帝政政府和临时政府缔结的秘密条约，并声明其为无效。

德国同意与俄国讲和，俄国进入休战状态。

这时节，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了和平原则“十四条”并倡议设立国际机构。

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的和谈于 1918 年 1 月举行，但德国拒绝了俄国方面不割地、不赔款的条件，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3 月 3 日，俄国迫于无奈以恶劣的条件签订了布列斯特——里道福斯克和约。

另一方面，1918 年 11 月，以基尔军港水兵起义为契机，德国大城市爆发了呐喊着“停止战争”、“我们要面包和自由”口号的革命。城市被工人、士兵评议会所控制，他们宣布共和制，帝政宣告终结。

德国革命后，共和国总统由 1919 年魏玛宪法会议上选出的多数派社会民族党的艾伯特就任。

直到 1918 年 11 月 11 日，经过 4 年零 4 个月的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以协约国的胜利而降下帷幕。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结束了，从 1914 年开始到 1918 年 11 月德国投降为止，4 年多的战争造成 990 万人死亡，2000 万人受伤，非军事人员死亡 1000 万人。消耗的巨大战争费用按当时的金额推算达 4000 亿日元。

而得到的呢？一是俄国革命使世界两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在经济上，美国取得飞速发展，相反，欧洲却走向没落；三是殖民地各国民族主义兴起。

换句话说，在占地球 1/6 的广阔地域上诞生了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统治全世界的唯一体制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使殖民地和宗属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在亚洲的中心中国和印度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大运动。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却日益加剧、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失业大军不断膨胀，围绕销售市场、原料市场、资本输出展开的激烈争

夺进一步加剧，在殖民地与势力的分配上也得不到满足。更有甚者，美国和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矛盾激化，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也表面化了。

在这种世界形势下，1918年10月，俄国的近邻波兰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11月德国和奥地利发生革命，两个君主国崩溃。接着，1919年3月，匈牙利发生革命；1920年9月，意大利的工人占领了工厂进行斗争。1921年3月再次爆发工人阶级的暴动，德国革命的危机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秋天。

在亚洲，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

连在战争中养肥了自己的日本，1918年8月也发生了由主妇、市民、工人发动的超过1000万人的“米骚动”，高喊“给我们米”的抗争运动持续了一周。

1919年3月1日，韩国发生了“独立万岁”事件，5月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印度也于1919年起至1922年展开了由甘地领导的不服从运动。土耳其从1920年1月也开始了反抗英、法、意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1923年废除了帝政，建立了共和国。再晚些时候，1924年12月发生了埃塞俄比亚暴动；1925年4月，摩洛哥开展了民族解放战争。

就像传染病在扩散一样，霎时间地球变成了一片火海。资本主义国家和君主国家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这种现象是俄国红色革命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造成的影响所致。以未曾预计到的资本主义危机为背景，所谓的赤祸论抬头，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对革命的苏联的干涉战争。

这一干涉战争的急先锋是日本帝国主义。俄国发生革命意味着其军事力量相应削弱，日本企图趁机出兵西伯利亚，将东西伯利亚变成日本势力控制下的缓冲国。

英国和法国以防止粮食产地乌克兰和石油产地高加索落入德

国人之手为由，决定采取支援苏联南部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方针。并以防止积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需物品运到德国为由请求美国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尽管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反对日本单独出兵西伯利亚。原因是，将西伯利亚托付给日本不仅危险，而且会给中国造成许多负担，担心会恶化同苏俄的关系。事实上，尽管日本经济取得飞速发展，但没有美国的援助，要独自进行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

但是，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却在悄悄进行侵略准备并伺机行事。

1918年5月，苏维埃政府下令武装押解处于微妙境地的捷克军团，遭到抗拒，捷克军团占领了西部西伯利亚，然后建立了反布尔什维克政府。

这一事件成了协约国对苏武装干涉的绝好借口。7月初英法两国军队在苏俄北部与摩尔曼斯克登陆，并请求美国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美国为救援捷克兵团同意以美日两国兵力限定在千名共同出兵。但是日本认为时机已到便于1918年8月2日宣布出兵后，开始出动包括《华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的1.2万兵力在内的7.2万兵力。

自“义和团事件”以来，以远东宪兵自居的日本露骨地暴露出了其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

在西伯利亚，违背与美国的盟约出兵到10月末为止的日本7.2万军队为非作歹，惨无人道，做尽了坏事。苏联人民郁积在胸中的怨恨直到1945年在满洲粉碎日本军队才算得以报偿。

9月中旬，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巴洛夫斯克和吉达，陆战队也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登陆。美国对日本增加兵力及带有独占性地管理中东铁路提出抗议，美日关系恶化。

红军与白军的战线极为曲折，不过作为赤祸论之一的驱逐共产主义的行动极为艰难。而苏俄面对荒废的国土和生活困苦也一筹莫展。

1919年2月，苏维埃政府宣布如果协约国停止介入将支付帝政时期的债务并中止宣传。同年4月苏俄通过W.G.布里得提出包括7项条款的讲和提案，但协约国并没有接受。

然而，这场干涉战争，由于苏维埃人民和红军的团结而以干涉势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从1920年春起，列强一无所获就开始撤军了。

为长期宣传所麻醉的美国于1929年10月迎来了因物价上涨引起股价暴跌导致的世界性大恐慌。无奈由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11月16日承认了16年的苏维埃政权。

另外，武装干涉的当事国则早在1924年2月开始就先由英国的麦克唐纳政府迫于形势承认了苏联，接着日本、法国、意大利也相继与苏联建交。但是，承认并不等于列强转变了反苏政策。

1925年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被宣传为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反成为世界性的反苏政治攻势的一环而在继续。

苏俄在革命那年的12月3日就向中国声明，废除沙皇俄国同亚洲民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19年7月25日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通告了废除宣言。

该宣言因当时外交人民委员代理之名而被称之为“卡拉汉宣言”，1921年、1923年还派特使到北京恢复邦交。1924年4月，卡拉汉作为全权大使访问中国，并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上建立了外交关系。

激励了被压迫民族的苏俄的举动使中国民众获得了巨大的力量。1919年3月成立的第三国际很重视亚洲的民众运动，并领导了运动。如果说这是作为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它也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战略。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地斗争具有拥共、反帝国主义的意味，这对帝国主义国家的

军队不能不是沉重的打击。

历经艰辛确立的苏联共产主义在列宁去世的第二年 1925 年 12 月十四次党代会上通过决议断言俄国具备了“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所有条件”。

对此，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强有力的联合，主张反对这一新决议的“永久革命”。

这一来，共产党内部的历史性斗争将党分成两派。托洛茨基一派指责斯大林背叛了世界革命，于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走上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条道路。

第十五次党代会以压倒多数支持斯大林，并开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左翼反对派。其后 1929 年 2 月 12 日托洛茨基被流放国外，在墨西哥被恐怖分子暗杀。

尽管托洛茨基失败了，但西方很多国家都无法摒弃这种固定观念，即：苏维埃的一切生活和活动的真正目的都取决于红色革命的初始阶段而且永久不变。

这种固定观念使西方统治阶层处于不知道世界革命会不会在现实中爆发的恐慌之中，而扶植起法西斯来。

1933 年 3 月 28 日，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10 月 14 日德国也退出了国联。然而，斯大林明知道国际联盟软弱无力仍然表示：“哪怕只能稍稍延缓战争的速度，而且只要能对和平有益，我们不会反对国际联盟。”

两个法西斯国家退出国际联盟之后，1934 年 9 月 18 日姗姗来迟的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由作为永久革命之固定观念象征的苏联填补法西斯退出的空缺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颇具讽刺意味。

更迭的两国虽然性质截然相反，但在专制方面是一致的。这里虽说有些世界史的宿命论观点，不过可以说那时已经有意识地在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五 四 运 动

为了说明中国的“五四运动”，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凡尔塞和约。

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巴黎凡尔塞宫召开了缔结和约的会议以便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问题。协约国有27国代表参加了第一次全会。美国威尔逊总统、英国路易·乔治首相、意大利奥兰德首相参加了会议，法国克雷孟梭总理任议长。

在会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倡议废除秘密外交，以不割地、不赔款、民族自决为原则，并设置国际联盟作为维持恒久和平的机关，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与美国立场不同的协约国国民，一方面怀着国家主义的报复情绪，另一方面又因过去所体验的全民参战的悲惨经验而渴望永久的和平，而且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劳动大众要求确立政治的民主化和劳动者的权利。

但是，与国民们的这种愿望不同，协约国方面不仅向德国和奥地利索取天文数字的赔款和给予苛刻的军备限制，而且在民族自决原则对协约国不利时便完全无视这一原则。德国殖民地名义上是委托国际联盟统治，而实际上却为协约国所瓜分。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尽管是美国提倡的，但因为上院的反对，美国成了非参加国。

不少国家误以为国际联盟是公平的裁判所，这实在太幼稚了。他们太不了解国际联盟其实不过是在行政院上计算利益和损失，以条约代替战场决胜负的一种权力政治的买空卖空罢了。与其说国际联盟是为弱小民族或弱小国家设置的必要机构，不如说它是对弱者进行统制的机构更准确。后来，日本侵略满洲，德国入侵东欧国家时，国际联盟一声不吭，无能相暴露无遗。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试图就以前德国在中国拥有的权益即有关山东问题取得列强的支持，但是，美国坚决反对日本进入中国。

特别是将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义的中国，在和会上提出了领土完整（收回租借地和租界）、恢复主权、外国撤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经济自由（获得关税自主权）的要求。

中国的顾维钧代表主张，德国在山东省的特权应当直接返还给中国。中国是在根据“二十一条”要求达成的华日条约中承认日本和德国之间约定的在山东省的权益的，不过，顾认为那是在最后通牒之下被迫签订的因而是无效的，主张应根据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原则直接返还给中国。

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不接受其对山东的要求，就不在国际联盟的条约上签字，威尔逊担心日本退出会妨碍国际联盟的成立。

结果日本的无理要求得到承认，而对民族自决原则抱有期望的中国民众却遭到背叛。不仅如此，中国要求的三原则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列入议题中。

中国之所以会遭到如此惨败，军阀政治的孱弱是重要的原因。

勉强维持中国统一的袁世凯 1916 年 6 月一死，直隶派的徐世昌虽然在北京成了大总统，但实权却落在掌握着直隶派军队的吴佩孚和冯玉祥（陕西督军）手中，直隶派除他们之外还有赵倜（河南督军）、沈鸿英（广西督军）、齐燮元（江苏督军）等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北京并非忠心耿耿。在满洲，奉天派的张作霖是实权人物，皖系军阀段祺瑞失意，来到天津，属于该派的阎锡山（山西督军）、卢永祥（浙江督军）掌握了权力。广东则有国民政府，孙文虽为大元帅，但两广总司令之职却由当时南方军阀的实权人物陈炯明担任。

此外，地方军阀还有许多，仿佛回到了战国时代。而且军阀不是单纯的军阀，在满洲和华北与日本势力保持关系，华中和华南在传统上就受英国的支持，在华北的直隶派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强有力支持。蒙古则受俄国影响。

就这样，中国被军阀割据势力分割占领，不过，军阀之间的混乱与国际上的对立相联系，这是中国问题特有的难点。事实上我们

甚至可以说中国是由几个傀儡政权分而治之的。

遭受军阀专制政治蹂躏的中国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对民主政治的要求非常迫切。作为新兴政治势力出场的是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中心掀起的思想运动，担当这一运动旗手作用的是 1915 年 9 月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

这时在中国两种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种是企图借助权力的力量来维持旧文明的儒教复活运动。它与袁世凯、张勋掀起的复辟运动（使前清宣统帝重新复位的运动）相关连，目的是延续过去，维持现状。

另一种则与之正面对立，要求的是希望接受西方文明的民众幸福和文明开化。

《新青年》是由以思想启蒙者闻名的陈独秀编辑起步的。第二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第三年从美国归来任大学教授的胡适分别加盟，共同编辑，文学家鲁迅呐喊助威。

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批判儒教道德观是奴隶道德观。

《新青年》的启蒙运动受到 1917 年苏俄革命影响后，原来只介绍给有限的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大众之中。

担负起这一使命的先锋是李大钊。他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介绍道：“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虽是俄罗斯人创造的，但其精神却是 20 世纪全世界、全人类的人们共同自觉的精神。”

1916 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就请来《新青年》的同仁们变革了学风。1918 年 5 月，日本为了出兵西伯利亚同中国签订了《华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约一签订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便纷纷中断学业归国，在北京，学生则组织了救国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美、英、法并没反对日本的要求，而是把德国在山东省拥有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的条款记

入和约中。

中国外交遭到如此失败的原因在于：前一年 9 月 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在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处理交换的公文中对日本政府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而这件事又在和会上露馅，这就是他们的失策。

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外交和获得列强支持的日本军国主义得逞的消息使迫切希望取消‘二十一条’要求的中国人民愕然 不过 最先爆发而冲在前面的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愤怒的学生。

1919 年 5 月 4 日早晨，这是个星期天，距中国国耻纪念日四周年还有三天，北京十三所学校约 3000 名学生根据头一天各校学生代表会议的决定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他们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誓死收回山东”、“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等标语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前往日本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途中遭到警察的阻止，于是便爆发出“杀死赵家楼的卖国贼”的呼声。他们袭击了交涉“二十一条”的负责人、以亲日派官僚闻名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的私宅。学生们翻过围墙，冲入楼内一看，曹已逃跑，只有围着日本西原次官团团转的倒霉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抓住，遭到质问，痛打。部分激动的学生点着了曹的宅邸，在准备撤退时，有 32 名学生被赶来的警察逮捕。

“五四事件”的事态逐渐扩大 各校都召开了抗议集会 并实行了罢课，学生联合会向普通民众进行爱国宣传，甚至在农村和贫民区也进行了街头宣传。政府迫于学生的压力释放了逮捕的学生，但在学生提出拒绝签订和约、惩办卖国贼、继续与广东政府进行和平交涉等要求后，军阀政府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从 6 月 1 日起，三天内在北京有 1000 多名学生遭到逮捕，大学教室被当作临时监狱使用。

北京的学生运动又引起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学生的

罢课风潮。

全国学生的这种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激发了普通民众，他们和学生一道展开了共同斗争。6月6日，上海召开了包括商人和工人在内的民众大会，进入了全面的罢工、罢市状态。到了11日参加罢工的工人数达六七万名，沪宁线（上海～南京）京奉线（北京～奉天）京汉线（北京～汉口）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

反动政府也觉察到形势的严峻，被迫于6月7日释放了拘留学生，10日，免去了前述三名亲日派要员的职务，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北京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第二年，凡尔赛和约生效，日本厚颜无耻地向中国提出就胶州湾问题进行交涉，中国没有答应。实际上，山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直拖到了华盛顿会议。

回顾“五四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新纪元，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该运动与辛亥革命不同，对中国革命的敌人有正确的认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明确表明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两大任务。

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地方学生则有毛泽东和周恩来。

第二，该运动之前一直认为武装的革命运动是最佳途径，而这次则是通过以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罢工、罢课及示威游行等大众行动来争取的。这一特征的代表人物是鲁迅。

第三，由当时大部分没有结成社团的工人阶级实行的政治罢工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成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确立领导权的契机。

这第三种要素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当时胡的立场显然是民主主义的，但其后却叫嚷反共，并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

第四，该运动是作为苏联革命后的世界人民反抗运动的一环，

受苏联革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说明“五四运动”具有文艺复兴的性质。

毛泽东将“五四运动”以前的革命称之为民主主义革命，将以后的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近代史记载着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脉相承的民众运动，记载着中国民众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带着钻心刺骨的痛苦、怨恨和诅咒对革命前途的展望。

第一次国共合作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排日、排斥日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逐渐发展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也是反军阀和对中国民族统一的强烈要求所致。促成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大罢工和香港罢工的民族运动便起源于“五四运动”。

在这种氛围下，南京政府改变了方针与旧军阀断绝了关系，试图推进以大众为基础的民众革命。1924 年 1 月第一次国共合作迈出了第一步。同年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倾力培养革命军国民党军。该校校长为从莫斯科归国的蒋介石。

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革命的知识阶层认识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重压迫阻碍了劳工组织发展的中国，如果不以工农为主力，人民解放斗争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于是，他们自觉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

1918 年，李大钊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毛泽东作为图书馆的助手在他手下任职。

李于 1920 年首次在北京大学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进行接触。5 月，他以上海为中心试图在

全国六个地方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自己则是“北京小组”的领导人。

第二年即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仅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不过 57 名党员。其中 12 人作为各地的代表出席建党大会，选出中央机构，同时，陈独秀成为负责人。

另一方面，孙文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1921 年末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 年 6 月，因陈炯明发动反孙文的政变而流亡上海。

这时帮助孙文逃脱的是年轻时代的蒋介石，以此为机缘，蒋后来被委以国民政府的重任。

1923 年 1 月，陈发动的政变遭到失败，孙文重回广东，成为大元帅。孙在上海时，苏联代表访问中国并与之会谈。

孙文派蒋介石到苏联留学，让他学习政治和军事，同时从苏联聘请了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列等数十人，并着手对国民政府进行改革。前面谈到的黄埔军官学校就是用苏联的援助资金建起来的。从法国归国的周恩来也来到该校，任政治部副主任，与蒋共事。

1923 年 10 月 10 日双十节之后，对国民党的改造进入实质性阶段。邓泽如、廖仲凯、谭平山、李大钊等 9 人组成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年 6 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 165 人出席了大会，闭幕前选出的 24 名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李大钊、谭平山等三名共产党员，17 名候补中包括了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人。

这次大会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这次为期 9 天的会议途中，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消息，为表示

悼念，大会决定休会三天。

经过这次大会，中国便进入了国共合作的时代。共产党并没有因此而解散，只是由一部分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内。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并顺应“五四运动”后国民的激进化愿望。

1914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莫斯科大会，回国后便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在华北作为劳工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活跃在工人之中，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然而39岁的他却于1927年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中遭到逮捕并被残杀。

另一方面，1925年3月12日正在北京出席国民会促成会总会的孙文，因三年前染上的肝癌而结束了60年坎坷波折的一生。段祺瑞政权准备举行国葬遭到拒绝。在北京的中央公园，数十万平民云集为他举行了国民葬。其灵柩于4月2日在以学生、军人、工人为首的30万市民护送下迁至北京西郊的西山碧云寺。南京的中山陵并没安置其遗体。

这二人之死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不幸，而且对国共合作而言更是不幸，而对中国国民可以说则是更大的不幸。

它改变了中国历史，使之走上了我们今天所目睹的这条坎坷曲折的道路。

1925年是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采用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那一年。这一年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国共合作之后，劳工运动轰轰烈烈。这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示威工人顾正红被害事件。30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学生又遭到枪击，导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

枪击事件的操纵者不是别人，而是英国人。

这被称为“五卅惨案”。20余万工人投入到总罢工中，5万愤怒的学生和工、商、学联合会成为罢工的先锋。

为了对抗罢工，英、美、日列强派出陆战队登陆，在租界里动用坦克威胁民众。

抗议斗争并没有局限在上海，也波及到北京、汉口、广州、香港等大城市。他们提出了17项要求条件。

“五卅运动”迎来了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中国革命新阶段。

第一，该斗争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发展成为包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所有爱国者团结一致的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在这一运动中，工人阶级明显成为站在民族抵抗运动最前沿的力量。5月31日，上海总工会诞生，到7日为止，有30万人加入该会。

第三，该运动有明显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因此，该运动在时间上超过了“五四运动”，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下去，直至转入国民革命军“北伐”状态。

第四，城市工人和市民们的斗争深深激励了饱受地主压迫之痛的农民，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自觉。

具有如此划时代意义的“五卅运动”使民族资本家阵营内部出现动摇。大资本家组织上海总商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运动，而是想方设法与外国势力相妥协。

不过，“五卅”之后，遍及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浪潮成为广东政府向全国扩张势力的绝好契机。对帝国主义暴虐的痛恨使民众对政治关心起来，而且很多事实都暴露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实质。

该事件前后，在国共两党的协作和苏联顾问的支援下，约两个师团的国民革命军组成了，胸中燃烧着熊熊爱国烈火的新军队不

断成长壮大。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向北方的军阀势力发动进攻。当时被称为“北伐”现在在中国称为“第一次国内战争”的革命斗争开始了。

9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武汉，得知国民革命军迫近的消息后，农民们便拿起武器追杀逃亡的军阀头领，欢迎北伐军的到来。在上海，80万工人参加了总罢工。3月24日组成了由工人、学生和市民代表构成的临时市政府。

2天后，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

北伐军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大的胜利，是因为借助了工农的力量。

但是，与革命的暴风骤雨不同，广东政府内部却是别一样风云。

与共产党合作以后，国民党不再是以一个阶级为基础的政党，而是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国民党的上层多半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和部分地主的代表，还有少数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参加。

而地方国民党多数都是工人和农民。同样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孙文、廖仲凯这样的左派和胡汉民、蒋介石这样的右派之分。

孙文去世后，由谁来占据中国国民党主席的位置就成了大问题。巨星陨落不久，国民党右派张继公然制造分裂，主张排斥共产党。反共斗争强化后，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右派向左派发起挑战。1925年8月，左派领导人廖仲凯遇刺身亡。国民党完全陷入四分五裂的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汪兆铭汪精卫成为政府主席掌握了政权蒋介石为第一军总司令控制了军权，政局暂时安定下来。这年9月，

毛泽东就任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当时，廖仲凯作为与孙文一起推进联俄、联共政策的领导人在国民政府中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部长。暗杀廖仲凯是由胡汉民的弟弟策划实施的，他们兄弟俩与英系买办联系，获得了香港的英国银行的资金资助。

廖死后，左派以政府主席汪兆铭和李大钊为中心形成主流，右派以掌握军部的蒋介石为中心势力开始抬头。

蒋介石的军事政变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利用其司令官的职位秘密着手对付共产党。

在广东的国民党海军局长李之龙调派国民党最大的军舰中山舰到蒋介石的根据地军官学校的所在地黄埔。蒋以此为借口说共产党有对国民党军发动叛乱的企图。在与汪兆铭密议之后，于20日凌晨突然发布戒严令，对中山舰发动突然袭击，并逮捕了李之龙。

但根据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看，观点正相反，说蒋与其党徒密谋，用电话命令中山舰舰长身为共产党人的李之龙为镇压暴乱将舰艇开到黄埔。到达黄埔后，蒋却诬其擅自出航，硬扣上有叛乱企图的罪名，将其逮捕。

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蒋大肆逮捕军队内和政府内的共产党员。香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住宅被包围，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被逮捕，被逐出军队。政府主席汪兆铭出国旅行，中央委员谭平山和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等共产党方面的委员辞职，在中央执行部，共产党的影子完全消失了。

这就是蒋介石最初发动的军事政变，共产党领导层怕造成国共分裂，以释放党员为条件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这一事件。

在这种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为夺回由华北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统治的地区，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北伐军又出征了。情况与前述一样，1926年12月，在判断长江以南地区已为国民政府所控制、掌握的情况下，便把首都从广东迁到汉口。

武汉国民政府由此诞生。

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国民党左派聚拢在一起，蒋只是在表现上接近左派。

但是，新政府虽然开始运转，国民党却因左右派的对立濒临分化。在北伐军的主力部队中，朱德、叶挺等共产党人在前面冲锋陷阵，而蒋的嫡系何应钦部队则尽可能地保存兵力。蒋把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没有进入武汉。1927年3月武汉政府撤销总司令部，将蒋降为军事委员会评委员。

但是，蒋介石秘密派出自己的部下到上海和日本与财团和列强暗中进行交涉。列强也派密使向蒋允诺，只要他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承认新政府。

另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继续推行其威胁与怀柔软硬兼施的政策。1927年3月，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对外国侨民施加了暴行为借口，英、美、日军舰向南京城内炮击，造成2000多名民众和士兵死亡。以这种手段相威胁，同时又诱引蒋介石代替旧军阀成为他们的代理人 and 帮凶。

于是，期待已久的蒋介石对以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的中共为中心形成的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毫无疑问，这是对列强和财阀所应允的镇压布尔什维克就承认新政府的回报。

上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以孙文之死为契机给失去了妥协点的中国政局的前途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文逝世的1925年显然是对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量的发展感到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残存在武汉的国民党于 1927 年 7 月 15 日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对此，共产党方面的谭平山、李立山、周恩来等发表时局宣言抨击政府。

武汉政府取缔了工农组织，实施了不逊于上海的大屠杀。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全国死于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在 1927～1929 三年间超过了 45 万。

7 月，武汉政府解除了鲍罗廷的职务，开始驱逐共产党。9 月与南京政府合流，等于彻底降服于蒋介石的军队。这意味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只经历了短短三年半的蜜月时期便瓦解了。

1927 年 9 月，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联合成立了国民政府。

可以说这是抛弃革命后的必然勾结，就像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一样，“五卅事件”后工农艰苦奋斗取得的北伐成果也被以蒋为中心的反革命派所抢走。

同时，两次都是因列强的干涉取得成功的。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治形态和工农红色政权的斗争敲开了半殖民地和十年内战时代之门，使中国国民的前途黯淡，令国民痛苦不堪。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蒋介石被称为“武装的戴天仇（一名戴季陶）”的缘故吧。

戴季陶于 1920 年前后在上海《建设》杂志任编辑 同时他还与陈果夫、张静江等一起经营证券交易所 在那里与蒋介石相识。蒋在辛亥革命时成为以青帮、红帮等秘密帮会势力为背景而在上海发动起义的同盟会陈其美手下的人。据说他们二人是在浙江暗杀功勋人物光复会陶成章的凶手。蒋在上海度过了近十年的流浪生

活，其间通过投机等活动成为他们的团体成员。同时又与浪人和买办资本家虞洽卿、杜月笙等建立了关系。不久，在黄埔军官学校内根据戴季陶主义学说纠集右派分子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并依靠他们制造了 1926 年 3 月 18 日的所谓“中山舰事件”，5 月又提出党务整理案，排斥共产党人和拥立右派的阴谋日趋成熟。

这就是蒋的政治发展过程，以及其幕后参谋形成的背景。

蒋的反革命思想是以戴季陶主义武装起来的，在开展反共恐怖活动中得到了发展。

不过，在判断当时情况时，认为他是作为列强的傀儡，以及小袁世凯而成长的，可能更正确。

政治是理想，同时也是现实。再加上权力就可以说是政权了。这是安定政治所必需的三要素，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蒋介石军事独裁政权成功以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就是过分依赖力量，以及无视理想和理想的腐败。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作为共产党的温床发挥了十足的作用，列强援助的武器则为壮大共产党军队助了一臂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是反共主义者蒋介石不知不觉地亲手养大了共产党，并自掘坟墓。也许这是异说，但至少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共之父”，他的失败决不是命运使然。

武汉政府主席汪兆铭发表反共宣言，通令取缔共产党，向昨日的同志谭平山等党的要人发出逮捕令。孙文确立的国共联合战线完全崩溃，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内躲避镇压，转入地下，成为地下组织，继续地下工作。

相反，蒋介石政权对共产党的扫荡采取的不是一般的枪杀和砍头，而是堪与黑暗时代宗教裁判的恐怖相提并论的拷打与酷刑。野蛮从来都是政治报复的特色。

济南事件和中国的统一

在此，我们再观察一下东方政局。如前所述，1902年英日之所以能结成同盟，是因为最强大国英国阻止俄国南下。

即使在俄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西伯利亚时，英日也还处于蜜月时代。英国只知道自己养壮了日本，却未曾想到日本军事力量增长迅猛，至少是在围绕中国的权益上，发展成为与英国对立的对手。英国意识到了，日本有时是伙伴，有时又是竞争对手。

1921年华盛顿裁军会虽说是大国为了扼止日本的壮大而召开的施加压力的会议，不过，直到同年12月，英日才解除同盟关系，这是正式宣布两国不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表面上看，19年间没有什么大摩擦，但在暗地里，英国围绕在中国的权益方面开始牵制日本，并与美国亲近以期取代日本。

这种矛盾成了蒋介石法西斯政府能够立脚的条件之一。与其说这是独立的中国政府的代表，不如说是为保护列强权益的代理人 and 元凶，是与合法地位有别的反国民的存在。

在蒋介石开始北伐的1927年5月下旬，国民党军一占领徐州，日本政府便以保护当地侨民为名，于同年5月28日派遣驻扎在旅顺的2000名士兵在青岛登陆，摆出了阻止北伐军进入山东省的架势。

在日本军队单独出兵后，英、美、法等国也向天津方面增派兵力，这是近乎牵制日军的行动。

从此开始，英美对日本的行动产生了疑惑，便开始采取了悄悄地援助蒋介石排斥日本势力的行动。

这时，日本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讨论了对满蒙的政策问题。

南京、武汉两政府合并后蒋介石暂时在形式上下野。1927年9

月，带部下张群到日本呆了一阵子，第二年正月一复归政府主席之位，便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重新开始北伐。

1928年4月中旬，他们逼近了济南。

尽管日本首脑部队为让张作霖撤回满洲，承认南京政府对华北的统治是明智之举，不过4月26日，日本军队还是开到了济南。驻扎在济南的孙传芳的军队一枪未放就将济南让给了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的司令部也于5月2日迁到济南。蒋介石要求日本军队撤军，正在交涉之际发生了不幸事件。

5月8日，日军决定第三次出兵，9日和10日向济南断然发起总攻击。日军毫不留情地向市民开了火，造成了600人死亡，1400人受伤，济南大部分溃毁。

该事件仅仅是日本军队为维护其威信而做出的屠杀无辜和肆意破坏的野蛮行径。充分显露出日军丑恶、残暴的嘴脸。使中国的排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蒋政权对日政策也强硬起来，从此以后，中国与美国携手强化了排日政策。

尽管济南有日军作梗，蒋介石还是绕过了济南继续其北伐。5月中旬，决定北京命运的时刻到了。当时，日本田中内阁说服了准备在华北决一死战的张作霖，让他回奉天去了。但是，当地的日本关东军却做着趁张作霖军队撤回满洲之际解除其武装，由日本直接统治满洲的美梦。

政府和派出的关东军出现这种分歧后，有人便企图利用阴谋手段促使双方趋于一致，这人便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他计划趁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之际炸毁火车，并伪装成蒋的间谍所为。企图使日本军队能够利用此后发生的混乱占领南满。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坐的特别列车从北京出发，4日凌晨5时过后，在京奉线与满铁的交界处，奉河本之命的工兵大尉东宫铁男安装炸弹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

身负重伤的张作霖被送进医院不治而死，他的儿子张学良隐瞒了其死讯，直到两周后的 6 月 21 日才公布。

张学良等事态平静后，于 1928 年 12 月在他统治下的东三省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并占据了南京政府东北边防总司令的位置。

北伐已于 6 月 2 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城后便告完成。在与张学良协议后，南京政府完全统一了中国。

从这时起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为止的三年间，张学良坚韧不拔地实施了反日政策，河本的阴谋反而加强了中国方面的团结。

那时，尽管河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杀死两名中国无赖，伪装成南方便衣队的人，怀揣伪造的密书，但现场却留下了日本人爆炸用的电线，炸药用量之多也远非便衣队所能做到，而且本以为已死的无赖中的一人逃跑后，透露了其中的内情，阴谋事实于是暴露无遗。

颜面丢尽的日本起初要严惩肇事者，但由于陆军的抗拒，而于 1929 年 7 月给予河本退役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只受到行政处分被编入预备役了事。不过，由于这一事件，不仅田中内阁垮台，而且，田中在辞职的两个月之后即猝死。

在此引人注目的是，主谋者河本后来当上了满铁的理事。

七、中国革命)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获得成功。第二年1月，中华民国诞生，为历代帝政画上了终止符，封建制度本应被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所取代。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代之以军阀政治，封建制度不是作为残滓遗留，而是拥有实权的从属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获得成功，王朝覆灭，地球上首次出现了由工人、农民、士兵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受其影响，与其毗邻的中国于1919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1924年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但1925年孙文的死却使中国的历史再次发生了转向。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与共产党决裂。1928年6月，国民军进入北京，北伐结束，蒋介石就任南京政府主席。

蒋介石由此暂时统一了中国，但是，军阀政治并没有完全得到整肃。实际上，蒋政权不过是代表资本家、地主利益的落后政权，以及保护列强权益的妥协政权而已。

1949年，身为军事独裁政权终身总统的蒋介石逃往台湾。

在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蒋介石只是一名为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和独裁体制需要而存在的一个人物而已，此外别无其他。中国国

民接受了取代蒋介石的毛泽东，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就像夜与昼的更迭，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可以说仅次于俄国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给世界史带来了重大转机。

中国此后的主宰变成了毛泽东。

从 1927 年国共分裂到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这十年在历史上被称为十年内战时期。

蒋介石以军事力量、封建土地制度和买办资本主义的政权为基础，建立了形式上是国民党独裁的新军阀独裁体制。

他得到了以金融资本和商业经营为中心不遗余力承担外国资本买办作用的财阀的代言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静江的支持。不过，光有经济界的支持，蒋介石是不会满足的，他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扶植为政府权力庇护下的财阀。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他们都属于官僚资本。宋子文是蒋的夫人宋美龄的哥哥，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姐宋蔼龄的丈夫。陈果夫是当初把蒋介石拉入国民党的陈其美的侄子。他与其弟陈立夫掌管直属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王朝。

蒋介石登上权力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对银行的支配权交给了四大家族。宋子文是中央银行首任总裁，之后，孔祥熙接任。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由宋和孔负责。农民银行由蒋介石和陈果夫掌管。其他重要银行也都由四大家族的直系作为政府的代表掌握了实权。

而且，他们还利用政府权力染指中国棉业公司和华南米业公司等垄断企业收敛巨额资金。国有企业大部分也成为私有化，被用以中饱私囊。

在外债方面，国民党政权也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性质。1935 年 11 月实行的货币改革也是在美英指导下运作的，并且继续采取对苏联的敌对政策及对美英的依赖政策。

四大家族虽然是垄断资本，不过其本质是封建的买办的，他们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有人对他们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原本既不是财阀，也不是企业家，但从掌权后开始，经过抗日战争，他们搜刮的金钱达一二百亿美元。

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喊出了“好儿当兵”的口号。在征兵制度下，这种口号固然可笑，不过，大部分上流社会的子弟却逃避当兵，不上前线。他们在骄纵之后走向腐化堕落，形成一股并不令人欣赏的毒瘤似的势力。

扛起枪，杀上战场的有志青年不是蒋介石的军人，而是八路军。在蒋介石的很多一线部队中，军官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鸦片和赌博上，士兵则好像是军官的士兵，或者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乞丐收容所似的。莫非“好儿当兵”是国民党为八路军而设宴招待的客人？……总让人感到不自然。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时代

与国民党这种腐败透顶正相反的是，因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政变而于 7 月 15 日留下《时局宣言》并与之决裂的共产党洗去了染上的血迹，磨亮了钢刀，重新投入到斗争中。

这就是同年 8 月 1 日朱德等人发动的南昌起义。

在动荡的局势下，这次起义并没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江西省南昌军官学校校长朱德领导的由军官候补生组成的向导队、军官教育团与集结于那里的号称“铁军”的贺龙与叶挺的部队合起来，共有 3 万多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军队的首次起事。为纪念这次起义，8 月 1 日被中共定为建军节。

策划这次起义的除上述军人外，还有周恩来、宋庆龄、李立三、郭沫若等 25 名政治领导人。虽然组成了革命委员会，但终因未能

与农民运动取得联系，而在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南下。在广东省东部的战斗中失利四散而去。

让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当初吧，创立于“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李大钊、陈独秀开始起步的。39岁的李大钊一死，接力棒就传给了陈独秀，陈由于本属知识阶层，只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似乎并不具备斗士的资格。

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会议批评陈独秀导致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解除了他的职务，使他从领导人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接替他的是李立三。会议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并商讨了强化工农自己的革命军队的问题。

会议还决定在秋收期间发动农民暴动。率先发动农民起义的是毛泽东。这一战略失败后，为寻找落脚之处，他们便进入了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的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

由此开始了井冈时代。

领 导 权

由伤口的血渍尚未干透、披散着长发的士兵和伤员组成了衣衫褴褛的这个集团，共有1000来人，这就是毛泽东的部队。他们拖着疼痛的双腿一瘸一拐地来到了井冈山，这是1927年10月的事情。1928年5月，在南昌起义中失败的朱德，率领约8000人的农民军也到达了井冈山。两支部队在这里会合，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由于他们二人如水乳交融，齐心致力于培养、壮大红军，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使用了“红匪头目朱毛”及“朱毛军”等字眼。

这里还有一支以王佐、袁文才为首的地方武装，此前一直占据

着井冈山。红军与他们维持着类似联合政权的体制，他们的队伍逐渐被红军吸收 编为第 32 联队。

这些士兵有为同地主作斗争而武装起来的农民，有反抗国民党指挥官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此外，还有来自各地的革命工人。

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中推行的“枪杆子运动”失利后，遭到了严厉的非难，不仅被挤出中央政治局，连前敌委员会中的职务也被剥夺了。

不过，他在井冈山制定了以“一切行动听指挥”开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以此为准则着手建设红军。

从 1928 年 10 月开始，他们改变了方针：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以土地革命和发展红军为基础在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同时，在红军的连、营、团中建立了士兵会，以维护士兵的利益。在政治活动和群众活动中，部队的党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官兵待遇平等，士兵会以自由讨论为原则。

为了消除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端，这种民主集中制度还引入了批评机制。

被红军解放了的地方召开了村屯群众大会，选出了政府委员。当时，中国共产党称这种新政权为苏维埃政权。1931 年 11 月 7 日，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的瑞金召开，临时中央政府诞生。这事发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年 历史上出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从这时起就当选为政府主席。

1848 年 1 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3 年之后发生了上述事件。1893 年 11 月 19 日作为毛顺生的长子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村的毛泽东 时年 38 岁。

从 1931 年到 1934 年，可以说是南方共产主义政权的全盛期，在 10 万平方英里（约 16 万平方公里——译者注）的土地上，人口最多时达 8000 万，最少时 3600 万。

苏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是土地改革和彻底的民主主义。土地改革以无偿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并重新无偿分配为原则，人民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凡 16 岁以上不分男女，一律平等。

同时，苏区和红军形成鱼水关系，这种鱼水关系在不断发展，然而自 1930 年以来，国民党政权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包围攻击。这种包围攻击被称为“围剿”，红军的反击被称为反“围剿”。

初期，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在井冈山周围六县取得了大胜，抓获了不少俘虏，缴获了大批军需品。

从战斗情况看，1930 年冬，约 10 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向江西省的中央苏区发动了进攻。第二次是在 1931 年 3 月，尽管调动了 20 万兵力包围攻击苏区，但只经过 15 天的激战，红军便轻而易举地击溃了 2 万国民党军，将国民党军赶出了苏区。第三次是 1931 年 7 月开始的，蒋介石亲自担任“剿匪”总司令。但红军作战出色，一举歼灭了 17 个师的国民党军。

经过这种反复的战斗，红军反而强大起来，1931 年拥有 10 万正规军，民兵十好几万。

日本军队暗藏祸心，利用中国发生内战之机，在东北和上海挑起中日战争。然而，不知蒋介石在想些什么，他不思抵御外敌入侵，反而率 50 万大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从 1932 年 6 月到 1933 年 2 月，经过 8 个月的大战，虽然红军撤离了湖北、湖南、安徽方面的三个苏区，但中央苏区却击退了国民党军，红军也增至 30 万。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聘请原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埃恩·赛克特将军为军事顾问，从美国获得 5000 万美元的借款，调动百万大军和 200 架飞机展开了第五次围攻。在这次作战中，由于中共领导

阶层反对毛泽东的慎重战略，主张“御敌于苏区之外，消灭敌占区”的正面作战的倾向占了上风，红军在这次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

由于蒋介石决心不再错过这次机会，这次进攻调动了大批兵力，陷入困境的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向西北方向转移。

由此开始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让我们再看看中共的内部情况吧。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红军在战斗中获胜后，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纠集了强有力的讨伐军。蒋介石增加了兵力，缩小了封锁圈。毛泽东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却出现粮食供应危机。

1929年1月4日，毛朱将善后工作交给彭德怀，率4000主力离开此地，翻过崇山峻岭，转移到江西省南部。

1929年12月，他们在古田召开了红军代表大会，而后才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苏区。

由于这时期在山中风餐露宿、备受蚊虫叮咬，毛泽东染上疟疾，挣扎在死亡线上，由于搞不到奎宁，甚至曾派人到上海买药。

当时在上海主持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工作的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曾留学法国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理论家李立三。1930年夏，蒋介石与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反目，导致战争。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时机成熟，不应错失良机，而应向大城市发动进攻，团结无产阶级便可一举获得解放。他命令一头扎进山中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集合部队到平原进攻大城市。长沙、南昌、武汉三镇是其攻击目标。以少数缺乏训练、装备又处于劣势的红军采用正面的攻城战去攻击由人数占优、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把守的城池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这源于无论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过错。

尽管毛泽东判断这一指令不切实际，但由于是中央的指令，不

得不由彭杀向长沙，毛朱直奔南昌。结果遭到失败，负有领导责任的李立三退位。1931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确立了他在苏区的领导地位。

如前所述，在湖南秋收起义后被挤出党中央、在江西山林中默默工作的毛泽东最终掌握了领导权。

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遵义会议

言归正传，1934年9月末及10月，红军主力放弃江西省的瑞金，向陕西省延安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道：

“在途中总共度过的368天之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行军。在休息的100天中，56天消耗在四川省的西北部，余下的44天用在约5000英里的行军途中。平均行军114英里才休息那么一天，一天平均行军24英里。翻过了18个山脉（其中有5个岭覆盖着积雪）越过25条江，穿越12个省，途中占领过32个城镇。”

而且这不是单纯的行军，没有一天不与敌人交战一两次。落伍兵和伤兵不断。1935年5月30日，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时遇到了最大的危机。150米深的溪谷上架设着长约300米的吊桥，桥板已被对岸蒋介石的守备队拆除。应征的红军敢死队抓着余下的铁索强行渡河冲向敌阵，终于获得成功，不过17名勇士付出了生命。在翻越大雪山时也非常艰苦。出发时估计有10万~12万兵马，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省北部吴起镇时，毛泽东的部队不过2万人，与刘、朱的军队合起来才不过3万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2/3以上的兵力没了。

为支援战略转移而留在东部的数千人，其后继续从事游击战，后来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成为组建新四军的核心。伤兵和落伍者在

地方继续开展活动。第四方面军因反对中央领导的张国焘的干扰，比第一方面军晚了一年，才同第二方面军一起到达陕西。

让我们再来看一次长征的原由吧。蒋介石接受了坡恩·赛克特的提案，在苏区实行杀光壮丁、烧光房屋、抢光粮食的三光政策。红军失去了落脚地，无可奈何，只能放弃根据地。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是希特勒的前参谋总长坡恩·赛克特，巧的是红军的军事顾问也是德国人，是苏维埃骑兵队出身的李德（外国名不详）并受其领导。面对蒋介石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堡垒战”，李德不顾毛泽东、朱德的反对，计划并采用了以阵地战死守要地的战略。这种盲目作战的结果，仅第三军就有 3000 人战死，这种惨败对红军主力是重大打击。

由于这种给红军带来悲剧性打击的战略战术，在长期岁月中积累起来的革命成果一夜之间便付之东流。眼看着这种局面发生，人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于是，1935 年 1 月在长征途中的贵州省遵义，应人们的要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毛泽东在朱德的支持下剥夺了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一派的权力。

会议确定了游击战术为党的行动路线，之后，毛泽东确立了其领导地位。

毫无疑问，李德顾问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不过，他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且，将军队的领导权委托给外国同志也是重大错误。

到遵义会议召开为止，毛泽东虽然担任着临时政府主席，但不是主流，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王明（又名陈绍禹）留党派手中。毛泽东以遵义会议为契机掌握了实权，可以说具有重大意义。

以江西省西北部为根据地的红军第六军团的总指挥孔荷宠错误地判断共产党军队即将全军覆没，而于 1934 年 7 月 27 日向蒋军投降。咱形势日趋紧迫的情况下终于迎来了 1934 年 10 月 15 日

这一天。

让我们再看一看这一天红军告别瑞金时的景象吧。等到日落，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朝西南行进。

先头部队是由朱德总司令的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的红军大学乡土联队。之后是总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党政要人、后勤部、技术部队、卫生队等摆开了长蛇阵跟在后面。

11月10日，蒋介石军队侵入中共首都瑞金时，红军主力穿透三重包围圈，甩开了敌军。瑞金只剩下空壳。

结束了漫长的长征之路受到陕北苏区刘志丹和高岗迎接的红军，于1936年7月1日从吴起镇迁到黄土高原的要地作为首都的延安。

同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过封锁线首次来到这里，归国后，于1937年写下了《西行漫记》。

1972年2月15日，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二战后首次访问中国的前夕，首次将中共介绍给世界的埃德加·斯诺在杰涅巴郊外艾新斯自己的家中因肠癌不幸离开人世，时年不过67岁。

蒋介石和毛泽东

让我们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个比较。二人都没有出身在有名的家庭，不是名门大家子弟，也没有沾上家庭的光，都没有在名牌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二人初次相识是在孙文没有完成国共合作就于1925年3月逝世后的第二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会议第二天，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之后，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毛泽东在第4天作为中央宣传部长作了工作报告。在这次国民党党代会上，后来成为宿敌的蒋和毛首次同席相见。

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作为同样的中

国人，这两张面孔是中国不同历史走向的象征。一个阶段，蒋紧逼“围剿”毛四处退避。不过历史却演出了大逆转的一幕，毛成了胜者，蒋成了败者。

虽然一方是唯心论者，另一方是唯物论者，不过，他们不是古希腊喜欢追根究底的学者式的人物，他们的分歧在于政治路线的不同。蒋是作为代表地主、资本家等有产阶级利益的统治者掌握着权力，毛则为了工农等无产阶级的大众利益与权力作抗争，两人总是处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位置上。

蒋操纵着与特定财阀相勾结的军事法西斯政府，毛则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主席。

两位巨人第二次会面是战后的 1945 年 8 月 28 日，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从重庆飞到延安，说服毫不动心的毛，与他乘机到重庆的时候。

说是开政治协商会议，不过，蒋介石依仗美国的支持，要求将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成国民党军。

改编为国民党军，实际上就等于无条件投降，是极为苛刻的条件，对毛威胁、利诱软硬兼施。20 年来首次走出闭塞地区的毛泽东，在他 15 年政敌的“陪都”重庆逗留了一个多月。

蒋最后提出，结果不接受该条件，就全面开战。我们有坦克，有轰炸机，还有原子弹，你们还要坚持吗？这时，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谁都没有开口。是谈判破裂，还是无条件投降，全在于毛的一句话。毛毫无表情地沉吟许久，突然睁大了眼睛：“总攻，大空袭，投掷原子弹，不管来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决不投降。只有抗战到底。”

毛泽东主张，如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联合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就会服从，国民党军队也要同样归属联合民主政府。这一主张获得了舆论的支持，结果 10 月 10 日，毛泽东成功地使蒋介石在协定上签字，同意召开各政党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联合民主政府的组

成问题。

蒋介石生于 1885 年，毛泽东生于 1893 年，蒋介石年长 8 岁。他们是中国历史艰难岁月的重要见证人。

不过，从政治谱系上看，可以说，蒋介石是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军阀政治家，而毛泽东则是继承洪秀全、李大钊、孙文等精神的革命家。因此，蒋介石同袁世凯一样，采取了杀害很多人的高压政策，与外国资本家或政治家相勾结，或是接受其援助，作为保障政权的代价，不惜采取各种保护外国权益的政策。在长期维持政权过程中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导致了腐败。岁月并没有使他赢得更多的尊敬，反而导致了更多的批评。

毛泽东是全面否定蒋介石的政治路线，高举革命旗帜的巨人。换句话说，毛泽东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是使他痛苦、难受，令他感到麻烦的人。1937 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过这与其说是新的学说，不如说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思想而站在辩证法和唯物论立场上，将马克思和列宁有关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根本法则及阶级斗争的见解用中国式表现手段所做的整理，好像更正确。此外，1940 年著述《新民主主义论》，很多部分似乎都继承了孙文的三民主义。

谁都无法否认，蒋介石和毛泽东自始至终就像摔跤场上角力的大力士，在中国国民的围观下奋力拚争。

最后介绍一下 1965 年正月初一毛泽东会见埃德加·斯诺的情形。

对斯诺的提问，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半晌，毛主席才张开了紧闭着的嘴：知道我出身小学教员吧……”

“那时根本就没想过要打仗，也从未想过会成为共产主义者。要说是哪一派的，和你一样，仅是民主人士而已。是何种意想不到

的偶然积累使我产生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念头，现在想起来有时还觉得奇怪。世上的事并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换的。最重要的只有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事实。这是没有错的。……”

“……说到这里，毛主席压低了声音，半闭上眼睛。地球上，人类的生存条件已发生急剧变化。从现在起只要再过千年，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还有列宁，毫无疑问都会成为过眼烟云……他这样说。”这是斯诺的记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918 年仅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而没有念过大学的毛泽东，借助于 1955 年归国的毕业生钱学森和周培源等科学家之力拥有了中国最初的原子弹和火箭，可见，其雄才大略的一面。

毛泽东表示，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长有苔藓的时代的纪念碑，并暗示自己也是如此。而且，毛主席尽管是唯物论者，但却相信人的命运受无法躲避的巨大力量所左右，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时说的话像是忠告，给人以很深的印象，颇令人伤感。1976 年 9 月 9 日凌晨 1 时，83 岁的毛泽东离开了人世。

让我们再回到当初。从 1928 年到 1937 年十年国共内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表现为妨碍国民党统治华北的企图，中国的危机也随之降临。

国民党如果大力推行国共合作政策，各列强就会支持日本，国民党就会面临最直接的危险。

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已经确保了上海和长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作出姿态允许英、美重要企业在该地区进行经济往来，对所有列强的友好姿态就会防患于未然。

为了明确表明自己对这两条路的态度，蒋介石的新政府采取了通过与共产党决裂，并与苏联分离的策略。外交政策与国内问题

相交织，因而与苏联的决裂使政府和毛泽东的军队走向内战，反过来则改善了与英美的关系。

这时，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正在寻找控制中国的铁腕人物。在国内，军阀及通过非爱国途径使赚来的钱避开征税，或为摆脱中国的支配存入外国租界的外国银行的腐败分子们，与外国势力同流合污，希望把蒋介石扶植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领袖。

日本帝国主义在领土、政治上对中国都野心勃勃，并且已成为英美的主要竞争对手。对美、英势力构成的威胁逐渐增大。这使蒋介石的存在显得更加重要，日本则走上了越来越孤立的道路。

日本在 1931~1932 年使国联暴露其无能后，列强便更倾向于从外部支配中国，寻求为其效力的强国作为其代理，而不是继续在中国国内寻求铁腕人物。因为与政治前景不明朗的中国直接交易，不如投资到日本，利润虽小，风险也不大。让日本承担更大的风险和更大的利润，委托他们对中国进行直接统治和剥削，省力又省事，说穿了就是变竞争而为代理人。

这也就是将中国从日本的魔爪中拯救出来，那是费钱的利他主义假说。

在中国国内外形势极其混乱、险恶时期，深受日本威胁之痛的东北军阀张学良，决定采取使中国东北与中国其他省联合的方针，1929 年，他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宣布易帜。

两年后，日本开始发动进攻，侵略计划是冷酷的，行动是残忍的。

这就是侵略东北战争——所谓的“满洲事变”。

远东危机震惊各国。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企图与以英美为首的各列强共同抵御日本。

然而，很显然，中国幼稚地误以为国际联盟是公平的裁判所。他们太不了解国联的实情了。那不过是由行政院计算各国所算计

的利益和损失，然后以条约代替战场决胜负的一种权力政治的证券交易所。结果，中国的控诉未能奏效。

不过这反倒使全中国人民觉醒，为斩断日本侵略魔爪组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高涨。

1933年1月，日本侵略东北两年后，日本军队为扩张领土侵入热河省，占领了省会承德。

西安事变

1935年6月，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签定了“华北自治”协定。内容包括解散河北省和北京、天津的国民党支部，在河北省的中国军队撤离该省，是屈辱的协定。同年11月，在这一特殊化了的华北区域建立了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府，通过华北，日本商品和大量鸦片从东北无关税地倾销到关内。

而且，日本在中国政客中挑选腐败分子，给他们贿赂和武器，煽动起“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另外，正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于是那年11月到12月，各地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纷纷声明和集会反对华北自治，以“五四”运动传统为荣的北京学生从12月9日清晨开始发动了“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

此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11月14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命令下，内蒙古德王的军队侵入绥远省。但是，接受了飞机等武器援助的内蒙古军，11月24日遭到傅作义指挥的绥远军的反击，在百灵庙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败退。

在这种事态下，上海和青岛的日本纺织工厂工人举行罢工，12

月 3 日，日本陆战军在青岛登陆，逮捕、镇压了罢工领导人。

像是事前与日本的这种暴行约好了似的，国民政府赶在这时候竟然做出了压制民众的行动，11 月 23 日逮捕了全国各地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第二天，又在上海租界逮捕了以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在国民纷纷投身抗日之际，蒋介石政府却采取亲日反民族的行动，引起了民怨沸腾。

蒋介石不顾国民的这种反国民党的气氛，想借助绥远军的胜利提高国民政府的声望，因而他于 1936 年 12 月 4 日率不少将军来到与绥远省南部相接的陕西省省会西安。西安有故乡在东北正卧薪尝胆、准备一有机会就返回故土恢复失地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部队。

由于蒋介石早已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故前来为讨伐红军而督战是蒋介石来西安的又一个目的。

正如前述，抗日是众望所归，由于中共呼吁抗日救国的正确态度，东北军官兵们对共产党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产生共鸣的人越来越多。

张学良当年六七月间去过延安，同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实际已处于停战状态。

不知就里的蒋介石指示张学良和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强化对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严令三个月内歼灭共军。

张学良陷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责任感与不能背叛民族良心道德观念激烈冲突的困境。尽管为此烦恼不安，但最后还是作出了决断。这与持刀冲向凯撒的勃鲁托斯的心情是一样的——“不是我不爱凯撒，而是我更爱罗马。”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团结一致、齐心抗日，采取了最后的手段，派自己的禁卫队到蒋介石的住处将其软禁起来。

这被称为“兵谏”。将蒋介石逮捕软禁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通电全国，在保障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同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

战，立即释放在上海逮捕的爱国领导人，释放政治犯以及保证集会、结社自由等八项要求。

这就是 1936 年 12 月 12 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全过程。

说得详细点儿，蒋介石是被曾任张学良副官的第二队队长孙铭九和唐海逮捕的，由杨虎城占据的新市街绥靖公署特别大队长宋文铭监管。

独裁者蒋介石遭监禁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引起了与之利益攸关的世界各国瞩目。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会被杀害，判断中国的内战会进一步扩大。

特别是日军特务机关希望扩大内战，他们向蒋介石不在时的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何应钦秘密转达了协助讨伐西安的意向。

尽管东北军中也有主张处决蒋介石的派别，但中共的立场却不一样。当时正值 11 月 25 日《德日防共协定》刚刚签定 苏联害怕蒋介石之死会导致内战，削弱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力。虽然无法知道确实明确的理由，反正斯大林确实有过释放蒋介石的指示，周恩来也飞到西安为释放蒋介石进行斡旋。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得到政变消息，立即剥夺了张学良的官职，16 日，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的总司令，开始炮击华县，内战气氛浓厚。

何应钦邀请出国旅游的汪精卫归国，准备采取亲日反共路线。

然而，亲美派的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想法却与亲日派坚决讨伐的主张不同。为了停止内战，救出蒋介石，他们与曾经是张学良顾问的美国人 W. H. 唐纳德结伴飞往西安。

最终还是周恩来及其同行的中共领导人的协助起了很大作用。

周恩来释放了软禁中的蒋介石，周恩来认为为了抗战应该停止内战 他说服蒋介石 只要准备抗日 中共就会全力协助 并不再采取打倒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反对扩大内战，并且为此还要释放蒋

介石 这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换句话说 为了民族的团结抗日 需要蒋介石出面统领，这就是中共的立场。

结果，事变的结局就像开始那样戏剧性地结束了。蒋介石虽然没有签署任何文书，但却口头保证结束内战，抗击日本侵略。

12月25日圣诞节，总统被无条件释放，张学良陪同他到了洛阳。蒋介石在那里下令西安战线的政府军停战。

另外，军法会议将张学良一直软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十余年间不见天日。不过 他虽然牺牲了自己 却开通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之路。

这是杀身成仁的好典范。

这一事变不仅得到了和平解决，而且中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人民感到救国有望了。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不能违背在国民面前发下的誓言。内战彻底停止，也不再同日本搞妥协外交了。第二年发生了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

对中国内战长期化寄予厚望的日本，看到不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停止 抗日救国战线反而得到强化 大为震惊。

日本军部回想起了六年前侵略东北的美梦。他们想到，这时如果不当机立断，以后东北问题恐怕会有麻烦。

正在这时，贵族院议长 46 岁的年轻政治新人近卫文麿成为首相。他在青年时代曾就学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在他的政策智囊团中还有很多学者、官僚、新闻记者、作家和左翼归顺者，很吸引人。因 1937 年 4 月震惊社会的佐尔格间谍事件而被判死刑的尾崎秀实也是其成员之一。

1937 年 7 月 7 日，西安事变过去半年多，近卫任首相一个月

后，日本军队为了对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侵略，向北平市郊的卢沟桥开了炮。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有计划的战争。日本认为与其等到国共统一战线发展成熟，不如现在动手时机更好。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订了反共协定，可以牵制美英势力，而且日本判断由于欧洲政局危机，美、英、法、俄无暇插手东方战局。然而，这是导致日本失败的重大误算。

起码，日本对中国本土的侵略，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是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权益的严峻挑战，日本人未意识到，这是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百年间深深扎根于殖民地中国的列强的间接开战。换句话说，日本对向中国宣战会被当作是对美、英、法宣战这一必然道理没有引起重视，因而其误算大得不能再大了。

日本事先做好这一切准备，通过长期的殖民侵略，扶植了盲从日本的失败主义者，装备了在选定的位置上随时都可以开火的大炮和机关枪，待命的飞机随时都可以起飞。日本军队不仅在装备和训练上优异，其残暴行为也是各国军队所望尘莫及的。

尤其是在1936年5月，日本驻华北军队从3000人增至5000人。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日本擅自增兵当然会被中国方面看成是日本侵略华北计划的一环。

日本藐视中国，公然将军队驻扎在丰台，并不顾中国方面的抗议，随心所欲地将丰台和卢沟桥之间宽阔的荒芜地当成训练场使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这一地区举行了具有挑衅性质的夜间军事演习。从晚7点半开始，日军一个中队的演习结束时是10点40分。就在这时，由于机关枪走火，打出三四十发空弹来，紧接着就听到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数十发实弹的声音，一名士兵失踪了。

一木大队长听完中队长的报告后，就向在北平城内的牟田口

廉也联队长作了报告，进入战备状态的日军命令从第二天凌晨 5 时半，向在永定河堤坝上布阵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中国方面看到日军连日举行挑衅性夜间军事演习，显露出攻击的征兆，便强化了戒备，在永定河堤坝上修筑了阵地，向卢沟桥附近增加了兵力。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指挥的第 29 军。

以上是日方对当晚事件的单方面说法。

不过，在局势紧张不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眼皮底下连日举行夜间军事演习本身可以说就是挑起战争的行为。失踪的 1 名士兵是去方便去了，20 分钟后就被发现平安无事，这却没有报告给大队长。而且，在训练途中去方便这在日本军队是看不到事，虽然说是演习结束后还发生了走火事件，不过，动用机关枪显然应该判断这是在挑起战争。

说穿了，日军采取的行动显然是一种阴谋，是有预谋的挑起战争争端的行为。

在黑夜是谁向日军射出数十发子弹尽管有多种推论，但日本迄今仍说真相无从查考。不过，从满洲事变等多次战斗中日本采取的诡计推测，失踪后重又出现的士兵一事是其惯用伎俩的可能性很大。

日本政府明明很清楚事件的责任在日本方面，但仍在 7 月 11 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派三个师团到华北，当天就将关东军和驻朝鲜的部分军队派到了华北。在华北集合的日本兵力增加到了两万，扩大战争的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时，日本陆军省也好，参谋本部也好，内部都交织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休。一种主张是应立即出兵一举确立对华北的统治；另一种主张是，与中国进入全面作战状态，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场持久战，为防备对苏战争，也不应同中国交战。

开战初期，军队和政府都采取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态度，近

卫在第 71 次特别会议上也严令“不扩大事态、中日亲善”。

不过，中国方面却没有以那种方式愚蠢地解释这种事态。

看起来反应最敏感的是中国共产党，7月8日在《关于日本进攻卢沟桥的宣言》中向全国民众呼吁：“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团结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17日，蒋介石在避暑胜地庐山也发表了抗战谈话，8月1日又释放了1935年2月23日宣传、鼓吹抗日而被捕的沈钧儒等七人。

就在北平处于这种气氛异常紧迫之际，从7月25日开始三天内，两军在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廊坊发生冲突，之后又在北平的广安门发生冲突。

还有一件事是28日发生的中国保安队骚乱。该事件起因于日本关东军飞机对保安队士兵的轰击，于是，在通州的日本特务机长细木繁中佐以下共260名日本侨民被中国军队杀害。

在初期阶段的两军冲突中，日本方面11人战死，36名负伤；中国方面虽然被害者不过100余名，但从28日早晨开始，在日本军队对北平郊外中国军队各部发动的袭击中，3000名中国军人中有2/3死亡，战死者中还包括怀着爱国热忱前来支援的学生兵200多人。日军7月31日占领了天津，8月4日占领了古都北平。

这时，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蔑视，日本不断加强攻势以为迟早会使中国人低头、屈服、退让，局势朝着战争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根本无法遏止。

连近卫也发表了强硬的声明：“政府为了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由不扩张政策转变为扩张政策，最终是帮了苏联和英美等西方自由阵营的大忙。战争的扩大使日本陷入中国这个既广又深的泥淖不能自拔，尽管日本的行为与自杀无异，可是，当时的陆军大臣杉山却在事变初告诉天皇战争只须两个月就能结束。实际情况与这种简单的想法两相比较，就可知道他们有多

么幼稚了。

不过，中国军队和国民的抵抗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国民对统一的强烈要求推动下，蒋介石在 9 月末也正式承认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蒋介石判断战争无论如何必不可免，便就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同时于 8 月 15 日发表了全国总动员令。22 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以朱德为总司令的八路军正式开赴前线。

日本还在做着速战速决的美梦，而中国从这时起已经摆好了决死抗战的姿态。

在国际上日趋孤立的日本失去了自制能力，战争朝着不断扩大的方向发展。

南京大屠杀和国际形势

日军在华北向 29 军发起总攻击的 7 月 28 日，日本预计中日将展开全面战争，因而出面准备将长江流域尤其是汉口及其上游的侨民送回本国。

他们平安到达上海的 8 月 9 日晚，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乘车擅入虹桥机场，被中国驻防军枪杀。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战争由华北扩大到上海，不过，因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而成为苦战，上海战事陷入胶着状态达 2 个月。到这时为止，在上海战线，日本军队战死者 9115 名，受伤者 31257 名。

11 月，日本派大兵团在杭州湾登陆，得到援助的日本军队突破上海防线，并从 12 月 10 日起开始了对南京城的攻击。13 日占领了南京的日军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

从上海防线崩溃起到南京沦陷，中国没有形成防线，与快速的

追击相比，日军给养供给却落在后头。日军依靠当地的物资，以征用的美名强行掠夺。同时以扫荡残兵为名屠杀普通市民，暴行像洪水一样蔓延。

南京沦陷后，被杀害的居民包括妇女之尸体填满了太平门外的濠沟。据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记载，仅在南京就有 4.2 万、进攻南京时有 30 万人被杀，这一数字与由德国人任负责人的国际救济委员会推算的屠杀人数相同。

日军不仅在 15 日一夜之间屠杀了 2 万人，而且被强奸的妇女既有 9 岁幼女，也有 76 岁老妇。在变成火海的城市里，掠夺、强奸，以及对俘虏和市民的屠杀持续了数周，可日本的军官们却不加制止，后来甚至连军官也参与到士兵们的残暴行为之中。

尽管这次大屠杀的消息在世界上广为报道，但日本国民直到战后东京审判追究此事之前，对这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真相一无所知。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时候的国际局势吧。

在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 18 届国际联盟大会上，中国提诉日本的侵略行为明显违背了国联宪章和九国公约。但是，10 月 6 日国联只是作出召开九国公约条约国会议讨论中日争端的提议后便结束了。

前一天，10 月 5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指责好战的日本和德国的演说，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11 月 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个条约国会议，日本以中日争端只有两国直接交涉才能解决为由拒绝参加。

不过，由于担心会削弱对美、英、苏的牵制力而强烈反对扩大中日战争的德国的斡旋，日本同意出席会议。这是参谋本部石原莞尔等担心战争持久化的不扩大派幕后活动的结果。

日本外相广田在南京沦陷后，于 12 月 12 日向德国驻日大使

迪鲁古泽递交了新条件。条件是：

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置非武装区。在华北设置中国主权之下的、为日、“满”、“中”“三国”共存共荣服务的拥有广泛权限的地区。在华中也要设置非武装区。对大上海地区，由中日共同维持治安，共同谋求经济发展。日、“满”、“中”“三国”签定有关开发资源和关税的要求的协定，支付赔偿金，保障日本在内蒙古、华北、华中的驻兵权等。

同时还附加上在一定期限内派讲和使者到日本指定地点的指示，就像是对战败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迪鲁古泽大使看罢，觉得交涉很困难，广田外相说，尽管交涉可能很困难，但还是拜托大使倾尽全力。26日晚，该和平交涉新条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之手转到了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手中。翌日，孔祥熙以不能接受日本条件为由予以拒绝。

但是，在华北方面军的扶持下，北平已经成立了以王克敏为主席的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且在2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通过了“支那事变对策要纲”，认为和平交涉已经没有必要了。

1938年新春之际，内阁与统帅部之间就中国问题出现了严重对立。不过，在1月15日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统帅部作了让步。因而16日发表了“帝国政府此后不再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声明。

然而，日本的这一得意忘形、目空一切的声明不过是极其愚昧、野蛮的行动。南京沦陷时是日本可以取胜的唯一时机，日本却错失良机。也许是日本太贪婪了吧，反正这样的机会此后再也没出现过，直至沦为战败国。

其实，蒋介石觉得该条件“还不是亡国条件”，认为没有必要拒绝调停。这是因为从1937年8月起，出战山西省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和雁门关战役中包围了日本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约4000人，并消灭了其中约3000人，大获全胜。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

牢固的基础；游击战一直开展到南京附近，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使蒋介石感到害怕。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内部矛盾不可能随之消除，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蒋介石都在想，只要回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随时都可以同日本讲和。

而且，蒋介石的这一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41年4月美日在华盛顿交涉时美国务卿赫尔提出了《有关中国战争的美、日两国关系》即所谓的“赫尔四原则”里面提出的日军撤离中国的条件是：中国承认满洲，蒋、汪两政权合并。美国是想让中国承认“满洲”是日本的殖民地，并让日本的傀儡政权同蒋介石政权合并。

毛泽东在1941年5月写的文章中痛斥美国这种出卖中国的活动为“远东慕尼黑”阴谋。

应该说，毛泽东的评价是深中肯綮的。就是说，这是美国为防止中国的共产化和苏联南下政策所打的如意算盘，与英国1938年9月所构想的绥靖德国使之东侵的慕尼黑协定没什么分别。

日本当时是过于高估了德国的力量呢？还是没弄明白世界历史是不会轻而易举地按自己的意志发展这一非常简单的道理？本应早些醒悟企图一口吞下拥有最悠久的历史 and 广阔的土地以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偌大的中国是多么草率，然而，当时日本却为自己的傲慢与自大所迷醉，被自己所背弃，被自己所欺骗。

另一方面，直到美日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前为止以国民政府监护人自诩的美英两国尽管口头上同意中国抗战，但并没有采取对策反对日本的侵略。1938年也好，1939年也好美国对日贸易出口额为2.4亿美元，其中有七成是军需品。

不过，为了防止国民政府垮台，美国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提供了2亿美元的借款。随着欧洲危机加重，又从1940年1月开

始限制向日本出口军需品。

英国对中国的援助局限在经济方面，从 1938 年到 1940 年间只提供了约 5000 英磅（合 1.4 亿美元）的借款，1940 年 8 月欧洲爆发战争后，英国军队反而从华北和上海撤兵。

谁会想到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就插足中国的英国会落到这种地步，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足迹就像那流逝的百年时光一样被洗刷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是被英日同盟后作为伙伴扶植起来的日本军队的力量挤走的。

苏联的态度与英、美不同。

中日战争初期的 1937 年 8 月 21 日，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9 年 2 月签订航空条约，6 月签订通商条约。从 1937 年到 1940 年，贷给中国 4.5 亿美元借款，是同时期美国的二倍多，此外，还派飞机和不少军人及专家支援蒋介石的军队。

1939 年 9 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使战争扩大为欧洲战争。欧洲战争爆发初期，美、英对日本的压力进一步削弱，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然而，1941 年 6 月因德国侵略苏联，战争转变为轴心国与同盟国战争，随着同年 12 月美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就成了美英苏的同盟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来，日军保持着优势，苏联也陷入倾力卫国的艰难处境中。不过，自 1942 年 8 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和同年 11 月苏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成功以来，国际民主势力便见到了胜利的曙光。

进入这一阶段，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突然变得积极起来。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印度、缅甸战区总司令。他还以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身份为中国军队的作战出谋划策。在印度训练中国陆军，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远征军，1944 年 8 月在缅甸北部首次与日军交锋。

这期间，苏联正与德国展开殊死搏斗，根本无暇对中国进行军

事援助。这一来 在与苏联邻接的新疆省 实际统治该地区的省主席盛世才抛弃了一直实行的亲苏政策 转而支持国民政府 逮捕共产党顾问和民主人士，推行露骨的反苏政策。

不过 罗斯福总统为减少对日战争中的牺牲 在远东采取的却是与苏联结盟的政策。1945年2月 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晤 达成协议 在欧洲战场结束两三个月后 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根据这一协定 同年8月9日 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参战，导致了日本的战败。

日本把侵略战争美化为“圣战”以此来欺骗国民。但是 现实是冷酷的，并没有按日本的意愿发展。

企图以速战速决使短期内获胜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日本陷入了持久战之中，战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以广阔领土和众多人口作为抗战资源完全压倒日本。中国依靠将空间让给日本以此来拖延时间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将日本众多军人和战争物资冻结在中国战线的效果。通过采用游击战术、回避依靠正规军进行的正面交战，不仅使日军痛苦、疲惫不堪，而且空有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却无用武之地。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作为兵器威力大减，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占领城市与铁道线两侧，而只要离城十里就为中国军队所控制。

1937年12月14日，日本在南京沦陷后，在华北扶植起了以王克敏为“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22日将“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自治政府”联合起来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又成立了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军共扶植了3个占领地区的傀儡行政机构。

这些行政组织只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不过是为了将来扩大、建立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设置的过渡性机构罢了。

这种机构采用的是以日本人为顾问的顾问政治，是“满洲国”的缩影，软弱无力是在所难免的。

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

1937年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蒋汪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拉大了。在重庆上清寺汪精卫的公馆，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密会，早早就谋求和平对日之路。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拿定主意逃离重庆，20日经由昆明到达河内。1939年1月1日，蒋介石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谴责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呼吁拥护蒋介石委员长及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斥汪为汉奸，民族的败类。

1939年3月21日，汪精卫的住宅遭到数名怪客的袭击，其心腹曾仲鸣成了替死鬼，这是国民政府方面制造的恐怖活动。

自己的知交遭到暗杀，使汪精卫感觉到自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他深知世间公理、民族及爱国究竟为何物，因而，1939年5月5日，他经由台湾的基隆到达上海。在欢迎其一行人的人群中，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也跻身其中。

这样，蒋汪便彻底决裂。

一度曾被指定为孙文的第一继承人，并作为国民党副总裁而名声大振的汪精卫，是该说他孤身投靠日本呢？还是该说他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好呢？反正他主动采取的这种自毁行为是令人费解的。可惜的只是，即使假定日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汪精卫也永远无法洗刷中国头号汉奸的历史罪名。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政府在南京建立。日本宣传这一伪政权是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返迁到南京的。主席为林森，汪精卫为代主席，以此为伪装。

另一方面，日本在军事上遭到沉重打击的 1938 年 7 月 31 日天亮前，占领了位于朝、苏、中交界处的图们江下游的张鼓峰和沙草峰一带。从 2 日开始，苏联军队在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展开了反击，从 6 日开始展开了第二次大反击，日本陷入苦战，遭受沉重打击。

8 月 11 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了停战协定，日本侥幸保住了面子，撤回到了罗南，不过，在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威力和丰富给养面前，日军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张鼓峰事件使日本获得了沉痛而又深刻的教训。

1938 年 3 月，进入战时体制的日本在第 73 届议会上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以战时状态非常时期为借口，加紧了对经济和舆论的统制，以及对以无产政党为中心的抵抗组织的镇压和破坏——人民战线事件。日本国民的命运被捏在微不足道的军部手中任其宰割，只须一个命令，他们就会从人变成战争物资。

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无视法治主义原则及独裁主义的胜利，不过，将这看成是象征日本经济破产、社会没落的一种崩溃现象更准确些。

日本军队和财阀相互勾结，企图度过难关，但经济危机得不到根治，农村日益贫困，加上国家控制粮食配给，城市居民填不饱肚子。

在经济危机、配给、代用品充斥的新时代，清一色的国民服和扎腿式的劳动服成了日本国民的日常穿着。

这时在欧洲，本来在中日战争初期并没有作出过友好姿态的纳粹集团，自采取对外扩张对策开始便频频做出诸如承认“满洲国”等友好姿态。这是因为德国期待日本能够在对英法作战时在亚洲发挥牵制英国的作用。

1939 年 1 月，平沼内阁一成立，德国便正式提出德、日、意三

国同盟案。提案包括遭到苏联攻击时相互给予武力援助的秘密条款。

要是不知什么缘故，德国来了个 180°大转弯。同年 8 月 21 日晚，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接到从希特勒的别墅打来的关于德苏决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长途电话。23 日该条约在莫斯科签订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三国联盟自动解体。

有这么一句话，儿子不知道爸爸的心。光是中日战争就够应付的了，可 1939 年 5 月 11 日又发生了外蒙古军队与“满洲国”军队之间的小规模冲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害怕事态扩大会使事件发展为与援助外蒙古军的苏联的全面冲突，因而指示尽可能地局部解决。

但是，关东军中的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少佐等作战参谋们坚持强硬立场，无视陆军中央的意向，调动拥有 130 余架飞机的航空部队轰炸了外蒙古的机场。

到了 8 月 20 日，朱可夫将军指挥的机械化部队发动了大规模反击，日军遭到惨败。

这次事件使日本首次体验到与现代化装备的部队交战的滋味。在这一事件中，日军死伤人数约达 1.7 万，第 23 师团大部分被歼，结局悲惨。

军部受到极大冲击，“不败的帝国陆军”的神话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作为中日战争的插曲，日本遭受的冲击和损失太大了。

苏联也由于欧洲局势不希望在远东打下去，因而，双方于 9 月 16 日达成停战协定，事态迅速平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方面都倾尽全力维持中国战线。不过，只是维持“点和线”，却没有充足的兵力进

行大规模作战。战线越拉越长，背后又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将其拖来拖去，日本已显露出衰弱之相。

正当诺门坎事件、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中国战线处于胶着状态使日本苦不堪言之际，1939年9月1日凌晨，在欧洲，纳粹德国的大部队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入侵波兰境内。

9月3日，与波兰签有盟约的英国和法国接连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940年4月9日，德国依仗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开辟西部战线。在德法边境设置的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被轻而易举地突破。5月末，德军在敦刻尔克将80万英军打得落花流水。6月14日占领了巴黎。这是世界战争史中罕见的德国闪电战的胜利。

德国取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令日本朝野上下兴奋不已，德国的胜利使日本产生了过度的错觉，日本迫不急待地加入三国同盟，南进政策占了上风，走向了对英美开战的道路。

新体制运动和日德意三国同盟

1940年6月，与德国的胜利相呼应，日本开展了新体制运动，大政辅导会成立。国防国家、大东亚新秩序、一亿人一条心、灭私奉公等等词语虽然像政治舞台上挥舞的旗帜，但是，那些都不过是抽象的东西。

实际真相是在‘交公粮’的名目下粮食被抢走，军事独裁进一步强化。

降服了法国的纳粹连日炮击英国，大有一鼓作气侵入英国本土之势。

日本国内亲德论死灰复燃，同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

结果，德、意、日结成三国同盟，日本同苏联也签订了“满蒙边界”互不侵犯条约，整顿落后于苏联的装备，同时也可伺机南侵，这就是日本领导层的构想。

这种政策的制定不是出于主观的有意识的变化，而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结果，不过是日本期待的侥幸而已。

当时，尽管德国对英国本土发动了猛烈攻击，但已看出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为了利用日本，派出斯塔马特使到日本探听政局。

日本外相松冈看到：在前一年即 1939 年德国因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而气势大涨；在西班牙，经过三年战争扫除了英法势力，佛朗哥政权占领了马德里，取得了胜利。

1936 年 11 月，德日达成反共协定，日本看到民主阵营和法西斯德意间进行的国际规模的抗争，从内心上判断加入法西斯阵营于己有利。三国同盟获得御前会议承认后，松冈外相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就像俄汉子得到了香饽饽一样，誉之为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随着世界局势进程加快，在中国战场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日本深感切断援蒋物资输送线的必要。

按顺序占领海南岛后，日本遭到英美的抗议却并没有害怕，反而于 1940 年 6 月 30 日签订了松冈安里协定。9 月 23 日，日军根据该协定强行占领了北部的越南。

重视越南局势的英美两国向日本提出书面抗议，谴责日本的行径。认为日军进驻越南是为了建立军事基地，打破了均势。10 月 8 日，英国终于以日本占领越南和签订三国同盟为由通告要重开缅甸通路以继续援助国民政府。

在此，英美重新认识到，正在抵抗日本侵略与之奋战的中国，在牵制日本南侵的战略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

1938 年 12 月 15 日，早在武汉三镇被日本占领之前，美国就向中国提供了 2500 万美元的借款，1939 年 7 月 26 日 通告废除《美日通商条约》半年后条约发生效力 起到了牵制日本帮助中国的结果。

同年 10 月，美国海军长官诺克斯发表了向三国同盟挑战的演说，并全力以赴强化太平洋舰队。而且劝告住在远东的美国人早早回国，使得美日关系更加紧张。

汪精卫政府一成立，美国国务卿赫尔便猛烈抨击日本的行径，并声明美国只承认在重庆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忠诚和支持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日本看到自己石油、钢铁、煤及其他战争物资的储备日益减少 如剜心般疼痛 仿佛败战就在眼前 令其惶惶不安。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日本都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为此日本倾力于日美通商条约的达成上，但中国极力干扰。英国实际也表明了不同意的立场。赫尔国务卿决定撤回三个月的日美通商条约议案，而于 1941 年 11 月 26 日 召来野村、来栖两位大使 递交了除去暂定协约的普通协定案。

这份被称为赫尔路线的文件可以概括为连保留条款都不允许的两项内容：

1. 日本政府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走一切陆、海、空军兵力和警察。
2. 合众国政府及日本政府除临时定都重庆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 不给予其他任何政府和政权以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支持。

日本外相东乡在 12 月 1 日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 如果日本同意美国的答复就不能再插手大陆，而英美就会取而代之，作为指导

者控制东亚。

日本走投无路，于是铤而走险，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袭击了珍珠港，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四年来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的中国带来了大光明。战争从中日战争升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一员，有望取得战争的胜利。

美日战争前的政局

让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吧，日本梦想在战后的和会上将世界分成“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苏联圈”四等份，而于 1941 年 1 月单方面制定了日本成为“大东亚圈”政治领导人的《对德、意、苏交涉案纲要》。在与军方协商后，该纲要作了部分修改。3 月 12 日，松冈外相携带此议案到欧洲旅行。

3 月 24 日，松冈在莫斯科与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会晤，到 4 月 5 日为止，他又接连与希特勒、里宾特罗甫、格林等德国首脑会谈。

在会谈中，德国方面告知松冈，德苏关系已经恶化，并认为由于与苏联意识形态正相反，同他们合作是不可能的，对日苏携手表示出不以为然的意向。

同时，德国为了彻底打垮英帝国，屡次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说服日本尽快消灭英国就能防止美国参战。

松冈从个人角度赞成德国的观点，明知德苏关系恶化后四国相互提携无法实现，仍于归途在莫斯科商谈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从 4 月 7 日到 12 日，双方因利害关系的摩擦争来吵去，终于 13 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斯大林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后的宴会，延长了松冈所乘坐的列车发车时间。除这种虚伪礼遇外，在车站，斯大林还拥抱了松冈，留下了“现在可以放心地南进了”的饯别之语。

另一方面，日本很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敲开了与美交涉的大门。

1941年4月16日，《美日谅解案》出笼。其要点有日本军队撤离中国，美承认中国的“满洲国”，合并蒋汪政权，领土非军事化，以非军事化为条件美国出面斡旋中日关系。这就是赫尔的四原则。

然而，4月22日从苏联归国的松冈在离开机场的汽车里听了大桥次官的报告就不高兴了。他对美宽和的内容表示不快，千方百计要修正赫尔四原则，结果使双方对立逐渐激化。

5月27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炉边谈话，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

日本为了南进虽制定了《时局对策纲要》，但对方则构想出形成以美、英、中、荷连成的A、B、C、D对日包围网的对策。

1941年6月22日，在剧变的国际形势下，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进攻。

日本则为是南进还是北进而犹豫不决。虽然松冈主张以三国轴心为根本展开对苏战争，但是，陆军省因诺门坎事件非常清楚苏联的实力，因而反对松冈的主张。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南进论压倒了北进论而被采纳。

结果，美日交涉结束，近卫内阁总辞职，松冈也被撵下了台。

1941年7月18日，近卫文麿再度组阁，为扭转局势，出面张罗罗斯福与近卫的首脑会晤。

但是，美英两国却于1941年8月14日在大西洋上的英国军舰波林绍夫·沃尔兹号上举行了罗斯福与邱吉尔的会谈，发表了以不扩大领土、自由选择政体的《大西洋宪章》。

在交涉出现这种波折之后，同年9月6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了以“日本帝国在为生存自卫不惜与美英开战的决议下，大致

以 10 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而且与之并行，依靠外交手段贯彻帝国的要求。外交交涉到 10 月上旬为止，如无贯彻希望就对美、英开战”为内容的重要的《帝国国策落实要领》。

但是，美日外交处于胶着状态，实际上毫无进展，对美日战争没有自信的近卫 9 月 26 日表明退意。

10 月 17 日，在重臣会议上，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被推荐为继任首相。

他认为“不开战陆军就没有出路”，迈出了战争内阁的第一步，这成为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败战发动的动机。

日本大本营在每日召开的重大会议上熬着通宵，而且随时向日本驻美大使馆发出指示电文。不过，美国方面破译了日本的全部的外交密码电文，对日本的动向了如指掌。

在这个节骨眼，11 月 26 日被称为“赫尔照会”的外交文书传到了日本方向。正担心外交上的打击会导致开战受阻的冒险主义的军部指着《赫尔照会》：“这只能说是老天保佑。有了它 帝国开战的决议就容易作出了。太好了，太好了！”而毫无惧色地接受了。实际上，日本国民并不知道，幼稚、鲁莽的军部的这种态度是何等可怕的冒险呀！他们没有告诉国民这是在把国民领向死胡同，这是日本的悲剧。

日本军部愚蠢地相信只靠一个大和魂就能赢得战争。当他们明白没有认识到庞大的美英物资和科学的力量是他们莫大的错觉时，已是战败后的事了。如果早点儿明白的话，就不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12 月 1 日，日本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与美交涉终于没有成功 帝国将对美、英、法开战。”早在 11 月 26 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就向从南千岛择捉岛（一名库里耳岛）单冠湾出发朝

珍珠港航行的机动部队发出电令：“12月8日按预定方案行动。”

这就是美日战争的开战命令。

《赫尔回忆录》中记载：“1941年12月7日虽然是星期天，但我从早晨开始就上班了。……上午我接到了一份很长的截获电报，这是东乡外相发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及特使来栖三郎的长篇电文。这是对11月26日我们的提案的答复。除此之外，还有发给两位大使的短电文，指示在当天下午1时转达给美国政府，如有可能直接转给我。那正是行动开始的时刻。”

巧的是就是这一天，日本奉若神明般的德军眼看莫斯科就在眼前，却只能在暴风雪中开始撤退。

不过，原本计划在袭击珍珠港前30分钟就中断与美国的交涉的通告递交到美国政府，而实际上赫尔国务卿接到通告是在开始袭击珍珠港1小时后的12月7日下午2时20分（美国东部时间）通告晚于攻击时间虽然在东京战犯审判所被追究，但是不宣而战是日军自中日、日俄战争以来的惯用法。

国共摩擦与抗战

我们再看看中国战线。

从开战两年后的1939年开始，国民政府军中逃兵数量增多，军纪松弛。与此相比，军纪严明的共产党军队的士兵逐渐赢得了民众的信赖。

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面扩大战果，一面建设敌后游击区；日本战略性进攻阶段到武汉、广州陷落后就结束了。从那时开始，双方无法发动决定性的攻势，进入相持阶段，变成持久战，直到战争结束前。

在这一时期战斗的特征是，共产党军队成为抗战的主力，而国民政府军却过分消极地守卫战线，或者一遇日军攻击便大抵是毫

无例外的逃遁。

在这个节骨眼，国民党上层对日投降及反共的势头越来越高，必败论或亡国论的论调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 1938 年 5 月发表了《论持久战》鼓起了国民的信心和勇气。而且他通过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将中国农民伟大的潜力加工组织成游击队，以游击战术为扩大解放区的武器。

看到共产党军队在抗日前线上的变化，暗中害怕的不是日本军队，而是国民党。1939 年 6 月他们背着共产党制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虽然实行国共合作却开始将共产党称为“匪党”将八路军、新四军称为“匪军”。

同年 11 月在河北省，12 月在湖南省，共产党军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牺牲者颇多。在日军面前显得软弱，而在共产党军队面前却显得强大，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结果还是间接帮了日本人的忙。

国民党特务机关阻止青年人潜入革命根据地，在西安和重庆建立了关押罪犯的集中营，拘留青年，总数共有 20 万。

另一方面，共产党军队第十八集团军逐渐南下渗透到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与渡过长江延伸到北方的新四军相呼应，形成了 T 字形红色游击区。

1940 年 10 月 19 日参谋长何应钦命令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在 11 月末之前移到黄河以北。但共产党军队并没有移动。何应钦将期限延长至 12 月 9 日严令首先黄河以南的第十八集团军到 12 月末为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 12 月末前先移动到长江以北再于 1 月末之前移驻到黄河以北开展对日战争。

1941 年 1 月 4 日尽管对这一命令不满，但新四军仍遵从了调动命令，在即将渡河之际，遭到第三战区顾祝同军队的突然包围和袭击，被丑恶的伎俩算计了的新四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就是皖南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包括副军长项英在

内死伤 4000 人。

明明是国民政府自己制造的事件，但他们却反而诬指新四军发动叛乱，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成为俘虏的军长叶挺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针对这一事件，中共在延安召开群众抗议大会，谴责这一事件是亲日派破坏抗战和发动内战的阴谋，任命新四军第一支队长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新整编了新四军。

该事件导致了国共关系恶化，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受到动摇。日本对中国阵营内部的分裂寄予希望，通过宣传和使用权谋为国共冲突火上烧油。

不过，1941 年 6 月 23 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第 2 天，毛泽东抑制住沉痛、悲愤的心情阐明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保持国共合作关系、避免与国民政府决裂的策略的必要性。重申了对外与同法西斯阵营作斗争的美英联合，与共同的敌人决战的方针。

除了皖南事件外，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还将司令部设在西安，屡次向延安地区发动进攻。1944 年 7 月，调动 7 个师的兵力围攻贺龙、肖劲光麾下共产党军队驻扎的爷台山，双方激战数日。结果，虽然中共方面死伤不少，但由于善战，并不像皖南事变那样悲惨。

中共向世界呐喊，国民党军队用美国支援的用来打日本的武器攻击我们，美国应该负起内战的责任。并不希望国共分裂的美国出面调停，才使胡的军队撤兵。

在中日战争的极度苦痛中，发动这种与国民的痛苦毫无瓜葛的内战，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国难当头之际彷徨不定的政府却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自相残杀的内战中并不惜流血牺牲，与其说这是一种野蛮，莫不如说是历史的嘲弄。

在以华北解放区为中心进行的战斗中，仅日军动用千名以上

兵力所进行的扫荡作战在两年内就达 109 次 动用兵力约达 50 万人。对此 八路军巧妙地采用游击战术与之周旋 两年内 其兵力由 4.5 万增至 40 万名，新四军的兵力也从 1.2 万发展到 10 万人。解放区的人口，华北解放区有 4000 万，总人口约 6000 万。

1940 年秋天 八路军发动了被称为‘百团大战’的集团性大攻击。战斗是在 8 月 20 日晚开始的 八路军将 115 个团 40 万兵力一下子都投入到攻击中 与 20 万日军打到 12 月。根据八路军的报告 大小战斗共 1824 次 击毙日军 2 万名 汪伪军 5000 名 俘虏日军 280 名 伪军 1.8 万名。八路军死伤数也达 2.2 万名。

在这一时期，八路军也好，新四军也好。他们面对的伪军更多了。

这是由于汪精卫傀儡政权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络，让国民党将领投到汪伪政权中，改换徽章强化伪军与共产党军队交战。为了扫荡共产党军队这一同一目标，日本、国民党、汪精卫傀儡政权三者究竟是达成了协议，还是形成了某种默契不得而知，反正他们的步调相当一致。1943 年 5 月 庞炳勋率领 7 万国军投降汪伪政权。汪伪政权拥有的 80 万军队中有 50 万前国民党军。

1942 年以后，国民政府军与美国形成联合军的关系，随着美式装备的配备，蒋介石采取了极力避免主力损失而谋求胜利的拖延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形成鲜明对照。换句话说，蒋是为了在战后的中国保证自己的统治地盘。

蒋介石的这种政策与美国强化反攻尽快取得胜利的政策相冲突。

从 1943 年开始，史迪威将军虽然要求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包围中共根据地所有的大军派往抗日前线及将部分美国的装备转给共产党军队，加强共产党军队的抗日反攻力量，但蒋并没有接受。

这种对立与不和导致 1944 年 10 月蒋介石提出罢免史迪威的要求 美国也无可奈何 只好接受了。

1944年9月，史迪威将军在给美国参谋总长的报告书中写道：“蒋介石并没有进一步努力打完这场战争的意思。谁要是对他的这种行为硬性劝诫的话，不是被穿小鞋，就是被除掉。……而且他认为太平洋战争大部分已经结束，因而他要依靠拖的战术，将所有负担都推到美国头上。……据我个人的看法，他会侵吞借款或战后援助中饱私囊，继续实行其拖的战术。”

“他的目的不是别的。他的现实地位是建立在一党政府、专制政策及依靠秘密警察镇压民主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他的目的就是要维持现在的地位。”

而中共与蒋却成鲜明对照。

解放区和游击区不断扩大，战斗力也在同日军作战中不断增强，1945年初中共已拥有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的强大兵力。据同年4月的报告，通过人民战争，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包含了19个省，总面积达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9950万人，形成相当强大的势力。

就是同一时期的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拥有121万党员而自豪。大会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份报告。

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失去生命的人超过了1000万，财产损失在500亿美元以上。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得知此讯的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展开了反攻作战。8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表全面进攻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各解放区的军队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发动了进攻。

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不过，日本总司令冈村宁次接到国民党的命令后，指示军队不要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以自己的实力解除了不少日军的武装，部分八路军

先期进入了东北地区。

从 8 月 11 日到 10 月两个月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收复 196 个城市 解除了 23 万多名日伪军的武装。解放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了 315200 平方公里 人口增加了 1871.7 万人。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由美国飞机和船只运送到日占区。

争夺日占区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约 200 万日军被拴在大陆的八年中日战争就在这种状况下结束了。

只要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站在同盟国一员的立场上过于依赖美国进行这场战争，而毛泽东呢？可以说，在他的脑海中，我们的国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战争的观念深深地扎下了根，他是以自己的力量在打这场战争。尽管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方面有很大差异，但通过抗战，民心倾向毛泽东这一方面不是偶然的。

美日战争、中日战争和巨头会谈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1941 年 12 月 8 日美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争吧。

在揭幕战中，日本奇袭珍珠港成功，击沉美国战舰蒲林斯·奥卜沃兹，令中国大失所望。

开始对英国势力在远东的最大据点香港发动进攻的日军，12 月 4 日扫荡了九龙半岛之后，18 日在香港岛登陆。在香港 英国军队虽然配置有 1.1 万人，但 25 日就投降了，日军有 675 人战死，2079 人受伤。

日本司令官酒井指出：“……将英国过去 100 年间统治东方的根据香港……”

身为东方人，听了这话没有不为之心动的。

但是 作为 1902 年与英国结盟，借助英国的力量进行俄日战

争，现正在残酷无情地践踏中国大地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出这种话，实在令人惊讶。

日本强行发动的是何等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呀！然而他们却不理解这种野蛮的历史，将谁都不信的天皇这一傀儡推到前台，硬说是圣战。这种不道德的嘴脸，与其说是可憎，不如说是可怕而又可怜。

12月8日，上海、天津、广东等地的外国租界在日军进驻的同时随之消亡。

1942年春，日本向南方发动进攻，推进的速度惊人，连马尼拉、新加坡的战略要地都被日军占领。3月8日，缅甸的仰光也沦陷了。中缅公路被切断。国民政府与美英接触的渠道只剩下印度加尔各答的通往西藏的公路联络。

另外，日本还打算同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签订和平协定，企图分裂中国的统一战线，1940年建立汪精卫傀儡政府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同美、英宣战。同一天，日本和汪伪政权之间签订了有关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的协定。

1月10日，英国和美国也同国民政府缔结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外国特权的新条约。这可以说是对日本和汪伪政府所签协定的反射性反应。

蒋介石感慨万分地说：“鸦片战争后经过100年岁月的流逝，中国侥幸从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经过50年的浴血革命和5年半抗日战争的牺牲，好不容易才看到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1943年1月14日，有罗斯福、邱吉尔，还有自由法国政权的戴高尔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德国灭亡后要将全力集中到对日战争中。美国总统还在会见记者时要求法西斯轴心国“无条件

投降”。

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败退。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1943年2月2日）是在会谈2周后发生的事。大战的大势已经发生转变。尽管如此，日本在对世界局势的综合判断上，仍保持着乐观的看法。

日本从宣扬“日满一体”变为宣扬“日满华一体”，再度鼓吹起“建设东西新秩序”来。而后是根据八纮一宇精神出笼的“大东亚共荣圈”，既像是念经，又像是看幻灯片，总之让人感到愚不可及。

同年10月30日，日本在南京与汪精卫傀儡政府废除了1940年签订的《日华基本条约》，改换同盟条约。但是，这只不过是为了迷惑中国国民及对国民政府进行诱惑的信号而已，并不是日本的侵略政策发生了改变。

1943年11月5日和6日，日本邀请东亚圈的首脑到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但是，出席的人仅限于日本势力圈的傀儡，而且只是罗列了一些抽象的共同声明。与不断恶化的战局相比较，不过是没有任何任何反响的一出皮影戏而已。

11月18日，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离开重庆，21日抵达开罗。他在开罗出席了与罗斯福、邱吉尔一起举行的中美英三国会谈。

23日，蒋介石、罗斯福在单独会谈中，讨论了对日本的战后处理问题，在关于处理日本领土问题上就战后将辽东半岛、“满洲圈”、台湾省及澎湖列岛返还中国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罗斯福还数次询问蒋介石是否对琉球群岛提出主权要求，而蒋却提出了由中美两国共同占领最终委托国际机构管理的中美共同管理的提案。在香港问题上，蒋介石作出让步，认为先由罗斯福、邱吉尔协议为好。在战后是否废除日本的天皇制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应由日本人自己来决定。

作为中日战争的当事国，是否过于宽容，是否有违国民的意

愿，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

26 日，三巨头会谈在取得以下一致意见后便告结束：关于日本的处理问题，剥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夺取和占领的太平洋上的岛屿，将满洲、台湾归还给中国，朝鲜在不久的将来也将 from 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

11 月 30 日，《开罗宣言》在紧接着召开的美、英、苏三巨头德黑兰会谈上获得了斯大林原则上的同意。斯大林只是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积极地同日本作战，应该让他们积极参战，并暗示苏联希望获得远东的不冻港。

蒋一行于 12 月 1 日回到重庆。第二年 1944 年 1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了新年祝辞：“今年正是甲午战争（中日战争）50 周年，开罗会谈决定清算日本 50 年来的罪行。……为了重建战后的日本，要全面消灭军部，使其再也不能干预政治。”

对开罗和德黑兰会谈的历史意义，有利害关系的各个国家评价的角度各不相同。不过，有一点没有人会提出疑议：这是为不久就会结束的战争所作的准备过程的一个部分，是大国间为了打开战后新世界历史之门所作的努力。

从本质上说，将这解释为由于是分割世界的战争，进入到清算阶段的股东所作的交往和为获取各自的利益而出现的调停阶段的情况，大概不会有大的扭曲吧。

日本昨天还在叫嚷“不与国民政府打交道”、“耀武扬威地要‘消灭英美’”如今却已是日薄西山。对此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的，只有相信“大本营之声”的日本无辜的国民。

日本军部是脱离国民的绝佳范本。

1943 年 11 月 25 日，开罗会议结束后，江西省遂川基地的 15 架 B25 飞机空袭了台湾的新竹附近。这是从中国大陆对日本占领地的首次攻击。这一事件表明，在中日战场上，中国方面已经掌握

了制空权。

1944年8月,日本好不容易攻占了衡阳、桂林、柳州等空军基地,以为能够阻止住空袭。然而,从此前的6月中旬开始,长途轰炸机B29从成都起飞越过黄海轰炸了北九州。接着,在7、8月份在日本山阴地区和朝鲜可以看到那庞大的身影,分散在华北、华中整个地区的日军水陆给养线,遭到了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美军的攻击。

另一方面,在华北成为抗日战场主力军的共产党军队的势力引起了美国的重视。6月下旬,以巴莱德上校为首的美国高级军官和外交官首次飞到共产党军队的中心根据地延安,视察边区地带,并开始与共产党统帅部联络。

被国民政府30万大军和日军封锁包围的这一地区正式接待同盟国代表还是第一次,不过,大约在一个月前,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新闻记者因获得国民政府的许可来到延安,此时还在逗留之中。

当时曼彻斯特《卫报》特派员斯塔因在文章中写道,拥有近百万人口、发电站、工厂、现代机械、很多货车和小汽车,以及几乎每天都有同盟国飞机运送军需品的重庆,与没有电、没有现代化设备,以及除四五辆老掉了牙的货车外再没有汽车运输的延安,这两大抗日根据地外观上的差异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特别是在延安,看不到在重庆毫无掩饰的那种对抗战的厌倦和颓废情绪,没有对外国援助的强烈依赖心理,忍受艰难困苦,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抗战的旺盛的战斗精神之饱满令外国记者惊讶不已。

当时,国民政府军千方百计想将共产党军队赶入饥饿和不利的境地。而中国共产党军队为获得平等的待遇,需要能够指挥全中国军队的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支持,这是朱德总司令向斯塔因特派员透露的。

7月7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蒋介石，提议为了统一作战和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从缅甸召回史迪威中将。蒋介石却并不想吞食承认共产主义者或任命外国人为军队指挥官之类的“苦药”。

他并不想同日本人作战，他所采取的不过是坐视美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而坐享其成的反动立场。

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10月19日魏德迈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愤怒的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统治的是以盖斯太保和党的谍报机关为支柱的一党政府的王朝。他还组织了10万人的亲卫队，讨厌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他将供给自己的军需品贮藏起来，打算在日本军队撤退后就去占领共产主义者控制的地区，并消灭他们。并没有真正努力去同日本人交战。”

罗斯福总统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见解影响，高估了日本的抗争能力。这一过高的估计使他作出为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苏联的参战是必不可少的判断。

由于这一判断而使苏联参战为代价引导罗斯福作出了让中国付出牺牲的雅尔塔让步。

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只要条件许可，苏联就能在德国崩溃两三个月后向日本开战。12月15日，斯大林又向哈里曼提出参战的条件：将千岛和南萨哈林岛从日本手中归还给苏联，向中国租借旅顺、大连地区和东南满铁路，承认外蒙独立。

1945年2月上旬美、英、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巨头会谈。8日，罗斯福在与斯大林会谈中原则上同意苏联作为参战的代价提出的条件。这一决定作为秘密暂时没有通告给中国。尽管开罗会议已经决定将满洲归还给中国，但在有关中国的领土和权益问题的处理上，不与主权国家作任何商议便擅自根据这种利

害关系作出了决定。

蒋介石并没有对建立在重新分割中国这一牺牲之上的雅尔塔会议提出抗议。提出抗议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历史上，大国主义的背后总是有弱小国家的牺牲紧随其后。将根本不是自己的土地随意分割给别人或留给自己，超级大国的这种强盗行为在国际政治的美名下得到美化，在道德上成为正当化，很难找出什么逻辑来辩解这不是将强盗扮成耶稣基督的犯罪行为。

2月11日，三巨头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1944年9月5日，在塞班岛被攻陷后，小矶国昭内阁在最高战争指导会上决定与国民政府实现和平。条件的要点是蒋介石回到南京成立中国统一政府。还有将香港让渡给国民政府日本军队以在华美、英军撤离为条件从中国全部撤兵。只是日本希望能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就是准备让1932年上海事变以后10余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付诸东流。

不过日本在10日后的9月1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上决定的对苏交涉的让步草案，同意为维持苏联的中立，避免其参战，将满洲和内蒙古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转让南撒哈林和北千岛也在考虑之中，这一草案与雅尔塔苏联参战条件大体一致。

就这样日本在战败灭亡的前提下摸索着战败条件。

同年3月起，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大医院住院，他是由于1935年遭蓝衣社袭击所受伤口恶化病倒的。陈公博代理他的职位。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躲在地下防空洞中，在夫人陈璧君守护下，于1944年11月10日结束了其60年的生平。

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一生，他的命运。与其说可憎，不如说更令人同情。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叛徒的标本，在国民的脑海里已经根

深蒂固。一想到这点多多少少都会让人感到人活在世上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在历史这个滚动在漫长旅途上的大篷车上，无论圣人、伟人，还是仇敌、叛徒全都粉墨登场，在他们随意驱使下，演绎出人类社会一幕幕场景。对此，人们是有充分理由可以嗤之以鼻的。

1944年11月24日汪死后2周 B29 首次大规模轰炸东京。

此前的1942年4月18日正午，从接近日本本土的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8架轰炸机突然轰炸东京后飞往中国基地。

这是对东京的首次空袭，笔者当时在大学区内便目击了前来轰炸的飞机。

日本的败亡与回顾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4月22日，苏军攻陷德国首都柏林，终于成功地与美、英军汇合。

写下《我的奋斗》，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代枭雄希特勒自杀了，5月7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欧洲战争就此宣告终结，日本被孤立了。到了这时，世界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已有50个。

从7月17日开始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后由艾德礼接任）及苏联元首斯大林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三巨头会谈。在不到5个月期间，雅尔塔会谈的当事人中只剩下斯大林一人。

7月26日会谈结果以美、英、中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苏联由于当时没有参加对日作战没有署名，8月8日参战同时加入了这一公告。

该公告是同盟国为了在战争结束前给日本最后一次机会而制定的，内容包括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铲除军国主义、占领日本本

土、归还过去靠侵略掠夺的领土、处罚战争罪犯，在日本国内则实行言论、宗教、思想的自由和尊重基本人权等。

总体说来，表明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和在日本复活民主主义的共同观念。公告结束时强调，如果日本不接受这些条件，同盟国军队只有使日本彻底崩溃。

4月12日，极力争取苏联协助的罗斯福总统猝死，杜鲁门继任。7月16日就在波茨坦会谈举行之前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的美国开始看到战争结束指日可待，于是，围绕战后的世界政策美苏对立表面化，掌握其领导权的意图也露骨起来。

但是，对政局判断茫然无知的日本只想依赖苏联作为和平媒介，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没有采取明确的态度。因此，同盟国认为日本拒绝接受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终于8月6日早晨，B29在广岛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这时在远东，美国凯觐的是将日本帝国主义的遗产全盘继承下来。特别是确保对中国的垄断性支配。雅尔塔协约定德国投降3个月后苏联对日参战，随着这一日期的迫近，美国开始焦躁不安起来。如有可能的话，美国想单独降服日本，以便独自占领日本并确保战后在远东政策上的优势地位。

即使不将原子弹投到日本，日本的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是常识性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投放原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的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对苏冷战之最初的主要作战之一。”如此评价相信更加切中肯綮。

日本在大本营没有把真相告诉给国民，只发表说那是“新型炸弹”。

据1946年2月占领军发布的情况，广岛遇难者176987名死亡、失踪者92133名轻伤27997名根据广岛市府推算爆炸时生存者为160079人，当时人口为40~44万，负伤者据调查为

157000 名。

在长崎，当即身亡者 73884 人，伤者 74909 人，合计 148793 人。

斯大林恐怕是彻底看穿了美国投放原子弹的意图，8月8日深夜，苏联以应同盟国的要求以促进战争结束为由对日宣战，第二天天不亮，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战线不堪一击，支离破碎，天皇的军队任人宰割。

让我们整理一下强国的定义吧。

所谓强国指的就是有强大的战斗力，有为了扩张领土毫不留情地调动一切手段进行掠夺的可怕权力，拥有将为了一块肉拚死争夺的野兽似的非人道、超道德之罪行正当化的力量，可以创造并维持所谓人类正义的集团。

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投到了长崎，很多人都失去了生命。

就在那天晚上的御前会议上，军部和外相围绕无条件投降问题发生对立，不过留下了能否“维持国体”即天皇地位问题。

结果8月10日早晨6时，日本通过瑞典和瑞士向美、英、苏、中四国转达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

美陆军司令史蒂文森明了、详尽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8月10日，华盛顿卷入兴奋的漩涡中。因为在经由瑞士正式通告到来之前，广播已经播出了日本接受投降的消息。上午9时，我被召到了白宫。总统召开会议与主要阁僚讨论日本投降的条件问题。总统征求意见时我答道：‘即使日本不提出天皇地位问题，为了将分散的、没有其他权威的众多日本军队引向降路，我们应该继续保留天皇的地位，让他听从我们的指示和指令，而且为了避免像历来在硫磺岛和冲绳发生的那种凄惨的流血事件，一定要利用天皇。’……这期间，伯恩茨起草了回文，我表示同意。……答复回避了对

日方条件的任何直接允诺，同时又满足了日方希望安心的目的。”

12日凌晨，以美国国务卿伯恩茨的名义作出的四国答复通过国际广播播出。

其内容要点为：“天皇的地位应置于认为其为受降之必要的联合国军司令官的‘制约之下——Subject to(以此为条件)’最终，日本国政府形态将根据《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决定。”

军部部分人认为在“Subject to”这种措辞下维护国体是不可能的，而产生动摇，甚至出现了浓厚的政变气氛。

另一方面美国第3舰队哈鲁济见已到了12日，为防备万一日本不投降的情况，命令舰队驶到预定地点。13日凌晨1时中止空袭，进入警戒状态，对着东京湾“按预定方案进攻”的命令一下达，空袭部队便轰炸了关东、东北多座城市，造成了严峻的事态。

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帝国主义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宫城内的防空洞中召开。天皇说服了想把战争继续下去的军部，拿起了承诺投降的麦克风。

第二天15日中午出现了“玉音播送”，天皇直接通过广播告知国民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在“尽忠报国”和“一亿玉碎”的密室里被蒙上耳目像牛马一样牵来拖去的国民和军队，面对新的事态犹如晴天霹雳。

不过，京都大学著名教授河上肇写下了名为“八一五之作”这一罕见之作——吐国民之块垒：“啊，真痛快，好不容易活下来，总算迎来了战争结束的今天。”

与这种情况不同，统治阶级更害怕的不是战败而是战败后产生的混乱和革命，为了防止国民和军队引起的骚乱和革命，作为最后的王牌搬出了天皇的权威。

卢沟桥的枪声已经打响八年了，从侵略东北（“九一八事变”）算起有14年，漫长的战争划上了终止符。侥幸的是日本国内没有

出现反体制的主张和行动。

美国出于廉价占领的考虑，借助间接统治的形式，利用了日本的政治机构和统治层的力量。

尽管同盟国和美国国内都有人主张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废除天皇制，但由于日本领导层和美国占领当局的偏袒，他们默认了天皇作为有价值的偶像保留下来。

日本正式投降是在 1945 年 9 月 2 日 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作为投降使节向麦克阿瑟盟军司令及八个联合国代表签署了投降书。

当时签署的投降书原本和签字用笔收藏在设在美国西点军校区内的军事博物馆中，令观众感慨不已。

让我们再度回顾一下美日战争吧。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 从 6 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183 个飞行编队飞抵珍珠港上空。那时是夏威夷时间 12 月 7 日上午 7 时 49 分（日本时间为 8 日凌晨 3 时 19 分 华盛顿时间为 7 日下午 1 时 19 分），总指挥官渊田平津雄中佐下达了“全军突击”的命令。在寂静的周日早晨 集结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遭到突然袭击后 没有任何抵抗就有 5 艘军舰被击沉 有 3 艘被击破，此外还有不少舰艇被击沉。188 架飞机受损，291 架飞机被毁不能使用，2400 多人战死 损失惨重 日方也损失了 5 艘特殊潜艇 29 架飞机 战死者 100 人左右。

当天 8 日上午 6 时 大本营发出短讯：“帝国陆海军在 8 日天亮前与在西太平洋的美、英军交战。”

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参议院一致赞成众议院一票反对通过对日宣战决定，不仅如此，袭击珍珠港还使美国国民团结到了总统周围。

“莫忘珍珠港！誓要雪耻的意念使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英国首相邱吉尔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喊“我们胜利了！”并于 8 日向日本宣战。他不顾年末事务繁忙，仍于 12 月 22 日飞抵华盛顿 到第二年 1 月 14 日止在白宫商议指导两国战争方针。

此前的 1941 年 8 月 14 日 英美两国发表了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宪章》 第二年 1942 年 1 月 1 日 在得到同盟国 27 个国家的赞同后 发表了《联合国共同宣言》。

让我们再插些题外话吧 在邱吉尔大喊‘我们胜利了！’的 8 日早晨，笔者从住宿处的邮筒里取出晨报，才知道美日战争开始了，在电车里只能见到阴暗沉郁的面孔，没有一个人想开口谈论战争。大学区内笼罩着一种忧虑的气氛（不知用兴奋来表现是否更好）。由于第一节课是军事训练课，我们都聚到了神田御茶水有轨车站处的校舍新建地。

带队教官现役大佐走到我们面前说了句“该来的来了”之后，用阴沉的语调给我们训话，然后那天的训练就结束了。

这是笔者大学二年级在校期间体验到的 12 月 8 日的记忆。

说实话，我可没有自信像邱吉尔那样以坚定的信念来占卜战争的进程。只是在我们面前民族解放的希望尽管还很模糊，但是否正同太阳一起冉冉升起，我们的疑问更大于我的欣喜。

不过，每次公布的战况都令日本人手舞足蹈。这是战争初期的现象，随着日子的推移，艰苦的生活和战线连连后退使越来越多的国民明白了开战是一种失策。

实际上，1941 年当时日本的总生产力不过只有美国的 1/10，经济上根本无法赶上美国。

尤其是动员了 300 万工人参军，不足的劳动力根本得不到补

充满 12 岁以上到 40 岁为止组成的女子劳动志愿队达 47 万。从 1939 年到 1945 年，仅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朝鲜人就有 66 万。

日本尽管老早就呈现败象，但他们就如同掉进了死亡沼泽。

与此正相反，中国在战争初期实在是太悲惨了。不过，就像正在退却的拳击手发出致命还击一样，从 8 月 10 日晚到 11 日 全中国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兴奋状态中，重庆的中央电台主持人只是反复地喊着“让我们听听陪都 指重庆 欢呼的声音吧！”从收音机里传出了爆竹的炸裂声、敲锣打鼓声、民众欢呼万岁的声音。经过八年艰苦岁月终于迎来了幸福的中国人，个个感慨万千、辗转反侧，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但是，八年抗战，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 132 万人死亡，176 万人受伤。

另外 让我们看看不幸的“满洲国”的结局。

由于苏联军的南下，“满洲国皇帝”和大臣们躲到了“朝满边界”一个简陋且散发着令人作呕气味的小矿村。8 月 17 日 在矿工公寓昏暗灯光下 召开了最后的御前会谈 决定解散“满洲国”和宣布“皇帝”退位。

从 1932 年 3 月建立傀儡政府到这时为止，随着 13 年间强占东北的日本势力被消灭 傀儡政权也自动解体 作为从“皇帝”宝座上退下来的人，其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人。

19 日，成为废帝的溥仪在亡命日本途中，于奉天北陵机场被苏联军队逮捕。

20 日 苏军开始进驻长春。

中国内战和美国动向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又出现了新问题。围绕接受日军投降和日

本国民待遇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和中共方面产生矛盾发生了对立。

蒋介石力主只应将日本的军阀当作敌人，而不应把日本的人民当作敌人的方针，并且说道：“我们当然不能不追究严重的罪行，不能不让他们忠实地履行投降的条件，但是，我们决不能肆意去报复，更不能侮辱敌国无辜的人民……”听了广播的日本人感触颇深。

8月10日晚12时，共产党军队的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下达了解除日本军队武装的命令。共产党军队根据命令开始积极接近日军占据的地区。但是，蒋介石却于8月11日严令共产党军队留在现驻地待命不得随意移动，不得接收日军的武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蒋的命令不仅有失公正，有背于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对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有利为由，于13日正式拒绝接受命令。

由孙文主导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西安事变以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代。

那只有需要共同斗争和目标一致时才能得以维持，一旦敌人失败便会分道扬镳或变成敌对关系，把这看成是政治方程式也无妨吧。吴越同舟这话用在此处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分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缓慢的，随着辩证法式的变化而发生的。

国共的蜜月时代在日本败亡同时瓦解并不是不曾预料到的事，双方事先都做过准备，为了确证，都在离婚证上盖了章，已到了诀别的时刻。

日军和国民党军与其说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不如说针对中共变成了友好的、同志式的协助关系。

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这种变化感到震惊的是美国。因为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的美国，希望将中国置于美国的监督下进行重建，并且以之作为在战争中暴发的美国

资本和生产力的处理地。美国的垄断资本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衰弱下去，反而飞跃式的强大起来。美国的工业生产率从 1939 年开始到 1943 年 4 年间增长了 120%。欧洲各国在战争中出现了 2600 亿美元的赤字，而美国却实现了 420 亿美元的黑字。这种飞速增长的工业生产力随着战争的结束，不能不寻求新的市场。何况已干掉了多年竞争对手的美国垄断资本，想当然地认为取代日本成为中国市场的“继承人”是其当然的使命。

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推行的是加强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对立的方针，一贯带有强硬的军事性质。为与苏联相对抗，在朝鲜南部登陆、在菲律宾构筑军事基地、对日本国内保守势力采取稳定政策等，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干涉的前奏。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表面上还是打出了民主主义的旗号，因为他们相信通过帮助和强化国民政府便可以继承日本在中国拥有过的空间和地位。美国为了让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尽管按理说并不重要，但仍将 4 个军的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全国各地，为此投入了 3 亿美元的费用。这不过是美国和国民政府为牵制中共进行的共同作战。

不过，美国并不是白白地帮助国民政府。1946 年 8 月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通过成立美中合办的航空公司垄断了中国重要的航线。同年 5 月，签订了成都至重庆《铁路借款协定》，10 月签订了广东、汉口间的《铁路借款协定》取得了铁路维护和建设的权利。更重要的是 1946 年 11 月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以自由贸易主义为根据，承认美中两国拥有可以相互在对方国的领土上自由经商、经营的权力。

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家要与美国资本相对抗，在美国领土展开经营活动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只有美国资本确保了在全中国的领土上随意经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在租界那样狭窄的领土上经营的权利。

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该条约使中国的全部领土和全部事业都向美国开放了。”将国家事业毫无防备地委托给别人，这说明了战后国民政府是如何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转包人的。

中国作为战胜国全国上下正处于爆竹声声一片欢腾之际，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抢过接力棒的美国如前所述，正为成为下一个继跑者，在帝国主义的跑道上奔跑而做准备。蒙在鼓里的中国国民还把美国当作友邦来感恩戴德，而美国却置此于不顾，其实质不过是在生意场上挥动刀枪的企业家而已。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说决不是只限于 24 小时的帝国主义，而是永远的帝国主义，这点是没有什么可置疑的。

不过，中国并不只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的中国。不仅如此，中共还占领了更加广阔的地域，视这一事实如眼中钉肉中刺的美国，仿佛有高高的岩壁挡在眼前，成为其巨大的障碍。

心急如焚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赶到延安，在 1945 年 8 月 22 日将毛泽东请到了重庆。

直到 10 月 11 日为止 毛泽东一直在重庆呆了一个多月 并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其间，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政府方面的王世杰、张群就战后政治形态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议，但在这种时刻，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共虽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政权，但国民政府借口政令不能不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而坚持无法承认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的解放区的政权。

实际上，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在施放和平烟雾，把毛泽东请进重庆，另一方面则在抓紧进行内战准备。即使在把毛泽东迎接到重庆时，他也没有形成任何关于避免内战的具体方案。不仅如此，在会谈结束的 9 月 17 日 蒋还向前线的将领们下达了“剿匪”（讨伐共产党）的命令。

与此同时，阎锡山约 20 万大军侵入晋、冀、鲁、豫等解放区 但

遭到解放区的反击，反而损失了约 7 万兵力。尤其是，阎军将来投降的大多数日本官兵改装编入到国民党军中，昨天还是敌军的兵卒又被动员到新的内战中，如此荒唐之举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屡屡发生。

当然，认为中共没有为内战作准备之说也是不成立的。在解放区扎下根来的共产党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利用这期间为做好所有的准备也付出了心血，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重庆谈判避开了根本性的对立，毛和蒋作出了邀请各党派代表和知名人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模糊决定之后，二巨头便分手了。

在这一期间的 9 月 16 日，在香港的日本军向英国代表哈马德少将投降，英国国旗重又飘舞在香港，香港又回到了殖民地的过去。

国共会谈后，美国认为爆发内战对己不利，于是在 1945 年 12 月将马歇尔将军派到中国，担当起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重任。1946 年 1 月 10 日，马歇尔同国民党方面的张群，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达成了停战协定，但国民党认为该协定没有包括东北而将大军派到满洲。此外，各地国民党军还侵入到解放区，从 1 月到 5 月 20 日这一百来天的日子里，发生了大小 3675 次侵犯解放区的肆意行为，共调用了约 258 万兵力。

尽管是美国出面调停，但美国却并没有力量制止国民党这种一系列的无理进攻。

同时，国民党又着手破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早在 2 月 10 日，以各民主党派为中心在重庆举行了祝贺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集会。国民党指使流氓到会场捣乱，在骚乱中，有 60 余名知名人士受伤。接着，3 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反对修正宪法草案，决定政府委员全部由国民党人担任，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遭到否决。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用船和飞机将军队派到东北和华北，由于国民党采取了先派军队落脚再用武力维持既成事实的计策，各地都处于紧张状态中。1946年7月，民主同盟所属两名主张反对内战的教授在云南省的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同样在7月，国民政府不顾其他党派的反对宣布在11月召开国民党召集的排斥中共的国民大会。同时，国民党军开始在前线发动进攻，结果全面内战没能够避免而终于爆发了。

从根本上说，中国内战与美国对国民党的积极“援助”是分不开的。

据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的《中国白皮书》记载：“对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获得的外国援助约达22.54亿美元，其中约占90%逾20亿美元数额是美国支援的，采取的是赠与及租借形式。而且在美国的援助中，大体上以军事目的和以经济目的进行的援助各占一半。对日战争以后，美国赠与及租借总计相当于国民政府货币支出的50%以上。……不仅有采用赠与及租借形式的援助，美国还将大批军用和民用剩余资产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中国政府。另外，美国还派出军事顾问团援助中国政府，并放弃甚至让中方转用留在中国的军事物资。其价值尚不清楚。”

换句话说，中共在这场内战中面对的不仅是国民党，还要同美国的装备、美元和中国从属化政策相对抗。

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结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结束的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吧。

虽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以及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同时又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有4/5的人口卷入其中，1.1亿士兵

参战死亡者 2200 万 负伤者 3440 万(中国除外)其中 德国死伤 950 万 苏联死伤 1500 万。

14 年间 与日本打仗的中国受害极大。仅 1937 年到 1943 年 6 年间,军人在战争中的死伤人数为 562 万,被占领地区普通百姓死伤人数为 135 万 因空袭死伤人数为 76 万。

财产损失虽然无法准确计算,但据罗马教廷的调查,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损失约 4000 亿美元。在中国,据国民政府公布的财产损失为 154 亿元(约 50 亿美元)资源损失为 140 亿元。

另据统计 到 1945 年 5 月 8 日纳粹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时为止,战争带来了巨大灾难。

总共有 5529.4 万人死亡。德国 735 万,波兰 600 万,俄国 2000 万 美国 32 万 法国 53.7 万 英国 39 万 南斯拉夫 48.5 万,犹太人等在集中营中遭到屠杀的人数达 570 万。

现在,我们光是看这些单纯的统计数字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从一个个数字都是同我们一样的生命体这点,以及他们都是可以与之相互交谈,同欢乐共悲泣,与之分享友情的人这点上探寻出什么。让这些生命掩埋在人类历史中 或践踏 或弃之不顾 则是非常可怕的耻辱,而在挖掘、披露的同时又不能不感到这是人类共同的罪恶。

这,也许是不可饶恕的人类原罪吧。

关于中日战争有这样的统计。

在 8 年的中日战争中 日军官兵死亡数(包括满洲地区)加上在战争中因伤病死亡的人数,共 418420 名 伤者 92 万余人。

日本投降后,派遣到中国的日军逃兵有 2000 人,从国共两方面接收的日本俘虏,陆军有 1212 人 海军 40 人 民间人士 106 人,总计 1358 人。

1946年5月末，日军和侨民遣返回国的工作大部分已经结束。军人和侨民合计达1663860人。

我们稍微把话题转一下，在日本中国派遣军回归本国前后，汪精卫政权里曾名噪一时的与日协作者接接受刑。前一年12月王克敏已死于狱中。缪斌于1946年5月21日，陈公博于6月3日，褚民谊于8月23日，梅思平于9月14日，林伯生于10月8日，梁鸿志于11月9日分别被处以极刑。随后王荫泰、殷汝耕等也步其后尘。只有周佛海由死刑减为无期，好像是1941年后向国民政府通告自首帮了他的忙。

以上从统计的角度对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总结。

“人类好像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几个人为了活得更好一些便要不计其数的人赔上性命。”

日本人坂本安吾在《堕落论》中写道：

“战争结束了。特工队的勇士迅速成为黑市商人，未亡人打扮得像换了个人，心中已经没有了悲痛。人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找回了自己。人类是不能堕落的。人们活着，人们陷入了恶的深渊。抛开这条路，人们就没有解放人类的便利的捷径。”作者以此慨叹一夜之间精神的根基便因战败和占领发生了变化，露出了真面目。

这是爱好战争并以此为自豪的日本在战败之后的国民相。一切只为了生存下去，人生无常，也许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体悟到了真正的人类本能吧。

不，并不需要所谓人类本能以及人道这样的高调。如果邻里之间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样活着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战后，美国将远东政策的重点放在对中国的支配上。而且想通过扼制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来稳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为此，美国送去了大量的现代兵器，派去了大批军事顾问，提供了 20 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946 年 6 月 与美国的反共政策相呼应 蒋介石口出狂言 声称只要对中共军队发动总攻击，年底前即可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军队。

同年 7 月，国民党方面率先开始全面进攻之际，八路军和新四军统一为人民解放军，其兵力为 120 万，而国民党军队则有 430 万，加上美国的援助，其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

在内战的头一年，人民解放军避开了阵地战，诱使国军进入解放区。当然 必要的时候便给予有力的反击 迫使其流血 还对其军需线给予了打击。解放区到处都有民兵，民众对国民党的敌意极深，国民党军队没有后方的供给就无法获得口粮。

首先在东北，抢先下手的国民党军队以 30 万左右的兵力占领了 50 多座大小城市，占领了全东北 30% 的面积。1947 年 1 月 人民解放军利用国民党军队这种兵力分散之机，开始了反攻。

另外，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一度成功地占领了中共的根据地延安。这对中共而言固然是大事，但国民党军队很快就遭到来自各地的反击，不到半年就陷入到依靠空运军需品的困境之中，要继续坚守根本不可能。

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及被俘合计损失 112 万 解放军的损失也在 35 万左右。

与抗日战争不同，这场战争并没有出现对峙阶段。内战第一年 国民党军队处于攻势 人民解放区采取了守势 第二年 解放军

便转为全面反攻。总攻是从供给线最长的东北开始的。1947年9月开始的解放军秋季攻势，使国民党军队失去了15个城市和7万兵力，接着展开的冬季攻势又使国民党军丧失了16个城市和15万兵力。解放军在华北和西北也展开了反攻，国民党军队完全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处处孤立无援。同一时期，解放军三支大军约30万人越过黄河，扩大了解放区。同年年末，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建立了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

国共内战可以说不只是军队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农民战争。

国民党军队入侵解放区时一定要带上当地地主和流氓集团。他们在那里屠杀解放区的干部，重新收回被分配的部分土地。经过流血牺牲，在日军的铁蹄下坚守中国土地的贫农和中农再次被乡绅和地主夺去了土地和自由。仿佛是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再现，只是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

因为这个缘故，解放区的人民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共的尊敬，而且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和民主权力，他们不能不和中共一起拿起武器。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又是一场反对数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的农民解放战争。

国民党来后只要几个月就会出现比抗日战争时规模还要大的游击战。发誓为被害亲人报仇者、在强抢、重税下挣扎的人、逃避征兵者等都跑进山里，与村里留下的人们保持联络展开游击战。然后就会和中共领导人取得联系。

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作战之后的1947年10月，中共发表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的内容是‘废除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虽不是政府的法律，不过在约一年期间，有一亿农民结束了土地改革，农民们个个笑逐颜开。

与此相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内战使国民生活极度困窘。

进入全面战争之前，上海的物价飞涨至战前的5000倍，其后

数月物价直线上升。美国的借款主要用于购买军需品，国民政府靠增发纸币维持内战财政。1947年7月纸币发行数额达16万亿元，上海的米价从1947年1月起至5月止4个月期间长了5倍。

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发动总攻之前，上海约10万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和要求美军从中国撤兵的示威游行。

民族资本的抵抗也表现为与国民政府的不合作态度。这也是使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崩溃的原因之一。

不仅是学生、工人，市民和中小资本家也反对内战，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人反对蒋介石一派的独裁，并于1948年1月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国民的支持下，中共用缴获的武器和弹药改善了自己的装备，日益强大起来。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倡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连国民党左派都支持这一倡议。

到了1948年，在东北的要冲长春和沈阳，国民党虽有50多万美式装备的军队，但其补给老早就靠空运提供。10月锦州机场被夺之后，连空运都不行了。这时，长春守军的部分人为解放军作了内应，将解放军引入城中。看到解放军已入城，部队又丧失了抵抗力，长春守军才和平投降。美制武器和弹药虽堆积如山，但还是原封不动地落入了解放军手中。

得知长春守军投降后，沈阳国民党军准备撤退，但却无法摆脱解放军的包围。

就这样在10月逾50万的东北国民党军连一枪都没射正便全军覆没，东北战争就此结束。

东北战争结束时，解放军在徐州和南京之间切断了国民党军的退路，并进行了围攻。到第二年正月为止，这方面的国民党军遭到全歼，南京城也早已失去了防卫军。同年正月，解放军戏剧性地进入北平和天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成功地渡过了长江，向包括南京、上海在内的华南一带进击，解放了中国。

历时三年半的人民解放战争以解放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1949年5月蒋介石率领约50万军队逃到台湾。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侥幸在该岛维持着被称为“国民政府”的流亡政府，沦为美国牵制中共的势力。

在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军损失305万，其中死伤27.2%，被俘60.86%，自动投靠解放军的12.12%。由于士兵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因而很轻易改换门庭，又因全都是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相当于诞生了400万美式装备的人民解放军。

这对美国而言不能不是巨大的灾难，苦不堪言。美国国务院的《中国白皮书》有这样的记述：“在中国内战的结局令人难堪至极，已经超出了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

我想，美国政策的毛病似乎在于往往不是从对象及客观的立场出发冷静地把握事态而导致失败。

像用破漏的缸装水一样，明知道国民政府腐败透顶仍卷入其中的美国太愚蠢了。

就像既贪婪又顽劣的富翁一样，美国在中国内战失败后，在越南战争中因同样的原因再度失败，美国的丑态是够瞧的了。

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不仅在于八年抗战期间过分依赖外国势力，还在于清楚地暴露出其不与敌人作战的虚张声势、腐败和无能。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根本不同，400万的庞大兵力和装备在短短3年半期间便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各党派的拥护，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了有600余人参加的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的政

治协商会议。

孙中山的未亡人宋庆龄女士和昨天还是国民党阵营中的要员、蒋介石的忠臣的张治中、傅作义等也在其中。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有 6 名副主席和 56 名政府委员的中央人民政府。

1949 年 10 月 1 日，有 30 万民众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五四运动”示威的场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在这个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以铿锵有力地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宪法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建国目的和性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从被压迫者一跃而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公，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取代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独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经过 30 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终于从外国统治和国内封建统治下解放了自己。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泥沼的中国，经过 109 年逾一个世纪的斗争，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祖国。

中国的彻底解放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喜悦，也是东方人、有色人种，乃至世界全人类的喜庆之事。从这个意义出发，笔者衷心祝愿中国永远繁荣昌盛。

自清朝崩溃以后，中国终于诞生了拥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种货币制度，既不是皇帝政府，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政府，而是名符其实的人民选举产生的、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大大改变了世界政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6 亿人口离开了资本主义体制。社会主义阵营占据了

世界人口的 1/3。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推动了中东、近东殖民地或从属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结果使单一的世界市场倒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对垒转向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一面，对战后国际政局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对美帝国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尽管为时已晚，但美国扶植台湾当局和削弱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政策发生了 180° 大转变。并且将日本当作其在远东维持美英苏势力均衡的美国体制的伙伴及代理人。李承晚也好，蒋介石也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作为美国需要的人物登场的。

1950 年 1 月 26 日签订的《韩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就应该从这种意义上去认识。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以何种形态来填补由于纳粹和日军撤出而在欧洲和远东留下的真空状态。

在二战中蒙受数千万生命和物质损失的欧洲，由于东欧转到了苏联势力圈内，其势力均衡遭到破坏，美国负担增加了一倍。在远东日本败亡，朝鲜、中国东北直接与日本相对，美国只能单独承担这种问题和责任。

资本主义世界像患了动脉硬化一样衰落下去，一度以世界帝国自诩的英国因殖民地独立而失去了昔日的光采，开始走向没落。

只有美国作为强大的国家以代表资本主义的“世界宪兵”的面目登场，很难用上的核武器竞争将世界导入冷战之中。

看到美苏双方保存并大量生产原子武器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争，怎能不为人类的灭绝变成现实而感到恐怖和战栗呢！世界人口分乘着美苏操纵的两列对驶的火车，这怎能不令人惴惴不安呢？

新中国创造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词汇。这是针对二战之后苏联的扩张政策而言的，围绕领土权产生的中苏边境问题是中共从先

祖继承下来的很大遗产。中苏这种争端，使欧洲共产主义和在亚洲坚持的共产主义理念间出现了不和谐音，其结果意味着，在远东，虽然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但至今为止仍发挥着在亚洲阻止苏联势力及维护亚洲和平的作用。

让我们对中日近代史作一番整理和概括吧。

1840 年鸦片战争后 经过 1850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和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出现了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1919 年爆发“五四运动”从 1923 年到 1927 年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1927 年因蒋介石发动政变，革命的脉搏一度被白色恐怖所切断。不过，1931 年，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1936 年 西安事变爆发，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1937 年 7 月 7 日 中日战争爆发，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两年又进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代。1945 年 8 月日本一投降，马歇尔使团就出面调停国共关系，但内战仍然扩大 1949 年 5 月 蒋政权流亡台湾；1949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其间 100 年岁月流逝，洪秀全播下的革命种子，靠毛泽东结出了果实。当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事实，这结果离不开中国艰苦卓绝的历史和众多人民群众的牺牲这一宝贵条件。

最后提一下迁移到台湾的蒋介石流亡政权，当时蒋实行的恐怖政策和大屠杀有 5000 到 2 万人遭到杀害，而且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抢掠和强奸。

蒋介石通过 1927 年的政变成为南京政府主席后，到 1949 年流亡台湾，22 年间为保护地主、资本家的利益，享受着天子般的地位，成为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一个时代的独裁者。

同时，他作为买办资本家，为维护列强在殖民地的权益，忠实地执行其财产管理人和代理人的职务，是腐败政治家袁世凯的继承人，称二人为双璧恐怕也不会冒读中国历史。

八、朝鲜——李王朝

李王朝的建国

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王朝是在 1392 年 到因日本侵略而亡国的 1910 年 政权共维持了 518 年。

李朝开国是在 1368 年元朝灭亡、明朝朱元璋即位 24 年时 正值 14 世纪后叶开始到 16 世纪前叶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还是哥伦布 1492 年发现美洲大陆前 100 年的时候。

1335 年，李成桂出生于咸镜道永兴，高丽末期在与中国红巾军的入侵和倭寇（从 13 世纪到 16 世纪专门骚扰、抢掠中国和朝鲜近海的日本海盗）的战斗中立下功勋，开始作为军事领导人崭露头角。

早在 918 年 王建建立了高丽 在长达 475 年期间 将松岳 现在的开城 作为都城 到 1392 年灭亡为止，高丽朝留下了八万大藏经和高丽青瓷等不朽的文化财富。

但是，由于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族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从 1231 年后约 30 年间对高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侵略，使高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那以后，高丽王朝在元朝重压下经常受到很大的影响，日益衰微的高丽王室为恢复王权，在与元朝实现一体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历代国王都从元室迎娶正妃，所生之子将登上王位。而且 即位前为止 还要到元朝大都（北京）生活 作为人质以防

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朝内部出现了依仗元朝势力的亲元派，政局陷入分裂和对立的局面。

虽然说是蒙古族，不过自 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来，元人占领了人类历史上横跨欧亚的最广阔的领土，并对俄罗斯原封不动地继承那些领土耿耿于怀时，高丽朝选择亲元政策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

14 世纪过半后，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元运动。

高丽朝恭愍王趁机与新兴官吏联合，于 1356 年展开了反元运动，首先处置了亲元势力，并果断推行了停止使用元的年号，恢复官职制度，依靠双城总督府的武力排除元朝势力和收复旧地等一系列政策，将国内元朝势力一扫而光。元朝也没有余力进行武力报复，只能默认此事，实际上与元朝的关系已经断绝。

在为亲元势力作后盾的元朝衰退同时，恭愍王录用辛钝，采取了将有权有势者夺去的土地和奴婢归还给原所有者的积极政策。但是，1371 年，辛钝被反对这一政策的势力所杀害，三年后，恭愍王本人也遭杀害，没能取得充分的成果。

这时节，在亚洲，对元朝势力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汉族的反抗。那就是群雄蜂起的起义军。其中最强大的是红巾军。他们转眼间便席卷了全国，1359 年从满洲横扫到高丽。

没过多久，在 1368 年，朱元璋在那些派别中脱颖而出，中国诞生了明帝国。

残留在北方的元朝为讨伐明，要求高丽出兵。

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和恭愍王的死亡，高丽王朝分成向元派和向明派。向明派中有一个人就是在抗击倭寇中声名大振的将军李成桂。

李成桂作为向元派崔莹总帅的左右都统使之一并没有动什么

心机。为了帮助元朝，带着 5 万军队于 1388 年朝鸭绿江行进。虽然目的是攻击明朝的辽东，但看来对新兴的明朝难以取胜。为了逃避毫无必要的战争，士兵中的逃亡人数不断增加。进军到鸭绿江中心的威化岛时，李成桂重新拿定了主意，回师向高丽首都开城进军，赶走了崔莹等拥有大农庄的王室和企图守住权势地位的保守势力亲元派。并废了国王辛禑，立其子辛昌为王，一举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掌握政权的李成桂在郑道传、郑梦周、赵浚等亲明派的帮助下，阐明了亲明政策之后，废除了辛昌，1389 年拥立恭让王即位。

1390 年果断地推行了田制改革，破坏了保守派的根基。

其后等待自己的势力站稳脚跟的李成桂在新兴官吏和己派儒学者郑道传的拥戴下，杀害了反对此事的郑梦周，自任为王。

于是高丽朝灭亡，李氏朝鲜王朝建立。这是对王位的篡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变。

有趣的是，这一过程与埃及革命中将纳吉夫推出来而过后却由纳赛尔掌握政权的过程，以及将张都暎推出来的朴正熙最终由自己掌握政权的“五一六”军事政变的过程何其相似乃尔。

不过，王朝这东西，本来就不像通过合法途径更新换代的民主政治有获得保障的方法。纵观古今东西的王朝变迁史，只有实力者才有维持政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征服或是篡夺政权乃是历史的遗产，这虽属于异端邪说，不过作为正道，这反而是很理所当然的行动。

今天，民主主义国家采取的是根据宪法实行选举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靠的是由党选出的方法，后进国家往往采取的是非法的政变形式，即依靠武力进行政权交替，这是司空见惯的。从各种意义上说，政变虽然并不怎么光彩，不过，也不能说它是百分之百的权力恶，其中有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恶。

通过舞弊选举延长执政与依靠政变掌握政权从本质上说没有丝毫不同，无法认可的国民作出抗举，是国民根据其当然权利而进行的对强劾权优先的自主权的行使。

与其说这应该作为实际法定的权利，不如说更应该作为超法律的自然法的权利而得到保护。

李成桂掌权后首先着手的是田制改革即土地改革。就是将贵族所有的私田编为公田，缴纳收获量的 1/10 为国税。此举削弱了贵族们的势力，巩固了国家财政基础，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并通过给地方闲良（未做武官的武人——译者注）军田强化了李氏朝鲜的军事根基。

李成桂通过土地改革强化了自己的权力。

1393 年 2 月，李成桂登上王位的第二年，重新起用古朝鲜的名字改高丽国号为朝鲜 第二年 10 月迁都汉阳——今汉城。而且他还确立了统治体制，当初虽然接受了依靠贵族实行的合议制政治体制，但王权并不稳固。

李朝统治制度和文化的文化

第三代国王太宗是杀害了李成桂及其功臣们定下的太子后登上王位的，第七代国王世祖杀死了年幼的侄子端宗夺取了王位。

这反映了高丽末期新兴势力与旧势力之间对王位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代表旧势力的贵族遭到被清洗的悲运。同时，由贵族合议的政治制度也遭清算，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依靠两班官僚实行的中央集权统治体制。建国半个多世纪以后的 1469 年 编撰了国家基本法典《纪国大典》，以此为依据整顿了国家的统治体制。根据《纪国大典》当时的国家机构将文武官分为东西及京中央)外(地方 职 确定品阶 在中央的叫作议政府 由领议政 首

相)及左右议政三大臣为首。还有辅佐他们会议的左右参赞。其下有分担国务的六曹(部)即吏——内务户——财务礼——文教,兵——陆海军刑——司法工——农商务曹。另外还有作为国王秘书机关的承政院,根据王命审理案件的特别审判所议禁府等。

此外,在中央设置了论思机关弘文馆、监察官僚机关司宪府、以指出王命之误为己任的司谏院,与言论有关的这三个机关被称为三司,其中司宪府和司谏院又称为言官、台谏。

作为地方机构,全国细分为八道、四府、四大都护府、20牧、44都护府、82郡、175县。道设观察使——监司,府设尹——只有首都的汉城府为中央的官职。牧设使,郡设守,县依格设令或监。观察使(监司)作为一道之长统管和监视其他各级地方长官,各级地方长官由于直接接触百姓而被称为“近民”、“牧民”,但实际担负像草耙子一样收割贡税、赋役等民脂民膏上缴中央作用的是在地方长官手下做事的胥吏——衙前。

这种一目了然的关系,只要到现在汉城的景福宫或德寿宫的院子里就可以看到,那里有从正一品、从一品开始的多个荒废的花岗岩石柱。现在谁都可以去触摸,甚至用脚跟踢它几脚,但在不到一世纪之前,那可是极难近前观瞻的位置。为了站一站那个位置,有多少人费尽心机。

不过,支配那个空间的只限于贵族阶级。所谓士祸和党争也是围绕着微不足道的石柱展开的争夺战。在权贵们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反面,怨声紧随其后的石柱到了现在在成为李朝封建社会油光光的遗产同时,说它是货真价实的古董也不是虚言吧。

“那也不过如此呀!”这也许是那些良心永存的有限的人出于寂寥发出的慨叹吧。

在李氏朝鲜社会的统治层中有被称为“两班”的阶级,指的是

文班和武班两种身份，上级官僚的子弟拥有即使不通过科举也能做官的特权，而一般人则只有经过科举这样的考试制度才能被录取为文武官。

观察使和其他各级地方长官作为地方官由中央委派。观察使任期 1 年，其他各级地方长官任期 5 年，禁止到出生地赴任。他们负责征收税收，全权处理地方行政和司法事务，拥有广泛的权限。

我们从电影或历史剧中可以看到手执棍棒严刑拷打的场面，那是在王政之下的官吏连司法权都在握的情况下，刑吏们滥用私情和权利的残暴形象。

但是，那绝不是私刑，应该将它理解为执行公务的一种封建社会的象征才对。

在地方官的所在地也有相当于中央六曹的六房，其实务委派给地方土豪和乡绅，他们被称为乡吏。作为辅助地方长官、监视乡吏的机关，乡厅承担着其机能。

作为一种制度，16 岁以上的男子要带上名为“号牌”的身份证明书，令人不由想起今天的居民身份证制度。

武班作为中央的军事组织设有五卫，作为地方军事组织，道设有兵营（陆军）和水营（海军）营下设镇。

李朝社会结构是由两班、良人（也被称作常汉，有时也称常民、常奴）和奴婢构成的。两班是统治阶级，良人和奴婢是被统治阶级，奴婢为最低层。

奴婢在法律上是属于主人的财产，自由买卖自不用提，除生死之外的任何权利都掌握在主人手中，与欧洲的奴隶没有大的差别，属于贱民。

奴婢有国家机关所有的公奴婢和官奴婢，及两班、寺院、上层良人所有的私奴婢之分。李朝初期公奴婢达 20 万左右。

1894 年，自古流传的奴婢制度被废除。

良人是李朝社会人口最多的阶层，他们作为国家通过田税、赋

役、贡纳等形式进行盘剥的基本对象，还承受着军役这种最为可怕的重负。

从李朝社会的学制看，中央的汉城设有专攻儒教、朱子学的成均馆和中东南西四部学堂，此外，各地方设有一邑一校制的乡校。京、乡有专门从事职业或技术学教育的各种机关。

中央设有学习外语的司译院，学医学的典医监和惠民署，学天文、地理、风水和命课、占卜术学等的观象监，算学在户曹，法学（律学）在刑曹，画学在图画署，道学、道教在昭格署。

不过，在儒教一边倒的时代，这类关于技术的学问被蔑视为杂学，中等以下阶层的子弟大部分都学习技术学。

在宗教方面，在高丽朝曾经风光一时的佛教遭到排挤，儒教朱子学成为国教。其直接原因固然是由于拥立太祖李成桂的郑道传等人是儒学者，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儒教本身不仅是维护封建政治体制的恰当的工具，而且封建的身份制度与儒教的教化原理很合拍，因而作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原理再合适不过了。

君臣、家长从属的名分主义、尚古的事大主义、空洞的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等等落后思潮维持了李朝 500 年儒教所发挥的作用应该说是功不可没。

16 世纪迎来了儒教的黄金时代，李 颙（退溪）和李 珥（栗谷）脱颖而出，作为儒学大家形成了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集朱子学之大成。

与此不同的是，像徐敬德（花潭）这样的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儒教、朱子学的学者辈出，成为两个世纪后实学思想的先驱者。

在文化方面，李朝第三代太宗时，为普及儒教发明了铜活字，这惊人的成就令世人为之瞩目，同时也不能不提及第四代世宗于 1446 年首次制定的《训民正音》——“谚文”（朝鲜文字）。

以世宗大王本人为中心，六死臣之中成三问、朴彭年和崔恒、申叔舟、郑麟趾等集贤殿学者着手创造的这种文字在朝鲜文化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谚文”和谚语一起形成了民族的血脉，是朝鲜古代遗产中的重要部分。

无论生活在地球何处都保留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的人，可以说对我们历史和子孙万代尽心尽责，充满了对本民族的自豪与骄傲。

此外，《李朝实录》、《东医宝鉴》、《东国大地胜览》等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壬辰倭乱中使用的铁甲船——龟甲舰是与李舜臣将军的名字紧密相联的宝贵文化。

民乱、土祸、党争

李氏朝鲜自 1392 年开元以来，走过了 500 年的历程。那虽然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朝代，但决不会是毫无坎坷的康庄大道。民乱、土祸、党争等难以消除的内政危机，以及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线后东进的西洋入侵而产生的国难频仍。

在此让我们看一下内政上的重要问题。

由同一统治阶级内部的文武差别，庶子与嫡子的绝对差别和地方差别观等造成的不满，成为破坏社会安定的重要原因。

不过，与这种偏狭的恶习相比，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奴婢和农民等最底层百姓的如火如荼的反抗和叛乱，尤其是这种骚乱在整个李朝历史上此起彼伏。被称为“东学党乱”的东学农民战争从本质上看没什么不同。这往往就是构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流血的革命的历史要素。

在高丽朝，1126 年发生了中央权贵李资谦乱，1135 年，妙清和尚在西京（平壤）发动了近一年的民乱，农民和奴婢起义连续不断。

1175 年，以南部为中心发生的被称为“草贼”的起义持续约 30 年。一年前则发生了以西北平安道为中心的赵位宠之乱，初具规模。

到了李朝从 15 世纪上半叶到后半叶，李朝确立了统治体制，由此强化了对百姓的统治和盘剥。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为躲避盘剥，以逃跑来进行抵抗。1467 年咸镜道吉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斗争。这一斗争是为反对中央政权强化田税盘剥和与实行号牌法相伴随的军役而开展的，农民军处置了中央派来的官吏，进行了三个月的彻底斗争。

这一斗争使咸镜道全道的农民都卷了进来，其领导人是土豪李施爱。他本来是中央派遣的地方官，退职后在当地落户，成为支配大量土地和良人的大土豪。在各斗争的中心地，土豪有七八个，都是领导数十名农民的中小地主。就是说，地主阶层和农民联合起来反对国家权力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是早期农民斗争的特征。

咸镜道农民斗争虽然遭到了中央政府军的镇压，但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15 世纪后半以后，便在全朝鲜的广阔土地上广泛展开。作为小规模农民起事，其意图非常明确，农民们的抵抗就是为逃避赋役而逃亡。他们或流入城市从事工商业，或成为城市贫民或成为农村流民。15 世纪末汉阳人口因此剧增，物价飞涨。

在这种动荡过程中，地方的地主统治得以加强，渐渐地进入到中央的政界。如此形成的政治势力被称为所谓的“士林”和“儒林”。

士林的崛起使之与自古以来的上流两班贵族之间形成了摩擦。15 世纪末起，二者之间的政治对立激化。两班贵族被称为勋旧派，他们对士林进行了严厉镇压，这被称为士祸。由 1498 年的戊午士祸开始，1504 年发生了甲子士祸，1519 年发生了己卯士祸，1545 年发生了乙巳士祸，约半个世纪期间竟发生了四起，每逢士祸，就有很多士林遭到杀害。但是，勋旧派却无法彻底清除士林。

作为士林根基的有地地主、带品土豪阶层于 15 世纪末开始动用武力扫除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勋旧派的干涉，扩大了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地主统治，不仅如此，他们还用武力掌握了地方的统治权，中央派遣的地方官落入无法采取任何措施的地步。

到了 16 世纪后半，士林将勋旧派赶下了台，掌握了政权。但是，以地方势力为基础掌握中央权力的士林政权，由于别的地方势力的强大而处于不安定状态。各地地方势力以书院为据点，订立了乡约，形成了朱子学理论上的派别基础党派。书院代替了乡厅。从 16 世纪后半开始，以地方两班为中心的地方统治机构得到了很大发展。

形成党派的地方势力为争夺中央政权互相厮杀。这被称为“党争”从 16 世纪后半开始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前半。其间，中央统治机构虽然削弱，但以国王为首的两班官僚统治体制并没有崩溃，仍在延续。只是两班的主体变成了士林。随着权力主体的变化，社会结构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这是作为政权主体的两班的内在变化，及与西方文明接触所产生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带来的变化。

李朝政治斗争的主体是被称为士林及儒林的官人或准官人阶层。九代王成宗盛世结束后，士祸便表面化了，那是暴君燕山君四年（1498 年，戊午年）发生的事。

儒臣金宗直及其门下金弘孙等新兴士林派一进入中央，就遭到以柳子光为中心的勋旧派的猜忌。他们在编纂《成宗实录》时发现金弘孙当史官时将世宗篡位和勋旧派的坏事以及金宗直写的《吊义帝文》记入“史草”（《朝鲜史记草稿——译者注》中，于是便向燕山君告发了此事。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由于告密者心存不良，金弘孙、权五福、李穆等与“史草”有关连的士林及金宗直弟子等 40 余人被处决或流放。该事件是四大士祸中的第一次士祸，因起于“史草”问题，又被称作“史祸”。

接着在燕山君十年（1504 年甲子年）金宗直一派 10 余人又遭处决。

该事件起因于燕山君之母废妃尹氏复位问题，赞成废除尹氏

的尹弼商等人被处死，韩明浚、郑汝昌等被剖棺斩尸，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刑罚。

这两起土祸都是燕山君时发生的事件，金宗直是高丽末期儒教学者吉再的衣钵传人，其门下名士辈出，由于崇尚朱子学的纯洁性而排斥其他派别，招致很多朝臣的反感而惹祸上身。

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径是从私人感情出发肆意妄为的行为因而历史上留下了“暴君燕山”之说。

经过两次土祸，金宗直一派的势力虽被肃清，但官僚们的抗争并没有中断。

中宗在登上王位 14 年的己卯年（1519 年）将以赵光祖为首的数十名大臣处以极刑。

中宗改革了燕山君的暴政，在起用被驱逐的儒林同时，大力奖掖朱子学。赵光祖以儒教为政治和教化的根本，为实现王道政治，设置了贤良科，通过该科，由年轻书生组成的赵光祖一派得到朝廷的大举任用。他本人也年仅 38 岁便担任了大司宪的要职。这引起了勋旧派郑光弼等人的反感，而且赵光祖一派以中宗的反正功臣中选拔了没有资格的人之名剥夺了相当于 3/4 的功臣称号。对此深感震惊的勋臣们不择手段，蓄意阴谋中伤。他们利用洪景舟的女儿为中宗的熙嫔这一点，无中生有地向中宗密告赵光祖在做着除掉功臣之后自己当国王的美梦。因而，很多人遭处决，或入狱，这时，千余名儒生聚集在光华门外上疏赵光祖无罪，他们进入宫廷嚎啕痛哭。虽然大王命令逮捕所有的人，但他们纷纷争先恐后冲到前面自请入监，使监狱人满为患，没有收容之处。

其后，大臣间的争端并没有结束，明宗元年（1545 年即乙巳年），尹任一派大臣由于尹元衡一派的阴谋而遭受极刑。

该事件是王的外戚坡平尹氏势力之间的较量。中宗过世后，仁宗一即位尹任便得势，但第二年 7 月仁宗早逝，明宗即位。这次，尹元衡一派得势，施展阴谋手段，杀害了以尹任为首的包括领议政

柳灌在内的十余名书生。其后五六年，又连续杀死了百余名书生。

以上四次士祸的共同点是，全都与国王和王后相关连。因此，败者便沦为叛逆者，毫无抗辩的余地。而且该斗争不是政策上的论争，而是关系到谁能掌握权力谁将被杀的血腥斗争。

这种围绕着两班官僚展开的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社会的暗斗虽说是以宫中为中心的政治斗争，不过，这种暗斗自然转变成围绕如何解释作为御用学说的朱子学学说上党派间的争端，具有了政党形态，既是理论斗争，同时又是为掌握中央政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

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况。通过大规模的清洗，反对派别被扫除后，政局一度得到安定，但过不了多久还会出现反对派，政局又陷入了不安。在这种不安定的抗争中，拉帮结伙现象严重，形成了“朋党”。他们不过是以强有力的首脑为中心，收罗党徒，扩大自己党派的权力，排斥其他党派的团体。这种团体不断壮大，逐渐发展为拥有不同党人的组织。

形成这种面貌的朋党进入相互斗争状态是从 14 代王宣祖初开始的。一方首领沈义谦作为明宗王妃之弟担任着大司宪的重职，而另一方首领金孝元是乙巳事变的胜利者尹元衡的亲戚，作为师从金宗直派儒学的才子，成为左右官吏任命的谗郎。以二人为中心，官人儒生结成党徒，以保护自己的派别和立身出世，开始排斥其他党派。因金孝元家在城东，沈义谦家在城西，所以金一派被称为“东人”，沈一派被称为“西人”。当时的士林、儒林投靠到东西某一方，相互论道天下和国家大事，以政权为中心展开流血抗争。到了李朝末期，朋党的对立和分立给政治外交带来了很大影响。壬辰倭乱及丙子胡乱导致国难时，党争也产生了很深的作

用。他们一方如果获胜掌握政权，就会将另一方当成叛逆党徒而放逐肃清；反对派如果取胜则采用相同的方法，如此你来我往，无

休无止。同时 东人和西人又分裂为南人、北人、大北、小北、骨北、肉北、少论、老论等等派别。

如此纷繁的朋党之战使政局变化错综复杂，对反对派的清洗出现了一下子要处死数十人甚至数百人的惨相。不过，由于无法斩草除根，在躲避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复仇，重演流血事件。

这种朋党的分裂和斗争形成了李朝政治史的特色。

当时统治阶层耻于劳动，连经营都交给奴婢，自己则过着消费生活。因此，即使是外乡同宗，只要生活在那里都不过是游离于农业的消费者。依靠贱民劳动的不劳而获的消费者阶级形成宗派，他们在书院里学习。而且 他们被称为“两班”是与农民生活在不同世界的特权阶级。

这种忌避劳动专事消费的风气、与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和朱子学的教理相关连，将优裕的时间都用在埋头于党派与政治斗争中，这成了李朝政治史的主流。

到了 18 世纪中叶，出于两班统治阶层不团结就无法与新兴势力对抗的危机感，英祖严令停止党争，这就是所谓的“荡平”政策。但是，政治斗争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一代代外戚掌握政权的强权政治不合理的血缘原理成了组成新政权的原则。这种姻戚政治是导致李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到与土祸、党派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民乱和外敌入侵上吧。

前面我们谈到过李施爱起义的情况，1453 年发生了李澄玉起义。

该事件是李朝建国后首次发生的事变。瑞宗时庆尚道出身的李澄玉任咸吉道相当于今咸镜南北道 鄚节制使 首阳大君 世祖——译者注 杀害金宗瑞、皇甫仁 成为领议政后 强行解除受金宗瑞推荐担任前述职位的李澄玉之职，朴好文继任。李澄玉察觉自己

成了中央政变的牺牲品，于是便杀死了朴好文，带兵移到钟城，举起了反朝廷的大旗，他收容女真族人，自称大金帝。后遭钟城判官郑种的夜袭而被杀。金本是被元朝所灭的以前女真的国名，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此名，反正如果不是顺应了地方百姓的正当的不满心理，李澄玉自称大金皇帝就不会有人响应。

在封建社会，阶级差别及中央和地方有别的地域差别等怪习是引发民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世祖以后完全中断了对咸镜道人的任用，这导致李施爱之乱和李澄玉之乱。同样，进入李朝后，起用官吏之门对以平安道为中心的南西北人也关闭了，这引发洪景来之乱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1589年，壬辰倭乱前三年，爆发了郑汝立之乱。

郑汝立出身李栗谷门下，名望很高，栗谷死后曾做过修撰官员。由于宣祖看他不顺眼而回到故乡晋州。在那里与很多书生作了接触，名声大振，因而便隐约产生发动暴乱夺取政权的野心。于是他组织了大同契，纠集了志同道合的人，定下了1589年冬天在全罗、黄海两道同时举兵，并一口气攻打首都的计划。安岳郡守李轴探知该计划后向上作了报告，许多人被抓并遭处决。

该事件被称为“己丑狱事”。湖南被称为叛逆乡，因此，该地域出身的人一度升不了高官。郑汝立与儿子郑玉男一起逃到镇安竹岛，后在官军包围之下自杀而死。

还有一次民乱是1811年（辛未）23代王纯祖治下12月平安道一代发生的洪景来之乱。

洪景来是平安道龙冈郡多美面生人，因不满于朝廷对平安道人的歧视政策，利用金氏强权之下官吏腐败不正严重，加上灾年民心动荡之机策划了起义。他周游各地，联合富豪和名士，招集以郡内矿山为据点的流浪贫民，使之武装起来。收罗了金士用、禹君则、李禧著等人，自认平西大元帅，金士用为副元帅，于旧历十二月十八日起事。

起义五六个月便波及到清川江以北的博川、定州、龙川等八个邑。他们虽然试图向官军的据点安州发动进攻，但因遭到官军的伏击而败退，在定州城死守。尽管对包围的官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却陷入了粮草危机中。第二年4月19日官军用炸药炸毁了城墙，进入城中。起兵5个月，守城100日的洪景来中枪而死，禹君则等多数人被押解到汉城处死。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来自极度衰微的李朝末期政治社会不安中的民众抗举。尽管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但它却激发了全国各地农民的起义。

尤其是没有超出过一郡范围内的农民起义扩展到了全道范围，数千名农民与土豪集结形成的规模有力地冲击了王朝统治者，使全国农民增添了勇气。

洪景来农民起义80年后发生了甲午东学农民起义，而后义兵斗争、“三一运动”祖国独立运动、解放后的学生抵抗运动延续了这一血脉。

这些起义的共同特征是，贵族、富豪等形成上流阶级阶层的士林总是站在权力一边，农民、贫民及普通大众则是起义或独立运动的主体，这点没有丝毫差别。今天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之分，我们虽然从意识形态上去分析，但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时代怎样变换，这片大地的主人，抛开与庶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便无从谈起。

笔者在五六岁时曾枕着爷爷的胳膊倾听读过《三国志》的祖父所讲关于刘备、张飞、关羽、诸葛孔明的古代中国故事。这样的时间是有一阵子的，但准确的时间却无法弄清，经常是爷爷摘下花镜、枕着木枕就沉入了的午睡之中。

这时的我作为跑腿的和说话的伴儿也许不过是爷爷的一个玩

具而已，我从没有听爷爷讲起关于壬辰倭乱的故事。

长大以后慢慢就知道了这件事，驻扎在盖马高原一带的洪范图义兵队长麾下车道善部队部队长、我们的近亲太阳郁在 1907 年被倭兵杀害，由于这个缘故，日子过了很久很久，我们家族都成为监视的对象。

爷爷想把这伤痛隐瞒起来不告诉年幼的我们，也不想讲述有关壬辰倭乱的故事。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知道生活在日帝统治下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壬辰倭乱

从高丽末期到李朝初期，日本倭寇对我国沿岸的掠夺严重，不过自从足利幕府成立后，因幕府的统制，倭寇藏起了行踪。其后两国间和平贸易盛行。但到了 1544 年，日本的足利幕府没落，日本迎来了战国的纷争期。摆脱了统制的海盗以比前期倭寇更大规模的势头掠夺东洋沿海各国，朝鲜受害也很严重。由于倭寇的活动，朝日两国中止了正式外交。

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大体与欧洲发达的北欧海盗相仿，也是以岛国为根据地给周边国家带来苦难。

过了一段时间，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出现宣告了日本战国时代的终结，封建秩序重新确立，倭寇也销声匿迹。

但是，日本人的海外进出和贸易在统制下仍然盛行，特别是丰臣秀吉对扩大贸易倾注了格外的关心。他并不满足于和平贸易，而是更进一步，计划侵略大陆。第一阶段是与朝鲜建交，想以朝鲜为先导侵略明朝。宣祖二十年（1587 年）通过对马岛的宋氏向朝鲜转达了上述内容，并向去日本的使节直接作了转达。

这时，朝鲜正处于统治阶级党派斗争严重，政治混浊的文弱状态，国防政策根本没有确立。特别是当代名儒、有代表性学者李滉

(退溪)和李珣、栗谷等提议应充实国防。栗谷还向宣祖请求建 10 万大军，但都没有被接受。

这时，朝鲜的军事组织采取的是将全国的民丁当成府兵，冬天农闲时节接受训练成为卫士的兵农一致主义，并没有形成像样的军队。

与此相比，日本约 130 年间处于战国时代，熟悉战争，而且将战国诸侯的强大武力放到国外，从对自己的地位产生的影响来看也是有利的。

尽管情况如此，朝鲜却没能作出决定，没有给丰臣以肯定的回答。

丰臣秀吉看到与朝鲜的交涉未能如愿取得进展，便决定作为征明的第一步侵略朝鲜。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即 1592 年 4 月 13 日，日本派 15 万大军在朝鲜南部登陆，5 月 3 日占领了首都汉城。接着 6 月 13 日平壤沦陷。

这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衰弱和社会腐败所致的国民缺乏团结、防卫不充分的缘故。特别是实行非正义进攻的日军拥有朝鲜方面所没有的鸟铳，由于其军事方面的优势，短时间内便扩大了侵略。

这种没有大义名份的侵略战争使朝鲜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朝鲜宗主国明朝为解救朝鲜派出了援军。第二年正月，辽东提督、大将李如松率 4 万军马进攻平壤，夺下开城后，杀到首都，但在 1593 年 1 月碧蹄馆战斗中失败，撤回平壤。日军在汉城等候明军南下，形成对峙状态。

官军遭到了如此惨败，而更有甚者是申砬放弃鸟岭战斗及留都大将李阳元和元帅金命元临阵脱逃。这种卑怯的态度，卖国的行径实乃奇耻大辱。

大王御驾避难途中指着随行的宰相们斥责道：“平日你们受国

家俸禄，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且不说国家，就是对百姓你们能瞒得过去吗！”不过，可惜的是，如果大王平时也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决断力岂不善哉！

结果大王丢下百姓，一直避难到义州。

与官军这种丑态形成对照的是义兵的英勇无畏。领导义兵的虽然主要是赵宪、郭再佑等在地方两班、土豪，但其支柱还是农民。奴婢也不少。义兵称号为倡义军。

他们的战斗主要是游击战，除农民军外，成为八道十六宗都总摄的西山大师领导 5000 义僧参战一事及四溟大师与义僧一起杀入战场，都是引人注目的事情。在排斥佛教、以儒教为国教的时代遇到国难而冲向战场的爱国心令人震惊。

1593 年 2 月，在背水而战守卫幸州山城的权慄将军的故事中有妇女们的浴血奋战，有在晋州矗石搂抱着敌将投入水中同归于尽的论介的忠节，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民族的骄傲。

日本虽然在陆战中作战暂时获得成功，但海战却陷入苦战之中。将本营设在丽水的全罗左水使李舜臣指挥铁制龟船组成的龟甲舰队，出击玉浦、唐浦、闲山岛，敌人的水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供给陆军的供给线被切断了。

1593 年。李舜臣因战功显赫成为水军统制使，海战的胜利使战局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只是嫉妒李舜臣功劳的元均阴谋陷害了舜臣。因为这个缘故，身处乱世指挥作战的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被议禁府道吏逮捕入狱。正当李舜臣面临死刑危机关头，由于判中枢府事郑琢一人的反对侥幸免死削职降为一兵应征从军。

其老母在牙山闻讯，承受不了这一打击溘然长逝。侥幸获释的李舜臣在从军路上经过牙山只是得以穿上孝服便径直到权慄军中从军。

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因穿丧服从军又称为“白衣从军”。

最近，搞政治的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动辄声称要“白衣从军”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亵渎忠武公李舜臣忠节的厚颜无耻的行径。

1597年8月7日排挤李舜臣后成为水军统制使的元均在闲山岛战斗水军覆灭后与全罗右水使李亿祺一起战死。闲山岛败讯传来，朝野为之震惊。9月日军乘势攻陷南京。群臣惊慌失措，而金命元和兵曹判书李恒福则悄悄进言：“这是元均的罪过，只有起用李舜臣重新任命他为统制使，此外别无选择。”王依计而行。

复职为统制使的李舜臣在珍岛碧波亭下击溃倭贼，击毙敌将马多。当时经过清点，兵船只剩下10几只。

1598年8月15日李舜臣怀着决一死战的悲壮决心在鸣梁大破敌军大部队，重新掌握了制海权。这时丰臣秀吉死亡，敌军撤退了。为了不错失良机，1598年11月18日李舜臣在露梁战斗中击毁敌舰300余艘，大获全胜。然而不幸的是李舜臣将军身中流弹壮烈牺牲。

当时他54岁。

他是壬辰倭乱中独自支撑国家命运的民族英雄，他成为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领袖，功勋卓著。

他是朝鲜的一位军神，被誉为圣雄李忠武公，作为孩子们推崇的榜样，在童话中获得了永生。

有关壬辰倭乱，忠武公李舜臣将军写下的《乱中日记》和当时领议政柳成龙写的《惩瑟录》都是很好的记录。

让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1593年4月20日李如松收复了首都，5月追击敌寇一直到闻庆便收兵回撤。那年10月避难的国王也返回了都城。

明军和日军在陆上处于对峙状态，战局没有进展，于是，两国之间开始萌发休战之意。但是，因为双方立场的差异，和议破裂。

宣祖二十九年即 1596 年(丁酉年)丰臣秀吉下令再度出兵, 14 万日军再次出动。然而, 在日军发兵的同时, 明朝也派出水陆两军到朝鲜, 朝鲜的军备也得以改善, 在防卫上也下了功夫, 因而日军并没能取得像首次出兵时那样的战果。日军到达汉江一线时已是初冬季节, 日军不耐寒冷, 退回到庆尚道和全罗道沿边地带。明朝 15 万大军南下向日军占领地发动进攻。

正值日军连连苦战之际, 丰臣秀吉死亡, 留下了中止侵略朝鲜的遗言。当时 明军在泗川战斗中败北, 也无心恋战, 于是 两军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1598 年末, 两军全都撤离了朝鲜。

日本的侵略战分为一、二两次, 也区别为壬辰倭乱和丁酉之乱, 合起来统称为壬辰倭乱, 是在这块土地上展开的前后长达 7 年的大战。这是朝鲜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 朝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日本虽然发动了这场大战, 但结果只是没有实现战争目的及撤走兵力而已, 并没有蒙受多大的损失。而由于这场战争, 全部国土都成为战场的朝鲜受害程度悲惨之极。由于日军的兵祸, 人死了, 土地荒废了, 在日本军政统治下, 百姓承担着艰苦的劳役, 来援助朝鲜的明军暴虐的行径犹如雪上加霜, 对朝鲜的蹂躏不亚于日军。

明、日数十万大军热衷于玩火, 成为战场的朝鲜尽管蒙受了巨大的战争灾害, 但却无处喊冤叫屈。城市、乡村一派荒废凋敝景象, 为避战火四处逃亡的难民和断了口粮的饥民们, 还有袭击他们的盗贼及利用政令混乱之机为所欲为的官吏和胥吏们的罪行等等交织在一起, 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混乱不堪的状态下, 由于土地大帐和户籍的消失, 连租税和赋役都无法课征。政治、经济、社会整体一时都失去了秩序, 重建工作极为困难。从这时开始, 李朝便迅速走向衰退。

特别是不仅众多文化财产流失无处寻找, 而且对前来救援的明朝的从属和事大化的加深更使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对明朝而言，这一战争也使其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已经走向衰退的明朝由于调动大军，财政困难的情况进一步加剧，百姓的不满使其更快地走向灭亡。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满洲守卫队被派往朝鲜，满洲的女真族利用明朝对满洲统治削弱之际开始活跃起来，创立清朝的根基开始形成。本来没有预见到倭乱会带来这样的变化，但它却对东方政局产生了很大意义。

日本也由于丰臣使国民生活凋敝，削弱了封建诸侯的势力，德川家康很容易便征服了国内。

另外，从朝鲜掠夺来的文化财产及掳掠来的五六万名劳工及陶瓷工、活版工、学者等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润泽。

德川政权成立后，日本希望与朝鲜建立和平外交。但是由于创伤难以愈合，直到 1607 年两国关系才得以恢复，到明治维新到来为止一直维持着和平外交。

镇压胡乱和天主教

壬辰倭乱造成的伤口尚未愈合，党争的火焰已经开始升腾。宣祖之后进入了光海君时代。由于卷入党争之中，太后红穆大妃被幽闭在西宫，政治随之紊乱，招致仁祖政变。平安兵使李适因对论功行赏的结果感到不满，而于 1624 年发动叛乱，夺取了首都，但在张晚率领的官军反击下败北。

这时节，大陆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女真族以前建立过金国，曾威胁到高丽，但在元朝的压制下受到削弱，元朝灭亡后仍屈服在明朝统治之下。但是，明朝后期统治力削弱后，女真族势力便开始逐渐兴起。特别是在壬辰倭乱时，利用明朝满洲守备队出兵留下的空间，女真族的活动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种变动之中，努尔哈赤于 1616 年建立了后金国，在与明军多次交锋后终于 1625 年迁都沈阳。这是李适叛乱的第二年。

在此之前，朝鲜接到明朝的命令出兵满洲，尽管对后金发动了攻击，但却以失败告终，之后便采取了不加入明和后金任何一方的中立的外交政策。光海君的王位移到仁祖手中后，一直保持的观望方针转变为向明排金政策。此举当然刺痛了后金的感情。

此外，在辽东的明朝将领毛文龙移驻到朝鲜西北的椴岛，威胁着后金的背后。在朝鲜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同时，后金感到了不安，并且为了从正面向明朝进攻，首先就要除掉朝鲜和毛的势力，这是绝对必要的。

这时，在李适之乱中逃往后金的残党告知后金仁祖继位的不当性，希望作为侵入朝鲜的先导。后金判断这是绝好的机会，便以为光海君复仇为借口，于 1627 年 1 月 14 日入侵朝鲜。这就是丁卯胡乱。

金军一部分进攻毛文龙的本营椴岛，主力南侵。朝廷丢弃首都到江华岛避难，但双方都希望讲和。两国以维持兄弟般的关系，今后也不背叛明朝为条件签订了和约，后金由此撤军。

第一次入侵就这样结束了，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后金为了进攻明朝向朝鲜施加压力 强行索要粮食 要求朝鲜提供兵船、征集军兵 等等。

其后，后金占领了蒙古一带，太宗称帝，1636 年改国号为清。

这是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二十年起，直到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为止，276 年间满族（一名胡人）统治中国的起点。当然，明朝灭亡，清朝迁都北京开始统治中国是 8 年后 1644 年的事。

太宗成为皇帝，改国号为清的消息，由龙骨大和马夫大作为使节也告知了朝鲜。但是，仁祖到了这时候仍忘不了对明朝执“事大”之礼，尽管有崔鸣吉等对清主和派的劝告，但仁祖仍拒绝召见

清朝使节连国书也未接受。不仅如此，还向八道下发了《宣战书》，表明了敌意。

面对这种情况，清朝于1636年12月2日派10万大军从沈阳出发，年末在汉城近郊展开了肉搏战。国王同朝鲜的1.2万军队一起躲到南汉山城，但在清军的包围下，粮食紧缺，根本无法取胜。最终按照崔鸣吉的主张打开了城门，正月30日，国王和王太子在设在三田渡的受降坛上蒙受了行降礼的耻辱。

壬辰倭乱之后，根本没有可以战斗的余力，毫无胜算还要虚张声势，这不能不是王朝的重大失策。由此导致与明朝断交，不仅王子和大臣入清为质，作为清的属国，还要行臣礼，并答应在攻明时派遣援军。

此后，与清朝形成了“事大、宗属”的关系，这意味着在外交承认了形式上的上下关系，而在内政上却又保持了自主性的关系。为了遵守事大原则，每年都要派使臣进贡。

此难称作“丙子胡乱”。壬辰倭乱后尚未恢复元气，却又经历两次胡乱，其受害程序不亚于高丽时代由蒙古、元所造成的灾难。

特别是农村荒废，农民流离失所，四处飘泊，旱灾、水害、瘟疫横扫全国，在显宗时代的1671年发生的大饥荒中，死于饥饿和热病的人数比两次胡乱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而且匪患横行，盗贼猖獗。

1812年的洪景来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这种天灾、饥饿、乞讨、瘟疫、流浪、盗贼、叛乱等不安定现象成为社会痼疾。然而，却没有令人满意的妙药良方能够解救，绝望的空气笼罩着荒芜的农村。

在这种绝望的社会气氛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基督教开始悄然潜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开始抓住了知识分子的心，后来则逐渐渗透到下层百姓之中，现世梦难圆的人们在外来的指示下做

起了天国的美梦。但是，基督教虽然能给人天国之梦，却无法改善农民现实的生活，农村的荒芜、黑暗、饥饿依然如故。

基督教首次进入朝鲜是从派往清朝的使臣带回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射击学等洋学时开始的。而最早加入天主教接受洗礼的人是 1783 年去北京的李承薰。

与以封建社会身份制度和忠孝思想为基础的儒教的从属世界观相比，以个人平等和自由为基础更信仰天主而不是祖先的基督教教义，对当时社会制度而言是异端，对人伦而言是邪教。李朝视之为对自己政权有威胁的批判势力是理所当然的，1786 年颁发禁令也是正当的。但是，其势力却日益扩张。于是，朝廷采取了镇压政策，金范禹等人被发配，很多天主教书籍于 1785 年被付之一炬。

1791 年（正祖十五年）发生“辛亥邪狱”，1801 年（纯祖一年）发生“辛酉邪狱”，有数百名天主教徒殉教。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神父仍然来到朝鲜，教会的势力得到了扩张，朝廷为之震惊。1839 年（宪宗五年）发生了包括 3 名法国传教士在内的无数信徒被处死的“己亥邪狱”。尽管如此，1845 年，金大建成为第一位朝鲜人神父，在传教中，于 9 月被处死。其后在大院君执政的同时，镇压进一步加剧。1866 年（高宗三年）发生了“丙寅邪狱”并引发了“丙寅洋扰”。其后大院君失意，以 1882 年与美国签订修好条约为契机，天主教的活动获得了自由。

结果在李承薰受洗后 100 年间 8000 余名信徒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基督教终于扎下了根，屠杀信徒的地方也成了圣地。

锁国政策和实学思潮

李朝社会通盘都是与中国以及日本的外交关系而产生的伤痕，并产生错觉，以为这一文化圈便是世界。统治社会的两班贵族

将儒教当成垄断物，对世界大潮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视而不见，就像井底之蛙一样埋头于党争之中。在“东方礼仪之邦”的从属道德的藩篱中，10年前也好，现在也好，以在观念上以及社会制度上没有大的变化而自诩。

然而 鸦片战争后 宗主老大国清朝在英、法、美、俄等国的侵略下滑向殖民地之路。

李氏朝鲜看在眼里，尽管深知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承担的重量是沉重的负担，但却又孤苦零丁，独木难支。

朝鲜顽固的“锁国政策”就是从这种情况出发制定的。

只是到了 17、18 世纪，与终日沉溺于对御用学问极端、抽象的思辨和烦琐、精研到毫无必要程度的‘礼仪论议’相对照的是 实学思想的出现。

实学派与空洞的儒教或朱子学不同，对自然与社会非常关注，并进行现实的、理性的及科学的探索。因而 以“实事求是”为本 在超越御用学问的思想的冒险同时，也为市民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这是对锁国政策的反动，是西方学问在王统治下的兴起。

实学思想的先驱者是 17 世纪的李睟光（芝峰）和柳馨远（磻溪）。前者对自然和社会的所有事象都表示出积极的、理性的关注，形成了致力于真正吸收了经由中国的洋学知识个别科学的源流。而后者作为《磻溪随录》的作者 在经历了倭乱和胡乱之后 对国防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形成了民族主义源流。

到了 18 世纪前半，李瀾（星湖）在学问上集二人思想之大成，在其门下，专门从事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所有领域个别科学的学者辈出。

18 世纪后半是各式各样的社会、政治理论百花齐放的时代。朴趾源 燕岩 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 以西学丰富的知识批判、讽刺不合理的迷信思想和封建身份制度，特别提倡振兴工商业。

丁若镛（茶山）通过流配生活的亲自体验认识到贫农生活解体状况是最大的问题，因而提倡使全体农民平等生活的理想社会的基础单位“ 闾田制 ”。内容为一个村子里的农民共同耕作、劳动 分配所得，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方式。

这种学问的变迁，使在学识与身份密不可分的朝鲜封建社会，作为特性与学问相隔离的常民、奴婢学学问的机会也扩大了，渐渐地，农民也可以出入庶民教育机关书堂了。

尽管学问越来越普及，但要改善一个社会制度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奴 隶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的足迹。 1776 年，美合众国发表了独立宣言。其后经过法国革命，当时的普鲁士才开始解放农奴，第二年，美国废除奴隶贸易。1831 年哲学家黑格尔去世那年“主张无条件解放奴隶”的《解放者》在波士顿发刊。

10 年后的 1841 年 法、德、俄、奥在伦敦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法》。1848 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前几天的那年 4 月，法国以二月革命为契机废除了奴隶制度。 1861 年 俄国制定了《解放农奴令》，1863 年，林肯总统领导的美利坚合众国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这是美国从殖民地解放出来后 87 年的事。

不过，奴隶制度并没有完全从地球上消除。只是在法律上，奴隶这种身份制度消除了，但仍有人过着残酷的生活。

朝鲜虽然没有奴隶制度，却有奴婢制度。1801 年废除了公奴婢，使他们拥有了良人的身份，但私奴婢的最终废除却是 1894 年

的事比美国晚了 30 年。但是“奴仆”一词至今仍具有生命力。

这种奴隶制度不应该从一个侧面去考察，作为一种制度，应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去理解，只有这样才会对理解过去有所帮助。

耶稣基督背负起十字架之前很久，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毫无疑问是依靠奴隶制度的力量创造的。

又由于封建社会的土地经济需要奴隶制度，因而，我们不应把它理解为不可避免的社会恶，而应该理解为宝贵的农机具。

到了 18 世纪后半，人道主义精神排斥了奴隶制度，而早在公元前 73~71 年，斯巴达克斯就领导了奴隶起义。

这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纪念碑，其光采不亚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璀璨的一页，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不是揭露、证实黑暗历史的证人，同时又是遗留给我们的革命的十字架。

如上所述，经历过民乱、土祸、党争、倭乱、胡乱，镇压过天主教的朝鲜王朝，尽管将锁国政策的门户关得严严的，但西方势力执拗的敲门声没有停歇。摆脱了中世纪社会的束缚，步入近代社会的欧美诸国，依次征服了以古代文明而自豪的东方国家。以鸦片战争为契机，1842 年使中国开港，1854 年，敲碎了日本闭关锁国的门户。其余波也涌向朝鲜。

开国和壬午军乱

1831 年，英国商船来到忠清道海岸要求进行贸易，第二年也同样提出了令人讨厌的要求。1845 年，在多岛海水域测量，要求通商。1846 年，法国军舰出现在忠清道洪州的远海。1865 年，俄国舰队停泊在咸镜道庆兴前海。1866 年，法国舰队占领了江华岛。同年 8 月，美国商船杰纳尔赛门号沿大同江上驶要求通商，1871 年，美

国舰队占领江华岛。

当时朝廷很清楚宗主国清朝在外国的侵入下正饱尝痛苦，因而不可能轻易答应外国的开港要求。并且看到受禁的基督教正在下层百姓中蔓延，更感到开港危险。结果在继续锁国的同时，1866年又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处死了约3万名基督教徒。在美国商船杰纳尔赛门号出现在大同江要求通商时得到的是枪击，法国和美国军队占领江华岛时，朝鲜人民发扬民族爱国心英勇奋战赶走了占领军。

从那以后 朝鲜的排外政策进一步强化 在八道树起刻有‘ 洋夷侵犯 非战则和 主和卖国 ’字样的石碑。

朝鲜之所以能够拒绝开港并坚持下去，固然有朝鲜的抵抗强烈的因素在起作用 同时也是由于英国要经营印度 俄国在开拓西伯利亚 法国在经营越南 美国忙于南北战争 各自为本国的事务自顾不暇，没有余力顾及朝鲜。

但是，就在不久前还接受朝鲜文化的日本却没有守住封锁的国门。1854年应美国的邀请开国 以成立天皇制政府为良机 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朝鲜。

这一时期 以心怀不满的武士群为主体 对韩强硬论抬头 并有发展成反对政府运动的倾向，日本政府认为与其压制这种强硬论 不如逆用之 将反政府运动诱导到国外。

这就是日本朝野征韩论的本质要素。

这时候，欧美列强并不是欢迎日本征服韩国，而是要利用日本，期待日本发挥敲开朝鲜国门并把朝鲜拖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作用。

为列强的阴谋所鼓舞的日本于 1875 年制造了“云扬号事件”，第二年强行签订了《江华条约》。

导致这种局势 不仅是由于当时朝鲜国内未能团结一致 而且还在于宗主国清朝受到列强侵犯没有余力反击日本的缘故。

尽管世界发生了这样的变动，国内又遭受外敌入侵，但李朝统治阶级仍浑浑噩噩，继续沉溺于党争之中。

固守锁国政策的是高宗的生父李昰应（兴宣）大院君。高宗一成年，大院君便隐退了，政局的领导权从大院君一派转到了闵氏一派手中。这与以前的派争不同，交织着外国势力，开始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况。闵氏一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推进朝鲜社会现代化的意图，对大院君政治反其道而行之便是他们的特色。

而且他们在签订了屈辱的《江华条约》后又于 1881 年 4 月与日本相勾结新设了新式军队“别技军”聘请日本陆军少尉掘本礼造为军事教官。

这成了担心开国即现代化反而会深化民族危机的崔益铉等两班儒生鼓噪‘卫正斥邪运动’的动因。

在这种情况下，新式军队费用支出增大使得原军队下层兵士 13 个月没有领到俸禄米。1882 年 7 月，所幸分发了一个月的份额，官吏们却从中克扣，而且有近半的米掺有砂子，兵士们对闵氏政权的愤怒爆发了，他们拿起了武器。

连心怀不满的不良分子也加入到军队的叛乱中，他们捣毁了闵谦镐的家，袭击了闵台镐等外戚的住宅，不仅捣毁了牢狱，横扫了兵营，杀害了日本人教官，还火烧了日本公使馆，并闯入王宫，国王逃之夭夭，事件演变成了大暴动。

该事件被称为“壬午军乱”。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躲到仁川，后乘英国船只逃往长崎。

这是朝鲜人民在开放门户之后对腐败政权和侵略者的最早的爱国反日事件，是民众斗争的嚆矢。

在赶走日本侵略者的首都，作为老的保守权贵苦等夺取政权之机的 大院君，在云岫宫让心腹部下许煜操纵兵乱，觅得掌权的绝佳时机。他在兵士们的迎接下轻而易举地入了宫，被奉为叛军的领

导人。

闵氏政府改革的新制又恢复为旧制，亲闵官吏也被赶下了台。作为日本商人的代理人、曾为特权买办商人的各种都贾被禁止。包袱商为政府所公认，为奠定政权基础新设了“惠商公局”。

李是应的这一第二次政权从主观上是要强化王权，这与民众的反日反闵斗争有一致之处。同时在反对西化和外来侵略的斗争这一点上也应得到高度评价。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日两国都认为这是扩张本国势力的机会，由于两国的介入，大院君被赶下了台，闵氏一族重新回归政权。

本来，中国自 17 世纪以来作为宗主国就对朝鲜有支配性地位，但到了 19 世纪，却由于欧美列强的侵略无暇顾及，而被日本乘机取代了其朝鲜的地位，正苦等重新找回原来地位的良机。尤其是中国正在进行名为“同治中兴”的诸政改革，在国际、国内都取得了暂时的安定。正为恢复宗主国的立场而工作，当然不会错过壬午军乱这一良机。

这时节，逃到日本的花房公使再次率陆海军直奔朝鲜而来，但中国洋务派政权却抢先一步，他们以应闵氏派金允植、鱼允中的邀请及将朝鲜政府从危急中解救出来的名目，于 8 月 26 日派遣由丁汝昌、马建忠、吴长庆率领的 5000 军队，在平定首都混乱的同时，抓获大院君押往中国，并进攻叛乱据点往十里和梨泰院，很多民众被杀。因为该地带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和下层百姓，而很多兵士的家属都在那里生活。

一举夺回对朝鲜支配权的清朝，指导重建了闵氏政府。闵氏政府抛弃了日本式的改革，依靠清朝获得政权保障。闵氏政权对恢复宗主权的清朝行事大之礼，因而被称为“事大党”，一名“守旧党”；与同日本勾结试图改革的“开化党”（又称“独立党”）形成对照。

清朝和朝鲜签订了《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在内政和外交上接受中国人和他们推荐的外国人作顾问，兵权由袁世凯统管。并且为

了防止日本的渗透 居中斡旋欲使朝鲜连续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法国签订通商条约。

在壬午军乱中遭受沉重打击的是日本，日本尚无力与中国抗衡。然而 日本却对壬午军乱的责任进行追究 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除惩罚主谋赔偿 50 万元外，还从朝鲜获得了赔礼及派保护公使馆用的驻兵等利益。

这可以说是壬午军乱的总结。

甲申政变及其背景

壬午军乱发生后，被清朝夺走对朝鲜支配权的日本，极力扩张为外战作准备的陆海军，他们无法放弃“云扬号事件”以来试图在朝鲜站稳脚跟的征韩论的美梦，处心积虑想挽回失去的一切。结果在日本的野心作用下的阴谋与开化党势力相野合，策划了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虽然是开化派与日本勾结，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进行政治改革的一次政变，但开化思想确实萌发得很早。

追根溯源，吴庆锡、刘鸿基等以翻译和医生为职业的人通过研究学问了解了世界政治形势，对欧美的侵略产生了危机感。他们有意愿地与掌权势力的子弟取得联系，开始组织对付危机的活动。

另一个源头是继承并试图发展实学思想的两班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影响。实学派大学者朴趾源的孙子朴珪寿是当时政府内最具开明思维的人，他自己家中的厢房为进步青年和两班开放并感化他们。

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当初的开化派人物有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他们组成了名为忠义契的基础组织。

领导开化党激进派的金玉均积极接近日本，想利用其势力，与福泽谕吉结缘，通过他接近政府内的井上馨。

但是，福泽作为脱亚论者暗藏将金玉均转化为亲日派并为日本所利用的私心，金事先没有觉察到此点便把脚伸出去是他的过失。

到了 1884 年，围绕越南问题清朝与法国交战失败。消息一传开，开化党便判断清朝没有余力干涉朝鲜事务，于是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当时首都有清朝驻军，因而，开化党与竹添进一郎密议制定了利用日军的计划。

计划是要在 1884 年 12 月 4 日庆祝邮电局落成仪式的宴会上，邀请内外高官，并全都暗杀之。没有如愿取得完全成功的开化派强迫国王移到景祐宫，将闻讯赶来的重臣们从宫门一个一个地拖入宫中处死。

6 日清晨，开化派组成了新政权。不过，由闵氏方面通过秘密通路与国王成功地取得了联系，于是，袁世凯率领的 2000 清兵同正在守卫昌德宫和昌景宫后院的日军交火。日军退却，国王返回闵妃所在的北关王庙。那时，陪伴国王的洪永植、朴泳教及士官生们被清兵杀害。

这天，日本公使馆遭到朝鲜兵和难民的袭击，数人被杀。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徐光范等随竹添公使流亡日本。

该事件被称为甲申政变，宫廷政变以短命告终，人称“三日天下”。

这次政变的善后问题耐人寻味。

厚颜无耻的日本政府声称与此事毫无瓜葛，并恬不知耻地强迫朝鲜政府赔偿公使馆的损失 还签订了《汉城条约》为与清朝形成暂时的妥协 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是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于 1885 年 4 月 18 日签订的 全文共三款 内容与前述相同。

壬午军乱时，花房公使逃到日本；甲申政变时，竹添公使又躲到日本去了。这从国内因素看体现了事大党与开化党之间的矛盾，反映了闵氏派和大院君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从背景上看，显然是中日两国围绕朝鲜而展开的领土之争。其结果意味着，怀有侵略大陆野心的日本，在当时情况下试图超越清朝军事障碍而未获成功。

另外，流亡的金玉均等人身价大跌，不是被赶到北海道，就是被撵到小笠原的偏僻地区，遭到了冷遇。从日本的立场上看，他们本来就不过是为增加日本国家利益而为日本所利用而已。

金玉均化名岩田周作在日本度过了 10 年。他忍无可忍，为得到清朝相助实现宿愿，到上海准备见李鸿章，但 1893 年 3 月在抵达上海的第二天，被闵氏政权秘密派遣的洪钟宇暗杀。他的悲剧的一生虽然结束，但遗骸运回首都后，却被朝廷以大逆罪处以分尸极刑并公开展示。

尽管他那失去了意识的尸体被碎尸几段，遭到了残酷、野蛮的刑罚，但谁都不能否认，就像开化派的活动对朝鲜近代化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一样，他的死给这块土地留下的意义也不小。

如上所述，清朝在防止日本进入朝鲜上一度取得了成功。可是，为了防止日本垄断性的进入，朝鲜向欧美列强开放的日子不远了，这给清朝带来了新的烦恼。俄国的南下政策给清朝带来了压力，这次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朝鲜。俄国的出现直接威胁着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关系，不过，牵制俄国行动的另一个势力在朝鲜亮相了。

当时俄国和英国作为世界两大强国正处于世界性的对抗状态中，在亚洲也因阿富汗国境问题正处于紧张状态，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俄国压力与英国在远东的进出相冲突。

甲申政变后《天津条约》签订三个月前，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同英国驻华公使巴克斯会谈，提议由中日共同保护朝鲜，得到了

对方的同意。但是，日本外务大臣井上却表示反对。为对抗俄国，英国不得已于 1885 年 5 月 15 日占领了朝鲜南海的巨文岛。这是俄国东洋舰队的要道朝鲜海峡的门户，由于英国的占领行动受到制约的俄国颇为震惊。经过两年半的交涉，虽然英国撤兵，问题得以解决，但清朝对朝鲜的垄断性统治已经出现了裂痕。为了扭转这种局势 牵制亲俄政策 清朝于 1855 年将软禁在保定府的大院君送回到朝鲜 向朝鲜政府施加了压力。但是 时过境迁 清朝已经无法挽回昔日的威信，朝鲜政府内部依靠俄国的势力已经成长起来了。

当时，英国和俄国围绕着大到亚洲，小到朝鲜展开了对抗，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的对立。

从那时起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大到亚洲小到朝鲜半岛，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拉夫人延续着的互不退让的战斗，只不过与苏联对抗的不再是英国，而是换成了美国。

在东方，喧宾夺主的两大超级大国旁若无人地你争我夺，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势力的均衡，但这并不能掩饰他们（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是在争夺东方这块市场。

从这种世界史的角度看，期盼中共诞生及成长的不只是中国人。要构想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东方经济共同集团体制虽然为时已晚，但总不能嫌弃那是过份的着想吧。

英国和俄国殊死争夺的朝鲜对日本资本主义成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市场。在这个时期着手经济侵略的日本人掠夺性地取走了谷物和黄金。

1877 年，日本黄金产量为 93421 钱 进口黄金量为 67250 钱。1887 年，日本产金量为 138838 钱，与此相比，进口黄金量为 520256 钱 其比率相当于 374.72%。日本资本主义为维持金本位

制的黄金储备大部分靠输入朝鲜产的黄金支撑。也就是说，牺牲了朝鲜的富庶养肥了日本资本主义。

尽管如此，朝鲜领导层却仍昏昏噩噩没有丝毫醒悟。仅当时几次纷争被强行索要的赔偿金就达 80 万元，1894 年内外国债为 165.8 万余元。与当时 759 万元的国家总收入相比，负债额不是小数，但却全部压到农民的头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过着豪华奢侈生活的闵氏一族和两班官人等统治阶级将负担转嫁给了农民。加上贪官污吏掠夺加剧，卖官鬻爵的颓废现象成为公开的交易，观察使从 2 万两涨到 5 万两 府使从 2000 两涨到 5000 两 买官费的回收又转为农民们的苦役。

在这种情况下 不堪重负的农民报之以“民乱”。众多大小“民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894 年名为“东学党乱”的甲午农民起义。

东学是 1860 的 4 月崔济愚将儒、佛、道三教合起来创立的民族宗教，在封建社会的价值观中，天相当于欧洲的神，而东学则主张“人乃天”即“人本身就是天”。这里指的人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普遍化、观念性的人，“在超越身份的所有个人内心之中都存在着相当于绝对价值基准天的人”。

东学运动表面上具有宗教结社的性质，而内部鼓吹的则是当时民众的意识 即反封建、反侵略的“辅国安民 广济苍生”的思想。

东学运动是从全罗道古阜郡的“万石事件”发端的，指挥数十万农民军的是绿豆将军全琫准。他是看到农民在暴政下挣扎而奋起举事的。

其经纬如前所述。这是一次其意义堪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的农民起义。

东学农民革命和李朝的没落

“东学党乱”从结果上看导致了中日战争。这是中日两国围绕着朝鲜展开的争端。但其结果并不仅仅是以清朝丧失对朝鲜的支配权而告终，“败给日本的中国”之衰弱相成了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对象。

在这种激烈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围绕着朝鲜和满洲又爆发了日俄战争。

关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前面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言，这里要谈的是这两次战争对朝鲜的影响，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的过程，以及殖民地下的朝鲜。

东学农民军被称为“火贼”、“济贫党”、“东匪”遭到了政府的镇压，而东学本身也被当时封建权力机关诬为“邪学”同样遭到了镇压。1864年3月，首任教主崔济愚因“左道乱正”的罪名在大邱被处死，1898年3月，第二代教主崔时亨也在江原道原州被捕，同年6月被杀害。

东学的教统传给了第三代教主孙秉熙。

孙秉熙化名李祥宪，云游日本，与开化派接触，归国后同权东镇、吴世昌等于1904年成立了政治团体进步会。

但是，主持进步会的李容九利用俄日战争正在进行之机，成为日军兵站监大谷少将的翻译官，并与在日本身怀使命归国的宋秉峻勾结，擅自将进步会改名为一进会，从事为日军刺探情报、运送军需品、强制动员百姓到铺设京义线铁路的公司干活等卖国行径。

1905年12月1日，孙秉熙在继承东学正统的教坛上宣布成立天道教，并将李容九等62名东学干部逐出教中。李容九等人与之相对抗，挂出侍天教的招牌，企图以此作为一进会卖国活动的大

众地盘，因此，东学两分为天道教和侍天教。

天道教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一进会在伊藤博文的顾问内田良平的操纵下，一直到 1910 年 8 月日本吞并朝鲜使之殖民地化时为止，其卖国活动一以贯之。

由于李容九是一进会的会长，这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东学与一进会有关联。其实，孙秉熙从日本回来东学就出现了大分化，孙继承了东学的正统，形成了天道教，东学和一进会完全是不同的团体。

如上所述 在中日、俄日战争中，日本都取得了胜利 而且在两次战争期间，朝鲜的国土荒废，国民生活备受涂炭，加上像一进会那样的亲日派作内应，国民团结遭到破坏。不仅如此，为了阻止俄国南下，英、美等欧美列强还站到了日本一方，帮助他们。

朝鲜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成了彻底的牺牲品。这是李朝亡国的背景。

俄日战争初和战争结束后签订了《韩日议定书》和《乙巳保护条约》。据此 韩国与俄国之间的所有条约、协约都被抛弃 驻在外国的韩国外交机关也全都被撤销。同时，列强在汉城的公使们也于 1906 年 3 月离开了汉城。条约内容前面已作过说明，可是这并不只是一份文件那么简单。

根据《乙巳保护条约》在韩国设立统监府的日本，于 1905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第 267 号敕令，公布了统监府和理事厅的官制。全文 33 条，其大意为：

第一条 在韩国京城设统监府。

第二条 统监由国王亲命，经直隶内阁总理大臣上奏天皇裁决。

第三条 统监在韩国代表帝国统管与驻韩国的外国领事馆及

外国人有关的事务，同时监督与外国人有关的韩国施政事务。

第四条 为维护韩国的安定秩序，在认定为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官动用兵力。

第七条 统监可以发布统监府令，行使监禁一年以下及罚款 200 元以内的处罚权利。

事实上，朝鲜内政的实权在统监府起步时就落在了统监伊藤博文的掌握之中。

从宫中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分布着日本的警察网，十三道的厅所在地设有警务顾问支部，全国设有 26 个分遣所，122 个分派出所，配置了日本人警察，当时日本警官有警视 21 人，警部 52 人，巡士 605 人，一年内人数剧增。

1907 年 7 月制定了第二期警官扩充计划，追加警务整顿费 31.3 万余元，增加 26 名警部，600 名巡士，总数达 4396 人。

同年 10 月，韩日警察组织合而为一，韩国警官受日本警官的指挥、监督。

1909 年 7 月签订了《关于韩国司法及监狱事务委托书》，夺取了韩国的司法权。

作为第三阶段，1910 年 6 月，寺内统监让韩国政府负担 250 万元的警务费预算，强迫韩国将行政警察权委托给日本，将朝鲜的一切警察事务全给剥夺了。这是为韩日合邦作准备而采取的对警察权的侵犯。

另外，1907 年 10 月制造了所谓的《有关驻韩国宪兵制》，宪兵隶属于统监，主要掌管维持治安的警察。

1908 年又制定了宪兵辅助员制度，宪兵数包括 4392 名朝鲜人，辅助员增至 6761 名，与当初设置统监府时相比，增加到 8 倍，分队、分宪队也从 212 个所增至 453 个所。这时的朝鲜人辅助宪兵

大部分收罗的是一进会不良分子等亲日分子。

在韩日警察合而为一同时，宪兵队长明石元二郎成为统监部警务总长，统一指挥警察和宪兵。

1909年1月1日朝鲜政府作为“朝鲜官吏”采用的日本人高级官员和一般官员达2080中警官达1548人。

他们虽然在名份上是朝鲜政府的官吏，但在合邦之前，日本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行政警察和军队。

而且，是对朝鲜人民课征的苛酷的租税养肥了日本的侵略势力。

前面提到过的伊藤写给儿子的书信很好地说明了朝鲜的这种事态实情。

闵妃被害引起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次义兵运动，其火种尚未熄灭就因《乙巳保护条约》的签订而再度燃起为恢复国权第二次义兵斗争遍及全国。

既然提到了义兵斗争，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此前宫廷和政府内部反对保护条约的真相吧。

作为宫廷的反抗而闻名的事件是试图依靠美国摆脱日本压迫的华盛顿密使事件。

1905年11月22日，美国人赫尔巴德声称带着韩国皇帝密命而来要求面见美国务卿鲁特。赫尔巴德到达华盛顿时，韩国外交权转到日本的保护条约尚未正式通告给美国，朝美两国在对方首都都设有外交使臣。不仅如此，1883年6月4日失效的朝美条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如果列国对签约国政府施加了不当压力时，依据事实通告，作为签约国友好关系的表示，各签约国力求给予最妥善的处置。”

尽管如此，在赫尔巴德说“要向当局政府申诉有关日本政府对韩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事宜”之时鲁特却答复：“美朝两国间是通过

正当的代表交换意见的，像这种没有依据正当途径的情况，我们认为没有采取措施的必要。”而回避了会面，还将这一事实告诉给日本公使高平。

12月11日朝鲜驻法公使闵泳赞与赫尔巴德商议后再次向鲁特呼诉，又被拒绝，更有甚者，连拒绝的文书都给高平公使过目了。

美国驻汉城公使阿莱恩很同情朝鲜，1904年4月14日他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信函要求美国就朝鲜事态给予干涉。鲁特却下达指令，要阿莱恩离开朝鲜。

另外，1907年1月伊藤博文在东京滞留期间，1月16日的《大韩每日信报》刊登了朝鲜皇帝写给俄、德、美、法四国元首的信函，内容如下：

“不曾想时局大变 强邻侵逼，日益严峻 外交权被夺 自主政治遭到毁损。朕和举国臣民无不恫愤、郁悒，苍天呼号，大地悲泣。迫切恳求各友邦顾念相交之谊、扶弱之义，予以广加商讨，制定对策 维护独立国势 全国臣民将感恩戴德 永志不忘。”

好像是企求天佑神助的奇迹，弱者的悲痛充溢其间。

韩国政府称此信函是伪造的，在正月21日的官报上予以否认。但是，《每日信报》主管贝塞尔说那确实是从鲁特那里得到的真品，并刊登了盖有皇帝御印的原本照片。

贝塞尔作为适用治外法权的英国人，是每日通讯社的特派员，朝鲜名裴说。《大韩每日信报》利用日本官场对朝鲜人专横、残暴，对欧美人卑躬屈膝的习性，让他当上了社长，正门贴上了“日本人不得入内”的字样。

另一方面，儒生们则发动了反日暴动。

1906年2月，忠清南道定山郡的闵宗植联合各地有志之士发动了起义，5月19日，占领了洪州。日方痛感宪兵与警察兵力之不足 因而派遣2个中队步兵和1小队骑兵于31日艰难地夺回了洪

州。

在同一郡邑，儒生崔益铉同全罗北道的林炳瓚共谋，率数百人起义。6月12日，二人在淳昌战斗中被俘，被日本军法会议处决。

1907年6月，俄国尼古拉二世召集的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

在这次会议中，原议政府参赞李相高、前平理院 高等法院 检事李俊、前驻俄公使馆参办李琦钟三人出面向议长俄国委员涅普留道夫呈示了朝鲜皇帝的信任状，要求出席和平会议。

但是由于俄国、美国、英国在《波士曼条约》等条约中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因而甚至拒绝与朝鲜皇帝派遣的代表会面。特使李俊义愤难平，愤然自尽，以示抗议。

李俊被称为烈士的原因就在这里，该事件称为“海牙密使事件”。日本驻荷兰公使都筑将事实报告给外务省，还告诉给在朝鲜的统监伊藤。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我们对国际社会复杂的利害关系过于天真，过于纯真的了。1905年7月至9月在“桂与塔弗特”之间的美日协定和“第二次英日同盟”以及《俄日和约》中作为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统治的代价以及协助英国统治印度的报偿，美英已经承认了由日本统治朝鲜，而这一事实我们却蒙在鼓里。不仅如此我们还不知道俄日战争以后世界势力关系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列强新的同盟关系的事实，我们则作为由此对立的列强的筹码，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可以说这就是朝鲜的命运。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与美苏大国势力接触的地域的民族或国家分成两极，而且处于被某一方支配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在成为帝国主义国际社会领土扩张或势力均衡的牺牲品这

一点上，可以说与李朝末期的朝鲜并没有什么不同。

接到“海牙密使事件”报告后，日本政府和伊藤采取了对策。他们向天皇报告，拒绝日本保护就是要宣战，应追究其违背协约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 1907 年 7 月 6 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一进会的宋秉峻诘问高宗皇帝，或者到东京谢罪，或到大汉门前向长谷川司令官负荆请罪，要么就宣战。与其说这是对皇帝的不忠，不如说是对民族的叛逆行为，这就是濒临亡国的国情之一面。

1907 年 7 月 18 日，高宗迫于压力发表了让位决定，年幼、有残疾的纯宗即位。

当天晚上，以得知此讯的自强会、同友会、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的会员为中心，2000 多人在汉城街道举行了大示威。

他们聚集在新王宫庆云宫大汉门前。跪坐在地上的青年们以悲壮的声音慷慨陈词，倾吐满腔的悲愤，新月在中天看护着与听众融为一体的悲壮凄惨的场面。目睹过这一场面的一位日本人对此记忆犹新，追忆当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分。

不过，由于这次集会既无组织，又无武器，因而示威的人在武装警察的驱赶下四散而去。

19 日，皇帝让位的消息一公布，民众又聚集到大汉门前，终于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一名警察负伤，朝鲜民众中有数名同胞遇难。这天晚上虽然是在流血中度过的，但年幼的国王却屈服了，他向伊藤统监传达了镇压爱国者的所谓“镇压暴徒的救命”。

驻朝鲜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借口受朝鲜皇帝委任，派步兵第 51 团占领了王宫。炮兵第 17 团的一个中队带 6 门野炮从西大门入城，在南山倭城门台布下了炮阵。在市内要地安排了守备兵，巡逻队则在城内巡游。而且，为了防范朝鲜军队发动叛乱，还占领了陆军弹药库。

在这种暴动状态中，第一把火是从李完用家烧起来的。李完用内阁阁僚在烟雾之中想苟延肮脏的生命，为避免危险，纷纷求助日本人的保护。李完用躲到日本人大街倭城俱乐部，赵重应法相躲到日本人俱乐部，高永喜度相、任善准内相、李秉武军相、李载昆学相等都在日本军队保护下呆在家里。

伊藤博文没有错过这一大好时机，要求与朝鲜签订全文为七条的韩日协约。内阁对日本的原案未作一字一句的修改便通过了，又得到少不更事的新皇帝的裁定，由负责全盘政务的李完用在统监官邸签订。整个过程一天之内就办完了，这就是 1907 年的第三次韩日协约。其全文采用的是命令式的口气。

韩 日 协 约

韩国政府及日本政府为及早谋求韩国的富强、增进韩国人民的幸福，约定如下条款：

- 第一条 韩国政府有关改善施政问题须受统监指导。
- 第二条 韩国政府制定法令及行政上的重要决定事先要征得统监承认。
- 第三条 韩国司法事务须与普通行政事务相区别。
- 第四条 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须征得统监同意后执行。
- 第五条 韩国政府须任命统监推荐的日本人为韩国官吏。
- 第六条 未经统监同意，韩国政府不得聘用外国人为官吏。
- 第七条 明治 37 年 8 月 22 日签订的韩日协约第一项就此废止。

作为证明，以下的名字是受日本政府郑重委任签署协约之人。

明治 40 年 7 月 24 日

大日本国统监、侯爵伊藤博文印

光武 11 年 7 月 24 日
大韩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 印

与此协约不同，双方还交换了秘密协约，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解散朝鲜军队。

另外，1907 年 7 月，李完用傀儡内阁制定了《保守法》、《光武新闻法》，全面强化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压制。

1908 年 1 月，任命日本人为各部次官的工作结束了。顾问制度由此完全终结。

上面介绍的韩日协约被称为“丁未七条约”，这成了后来日本对“满洲国政府”采取的统治形态的原形。

解散军队和义兵运动

俄日战争后，日本向朝鲜派遣了前所未见的大批正规军，军队司令官作为从军事上直接统治朝鲜全部国土的力量发挥着作用。

不仅如此，如上所见，朝鲜的外交、内政、军事、警察方面都转到了日本统治之下。即使如此，日本也仍不知足。为了实现完全统治，他们还想把朝鲜划归到日本帝国版图之中。

因而，1907 年 8 月 1 日，作为最后施展的勾当，强行解散了朝鲜军队。

此日的前一天，李完用事先编好了解散军队的敕命，与伊藤统监联系。伊藤向军队司令官长谷川下达命令，赋予其可以使用武力镇压暴动的权力。

长谷川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特别是武器库、弹药库、粮草库都安排了日本岗哨。

8 月 1 日上午 8 时，在京部队的军官即韩国侍卫混成旅团长、参将梁性焕，以下还有二侍卫团、六侍卫团及各部队长等与韩部队

配置的日本教官一起突然被召集到日本驻韩国军队司令官的官邸。集合好后，长谷川司令官和李秉武军部大臣出现了。

他们没头没脑地就念起了“解散军队敕令”。然后通知上午 10 时到训练院举行解散仪式。这平地风雪令军官们大感意外，惊诧不已。不过，虽然军队要解散，但军官还会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希望军官们平稳地解散部下兵士，这是军官们得到的训示。这时，日本军队已经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军官们束手无措。

那时，大部分部队都参加了训练院（练兵场之意）只有侍卫第一团第一大队和第二团第一大队没有出席。尽管发电催促，但仍不见两支部队的影子。这两个大队的士兵在第一大队队长朴怀焕（参领军衔）自杀后，发动了起义，南大门方面响起了枪声。

因为害怕事件扩大到一般兵士，会场上结束了简略的解散仪式，在队长训示同时，取下肩章，将名为韩国皇帝恩赐金的收买金分发给兵士。下士 80 元，兵卒服役一年以上 50 元，不满一年的 25 元，这在当时不是笔小数目。当时韩国军队是雇佣兵，首先让兵士免除失业的后顾之忧，这是收买政策的狡猾之处。

解散仪式是下午 3 时结束的，很多人预想到解散而摆脱兵营未参加仪式。出席的有 1812 人，约 1350 人没有参加，后来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日义军。

首都部队解散的消息传到地方，引起了极大不满。8 月 6 日，原州镇营队发生起义。9 日发生的江华岛起义袭击了日本人的警察驻在所，杀死了当郡守的一进会分子郑景洙。

这两支韩国部队的起义点燃了全国性武装起义的烽火。李麟荣、许筠等领导的生机勃勃的游击部队活跃在从铁原到金刚山附近的 13 郡。

1908 年，游击活动发展到北朝鲜，这样，朝鲜全岛都有游击队员在活动，总人数超过了 7 万。

在这种局面下,1908年3月如前所述,美国人史蒂布森被杀,1909年10月,侵略元凶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击毙;同年12月22日,亲日派巨头、总理大臣李完用被爱国青年李在明刺中免于死。

这种为大义奋不顾身不惜杀身成仁的起兵倡议活动,作为保护条约以来朝鲜人民的斗争,逐渐发展为为恢复国权而开展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反日义兵活动和爱国启蒙运动。

爱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是继承独立协会精神的知识分子们。出现了大韩自强会、西友学会、威北兴学会、青年会等团体,创办了《帝国新闻》、《皇城新闻》与一进会对抗宣传排日攻击政府。生活在美国夏威夷及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朝鲜同盟也办起了报纸,展开了反日运动。

英国人裴说、美国人豪英·赫尔伯特等也通过报纸批评、攻击日本的政策。

在这种历史的流程当中,给日本人最大冲击的莫过于伊藤被杀事件。

1909年7月6日,日本内阁决定了《确定对韩政策议案》确定强行与韩国合邦,这是伊藤被杀三个月前,亲日御用团体一进会1909年12月4日发表合邦声明的五个月前发生的事。

因为伊藤被杀,日本没有找到合邦的适当时机,不过,第三代统监寺内正毅调动数十艘军舰进行威胁,并于1910年8月中旬叫来李完用,将事先准备好的合邦文书交给他,强迫他签了字。

该文书就是《关于韩日合邦的条约》。

此前的1904年10月15日,日本政府推荐的财务顾问目贺田种太郎同大韩国议政府参政申箕善和度支部大臣闵溶缔结了下面的协定:

第一条 目贺田种太郎负责整理、监查大韩国政府的财政。对有关财政上的各种设备问题提供最成熟的审议草案。

第二条 大韩国政府有关财政方面的一切事务都须经目贺田种太郎同意方可实行。

目贺田种太郎可以参与有关财政事项的议政府会议，有关财政方面的意见可以通过度支部大臣向议政府提出。

议政府的决议及各部事务中，与财务有关的在上奏之前需经目贺田种太郎同意、加印。

第三条 目贺田种太郎有权就财政上的意见进行上奏。

第六条 在发生需要解除本契约的情况下，相互商议之后，经日本帝国代表同意，可解除本契约。

从该协定看，目贺田种太郎不是财政顾问，实际上好像是朝鲜总督，从这个角度看，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

为了与朝鲜合邦作准备，他想把一切都变成朝鲜人的负担。

他首先着手的是币制改革。当时朝鲜流通的货币是被称为常平通宝的常平钱和叶钱，政府以 5 倍的名目又铸造了当五钱，闵氏一族为了自己的私利强制通用该货币。朝鲜的这种货币改铸给经济界带来了混乱，但目贺田却强行推行“货币整顿事业”，使朝鲜货币制度与日本货币制度相合，这有助于日本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为其资本输出奠定了基础。然后将第一银行首都分行定为朝鲜的中央银行，掌握了朝鲜的货币发行权，加上设置农工银行和地方金融组合，确立了对朝鲜的金融统治。

不仅如此，在新旧货币交换上，有计划、有组织地一举使朝鲜人手中的旧货币的价值大跌，以此掠夺朝鲜人的货币财产，使朝鲜

关于委托韩国司法及监狱事务的照会

韩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以改善韩国司法及监狱事务，确实保证韩国臣民和在韩外国臣民及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巩固韩国财政基础为目的，特约定以下条款：

- 第一条 韩国政府将司法及监狱事务委托给日本政府，直到认证韩国的司法及监狱事务达到完善为止。
- 第二条 日本政府任用具有一定资格的日本及韩国人为在韩国的日本法院及监狱的官吏。
- 第三条 在韩国的日本法院除条约和法令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对韩国臣民适用韩国法规。
- 第四条 在有关司法和监狱事务上，韩国地方官府及官吏根据其职务须接受在韩日本相关官吏的命令，并辅助其行事。
- 第五条 日本国政府负担有关韩国的司法及监狱事务方面的一切费用。

根据这一协定，韩国的司法部和韩国的法院都被废除，统监府设司法厅，并设置各级法院。其职员也都由日本任命。

这就是朝鲜司法权落入日本魔爪的过程。

此前两年，1907年10月29日两国有过关于警察事务的约定，内容为：

统监府和韩国政府约定，日本政府根据明治40年7月24日缔结的韩日协约第五条任命的韩国警官，须接受相关的日本官吏的指挥和监督，执行对日本臣民的警察事务。

该约定书是伊藤和李完用签定的，松茂义成为警部局长后整顿了警察制度，干部职员用日本人，警察一般多用朝鲜人。

如上所见，由日本人直接掌握警察、司法和监狱的实质是为镇压《乙巳保护条约》以后朝鲜国内爱国同胞大规模的反抗而进行的体制强化。

对朝鲜的统治完全变为对刑讯和军事监狱的依赖。

让我们的话题再回到义兵运动上来吧。

从 1895 年开始经历了约六年光景的义兵运动是以闵妃被害为契机发生的，1905 年 11 月保护条约之后的义兵运动则是反对剥夺国权而再度爆发的事件。其特征从初期阶段到再度爆发的各阶段都是一贯的依靠武装进行的反日爱国斗争。

那么，什么是义兵呢？义兵就是指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不是坐等朝廷命令，而是自发地投身到保卫祖国的前列中的民兵。这是自三国时代以来，经过壬辰倭乱，积淀在朝鲜人民爱国传统中的民族精神的精华。

义兵运动再燃烽火是从 1905 年 4 月柳重教的文人元用八在江原道原州起兵开始的，李文镐和具万书也分别在京畿道的加平和广州起兵。而且在以忠清北道和庆尚北道邻接的名为乌岭的天险山岳地带为中心，其周边郡邑义兵活动也很活跃。

不过，与日军和政府军进行正面决战还是从前面提到过的 1906 年 5 月闵宗植起兵及同年 6 月崔益铉起兵开始的。崔益铉在淳昌起兵，为避免同胞相残，中止抗战，试图说服政府军，但却被敌人先发制人而遭逮捕，在对马岛严原的日本警备队拘留中绝食而死。

1906 年 1 月，按着都察使郑焕直的指示，他的儿子郑镛基成为义兵将领，他率领 600 余名义兵以庆尚北道东大山为中心英勇善战直至战死。其后，父亲郑焕植继任义兵将领继续奋战直至

1907 年末被永川守备队杀害为止。

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申弼石以日月山为中心，在盈德、宁海、平海一带，率领 1000 余名农民展开了英勇斗争。由于他以农村为地盘，因而在坚持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过程中还展开了宣传。

在这种事态下，军队一解散，揭竿而起的军人们就与义兵运动合流，扩大到全国范围，显露出保卫国权的独立运动的色彩。

闵宗植、崔益铉起兵失败后一度陷入低谷的义兵运动以军队解散为基点重又注入了新的活力，迎来了新高潮。

有一段时间，李麟荣担任了十三道义兵总大将，军师长为许芬、闵肯镐、李康年、朴正斌、权重熙、方仁宽、郑凤俊等成为各所属道的倡议大将。义兵数从主力为 6000 人的各道中集结了约一万名，其中 3000 名是解散的军人。

他们制订了 1908 年正月进攻首都的作战计划，许芬率 300 名的先遣队，在行进到东大门外 3 里处时，被日军抢先下手而遭到失败。其后，义兵部队分散到各地，独自开展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咸镜北道，洪范图、车道善领导的由猎人、矿工、北青近卫队的解散兵等组成的义兵队伍战斗能力非常突出。

此外，还有很多义兵将领和义兵们的活动，1907 年交战 323 次，参加的义兵数为 44116 人；1908 年为 1452 次，69832 人；1909 年为 898 次，25703 人。这是与驻朝日军相关连的战斗情况。

另一方面，日本军警的讨伐也日益残酷，兵力也在逐渐增强。

其结果，义兵损失巨大，从 1907 年 8 月起至 1909 年末为止，被杀害的义兵人数为 16700 名，受伤人数为 36770 名。这是日本方面发表的数据。

以 1901 年为界，国内的义兵运动走上了流亡中国东北部之路，国内少数精锐的活动虽很明显，但到了 1914 年便暂时告一段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义兵运动完全被消灭。在图们江、鸭绿江

对面的中国东北的辽东和延边及俄罗斯沿海州，义兵的残存势力和很多朝鲜人就迁居在那里。以此为根据地，流亡的义兵运动家和爱国启蒙运动活动家们，展开了对朝鲜移民的启蒙运动和对青少年的教育。洪范图、车道善、李东辉等在东满的间岛地区，李范允、崔在亨等在俄罗斯的沿海州分别开展了独立运动。他们筹措粮食和资金，购入武器，培养军事干部和壮丁，还对朝鲜境内发动了游击形式的袭击。就这样，义兵运动转变成了独立运动。

韩 日 合 并

尽管有国民的这种抗争，但对日本统治朝鲜，英国和美国却没有半点踌躇不惜添油加醋。俄国因在俄日和约中有过谅解协议姑且不论，英日同盟协约第三条也好，《桂一塔夫特密约》也好，这类的文书不仅是我们的子孙万代无法遗忘的文书，更是将友爱和尊重化作憎恶的令人气血倒流的文书。

当时，朝鲜名符其实地孤立无援，不仅成了国际政治的牺牲品，而且在国内，韩国政府在负担 250 万元的警察预算情况下，还把警察权拱手交给了日本。

警察权是一切行政的后盾，因而，这实际上就同统监掌握了韩国行政权相仿。

1909 年 10 月，伊藤被杀；12 月 12 日，李完用遭到李在明的袭击受伤。1910 年 7 月 29 日，伤好后的李完用替换朴齐纯再度登上总理大臣的位置。

同年 8 月 13 日，松永师团长在警备会议上指令各地方军部队秘密集合到首都。军队以讨伐游击队之名，在半夜，尤其是放弃大路像盗贼一样涌到汉城，在城门要冲、各王宫、统监官邸、司令官官邸、内阁中成员官邸等布下森严的戒备。

《韩日合邦条约》就是在这种动用军队以近似于政变的方法强

行签订的，其内容如下：

关于韩日合邦的条约

日本国皇帝陛下及韩国皇帝陛下都希望两国间形成特殊的、亲密的关系，增进相互的幸福，确保东洋永久的和平，并确信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比将韩国并入日本帝国更好的途径，因而决定缔结两国间的合并条约。为此，日本国皇帝陛下和韩国皇帝陛下分别任命统监寺内正毅子爵和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各自的全权委员。

全权委员会同协议后达成如下诸条协定：

第一条 韩国皇帝陛下将对韩国政府的一切统治权完全而且永久地让与日本国皇帝。

第二条 日本国皇帝陛下接受据前款让与的权力，并且同意将韩国并入日本帝国。

第三条 日本国皇帝陛下约定韩国皇帝陛下、太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还有其后妃及后裔将享受与其地位相称的尊称、威严及名誉，而且为保持这一点，还将提供充分的年金。

第四条 日本国皇帝陛下约定，前款以外的韩国皇族及其后裔将享受相当的名誉及待遇，并提供必要的资金使之得以维持。

第五条 日本国皇帝将授予有功的韩人，尤其是被认证值得褒奖的人荣誉爵位，并颁发赏金。

第六条 作为合邦的结果，日本政府承担所有的韩国事务，充分保护遵守在韩国实行的法规的韩人人身和财产安全，并谋求增进其福利。

第七条 日本国政府诚心诚意录用那些尊重新制度又具备相

当资格的韩人为在韩国的帝国官吏（在情况许可之下）

第八条 本条约经日本国皇帝陛下及韩国皇帝陛下定后，自公布日起实行。

两全权委员在本条约上签名盖章，以资证明。

明治 43 年 8 月 22 日

统监、子爵寺内正毅 印

隆熙 4 年 8 月 22 日

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 印

上述条约 8 月 22 日，由寺内正毅和特大卖国贼李完用签订，8 月 29 日，日本政府作为第 4 号条约公布。

仿佛眼看着急救室里的患者微弱的脉搏突然停止撒手人寰，那瞬间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述，朝鲜在世界地图上消失，沦为黑暗、冰冷的日本殖民地。到那时为止，尽管对中国历代王朝执事大之礼，但依靠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命运，抗击侵略，维持了独立名份的朝鲜，如今自主权完全被剥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殖民地百姓饱尝不尽的辛酸和亡国奴剜心刺骨的疼痛。这是 518 年李王朝的终结，又是到 1945 年为止 36 年间殖民地百姓深受欺压和牢狱之灾的开端，同时又是独立斗争的起点。

在这种举国上下皆丧家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下面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日本以天皇的恩赐金为名。一次性支付给以签订合邦条约的卖国贼李完用为首的 3645 名旧韩国官吏 679 万元钱。当时日本总理桂和宋秉峻之间还曾为合邦一事讨价还价，索要 1 亿元，日方认为数额太大，减为 3000 万元，这一丑恶黑幕天人共愤，不可饶恕。

以功劳金为名，李完用得到 15 万元 宋秉峻等得到 10 万元巨额卖国酬金。

国王和王族们不管是否出自本意，他们得到了 150 万元的岁费和王族的待遇。侯爵 6 人 伯爵 3 人 男爵 45 人 共计 76 人得到了日本贵族的身份。有呼天抢地的百姓，也有通过卖国致富以忠实于日本天皇为荣光而自豪的没心没肺的民族败类。

寺内正毅实现了连丰臣秀吉都实现不了的事情，自然喜形于色。诗人石川啄木写过这样的诗：“黑黑的 / 我用墨汁涂抹 / 地图上的朝鲜 / 听那秋风瑟瑟”。

韩国从地图上消失的那一天。这一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因而我们把 8 月 29 日称为国耻日。

合邦条约第一条的内容是将韩国的统治权让与日本皇帝。在形式上，韩国皇帝是自动委托给日本皇帝的，而日本皇帝则接受了这一委托。该条约在日本遭到曲解，或者说已形成定论，他们认为这不是依靠侵略所得，而是统治权圆满地转让而形成的妥协的产物，以此来为其侵略行径披上伪装。

然而，国家并不是国王的私有财产，不能任意转让，这在法理上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而且从合邦的情况看，不过是以强大的日军武力为背景，压制韩国民众的抗举，威胁、收买部分上层官吏实现的韩日合邦。条文上的让与、接受等术语不过是一种修饰词而已，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日本的弱肉强食，这点是无可否认的。

退一步说 即使让与、接受是事实的假定 能够站得住脚 依据民法上赠与的法理，随时也都是可以取消的，因而合邦条约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而且，合邦条约中还潜藏着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能不指出来。

日本统治下 36 年 解放 40 年 75 年的岁月流逝，现在再写这

样的文字也可以说既可笑，也没什么意义。

不过单从法理的角度看，《韩日合邦条约》是无效的文书。

该条约第八条有经韩日两国皇帝陛下“裁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的字样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合邦条约缔结一年前的 1909 年 7 月 6 日，日本内阁会议便通过决定了《确定对韩政策议案》同日 事先已经得到了天皇的裁决。该决定的内容中有：

第一，在适当的时机将合并韩国。

将韩国并入帝国版图是在半岛确立我方势力的最实际的方法。根据帝国国内外形势，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实行合并，使半岛名副其实地在我统治之下，而且消除韩国同各国的条约关系，这是帝国的百年大计。

从其文脉看，从韩国皇帝手中夺取统治权之意表露得很明确，而且，不仅所谓让与云云毫无商议的余地，在当时，有关韩日合邦问题就已经得到了日本天皇事先的“裁定”批准。

而韩国皇帝陛下的裁决不过是日方单方面的假定而已，并没有成为事实。

不仅如此，关于裁定问题，在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在君主国家需要得到国王的裁定，这是条约各自发生效力的要件。这应该是在条约签订后两次性地得到国会批准以及国王的裁定，这是常识；在条约签署之前就得到国王裁定，这不只是在次序上有矛盾，即使退一步假定获得裁定已是事实，在毫无内容的一纸空文上的裁定，是不能当作对合邦条约的裁定看待的。

换句话说，从对合邦条约的内容作出许可的表示是在条约签订之前的情况看 条约的签订是矛盾的。退一步 假设这是事实 那么就相当于是对没有内容的未确定事实表明意思，这种意思的表明是发生不了效力的。这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说，这将归结到在这种情况下的事前裁定与未表明意思的情况是一样的法理上。

笔者自不用说，他们也没有给国民查阅《韩日合邦条约》这份文件的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这种文书保管在什么地方根本无从知晓，即使知道，能够查阅的人也非亲日派莫属，就算有的国民懂得合邦条约无效的法律原理，有勇气指出的人恐怕为数也不会多。

就是说，韩国遭到的是日本的强行侵略，他们根据采用强迫欺诈手段形成的“合邦条约”文书统治了韩国 36 年。这种见解才是正当的。由于背着国王缔结的文书，韩国国民作为日本的奴隶受尽了辛酸苦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日本是依靠实力统治韩国的，这是没有根据的非法占领，因而是强盗的犯罪行为。

只有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社会主义者们，不仅在俄日战争时高喊反战论，也批评了对朝鲜的侵略，认为殖民地统治对日本平民阶层有害无益。

尤其是幸德秋水，他在文章中写道：“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殖民地及新市场”；得利的只有政治家和资本家，多数劳动者得不到任何实惠”，并作为有志者的决议，向国际社会呼吁“反对保护条约”和坚决维护朝鲜独立。他们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仅遭到压迫，1910 年 5 月 25 日还被一网打尽。幸德秋水也被扣上了大逆罪的罪名惨遭杀害。

关于韩日合邦还有一个闲谈。

有报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继承了逆贼李完用骨血的子女就跑到了日本。有个相当于他孙子或曾孙的人，亲手毁了李完用的坟墓，棺木也成了碎片。在彻底解放了的祖国，李完用终于销声匿迹。某个地方大学博物馆中保管着写有李完用之墓的棺木牌，这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兴趣。

这不只是局限于李完用的问题。这也给所有活着不想给自己的名字抹黑的人敲响了警钟。

自古以来 笃信‘老天有眼’的受压迫的百姓是很多的。在他们看来，李完用这样的下场就是天意，他们将坚守这种朴素的信仰生存下去……。

殖民地统治下的朝鲜

韩日合邦同时，韩国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实际上一直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机关的“韩国统监府”改名为“朝鲜总督府”第三代统监寺内正毅仍留在原位 成为首任朝鲜总督。总督掌握着统治朝鲜的政权。总督由天皇亲命，还被任命为陆海军大将，直接隶属天皇，掌握着统辖朝鲜政务和军务的绝对权限。尽管这是以统治印度的英国人总督为本，但解释为殖民地王国的王座更正确。

寺内正毅实行的是所谓的武断政治。

他将警察和宪兵统合起来，中央的警务总长任宪兵司令官，各道的警务部长任宪兵队长，确立了在宪兵指导下管理治安的宪兵警察制度。

1910年8月25日公布了《集会取缔令》包括亲日团体一进会在内的12个民族政治团体被解散。

此外，朝鲜人的结社、政治集会自不必说，在户外的多数人集会也遭到禁止，朝鲜文报纸和255种出版物也被禁止出版发行。朝鲜人发表政见的路完全被封住了。不光是军人，连官吏和学校的老师们 制服的腰上都挎上了腰刀 作为威慑 企图使朝鲜人屈服。在因1919年3月1日“朝鲜独立万岁事件”遭到全国性反击后 才变为文化政治，尽管只是名义上的。

总督政治是武断政治与被称为“内地延长主义”(朝鲜语中 在

殖民地称本土为内地——译者注)的同化政策的交织,二者互为表里,一以贯之。将朝鲜人强制性地日本人化的殖民教育,是从 1911 年 8 月 23 日制订《朝鲜教育令》开始的。他们为麻痹这块土地剥夺、抹煞朝鲜文化遗产不遗余力。

他们编造了“日鲜同祖论”的谎言,还散布否定朝鲜民族自立发展的“朝鲜文化论”。

其目的在于,实现夺去朝鲜人的民族魂魄,抹杀其文化,消灭其语言,以此造就忠实于日本天皇的奴隶的巨大工程。

让我们看一看武断政治的治安工具吧。

宪兵警察机关 1624 所,宪兵军官(警视警务)96 名,下士、准下士(警部)323 名,宪兵上等兵 2525 名,辅助宪兵 4749 名,侦探 3000 名,警视 35 名,警部 223 名,巡士 2321 名,巡士补 3019 名。

其中,有 1 名警视,100 名警部,100 名巡士,以及全部的辅助宪兵、巡士补、侦探是朝鲜人。

除了这密如蛛网的警察组织外,还有战时编制的陆军 2 个师团,海军 2 个分舰队常驻。郡厅所在地和各车站配备了守备队。

这些就是压迫朝鲜,将朝鲜赶向殖民地的日本暴力。只不过以上列举的统计数字是刚刚合邦之后的数据罢了。

这些军警夺去了约 2 万参加义兵斗争和爱国启蒙运动的同胞的生命,确立了镇压制度。换句话说,他们是喝饱了朝鲜爱国同胞鲜血与国民的汗珠长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

朝鲜在立法方面也出现了问题。日本政府想以紧急敕令将立法权授予朝鲜总督,但因在第 27 次会议上没能取得认可,到第二年 1911 年的议会才通过,公布了第 30 号法律。其内容如下:

关于在朝鲜实行的法令的法律

- 第一条 在朝鲜，需要法律的事项，可由朝鲜总督发布命令予以规定。
- 第二条 前条命令须经由内阁总理大臣，请天皇敕令裁决。
- 第三条 在需要采取临时紧急措施情况下，朝鲜总督可以发布第一条规定的命令。
前项命令发布后须请天皇裁定。如果未获裁定时，朝鲜总督须颁布该命令将来无效。
- 第四条 法律的全部或部分有必要在朝鲜实行时，通过敕令确定。
- 第五条 第一条的命令不能违背根据第四条在朝鲜实行的法律，尤其是为在朝鲜实行而制定的法律及敕令。
- 第六条 第一条的命令称作制令。

附 则

本令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不是由国民选出的代表构成的国会制定法律，而是由殖民地政治统治者总督的命令来左右人权或权力关系。换句话说，总督取得了为日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根据。

取得这一政令发布权的朝鲜总督得以独揽司法、行政、立法三权。他实际上是殖民地的皇帝。

让我们继续义兵抗争的话题吧。朝鲜总督府对国内义兵部队残存势力进行讨伐的结果是合邦前后，义兵主力部队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涌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强有力的根据地，这在前面已作过一些介绍。

其中，徐一等人集合义兵于 1911 年组建了重光团，本营设在

汪清县。由于该组织中拥有过去韩国武官学校出身的有才干的军事干部，对其后独立运动的发展贡献很大。

此外在延边李东辉设立了军官学校李会永、金月松等创办了新兴武官学校的前身新兴讲习所，倾力培养革命斗士。

不仅在延边，在上海，1912年流亡的申圭植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开展了独立运动。1918年，以吕运亨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新韩青年团，展开了独立运动。

在北京，申采浩通过写作活动宣传爱国主义。

在沿海州李相高、柳麟锡等组织了声鸣会，其后国民会成立，在活动中迎来了十月革命。1917年12月，全俄韩族会中央总会成立，1919年2月，改称大韩国民议会，展开独立运动。

十月革命后，在哈巴洛夫斯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俄国军队里从军的朝鲜青年为中心组织了劳兵会。

就这样，只要是朝鲜同胞聚集的地方，都在为“想忘忘不了，想丢丢不下”的祖国继续在斗争。

日本镇压的不光是义兵运动和武装部队，对知识分子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集中在以黄海道和平壤为中心的新民会上。

其一为日本官方探明安重根义士的堂弟安明根以黄海道为中心联络志同道合者为在中国东北部的西间岛设立武官学校筹措资金，便无中生有地捏造了袭击安岳邮政局未遂事件。1910年11月以安明根为首的160人被逮捕，安明根被判无期徒刑，50余人被判徒刑或被流放。

再就是1911年12月捏造了刺杀寺内总督未遂事件，以新民会为中心逮捕了700余人。尹致昊、梁起铎、安泰国、李升薰、林莹正、柳东悦等被判10年徒刑，共有105人被判徒刑。“105人事件”的123名被告中除18人无罪外，余下的105人所受徒刑合计竟达600余年，相当于6个世纪。

在该事件中受牵连者无一例外都是爱国启蒙运动的领导人。

在捏造无中生有的事件过程中 为了获取自白进行了严刑拷打 为数不少的人死于狱中或成为残废。

该事件实质是对安重根义士的政治报复，目的是防止第二个安重根的出现及将爱国启蒙运动斩草除根。

日本社会主义者称此为朝鲜版的“幸德秋水事件”，予以了严厉的谴责。

对异民族施加的刑罚从本质上说是迫害，因而不是屈服就是死亡 二者必居其一。

三一独立万岁事件

现在该谈谈“三一运动”及“己未独立万岁事件”的始末了。

我们民族形成了拥有 5000 年光荣历史的固有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屡受外敌入侵，但却找不出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36 年更耻辱的时代，比背着殖民地枷锁生存的痛苦更巨大的牺牲。

同时 在这种痛苦中，“三一运动”作为分散在整个国土谋求生存的全民族团结一心不惜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抗争的运动 在 5000 年历史中犹如夜空中光彩夺目的巨星，光辉灿烂，令我们自豪不已。

我们生存的意义，我们维护的正义，还有为民族伟大的发展而作的祈祷、赞美……所有这些无不植根于“三一运动”中，如果与“独立万岁”的呼声相背离 那么连一天也活不下去。无论生活在地球何处的同胞，如果不能从己未年中吸吮乳汁，就不会有永久的成长 永久的休息。

从各种意义上说，“己未独立万岁事件”使国民承担起了义务，作为鞭策的力量，视之为民族的宗教也不会有什么缺憾。

到“三一运动”为止 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是所谓武断政治的高

压政策，就在这节骨眼上，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统治者喜出望外，由于欧美列强一度因为战争退出亚洲市场，日本取而代之，独占中国市场，进入世界市场，使得日本资本主义取得了飞跃发展，他们称这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

作为日本经济发展阶梯的朝鲜经济，由于朝鲜银行滥发货币带来的通化膨胀政策，导致 1916 年以后的高物价。其结果虽使大地主和庞大的日本资本沾沾自喜，但农民却穷困潦倒，变卖家财背井离乡的人一天天增多。特别是 1919 年袭击朝鲜中西北部的旱魃，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工人的实际收入也很低，生活陷入饥饿状态。

这种不安定的事态使农民组织起了秘密社团，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也初露峥嵘。

不仅如此，每逢被称为义兵运动的武装抗日运动发生时，日帝所给予的残酷镇压，不仅针对本人，对其生活的整个村庄也给予了严厉的处罚，失去亲人在短时间内怎能忘记这种深仇大恨，仇恨已化成潜在的、可怕的火山。

这时正好俄罗斯革命于 1917 年爆发，其影响导致德国和匈牙利革命，波兰独立，东欧诸国成立民族国家，中国爆发恢复国权运动等，国外的这些风暴给朝鲜带来了巨大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威尔逊总统作为讲和条件提出了共 14 条的所谓《威尔逊纲领》，其中第 11 条的内容是“援助弱小民族”。

这又被称为“民族自决宣言”，当时美国并没有允许其殖民地菲律宾进行民族自决，反而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这点看，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而已。不过，并没有作深入探讨的弱小民族对此却非常欢迎，开始着手设计自己民族的将来。

其影响也波及到朝鲜，沿海州、上海、美洲等地海外同胞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向巴黎和会派出了独立请愿使节。

国外的这种变化成为“三一独立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不过其直接的导火线却是在东京的朝鲜留学生们。当时早稻田大学在校生李光洙独立运动家、作家到北京后在那里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等变化了的世界形势。而且感受到了“五四运动”之前北京热气腾腾的气氛。他带着这种影响回到汉城，决心从事朝鲜独立运动。

看到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顾维钧、胡惟德等起程后回来的李光洙，找到中央高等普通学校的玄相允，又见了玄的恩师宝成高等普通学校校长崔麟，转述了北京的动态。崔打动了当时强劲的民族宗教势力天道教教主孙秉熙，确立了以天道教为中心开展独立运动的计划。这就是“三一独立运动”的开端，也是与中国“五四运动”血脉相通的缘由。

在汉城结束密谈的李光洙 11 月末回到东京，开始串联同志。得到了崔八镛、白宽洙、金度演、徐一椿、金喜寿、崔谨愚、金尚德、尹昌熙、李淙根、宋继白等日本留学生的赞成，他们作为在东京的《独立宣言书》的署名者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这时，崔八镛来到李光洙的住处，说是带着同志们一致的意见而来，拿出 200 元旅费劝说李光洙最好到上海把这一事实公之于世。李光洙于是赶赴上海。

在东京以 2 月 8 日为期，为在东京和汉城两地同时发动独立运动，宋继白将《独立宣言书》写在绸子上，藏在学生服中回到汉城。

2 月 8 日到了。以崔八镛、徐一椿、尹昌锡、金度演、金喜寿、白宽洙、李淙根、金尚德等 8 人为中心在东京神田朝鲜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了独立大会。当时日本约有 800 名朝鲜留学生，在东京的大部分留学生约 600 人参加了集会。

大会进行中，集会者与破门而入的官兵展开了大混战，结果为

暴力所镇压，除主持人崔八镛外，还有 60 余人被逮捕，8 人被起诉。

该运动报道到国内和海外，直接激发了“三一运动”。

另外，由流亡在上海的朝鲜人组成的新韩青年党人也计划在巴黎和会前后掀起独立运动。

新韩青年党的金澈、韩松溪、张德秀、吕运亨、徐丙浩等派金奎植作为民族代表到巴黎，并决定派吕运亨到沿海州，派鲜于赫到国内，派张德秀到日本。

离开日本到达上海的李光洙，在上海码头邂逅了前往日本的张德秀和送行的赵东佑等人。李光洙经赵东佑介绍，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同上海独立运动接触的机会。

2 月 20 日，汉城独立运动本部代表玄楯和崔昌植携带准备发表的《独立宣言书》来到上海。

另外，汉城的情况，起初是以天道教的实权人物孙秉世、权东镇、吴世昌为中心推动着独立运动，但在中央高等普校的玄相允、东校校长宋镇佑、宝成高等普通学校校长崔麟和历史学者崔南善加入后，他们形成了中心。

不过，他们担心这会成为单纯是天道教教徒的运动，于是也吸收了基督教徒的中心人物加入其中。

起而响应的基督教徒有李寅焕、梁甸伯、刘如大、李明龙、吉善宙、申洪植、朴熙道、吴华英、郑春洙、吴基善、臧台永、李甲成、安世桓和玄楯等。

普校代表韩龙云、白龙城等也参加了。

这是 2 月 24 日的事，2 月 8 日以后，东京的留学生为了推进祖国的独立运动三三两两地回到故乡负责指导部署。

正巧 1919 年 1 月 20 日被称为李朝末代皇帝的李太王高宗驾崩。由于高宗因 1907 年的“海牙密使事件”而被伊藤强行剥夺皇帝的位置，他的猝死与皇帝所处的逆境及走向死亡的朝鲜实际相联

系，于是，皇帝是为日本人毒杀的传闻四起。而事实上是贼臣韩相鹤在日本人的唆使下，在米酒里掺了毒后献与皇帝致命的，这一传闻在朝鲜人胸中浇上了油，点着了火。

高宗的国葬定于 3 月 3 日举行，独立运动家们预计有数十万群众集结在首都，便计划借此时机于 3 月 1 日在帕高达 佛塔 公园发表《独立宣言书》。

崔南善起草的《独立宣言书》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义正辞严的名篇力作。但是，却遗漏了朝鲜人民对掠夺土地、剥夺民族之魂的同化政策、宪兵警察的镇压等等痛彻心腑的抗议。老老实实地寄希望于欧洲诸国的援助及唤醒日本的理性侥幸实现独立。

领导人们没有利用日本殖民统治的本质和朝鲜人民的革命力量，对选择暴力斗争犹豫不决。他们选择了只是呼喊独立万岁进行示威游行的和平方法。

本来预定的是 3 月 1 日在聚在帕高达公园的数万群众面前发表《独立宣言书》但后来却改变了当初预定的场所 怯懦的“民族代表”们失去了堂堂正正地站在大众面前的勇气。他们聚集在位于仁寺洞的饭馆泰和馆 他们自己分发了《独立宣言书》后 给警务总督府打电话自首申请被捕。这种丑态表明，随着“三一运动”的展开，他们的历史使命业已结束。这种结果不过是他们自己卑劣的态度所招致的。

尤其是这天 吉善宙、金秉祚、郑春洙、刘如大 4 人连会场都没到。与会的 29 人于 3 月 1 日下午 2 时在饭桌旁坐定后，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位置上分发了宣言书，以此代替朗读，之后由韩龙云致词，并以三呼万岁而结束。

他们被警察带走时，聚集在周围的民众不明真相，还以独立万岁之声为他们送行。

惭愧呀，惭愧！他们是了无战意的俘虏一并不是民族领导人。

很想掩饰这种事，现在却反而要说穿真相，就像犯了罪一样令

人痛苦不堪。

不过与这些‘民族代表’们的丑态不同的是，下午 2 时在帕高达公园，不知名的青年郑在瑢在三四千名群众面前堂堂正正地宣读了《独立宣言书》：“让我们在此宣布吧，朝鲜是独立国家，朝鲜人是自由民！”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场内‘独立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传播四野。接着进行的示威游行犹如火球滚过，为参加高宗国葬聚集起来的群众也与之合龙。这天参加独立运动的人超过了 50 万。

在此我们插些题外话。北汉山白云台是登山爱好者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在白云台最顶端刻着因旅游者踩踏而变得难找、模糊了的文字，仔细辨认可知其内容：

“己未年二月二十日朝鲜独立宣言书作成六堂崔南善”“己未年三月一日朝鲜独立万岁导唱首阳山人郑在瑢也”。是为了赞扬、纪念《独立宣言书》的起草年月日和起草者，以及首倡独立万岁的日子和人。不过现在却被来来往往的无心者踩得难以辨认，令有心人痛心不已。

言归正传，《独立宣言书》的宣读并没有就此结束，地方甚至偏僻山村都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和平示威转变为暴动。随着日本官宪的镇压逐渐残酷，抵抗变成了战争。运动从 3 月开始到 4 月达到最高潮。日本以镇压暴动为名增派了军队，分派到了朝鲜全国一千数百个所收拾局面，肆意进行冷酷无情的拷打、投监、屠杀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提岩里基督教会屠杀事件。

这种全民族的抗举虽然付出巨大牺牲并以失败告终，不过，毫无疑问，在朝鲜民众意识的提高及取得巨大的进步方面，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胜利。特别是这一运动扩散到国外的哈尔滨、延边、美国 and 夏威夷等地朝鲜侨胞社会。在延边，侨民们还袭击了日本领事

馆。

要想找到对“三一运动”的准确统计是很费劲的。

朴殷植先生在《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中列举了京畿道提岩里屠杀事件、京畿道狩川花树里纵火及残杀事件、汉城十字街屠杀事件等等很多起屠杀事件和野蛮行径。

根据同一本书中列出的统计表，府郡数 211 集会次数 1542，集会人数 2023097，死亡人数 7509，受伤人数 15961，入狱人数 46948，烧毁教会数 47 烧毁学校数 2，烧毁民屋数 715。

这惊人的数据是日帝殖民地统治下朝鲜人如何生活的有力证据。

另据日本官方资料，从 3 月到 5 月末，218 个市郡中，有 217 个市郡发生了 1491 次示威和暴动，有 200 万以上的民众参加。

这期间，工人罢工次数也达 102 次，参加人员为 1.1 万人，人数飞增。

不论男女老少，妇女也没有丝毫幸运，一旦被抓，就会被倒吊在天棚上，用烧红的火钩子烙烫，或用针刺扎全身，再就是由鼻孔往里灌水，这种拷问如家常便饭，被当作正常的初步的审查阶段之一景，连杀人、放火等也都被当作正当行为。

其结果从 3 月初到 5 月末，死亡 7909 人，受伤 15961 人，烧毁房屋 760 户，逮捕 46948 人，其中多数遭到杀戮。

另据统计，三四两个月期间，参加示威运动的人推算约有 50 万，骚扰 618 个所，骚扰次数为 848 次，在受袭的官公署中，面事务所有 47 个，宪兵官署有 3 个，警察住在所 28 个，其他邮局、法院、税官监视所、学校等有 71 个。死伤人数中，官方 166 人，普通人 29 人，“暴民”1962 人；被捕者 19525 人，其中妇女 471 人，被起诉者 10441 人，其中妇女为 186。这是根据总督府文书作出的统计数字，实际数字应该比这多好几倍。

根据山边健太郎写的资料，从 3 月到 12 月，逮捕人数为

26443 人 其中最多的是 3 月 为 12522 人 然后是 4 月 ,5000 人 ;6 月 ,1202 人 ;7 月约 500 人 ;8 月 662 人 ;9 月和 10 月约 200 人 ;11 月、12 月又分别增至 415 和 455 人。

从被捕人的职业看,农民占压倒多数,在全部 19525 名被捕人员中 农民有 10869 人 然后是工商业者 2510 人 教师、学生 2355 人。从社会阶层看,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有 3700 人 余下的有 15700 人。从年龄结构看,30 岁以下按青年算,约有 6800 人,30 岁~50 岁看作是壮年 有 7000 人。因而从结论上可以说,“三一运动”是朝鲜民族的中坚力量所为。

当时朝鲜人口约为 1700 万 工人数约为 4 万。不过 这一年期间都算上,参加独立万岁事件的人数达 2000 万,在炮火中丧生的朝鲜人超过了 10 万。

也就是说,170 人中就有一位同胞死于日本人之手。

受害程度是惊人的,然而,解放后韩日会谈似乎已使这一令人战慄不已的牺牲化成了泡影,实在令人气愤。我真想质问他们,是否把它当成了交易中的法码。

当时处置爱国志士的法律根据是为取缔暴动而制定的特别法 这就是 1919 年 4 月 15 日的臭名昭著的朝鲜总督府大正 8 年制令。其内容如下:

第一条 以政治变革为目的聚众妨碍或试图妨碍安宁、秩序者判十年以下苦役或监禁。但适用宪法第二篇第二章规定 内乱罪之项 则不适用本令。

第二条 触犯前条罪名者在暴露之前自首将获得减刑或免刑。

第三条 在帝国外违犯第一条之罪的帝国臣民适用于本令。

第二条和第三条作为维持治安法的前身,其目的在于镇压朝

鲜人的解放运动。

日本虽然以武力镇压了“三一运动”，但他们也领悟到单纯以武力政治统治朝鲜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一事件，总督改变了策略，武断政治变成了所谓的文化政治。

在表面上，宪兵警察变成了普通警察，官吏和教员穿着制服和腰间挎着东洋刀的现象不见了。同时，在一定的监视范围内允许朝鲜人发表意见 同意办《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等朝鲜文报纸。

在这种政策转变之中，日本人也暗藏居心。1918年日本全国爆发了米骚动，他们感到有必要将朝鲜扶植成为其稻米生产基地。日本从满洲将小米运到朝鲜给朝鲜人吃，同时抢走朝鲜产大米，全部塞进了日本人的嘴里。

“三一运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未给予任何援助。美国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 反而称此为日本的“内政问题”并且支持日本的镇压。

对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宣言》满怀期望的朝鲜终于明白那不过是幻想，是谎言。

不过，继朝鲜人民给予了日本殖民地统治以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也爆发了“五四运动”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这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一道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加了油，鼓了劲，使世界资本主义体制陷入危机之中。日本也陷入这一危机中，为破坏排日运动蓬勃发展的东洋政局而红了眼。

在必须死守朝鲜的前提下，徒有虚表的“文化政治”作为一种手段登场了。

但是，戴着“文化政策”面具的第三代总督斋藤实，1919年9月2日到达汉城车站正准备乘马车离开时，遭到炸弹袭击而清醒起来。刺杀未遂行动失败的是从沿海州携带炸弹潜入汉城的66岁老爱国者姜宇奎 字灿九 号日愚。他是基督教的信徒 还属于老人同盟团。尽管他轻松离开现场 但8天后却被日本的走狗金泰锡逮

捕,于 4352 年(1920 年)11 月 29 日被处死。

也许是斋藤实的文化政策第一步就与炸弹相对的关系吧,本来宪兵、警察合起来有 1418 人,改变政策后,增员到 16897 人,其后也没有中断增员。虽然口口声声文化政治,但本质上不过是武断政治的延伸罢了。

以《独立宣言书》起草者崔南善为首的 33 名民族领导人大部分被收买。只有在城北洞建立牛寻庄的韩龙云(万海)一人成为保持僧籍和气节的典范。连毒辣的总督政治对万海也无可奈何地举起了双手,这样的逸事不只一二。

变了颜色的这些人获得了其实质不过是养老院的中枢院参议之职,他们大部分作为民族主义者却丧失了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弥补这一空白开始成长的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扩大了自己在运动中的领导权。

作为总督的咨询机关,中央设置了中枢院,为了与之合拍,道设置了道评议会,府面设置了协议会。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朝鲜人高兴高兴以支持其殖民统治的伎俩而已。

教育说是改善了,其实没什么改变,最终仍不过是“殖民地奴化教育”。

在劳动条件上,1929 年当时成年男子,日本人工资为 2 元 52 分,朝鲜人为 1 元,成年女子,日本人工资为 1 元 10 分,朝鲜人为 59 分,不到一半。

在劳动时间上,1930 年左右,日本国内 8~10 小时以内的占 45.3%,10~12 小时以内占 46.3%,占绝大部分,而在朝鲜,10 小时以内占 29.5%,10~12 小时占 11.9%,12 小时以上占 46.9%。尤其是纺织业,在日本 88.3% 在 10 小时以内,而在朝鲜 82.2% 在 12 小时以上。与日本相比较,平均 2 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劳动被强行榨取。

当时的朝鲜,根本没有像劳动法之类的保护法令,对疾病、灾

害、失业没有任何补偿。就是说，工人就像是得不到保养的消耗品一样，或者说不过是奴隶而已。

这大抵就是日本人喧嚣、鼓噪的文化政策的真面目。

还有一个事件不可不提，日本认为延边的独立斗争如果波及朝鲜就将威胁到其对朝鲜的统治，于是 1920 年制造了所谓的“珲春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出动了大部队。但同年 10 月下旬在和龙县青山里战斗中日军遭到沉重打击大败而归。然而 1920 年 10 月 5 日~11 月 23 日约 50 日期间，日本军队以延边为中心对朝鲜人村庄进行了袭击，屠杀朝鲜人 3000 余名，烧毁房屋 2500 余家，粮食 3.8 万石。

这是文化政策暴露出的又一丑恶嘴脸。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政策无疑是经过修饰的骗人的假面而已。

不仅止于此，1923 年 9 月 1 日关东大震灾一发生，无辜的朝鲜人便遭受了任人屠杀的惨变。

明治维新以来，以武士道和大和魂为荣并以此装扮自己的日本固有的精神文化，不过是这种罪恶和野蛮而已。因而，文化政治自然也超不出野蛮的范畴。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及其后

就在“三一独立运动”的熊熊烈火逐渐要熄灭之际，在汉城分散的志士们又一一聚集到了上海。

这些流亡者估计一度达到过 1000 名。知名人士有玄奘、孙贞道、申翼熙、曹成焕、李光、李光洙、崔谨愚、白南七、赵素昂、金大地、南亨佑、李会荣、李始荣、李东宁、赵琬九、申采浩、金澈、鲜于赫、申锡雨、吕运亨、吕运弘、金东三、韩镇教、秦熙昌、申铁、李汉根、赵东珍、赵东佑、玄彰运等。1919 年 4 月 10 日他们聚集在上

海法租界召开了第一届临时议政院会议，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任命李光洙、白南七为议政院书记。

这次会议定国号为大韩民国，选出了国务委员。

国务总理李承晚，内务总长安昌浩，外务总长金奎植，财务总长崔在赫，交通总长文昌范，军务总长李东辉，法务总长李始荣，国务院秘书长赵素昂，内务次长申翼熙，外务次长玄楯，财务次长李春淑，交通次长鲜于懋，军务次长曹成焕，法务次长南亨佑。这就是临时政府的开端。

同时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法。

这天是大韩民国元年 4 月 10 日。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第一条规定“大韩民国为民主共和制”。

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在李朝 500 年君主政治薰染、压抑下的百姓能够选择主权归于人民的民主共和制，这在 5000 年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大转换，是惊人的进步。

不过，这在当时不过是理想而已。既无国土也无人民的流亡政府如果是为将来设计的蓝图倒也罢了，而在现实上也许只是个空洞的具有大韩民国魅力的面具而已。

然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不只限于上海。

“三一运动”当时以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中心，从满洲和国内来到俄领的同胞超过了 50 万。

这时在俄领方面活动的志士有李范允、柳麟锡、李相高、赵琬九、李东辉、朴殷植、申采浩、洪范图、张志渊、安定根、文昌范、柳东悦、李东宁、金学万、李甲、曹成焕、金东三、元世勋、金翼直、严柱弼等。

他们在“三一运动”之前，于 1917 年组建了“全俄韩族会中央总会”。同年 6 月，各代表会聚于尼古拉耶夫斯克，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组织。

1919 年 2 月，中央总会改称“大韩国民议会”，选举文昌范为

议长，金万谦为副议长。

此处国民议会决定的内阁由总统孙秉熙、副总统朴泳孝、国务总理李承晚、度支总长尹铉镇、军务总长李东辉、内务总长安昌浩、产业总长南亨佑、参谋总长柳东烈、和平大使金奎植等组成。

1919年9月15日，俄领代表元世勋在临时政府议政院提出“合并俄领大韩民国议会和上海临时政府议政院，政府位置定在俄领”并进行了讨论，但是当时通过的事项未能落实。此后所谓俄领派与上海派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

另外，还要提一提一个政府组织，即汉城政府的建立。换句话说说是国内派的活动。

1919年3月16、17日光景，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们聚集在汉城内秀洞64号现职检事韩成吾家，决定4月2日在仁川万国公园举行十三道代表大会，成立临时政府后，公之于世。他们组织了临时政府，选出了阁员，政府名称为“汉城政府”，避开总统制，仍沿用帝国式的名称。

当时的组阁名单为：

执政官总裁李承晚，国务总理李东辉，外务部总长朴容万，内务部总长李东宁，军务部总长金奎植，交通部总长文昌范，劳动局总办安昌浩，参谋部总长柳东烈，次长李世荣等。

存在以上三个政府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独立运动家们为实现统一政府作出了各种努力。其结果，在上海成立的临时政府包容了俄领的国民议会，并对自身进行改造，成功地实现了与汉城政府的一体化，而告一段落。

1919年9月15日改造了临时政府，国务院组成名单一发表，就让俄领的李东辉，杭州的李东宁、李始荣、申圭植赶到上海，11月3日在法国租界康宁阳里3号居留民团（侨民自治团体——译者注）事务所举行了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职仪式。

但是，1921年4月19日却有54人联名发表了声讨文章。檄

文开篇便点明声讨的理由：“我们要向 2000 万兄弟姐妹列举李承晚、郑翰景等人对美委任统治的求援和提出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求援的事实并声讨其罪行。”对威尔逊总统的亲日政府茫然无知，反而寄予过大的期望，并任意请求委任统治，当然会招致这样的结果。

企图依靠以掠夺殖民地为本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实现独立，这本身就很滑稽可笑。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伊尔库茨克打倒华盛顿会议的口号之下召开了远东劳动者大会。大会于 1922 年 1 月在莫斯科正式召开，远东地区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在远东殖民地、宗属国代表及日本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这一结果产生了新局面。

从这时候起，上海临时政府便进入衰退期。其重要原因在于不了解临时政府的本质而聚集来的野心家们一个一个地堕落下去，还有一个原因是朝鲜总督府的收买政策获得了成功。

例如 创办于上海的独立新闻社社长“三一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李光洙在上海结识了一女子许英淑后，不辞而别，背着同志们逃回了汉城。他通过朝鲜总督府的关系进了东亚日报社，令国内外众多同胞大失所望。作为文人虽曾一度声名显赫，但从背叛同胞的意义上，不少人认为他是变节者。

还有一个问题，临时政府内部经常出现一些麻烦事。1923 年 4 月 25 日 赵德镇、金斗万等 13 名议员在临时议政院会议上提出了署名的《临时总统李承晚弹劾案》对 1921 年 5 月 17 日从美国回到上海谋求临时政府团结的李承晚进行弹劾。

理由是，未经国务院同意或部署滥发命令。还有，任意挥霍大韩民国元年的 500 万元外国公债，随意使用欧美委员部的钱等。

本来，李承晚曾因请求委任统治援助事件而遭到非难，这次再度成为攻击对象，局面很难收拾。但是，当时议政员的在籍数为 30 余名，因未到法定人数，没能召开会议。1923 年和 1924 年 没能同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过有效的战斗，感觉好像只顾窝里斗了。

1925年3月11日第13届临时议政院通过了委员长罗昌宪委员郭献、蔡元凯、金铉九等提出的内容为“免去李承晚临时总统职务”的弹劾案。

这一提案通过的1925年就是朝鲜共产党4月17日在汉城创建之年。其后随着左翼势力兴起，临时政府日趋衰落。

朝鲜独立运动大体以此前后为界分成了两股。变成殖民地后便没落的庶民阶层接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逐渐发展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可以说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援助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另一条路线则是与从前一样的民主主义和独立运动。这两派选择了各自不同的路线投入到斗争当中，但是，他们只是在开展独立运动的方法上存在差异，在“八一五解放”之前相辅相成，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过，在没有了日本这一共同的靶子之后便完全脱离了工人和资本家对立的范畴，演变为同族间的敌对关系，加深了国家分裂的不幸。以大炮取代长枪进行你死我活的血斗，这种野蛮行为究竟是为了谁？要找到答案实在太难了。

在苏联的独立运动主流同在上海和满洲组成临时政府的势力正好相反，变成对立的集团，脱离临时政府而支持中共的势力和国内数派政治势力形成两大块，分别支持美苏一方的占领军，这是今日我们的悲剧的开端。

“一块土地上两个国家两个统治者”这不会成为我们永远的理想。现在忠诚祖国的命题莫非就是坚持民族分裂？我们深表忧虑。

我们决不能作为大国的工具，成为其牺牲品。

言归正传，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恐慌的余波使日本资本主义面临危机，为了打开国内外的困难局面，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

发动了所谓的“满洲事变”成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

至此为止，以中国东北为中心开展活动的独立运动遭到了巨大打击，不仅支离破碎四散而去，而且，在日本只要归顺便既往不究的狡猾的宣传下，相当数量的知名人物向日本屈服、变节。连金翼大、高劫信、李卓等在北京、上海等关内的人也变节转而向日本人谄媚。

在朝鲜独立运动坎坷、曲折的历史中是很难找到像这时期这样直面灭绝境地的时期。他们并不是仅仅变节便了事，摇身一变成为日军侦探，助纣为虐者不在少数。

在陷入这种困境的时期，给独立运动注入勃勃生机的是 1932 年 1 月 8 日韩人爱国团员李凤昌刺杀日皇未遂事件。该事件被称为日本人樱田门炸弹事件，李义士于同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 2 分走上刑场英勇就义，成为杀身成仁的榜样。

同年 4 月 29 日，韩人爱国团员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制造了投放炸弹事件取得巨大成功，这不仅是朝鲜独立战线的喜悦，也使在上海事件败北的痛苦中呻吟的中国国民心中掀起了波澜，鼓起了勇气。尹义士于同年 12 月 19 日在日本大阪被杀害。

这两起事件之后，中国国民政府和韩国临时政府之间强化了新的认识。1937 年 7 月 7 日中日战争爆发后临时政府也随中国政府迁移，在重庆迎来了祖国解放的喜悦。

其间 1940 年 9 月 17 日，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很多韩国青年作为中国军人参加了抗日战争。

不仅如此，从战争接近尾声的 1945 年春开始，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也在韩国光复军和美国 O.S.S(战略情报部)之间进行。

就是说，两义士的壮举成为韩国独立战线的转折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临时政府也好，独立运动也好，都完成了同样的使命，政局转向了国内。

自 1919 年临时政府在上海诞生以来，以 1932 年前述李尹二烈士事件为契机，分散到南京和杭州开始，到 1940 年 9 月迁到重庆时为止，8 年间，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迁移了八次。

杭州时间比较长，有 3 年半，然后是嘉兴 1 年零 4 个月，长沙 7 个月，广东不到 3 个月，柳州 5 个多月，重庆是终点。

关于临时政府这里再谈一件事。

那是 1938 年 5 月 7 日临时政府在长沙时的事。在国务委员金九、军事委员玄益哲、柳东烈、李青天所在的地方，阴险的李云焕跳了出来扣动了扳机。玄益哲在现场身受重伤，不久即告殒命，李青天受轻伤在家中治疗。白凡和柳东烈、春郊身受重伤，住进了湘雅医院，治疗一个月后才出院。

李云焕，义州生人，他自白说第一目标是白凡。其同谋嫌疑有姜昌济、朴昌世、李昌基、申基彦、韩成道、宋昱东等人，但由于临时政府没有侦破权，根本不可能查明真相。

不仅如此，中国当局撤离长沙时还释放了同谋者，连李云焕也在途中逃脱，最终其背景也没有弄清楚。

作为独立战线中的不幸事件本想加以掩饰，不过，这事件实在令人莫明其妙。

金佐镇（白治）将军也因相同的命运离开了人世，韩国青年前进工作队队长罗越焕也被一个名叫朴东云的家伙夺去了生命。

认为这帮家伙是出于个人感情所为似乎有些不合情理，而认为这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策划、唆使破坏独立战线工作的一环或许更为正当。换句话说，认为是日军特务工作的影响所及，或是革命阵营中的派别斗争所致，倒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推理。

“六十”万岁事件和光州学生事件

以上我们考察了海外朝鲜独立运动的变迁。下面整理一下国

内的变迁情况。自‘三一运动’以后，一如既往地主张不妥协的反日独立运动的团体和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实现“自治”的派别抬头，围绕着独立方案莫衷一是。在上海组织的大韩民国政府在1924年也因左右对立与纠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在东京起草《二八独立宣言》的李光洙也没了三年前的气概，于1922年发表了《民族改造论》。他供职的《东亚日报》不知是否由于湖南财阀经营的缘故，而发表了主张“自治论”的社论。

这两种主张固然可以认为是在日帝监视下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为而给予同情，不过，我疑心这会不会是给朝鲜独立运动泼冷水的有预谋的干扰工作之一环呢？

由于这种带有渐进主义、启蒙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力量的不稳固和领导观念的茫然，运动缺乏为吸引朝鲜人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而应具备的说服和组织力。

1920年以后，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工人和农民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

1925年，该势力创立了继承了马克思血脉的朝鲜共产党。在此之前的1920年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相对抗，以李东辉为中心的‘高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左翼势力领导的独立运动以崭新的面貌迅速发展。

1926年4月末，最后一位大韩帝国皇帝纯宗去世，亡国的悲愤和对日帝在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产生的怒火重新燃烧起来。抓住这一机会，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爱国的青年学生及朝鲜共产党员联合起来，以葬礼之日6月10日为期，秘密开展了全国性的反日独立斗争的准备活动。

天道教的朴乃元、权东镇、杨在植、孙在基，社会主义方面的权傲雪、金丹野、李志泽、朴民荣等，京城大学生李天进，延熙专校学生李秉立、朴夏均，中央高普李光浩、李光熙，印刷职工闵昌植、李

龙才、李杭俊等为主导人物。

他们与全国各地取得联络，将 5 万份传单发送到主要城市，计划在 6 月 10 日举行盛大示威运动。但是，由于有了“三一运动”的经验，日本官主事先逮捕了社会名望高的人物，而且阻止人们上京参加葬礼，并布下了严密的警戒网。

然而，6 月 10 日，送葬的队伍一出昌德宫，便哭声四起，独立万岁的呐喊声如旋风卷起。

这天，日本在全国布下了警戒网，尤其是光汉城就集结了 8000 名军队，仁川海域事先出动了“平户”、“雾岛”三艘军舰待机行动。约 40 万市民挤满了送葬的路，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其中三四万人参加了游行，日本军警不分老幼进行残酷镇压，在各地诱发了流血冲突，有 160 人受伤。而且，仅当天就有 200 名爱国者被逮捕。

这第二次万岁运动在利用国王葬礼这点上与“三一运动”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军警在全国布下警戒网，运动只局限在汉城、仁川部分地区。

不过，这表明了朝鲜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坚定信念，在“三一运动”7 年后，作为民族自觉的解放斗争，为朝鲜独立运动指明了新的方向。

只是在这一运动中，以朝鲜共产党的檄文在汉城被发现为开端，权傲雪被逮捕，由于他开了口，随后党员们接连被捕。逮捕与党的重建交替进行，1928 年 3 月进行了第三次逮捕，8 月进行了第四次逮捕。

“六十万岁运动”第二年 1927 年 2 月以《朝鲜日报》的干部、民族主义者申锡宇、安在兴、金俊渊、白宽洙等为中心，此外还聚集了 17 人公布了新干会组织。

其纲领的内容如下：

(1) 谋求最终解决朝鲜民族的政治、经济问题。

(2) 巩固民族团结。

(3) 否定妥协主义。

除民族主义者外，共产主义者、工人及农民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首任会长由独立协会的领导人李商在当选，从一开始就排斥自治运动，致力于民族权利的恢复。在日本警察严密监视下，仍然在全国各地自不用说 在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等地建立了支部 会员一度达 3.7 万人。

另外 同年 5 月还组织了新干会的姊妹团体 槿友会。该组织是为妇女运动组织的，意在让妇女一同参加抗日运动。

世界经济大恐慌之后，日本在全国法西斯化同时，镇压也进一步残酷，随之，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系出现了困难，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矛盾加剧，民族战线的力量难以维持。到了这种地步，新干会便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解散 以不到 5 年的短命而告终。

不过，它使朝鲜所有阶层的运动更加积极起来，而且强化了相互的连带性 为 20 年代后半期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令人不能忘怀。

不仅如此，在与世界列强打交道时，作为国内代表朝鲜人的唯一团体承担起政府的职能，留下了独特的风采。

“三一运动”和“六十万岁事件”之后延续的韩国独立运动的主体变成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租地争议、劳动争议、学生运动、思想运动、共产党事件等一系列运动形成了新的民族运动的特色。

尤其是劳动运动，1927 年，朝鲜劳动总同盟作了发展性的解体，分解为朝鲜劳动总同盟和朝鲜农民总同盟，强化了组织。前者将 158 个团体和 20638 名工人 后者将 32 个农民团体和 24180 名

农民成功地集结起来了。

从 1926 年到 1931 年间共发生 761 次罢工，有 68545 名工人参加，其中有代表性的斗争是 1929 年的元山总罢工。

农民运动，在 1926 年至 1931 年间也发生了 3212 起租地争议，有 29912 人参加。

学生们则由于殖民地化的祖国和民族歧视而发起运动，愤起反抗，从 1920 年起到 1928 年止，发动了 453 起联合罢课行动。

其中名声最大的事件是光州学生运动。

1929 年 10 月 30 日，在光州和罗州之间走读的学生在火车上遇到日本学生对朝鲜女学生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使朝日间发生纠纷。在光州车站下车后，双方开始混战起来。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不问情由便单方面殴打、拘禁朝鲜学生。第二天，《光州日报》刊登了歪曲事实、蔑视、非难朝鲜学生的文章。不仅学生，连普通市民对此都愤愤不已。不仅如此，31 日早晨，校长以下军事教官和体育教师等还让 300 名日本中学生背着步枪集结到光州车站威胁朝鲜走读生。闻听此讯，光州市内 200 名朝鲜学生也聚集起来，形成一触即发的严峻事态。附近一直关注这种事态的磨坊工人和市民给赤手空拳聚集起来的朝鲜学生送来了木拌子。

混战虽然开始，但这次赶来的警察仍然只是殴打、拘捕朝鲜学生。

这种因为是殖民地百姓的缘故而受到的民族屈辱和压迫并不能使朝鲜学生屈服。11 月 3 日尽管是祭日明治节，但光州市内的学生还是断然采取了统一的联合罢课行动，在市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还袭击了光州日报社，捣毁了报社的机器。

日本警察连消防队和复员军人都调动起来取缔学生运动，将朝鲜学生逮捕入狱。

11 月 11 日，光州学生再次起义，他们高举“废除殖民地奴化

教育制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朝光州监狱行进。

汉城成立了光州学生运动指导委员会，决定 12 月 5 日开展全国性的统一的联合罢课和反日示威。这天，全国高等普通学校和专门学校一致罢课。

从 1929 的 11 月至 1930 年 4 月 6 个月间，有 54 所普通学校，136 所高等普通学校，4 所专门学校，合计 194 所学校参加了反日活动。延边也有 8 个学校举行了与这一活动相关连的万岁示威。参加的学生数总计达 5.9 万人，是“三一运动”以后最大的抗日民族运动。

在釜山和仁川，工人们举行了声援罢工，全国爱国志士们对此给予了支持。

特别是新干会，有 13 名干部以援助学生运动之名被逮捕，1931 年被迫解散。

以上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对日本侵略进行的民族抗争的大致情况。

不过，“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对朝鲜民族运动进行了彻底的镇压，同时把目光转向同化政策，推行抹杀民族的政策。

但是，朝鲜人民并没有屈服，在朝鲜国境地带展开了抗日游击斗争。据总督府统计，从 1931 年到 1936 年在朝鲜对岸中国领地内，抗日游击队出没次数为 23928 次，参加的人员有 1369027 人次，夺取枪支 3179 支。这同在中国加入八路军的朝鲜义勇军势力和临时政府所属光复军的活动一起，使到 30 年代质与量都达到高潮的朝鲜独立运动的活动一直开展到“八一五解放”。

让我们再来看看“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朝鲜的产业情况吧，在主要产业资本中，日本人的资本支配率占 90%，民族资本的支配

率只有 6%。可就连这些硕果仅存的民族资本也是协助日本侵略、参与压制朝鲜人的卖国资本家，这是日本人的评价。

朝鲜人企业家中有名的有闵大植一族，以及金季洙和朴兴植。

闵一族是朝鲜人中的首富，其资本主要投入到金融证券上，并没有直接投入到产业中。为了保全财产、农田和经营不动产，拥有了有 2500 万元资金和永保合名会社和有 200 万资本的桂成株式会社，还拥有兆兴银行的前身有 400 万元注册资本的东日银行。还以持股形式对多个产业进行了间接投资。

金季洙的中心产业有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的京城纺织和有 300 万元资金的元义山洋社。

朴兴植拥有以注册资金 100 万元的和信百货店为中心的和信连锁店，还支配着注册资金为 275 万元的和信贸易和经营不动产的大同兴业。而且在战争中建立了“朝鲜飞机株式会社”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在上海 宋昌植开办了精密株式会社 生产武器 协助日本 这也是不容隐瞒的事实。

就是说，韩国的所谓企业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资金上都微不足道。

亲 日 派

既然话题扯到了亲日派，那么就再扯扯关于亲日派的两桩事吧。

那时，部分朝鲜知识分子中有人自觉自愿地加入日本推进“日本臣民化政策”“大东亚共荣圈”“完成圣战”等侵略政策的行列中，以表现自己的存在。也许是出于过快地确信日本胜利的“机敏”吧，反正称他们是“大本营指令的信徒”也无可非议吧。

曾经是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有朝鲜近代文学舵手之称的李

光洙早早就创氏改名成了香山光郎。从 1940 年起,不知是什么缘由,在日记中经常混用一些日本和歌,如“大君御惠乌给肴,获得天皇恩宠之意”“天日子和现神那雷巴(由于与老天所生形体相像的现存神人的缘故之意)”等吹捧阿谀日本天皇的字样充斥其间。这种情况在田中英光写的《醉汉之腹》中就有记载。

还有一人,就是曾任大韩民国总统的朴正熙,他就是从满洲军官学校毕业并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之后,分配到关东军任陆军中尉的高木正雄。据兰星会发行的《满洲国军》一书记载,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镇压朝鲜人民的抗日独立运动中冲在了前面。

一度在市井误传其创氏改名为“冈本实”,他也称那只是祖国命运使然,不是他的罪过。

不过,通过政变攫取一国总统之职后,也许是错觉成日帝统治的延伸的缘故吧,朴正熙长期肆行亲日军事独裁,镇压国民,作为朝鲜民族,我们不能不为此而感到羞愧。

作为其业绩,他在忠清南道牙山建造了白衣从军的忠武公李舜臣将军的显忠祠,还在光化门十字路口等多处树起了忠武公铜像。很多国民都觉得这看起来是件了不起的事。不过,也有国民认为,在壬辰倭乱时的 1598 年 11 月同入侵的倭兵海战中击毁敌船 300 艘,并在战斗中中弹牺牲的忠武公,由曾是日军中尉的朴正熙来敬奉是一种亵渎,而表示出强烈不满,特别是有不少人解释这是利用国民对忠武公的崇敬心理掩饰自己的过去,助长权威意识的一种手段,是在作戏。虽说立场不同,观点也不同,不过这种解释还是值得一听的。

但是,被指摘为“亲日分子”的人至今赫赫然能够掌握这个国家的主导权并不令人惊奇。作为接续美军政的国家,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吧。

关于亲日派的参考书籍我们介绍一下林钟国写的《亲日文学论》和《日帝侵略和亲日派》两本书。再读读他翻译的《醉汉之腹》也

是饶有兴味的。

在抵抗过日帝侵略的大众面前，能把自己的名字仨字写得端正正的人作为亲日派凌驾国民之上，既令人齿寒，又令人羞愧。一个不过是衙役的人错以为自己是日本臣民而成为使同族痛苦不堪，像对待奴隶一样进行压榨的走卒，与其说这是悲剧，其实分明又是喜剧。宣读皇国臣民的誓词之罪难道也要归咎于国运……

下面关于亲日派再更细致地谈论一下。

被称为亲日派的人并不是渡过朝鲜海峡而来的人，他们的血管中也流着韩国人的血液，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北朝鲜以“八一五”铲除了亲日派为荣。而在南韩 压制过独立运动的殖民主义势力亲日派与李承晚势力相勾结摇身一变为亲美势力，很快就戴上了亲美派的面具，成功地把自已装扮成为爱国者。他们开始围攻民主主义为反美、叛逆者，利用三八线将南北分断之机，以反共正宗势力的面目出现，一律套用反美即拥共这一固定的模式，起到了帮美国大忙的作用。

而且，他们还让人们相信领导层的安全乃至旧亲日派——现亲美派的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及政权的安全。他们躲在这种屏蔽之内，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倒政敌，在庇护渎职、腐败现象时毫不迟疑地冲在前面。

巧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国民的眼里，亲美派的过错和腐败都是美国的责任，于是这成了反美呼声越来越高的缘由。

在“美国佬回家去”的呐喊声中，选择亲日派掩饰其阴谋和背信行为，很难说没有美国的过失。

恐怕亲日派是连美国优秀的医药都无法清除的痼疾病菌吧。

1910 年韩日合邦以后，韩日两国通过暴力维持着殖民地关系。

1931 年日本侵略东北战争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一爆发，不仅

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也面临大转换的契机。

接着，1937年中日战争一爆发，韩国距离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便更近了一步。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跳入被称为所谓太平洋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韩国的解放作为现实问题便指日可待了。

结果，日本在侵略战争中虽然成功地占领了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想完全吞掉中国如此广袤的土地和众多人口绝非易事，而且打破国际社会的均衡对他国他民族也是不能容忍的重大问题，因而最终只能面临决战的局面。

最初的胜利被日本错觉为战争的终结。而且军人独裁体制还剥夺了国民视听说的权利，作为领导力量也缺乏高瞻远瞩的洞察力。不懂得科学和物质是现代战争致胜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简单道理，想依靠谁都不信的“大和魂”及木炭汽车和代食品来打现代战，纯属误算。

这既可笑又愚蠢，不过，日本的贸然之举对韩国人来说却是幸运的，值得感谢的。不仅如此，说句歪理，日本蹚入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对东洋的和平还是中国的解放都是一大贡献。

日本战争使东洋重新找回了和平和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心希望他们悔悟，为他们点拨“善邻之道”者，不会只是笔者一人。

再回过头来看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朝鲜海峡的海运得不到保障，因而日本便构想在朝鲜建立粮食、工业和军事基地，这是为建立所谓“大陆兵站基地”而实行的朝鲜产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为此日本在朝鲜实行了朝鲜人创氏改名，强制供应粮食，强行征用朝鲜人，由志愿兵制改行征兵制等政策，并通过使用日语、穿国民服、参拜神社、国民总同盟朝鲜联盟、国民捐资、女子服务队、皇国臣民誓词、不逞鲜人、爱国班、警防团等等有所为的黑暗

和刑讯的地狱掠夺朝鲜的资源 and 生命。

这既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为避免战败所作的最后挣扎，也可以说这是获得解放的祖国韩国诞生所付出的重大牺牲和阵痛而聊以自慰。

朝鲜语学会事件和殖民统治下的牺牲

最后我们再谈“朝鲜语学会事件”。

日本人的“内鲜一体”也好，朝鲜人的“皇民化”也好，都是为了同化朝鲜民族。日本鼓吹所谓的“使用国语”强迫使用日本话，限制使用朝鲜语和使用朝鲜文字的印刷物。

在这种情况下，由朝鲜人组成的“朝鲜语学会”编纂了《韩字大辞典》。与其说这是为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朝鲜语，誓死捍卫民族固有文化的学术研究，不如说这本质上是独立斗争。

朝鲜总督府对语言学会没有自动解散反而编纂辞典一事视如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10月1日，他们制造了“朝鲜语学会事件”，以违反维持治安法嫌疑逮捕了很多会员，拘禁在咸镜南道洪原警察署。所谓维持治安法是处罚“以变革国体、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组织结社者”的法律，而朝鲜语学会与私有财产制度并没有关系，与变革国体也并不相干，完全抛开了对法律的正确解释，而对朝鲜人进行疯狂镇压。

1942年10月1日，李允宰、李克鲁、崔铉培、金允经、郑寅承、李熙升、张志暎、韩澄、李重华、权承昱、李锡麟等，21日李康来、李秉歧、金善琪、李万珪、郑烈模、金法麟、李佑植等，23日尹炳浩、徐承孝、金良洙、张铉植、李仁、李殷相、郑寅燮、安在鸿等，1943年3月金度演、徐珉濠等分别被逮捕。

在咸兴检察院，大部分不起诉或推迟起诉，被起诉的有李宰允、韩澄、崔铉培、李熙升、丁泰（10月1日之前因其他案件被捕，

后卷入语学会事件中)李克鲁、李重华、金良洙、金度演、金法麟、李仁、张铉植等 12 人。由于拷打、粗劣的饮食及难以忍受的环境, 1943 年 12 月李允宰, 1944 年年 11 月韩澄死于狱中, 只有 9 人在公判中被判 2~6 年徒刑。丁泰镇刑期短而在服役, 张铉植无罪释放 其余 8 人不服上诉。

1945 年 8 月 15 日解放的前两天, 他们的上诉被驳回, 但两天后, 他们便全都喜获自由。

这就是“朝鲜语学会事件”的真相。就是说这是学者们怀着祖国语言在被抹杀的悲痛自觉捍卫民族语言的凄绝事件。

朝鲜语即我们的国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发展起来的祖先们用生命维护的宝贵文化财产。不, 可以说是民族本身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 移居海外的人或是部分年轻人, 没有认识到国语的宝贵, 疏于对后代的教育, 这种令人寒心的事并不鲜见。

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地球何处, 没有不懂母语的人, 可以说他们不想丢掉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印度的通用语是英语。与其议论中国和印度的民族性如何, 不如说其将来如何似可预测。

对在“朝鲜语学会事件”中经受拷打和死亡考验而被捍卫了的国语, 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

“大陆兵站政策”给朝鲜带来的牺牲很难作出准确统计。

1904 年以前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包括留学生不过 229 名 人数很少 到了 1945 年 超过了朝鲜总人口的一成 增至 240 万左右。这一数字的增加说明了围绕近现代史朝鲜人所受的生活苦难和日本的强制迁移。特别是 1935 年 30 万, 1940、1941、1943 年各 22 万, 1945 年超过 42 万, 被强制迁至日本为其侵略战争卖命。

这一是可以强化日本的战争能力, 二是为同征兵制一道起到与抹杀朝鲜民族政策一致的双重效果。

另据统计，为抵消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朝鲜人被强行征发到日本矿山和土建业干活的人员从 1939 年起到 1945 年有 66 万人。据 1945 年 3 月的调查，在日本煤矿干活的朝鲜人、中国人及俘虏合计有 15 万人，相当于日本工人的 6 成。

另据其他统计从 1939 年起的 6 年间，有 72.5 万朝鲜青壮年被拉到日本，到煤矿的有 34 万名，土木工程有 11 万名，矿山有 7 万名，他们受尽了奴隶般的虐待，6 万人死亡，很多人都逃跑了。

再据别的统计，朝鲜人被征往日本和外地的情况，1941 年应海军的要求，为从事南方紧急土木工程，从海军工程爱国团拨出 32248 人；应陆军的要求，北部军经理部要员 7061 人，美、英俘虏监视要员 3223 人，运输部要员 1320 人，此外，还派不少军要员到日本、中国（包括满洲）、南洋方面。到 1944 年为止，直接在战斗中死亡者有 2142 人，失踪者 735 人。

另外，根据国民征用令强制征集的朝鲜劳务人员从 1942 年 1 月到 1944 年止为 22785 人。这些劳务人员在日本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大湊、镇海各海军设施部和南方劳动，再到 9 月为止按分派计划分配了 9500 人。这些劳务人员在南洋军岛约有 5000 人，塞班岛有 79 人战死。

这应该看作是朝鲜总督府的末期现象，1938 年 2 月，总督府公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又，1943 年公布了《海军志愿兵令》。

尽管这是出于补充日本军队兵力不足的现实需要，不过，在“内鲜一体”的招牌下，反倒像是日本给予了很大惠泽。

他们办起了志愿兵训练所训练志愿兵。朝鲜全境 1938 年有志愿兵 2946 人，1939 年为 12348 人。1938 到 1942 年，志愿者总数为 363994 人，采用者有 1 万余名。

这么多的志愿者名义上是志愿，其实是通过指标强迫的。他们决不是战争英雄，而是战场上的炮灰。尤其是他们还承受着为仇敌

侵略者献出宝贵生命的矛盾和屈辱。

志愿兵制度取得明显效果后，1942年5月9日，名为南次郎的朝鲜总督宣布实施征兵制，该制度同1943年公布的要在朝鲜实施的“动员学生兵”一道将从1944年起实施。为此，1942年11月制定了《朝鲜青年特别培训令》进入准备阶段。1942年开设了741个培训所，1943年开设了1922个培训所。

可笑的是，作为征兵制的报偿，让朝鲜人拥有了参政权。不过，这并不是以朝鲜自治或独立为前提设置朝鲜议会，而是按百万人口选一人的比率，在整个朝鲜选出23名议员参加日本国会。而且是只有缴纳国税15元以上者才有权参加的限制选举，因此，不过是与朝鲜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的欺骗性参政权。

应该说，这不过是效法英国统治印度政策的帝国主义用来利用殖民地人民的空头支票，是为暂时避免战争时的痛苦而施展的一种骗术而已。

实施征兵制后，1944年7月壮丁总数为266225名，其中朝鲜居民213366人，因52859人住在朝鲜之外，应试人数包括归鲜应试者在内预计有218659人，但征兵时应试人数为206057人，有12602人没有参加。

到1943年为止，因志愿兵令而强迫当兵的朝鲜人约1万人，通过征兵调动的朝鲜军人，陆军有18.7万，海军有2.2万上了前线。随军人员主要派到南方，在飞机场及其他工程的从业人员超过了14万人。清楚的数字，军人和随军人员合计有36.5万名。此外，朝鲜妇女作为日本士兵的慰安妇多数被调到前线。

与此略有不同的是在日本方面发表的统计数字中，派往前线的朝鲜士兵有229934名，其他军需人员达15万。

正如上面列举的数字一样，即使不算殖民地统治下的牺牲，朝鲜人作为战争的直接牺牲品，战死者也很多。

但是，脱离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在归还住在撒哈林岛的朝

鲜同胞问题及原子弹爆炸中的朝鲜人受害者的待遇上，以没有日本国籍为由，回避责任，这是自诩为世界一等国民的日本人卑劣的劣根性的表现，应当引起世人注意。

此外，日本通过供出制度这种掠夺机构，于 1938 年将 1000 万石朝鲜米运到日本，其后虽然连年遭灾歉收，但仍运到日本 500 万石。1943 年起，制定了事前确定供出米量的指标制，无论是否遭灾，朝鲜米都被抢到日本去。

农民以低于生产费的“公正价格”卖得的回款中，10% 被夺走作为金融组合的强制储蓄和国防捐资。

被夺去粮食后，韩国人在配给制度下，只能将豆饼当口粮，以此充饥度日。

明火执仗的强盗也不过如此。

此外，从 1937 年起，在朝鲜实行了军事费特别会计操入金，1941 年为 9456.8 万元，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开始后，1942 年一次就收了 16321.2 万元，战败前的 1944 年增至 41407.5 万元。

想到这么多的金额都是朝鲜人民的血汗钱时，足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的富就是殖民地百姓的民脂民膏。

在此很想列举一组统计数字，但因材料搞不到手没能列出，颇为遗憾。

我想列举的不是别的，是犯罪人的统计，是除去统制经济中产生的经济犯外的违反《维持治安法》的政治犯统计。

日本逮捕的人数为 1938 年 930 人，1939 年 853 人，1940 年 682 人，1941 年 1049 人，1942 年 1376 人，1943 年 866 人，1944 年 422 人。

虽然没说明这是以当时日本全国为对象的统计，但如果看作是局限于日本本土的统计，那么，朝鲜人政治犯的数字是多少呢？实在令人纳闷。

九、结束语

“只剩下两个”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这句话表现了弱小民族在人类历史和生存竞争的激烈斗争中对美苏两国的看法，这既含有在空间、资源、劳动力还有科学和军事力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超过这两个国家之意，也含有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可以生存下去之意。能够完全实现自立经济和自主国防的国家，除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外找不出第三个，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敬畏举世皆然。同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现存的这两个根深蒂固的国家，其性质可以用老牌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术语相区别。经济学者们虽然使用金融资本主义的术语，不过，从债务关系区分为债权者和债务者国家群的债务关系上看，也可以解释为两个正在饱食的黑手党帝国。

不仅如此，美苏两个对立的国家选定为假想敌的敌对国家最后只剩下两大强国，这有着政治学的意义。两大强国努力维持着支配世界的现存体制。换句话说，不是作为竞争对手，而是作为合作者和伙伴成为必要的存在。在不少场合，两国都表现出了这种关系。

这两个国家将很多卫星国以及伙伴国家拢在一起两分世界，即以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内容的自由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

不过这种两分的世界并不是偶然地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其根源可以从 18 世纪后叶产业革命后的 1776 年美国从独立和 1789 年推翻封建制度的法国大革命，以及 1917 年的苏联布尔

什维克革命中寻找。如果把眼光放开点儿的话，这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期竞争中出现的现象而已。

不过，形成美苏两国和国家群的直接原因不应该从《资本论》或唯物史观中寻找，而是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查寻。

1933年1月，希特勒完成组阁确立纳粹独裁统治时，及之前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东北战争时，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的呢？尽管他们完全可以采取断然措施，但为了利用这两个国家，使其成为阻遏苏联势力扩张的屏障，而以及因为从本质上说两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处之泰然。

1937年11月，日德意三国缔结了反共协定，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割让苏台德地区的要求。结果1938年9月19日，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谈，在没有捷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缔结了容忍德国要求的所谓《慕尼黑协定》。

这件事在世界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再详加考察可知，当时英国张伯伦首相对纳粹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为将德国军队锐利的锋芒引向反苏战线，同盟国捷克被当作替罪羊出卖，《慕尼黑协定》便建立在牺牲捷克的基础上。

捷克拥有150万训练有素的兵力及世界一流军工厂制造的优良武器，空军也拥有1500架飞机，而且在位于波希米亚高原的该国周围连绵的高山上还有耗资4亿美元的小马其诺防线。

只要英法采取强硬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就会不战而退，然而最后的机会却被白白葬送了。而英法两国大使向捷克总统贝奈斯发出冷酷无情的最后通告，要他立刻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方案。经过通宵会议，捷克政府终于屈服，使捷克解体。消息一传开，全国百姓忍无可忍，他们流着泪水在布拉格的大街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捷克国民的屈辱和愤怒即使过了千年也不会忘记。

虽然英国为与包括法西斯独裁者在内的四国形成提携关系而

自得，但由于出卖同盟国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捷克认为与其选择不值得依赖的英法，不如依靠莫斯科谋求本国的安全保障。这是战后东欧圈转向苏联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历史学家萨尔贝米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序曲》中认为慕尼黑会谈是伦敦和巴黎有计划的产物并且认为到1936年为止，英国领导人“与希特勒之间形成了默契，允许其对苏联采取自由行动”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东西”。

就是说，当时，世界领导人们已经事先预见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对立，并为战后作了准备和设计。

即使在激战正酣之际，仍然只想着将时局导向有利于本国的意图是同一的。

这表现在有关所谓第二战线的拔河式的见解。

1942年，苏联度日如年般地苦苦等待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2年6月1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通告：“会谈结果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急课题取得完全谅解。”

可是，英国综合作战部长莫德巴登哪怕德国从苏联战场调动一兵一卒到西部战线他也不高兴。他访问了白宫，足足逗留了两周，与罗斯福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会谈，强烈反对开辟第二战场，提出首先进攻非洲，然后通过贝尔格莱德向华沙挺进的沿巴尔干半岛北上的迂回作战方案以取而代之。

英国极力反对横渡多佛尔海峡的作战方案，虽然美国反对英国的方案，支持横渡多佛尔海峡的作战方案，但1942年11月8日，还是由北非开始了进攻。

因为联军不想对苏联有所助益，英国则希望采取“德苏共灭”的作战方针。

另一方面美国也主张苏联“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对美

日战争的一种牵制作战。

到了 1943 年，第二战场还没有开辟，东部战线德国投入了 200 个师团。

英国梦想狠狠地削弱苏联的力量，使之在战后不再具有强大的实力，为此，它相信还应继续坚持慕尼黑政策。

1944 年 5 月 1 日决定诺曼底登陆，同年 6 月 6 日实现了这一作战计划，美英联军在法国海岸上陆，在这种情况下，直到 7 月 19 日，邱吉尔还主张在地中海牵制作战。

1943 年 10 月，斯大林一度从伦敦和巴黎召回大使，“公然批评联军对第二战场问题没有诚意”，但情况却没有大的改观。

邱吉尔在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述：他在 1944 年 8 月 15 日巴黎解放后的柏林争夺战中不禁想到“苏联就要成为自由世界最可怕的敌人啦”。

另一方面，苏联也是如此。

尽管美国屡次要求苏联尽快以最强大力攻击日军，但只是在看到美国 1945 年 7 月 16 日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同年 8 月 6 日将原子弹投到广岛，苏军才开始发动进攻。

在此可以理解第二战场并不是单纯战术上的问题。

虽然是同盟国，但内心却非常敌视，极度不信任。如上所述的这种历史事实成为今天美苏两大国在平行线上无休止的竞争产生的根源。

战后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认为：对投掷原子弹一事“如果迄今还在动摇，则尤其对正在分裂的这个世界而言，是可以比作犯罪的狂人之举”。

并叫嚷：“威胁‘贫困的住板棚的人们’的第二危险是专制及东欧警察政府……”

他还率先公然主张原子弹应作为权力政治的手段来运用，也说过“铁幕”之类的话。

邱吉尔在 1941 年为解救英国军队，看到苏联获得援助而非常欣喜，虽然为了消灭德国，要利用苏联，但却不想把胜利果实分给苏联，足见其贪婪成性。不仅如此，还想调动美国的力量来满足其未能满足的欲望。

他心中好像难以忘怀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就控制了地中海，也就控制了中东油田地带的哲学。

邱吉尔的这篇演说无疑是战争挑起者在为冷战火上浇油。

哈劳德·E. 斯塔森评论说：“军刀声犹在耳畔。”

第二个是 1947 年 3 月 12 日的“杜鲁门·德特林”宣言。当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尤尔逊在上院秘密外交会议上作证“土耳其是中东的钥匙”因而，5 月 22 日，杜鲁门在对土耳其和希腊的 4 亿美元援助法案上签了字。1947 年 6 月 5 日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具有杜鲁门案延伸性质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同年 12 月 19 日，杜鲁门总统向议会提出总额为 170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很多生命得以保全，政治、经济制度不至于全面崩溃，在革命中被挽救，都得益于美国救济局的努力。当时，胡佛任总统前就是救济委员，所谓马歇尔计划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实施的再次开展救济局活动以保护资本主义的政策。

1947 年 9 月苏联的安德烈·乔达诺夫对美国的这种变化进行了攻击：“世界分裂成了反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阵营。马歇尔计划是奴役欧洲的手段。”并指责美国“图谋统治世界”。

1947 年 10 月 5 日，苏联成立了共产党的国际机关（共产党

工人党的情报局)，1948年2月25日捷克共产化同年3月31日，强行封锁柏林。

而且，1949年4月4日由12国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所谓的N. A. T. O.成立，与此相应，1955年5月14日，8个共产党国家结成了华沙条约组织，其间发生了两个阵营直接冲突的朝鲜战争。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急切地采取这种反共路线固然是以乔治·科南的“封锁政策”（形成军事基地网的封锁作战）为理论支柱，不过其中也有1945年9月23日杜鲁门总统在苏联公布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为失去对原子弹的垄断而惴惴不安和美国外交政策内部隐藏着巨大的军产复合体的因素在起作用。

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通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大致理清了美苏两个阵营相互敌视与分裂的背景和经纬。

归根到底，地球上的全部问题全都由美苏两个大国垄断、左右，这基本上是为慕尼黑协定造成的不信任感笼罩的两大阵营无法隐藏的态度延伸。

很多人都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最后的战争”。

但是，如上所述，国家之上，国家周围交织着大国之间的矛盾，裁军会谈谈得挺欢，但实际上却在不断扩大军备，为第三次大战作准备。无论高兴也好，讨厌也好，这种危险的现实都必须接受，地球已到了大战爆发的前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和民族都发生了不少变化，由于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欧洲国家的弱衰弱已显而易见。

不过，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变化是产业社会的变化，这是人所共

见的。18 世纪后半期纺织机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现在回过头去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时却刮起了产业革命的新风，带来了中世纪权力阶层和封建经济制度的变革。不仅如此，它还诱使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变成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不用说国境的变更，还在地球上点燃了事关国家民族兴亡的战火。

回味逝去的这种历史空间，看看今天我们的生活，谁都无法否认，我们有意无意地已经卷入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涡流中。

航空器、通讯器的发展使地球缩小成极小的行星，原子力、人造卫星、电脑、机器人产业、遗传工程和宇宙飞船等高尖端的综合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向浩瀚无际的宇宙空间和梦境发起了挑战。

这虽然使武器装备复杂化和大型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威胁，但是，只有人类才会具备这种能力，这可以理解为繁荣的表现，给人类带来的是对前途的希望和信心。

因而可以说，现在正在变化着的产业社会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何等巨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将其当作即成事实来接受也未尝不可。

简言之，这可以解释为，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好，共产主义体制也好，都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而如果认为这种变化是某一方的胜利则是无理的。

如果说产业革命主要是关于生产的问题，那么，可以说今天的自由经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关于分配的问题。解放神学、法兰克福学说、欧洲共产主义在工资大战后揭示了对分配问题的新视角。也许这是历史的进步吧。

到二战为止可以说，发达国家的重要条件科学的发达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

但是，战后失去殖民地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英国的没落，不是来自技术的条件，而是来自与奴隶解放后贵族社会的没落一起

的经济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殖民地的丧失，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拥有广阔的国土、资源、人口、技术的综合实力的国家，可以延续优秀的文化。

现在地球上除美、苏、中这三个拥有广阔疆域的大国外，还可划分为属于白人集团社会的欧共体国家群，中东的阿拉伯回教圈，印度和非洲的黑人圈等。

不过，非洲仍可说是殖民地圈，而印度如果不能排除语言、教育、宗教的障碍，不能解决到 21 世纪人口将居世界第一位的难题，要想跻身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行列还需要一定的时日。

阿拉伯回教圈怎么样呢？从历史和地理位置看是著名的地区，但如果假定成立像欧共体那样的经济共同体的话，就不应该局限于宗教的阿拉伯主义的团结，而有必要从封闭的、孤立的信仰中摆脱出来。

不仅如此，还需要改善并解决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只是宗教而已，如果不把国力消耗在美苏的代理战争上而能相互共存的话，相信回教圈具有充足的繁荣要素。

他们是创造了先于古代希腊文明的东方文化一部分的以色列文化、回教文化及撒尔逊文化的伟大民族，这些文化构成了中世纪以前的地中海文明，因而留下了“地中海是阿拉伯人的湖泊”之言。

因而，他们有必要以开阔的视野面向世界。

欧洲共同体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地，同美国的关系犹如兄弟之家。即使对内因利害关系出现某种纷争，但一旦对外便会团结一致，这是基督教文化的白人同盟。

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洲等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是欧共体国家群的分支或共同圈，受的是基督教文明的影响。这些国家目前仍会在不摆脱欧共体国家群以及美国的影响圈情况下实现发展，他们要摆脱欧共体和美国的间接统治或作为间接殖民地排斥资本主义经济的惠泽和榨取相信并不容易。因为那直接关系到欧共体和美

国的兴亡。

二战之后，虽然很多民族都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了，但是，非洲广大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以及间接的阿拉伯回教圈和印度与欧共体和美国保持着经济和文化的从属关系。

换句话说，白人在地球上控制的空间依然广阔，其资源和劳动力作为培育、维持白人文明的重要养分及乳汁这一点并没有变化。

只是大战后，与经济、军事方面都得到强化发展的美国的影响力相比较，欧共体国家是迎来了老龄期的资本主义后期国家，在产业社会和军备竞争方面并不具备能够阻遏社会主义国家群扩张的力量。美国自然要通过北大西洋组织 N. A. T. O 担负起欧共体国家的安保问题，帮助其经济发展。从大体上看，美国和欧共体在文化和经济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集团。将这个集团解释为军事同盟是正当的。

根据这种推理，可以认为是思想和体制都不相同的美苏两大强国同与西方文明有着完全不同根源的中国在牵动着整个历史前进的车轮。

中国在奉行儒教、佛教的汉字圈中一直发挥着长久的历史影响力，只要她能像欧共体国家群构成经济共同体那样，形成黄人集团社会，采取平等的开放政策，就不能排除其实现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在内的广大的经济共荣圈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作为参与创造人类文明史上最悠久文明的民族，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不仅如此，她还是这样一个民族，作为白人国家群的殖民地，曾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在受尽一个世纪的蹂躏之后仍然存活下来。他们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反封建、反官僚、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名目下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进工业建设。

可以预见，他们要想通过技术革命参与第二次产业革命，达到美苏工业发展水平，就需要远东地区保持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

中国有句话叫“慢慢的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虽然这经常被解释为大陆人懒惰的表现，但其背后往往含有等待某种决定性时机的心境、态度、蔑视小人浮躁情绪的哲学。

放眼今后 50 年的中国工业化，中国赶上美苏的工业水准时，其自身就会发生巨大的质变，可以预期这是一种辩证法的发展。

不过，如果草率地判断这种变化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则是危险的，因为资本主义自身也将发生很多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50 年后的印度、非洲、南美洲等地域的变化和发展将无法保障其能继续维持同今天被称为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体制的隶属状态。

从地域位置及摆脱殖民地的目的看，反而不能说没有转向苏联或是中国的可能性；阿拉伯国家群的态度也不无变为中立，甚至亲苏、亲华的可能性。

产业社会和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完全取决于经济和国防上的利害关系。

再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1956 年 10 月 以色列、英国、法国三国进攻埃及，苏伊士问题爆发，漫长的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战争开始了。当时纳赛尔发表了三个半小时的演讲，他说：“在非洲地域 500 万白人和 3 亿非洲人之间的血腥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并宣布苏伊士国有化。不过，战争的背景在于极其丰富的石油贮量和该地域所具有的战略价值。

第二年，1957 年 8 月，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 5 亿美元的长期军事、经济援助，并通过政变建立了亲苏政权。

这也是觊觎石油。

1958 年 11 月 10 日，导致第二次柏林危机。

接着 1959 年 1 月 1 日，卡斯特罗进军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的古巴政权，公开处决了 5000 人。

这虽然只不过是在美国眼皮底下一个小岛上发生的变化而已，但她却成为西半球反美和超民族主义运动的基地。

而且她还成为自由世界上最令美国痛苦的肉中刺。

以色列和古巴对美苏两国而言是分担着同样作用的令人痛苦的癌细胞。

美国为什么会吃这样的苦头，责任并不完全在苏联的决策者。

1960 年以前 美国对外援助的 75% 投到了军事援助上。受援国家承担军事义务，美国企业摇身一变成为死亡商人。

这与吞食鱼钩上的鱼饵没什么区别。

对美国产业开放门户使得自己沦为无法摆脱美帝国主义的负债国，而负债国的增加却导致间接占领化和反美亲共化的双重现象。

美国操纵过多反共政府的过程妨碍了弱小国家的经济增长，腐败和道德堕落自不用说，还造成了少数的财阀和绝大多数的贫困，其结果造就出不少共产主义者或反美主义者。

在进行人类最后的军备竞争同时，军事受援国担心、害怕自己成为潜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消耗品。

早在 1959 年 美国就已在 30 个国家保留了 275 个军事基地，非常时期可以使用的基地超过了 1400 个。日本不过是美国在远东的最大的反共军事基地而已。

这里需要的基本经费约 40 亿美元 有 100 万美国士兵严阵以待。和 B652 轰炸机一道形成的是美国的封锁环，而且还配备了可以潜航 60 天以上对大洋进行戒备的核潜艇。

I. C. B. M, I. R. B. M, M. R. B. M, S. R. B. M 等导弹随时可以发射 战争只需要 15 分钟。

美国的这种战争准备威胁着世界众多的人们，使他们感到恐怖。

这就是虽然接受了美国援助却又要背叛美国的原因。

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按着自己的框架、趣味和利益不加区别地划分、干涉和规定世界，就是美国招致反感、指责和嫉恨的原因。

称世界警察指的就是依靠力量维持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努力，其实不过是暗地里拥护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而已，因而，如果不遭人嫌，不遭到反抗反倒不正常了。

这是因为美国的自由有时是被迫害的自由与可以迫害的自由并存的大棒加胡萝卜的自由，而更多的时候只是白人的自由。

美国拥有足以破坏地球还有剩余的大量核武器，这是与苏联扩大军备竞争的结果，苏联也拥有不亚于美国的大量核破坏力，这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据格拉温德·杰洛在《核战争》中记载：“放射能无形、无臭、无味，用手也摸不到。幸存者生不如死。”

本来是全世界的问题，美苏两国最高权力者却自作主张，任意左右数十亿生命，危险之极，不能不令人震惊。

那种对地球是毁灭还是存续的重大问题作出“应由美苏共同负责”的回答，就好比人类灭亡之后摆宴席或祭祀一样，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回避责任论。

如前所述，这种危险的根源决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的。而应该从二战之后对财富和技术这种经济力的垄断上去寻找，从破坏或试图破坏经济均衡上去寻找才明智。

从这种意义上说，防止核战争的途径是从经济力的垄断中摆脱出来。

可以想象很多白人会觉得下面的话刺耳，由此产生猜忌和恐怖，并杞人忧天以为会招致新的战争：中国极早确保其军事力量达到与美苏对等的地位有利于世界和平。理由是，将来在经济力上能与美苏对峙具有牵制能力的国家除了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了。

中国的成长现在就已经对美苏两大国构成了威胁，既然相信作为牵制势力，中国的地位是能够防止其他广大人类和地区遭受核侵害的唯一途径，就应该以人类的理智来接受，这个时期一定要到来。

陶醉于优越感的白人社会可能会看不顺眼，不过只要这条路能拯救人类使之共存，就应予以信赖，不是拒绝与反抗，而是给予协作与帮助，从中发现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才是为全人类着想的明智之举。

白人社会流行着幼稚的黄祸论——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一获胜，欧洲国家就联想到了过去蒙古人的侵犯，煽动起了对黄色人种的恐怖感，这就是黄祸论。

不过，鸦片战争以后，如果把白人对殖民地的侵略造成的损害称为白祸论的话，白祸论堪称黄祸论之父。以上两种论调都是以白人为中心的优越感的产物。——将前述途径当作将地球从核战争中解放出来的具体而又现实的努力、提案及祈祷来接受就能够减轻恐怖的负担。

忘记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北是大陆一部分的轻率态度是要不得的。

到了近代，欧洲人东进时，十字架背后誉藏着大炮，这是历史学家们指出的事实。

这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侍女，说得更难听些是走狗之说是是一致的。

回过头去看，这既有教会堕落的因素，也不无在异质性的东洋文化圈中大炮成为必要的工具而登场的因素在内。

公元 30 年左右，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的初期，本来指示的是从权力之下解放弱者，往大了说指示的是人类的解放和上帝的爱，

但到了中世纪个人的意识被从神出发服从神的教权时代的宗教理念所取代，变质为对个人的否定。

14 世纪后半到 16 世纪前半迎来了文艺复兴时代，呼唤的是个性的回归。虽然布鲁诺 1600 年因地动说惨遭焚刑悲运，但最终在宗教改革时期发现了个人主义的出路。

为了扫除撒尔逊人，帮助殉礼者，十字军从 1096 年开始先后发动了 7 次远征，使欧洲人付出了不小的牺牲。翻开基督教史可知，12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数次宗教一统中，牧师口中的宗教和人们眼中看到的宗教，很多情况下其差异就好比同一物体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的阳面与阴影的差异一样。

基督教文化是欧洲文明，是白人社会精神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基督教文明是发达国家引以为荣的白人帝国主义文明的本质，否定的人，反抗的人为数都不会少。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逾一个世纪的时间，由白人实行的帝国主义支配了地球广阔的空间，他们依靠剥削、榨取积累了财富与傲慢，这一事实是没有理由否定的。

这里便体现了宗教的本质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和苦闷。



以上的看法虽说是浮光掠影的，不尽成熟，但我还是信马由缰地从各个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形势作了探讨。

从总体上看，美苏之间的摩擦威胁着人类的存亡。

共产主义有这样的哲学：“在物质生产、交换的商品经济时代，资本家的生产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不公正的分配必然诱发革命。”由于这种理论的影响，有众多工人生存的地球往往不能保持平稳状态。

资本主义则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恶的，共产主义社会不

会因为进化而得到改善”的固定观念，盲目相信神的诅咒。

我们应该摆脱这种互不相认不共戴天的绝对主义和观念的旧壳，那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一种现存的制度而已，从这一立场出发，应尽快适应新的产业社会。

其实，只要能够成功地实现均等分配及控制人口增多，地球完全可以维持安定状态。

然而，生存竞争这一可怕的水流是无法完全断绝的，所有这些不过是理想而已。

自由和平等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到过的理想而已。未得到者与得到者之间连续的纷争就是历史的场景，强者取胜则是人类历史的教训。

本书也到了该收笔的时候啦。

人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恶魔。伟大的人，渺小的人，说穿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都是平凡的人而已。

所幸的是，弱肉强食的结果，使历史总是按着巨人指引的方向调整步履，一直前进而没有中断和沉沦。

跨国企业和经济援助，情报媒体和兵器体制，以及同军产复合体结合的政权干涉等人们耳熟的武器粉饰了间接支配下突出的新型殖民地形象，就像令人难以割舍的鸦片一样，这种不和谐的回声永远不会自动远离人类社会。

审判历史上的悲运及不公正的神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历史不过是永无休止滔滔奔流的生存竞争的江水而已。

1985年11月16日脱稿

引用及参考文献

- | (书名) | (著者) |
|-------------------------|-----------|
| 1. 世界史概论 | H. G. 沃尔兹 |
| 2. 韩国史的延长·日本古代史 | 文定昌 |
| 3. 朝鲜史 | 旗田巍 |
| 4. 近代朝鲜思想 | 姜在彦 |
| 5. 朝鲜近代史 | 渡边学 |
| 6. 朝鲜历史 | 朝鲜史研究会 |
| 7. 朝鲜史入门 | 朝鲜史研究会 |
| 8. 日本历史 中央文库,(20)~(26)卷 | 中央公论社 |
| 9. 日韩合并小史 | 山边健太郎 |
| 10. 日本统治下的朝鲜 | 山边健太郎 |
| 11. 朝鲜 | 金达守 |
| 12. 激动的韩国 | 松本博一 |
| 13. 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 | 朴殷植 |
| 14.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 | 李康勋 |
| 15. 中国 | 里蒂摩阿 |
| 16. 中国现代史 | 岩村三千夫等二人 |
| 17. 孙文和中国革命 | 野泽丰 |
| 18. 实录鸦片战争 | 陈舜臣 |
| 19. 朝鲜战争 | 神谷不二 |
| 20. 朝鲜战争的爆发 | 信夫清三郎 |
| 21. 朝鲜人民军南进和撤退 | 朱荣福 |
| 22. 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 | 新日本出版社 |
| 23. 现代国际政治史,(1)~(4)卷 | D. F. 福列明 |
| 24. 美国在亚洲的作用 | D. F. 福列明 |

25. 亚洲人民的历史上,下 列奥·休伯门
26. 伊藤博文暗杀记录 明治百年史丛书 原书房
27. 昭和史 远山茂树等三人
28. 中日战争 白井胜美
29. 美洲外交的基本问题 乔治·肯南
30. 美洲外交五十年 乔治·肯南
31. 中国革命思想 野村浩一
32. 某律师的生涯 布施柑治
33. 朝鲜经济 隅谷三喜男
34. 朝鲜半岛的政治力学 玉城素
35. 冷战 F. L. 苏曼
36. 蹇蹇录 陆奥宗光
37. 毛泽东传 贝冢茂树
38. 实践论 矛盾论 毛泽东
39. 惩毖录 柳成龙
40. 恶魔的饱食上,下 森村诚一
41. 核战争 格拉温德·杰洛
42. 如果核战爆发 拉尔夫·E. 赖朴
43. 恶的逻辑上,下 仓前盛通
44. 美洲黑人 格拉温德·波兰
45. 奴隶者 朱丽亚·蕾斯塔
46. 国家与革命 列宁
47. 帝国主义 列宁
48. 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
49. 为了觉醒的旅行 埃德加·斯诺
50. 论斯大林主义 G. 马路纪内等二人
51. 纳粹时代 H. 马乌等二人
52.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上,下 乔伊斯·考尔考

-
53. 现代帝国主义 H·马各道夫
54. 军事费 岛恭彦
55. 国际经济的政治学 渡边经彦
56. 西欧共产主义 A. 克列杰尔
57. 俄罗斯革命五十年 L. 道依查
58. 震惊世界的十天上, 下 琼, 里德
59. 地底下可笑的故事 上野英信
60. 政权争夺 户川猪佐武
61. 权力斗争 鲁道夫.V. 叶林格
62. 俄罗斯文学史 叶拉尔
63. 俄罗斯文学指南 金子达彦
64. 满洲日日新闻附录, 明治 43 年 2 月 8 日~15 日 第 829 号~
836 号